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LITERATURA ROMÂNĂ

罗马尼亚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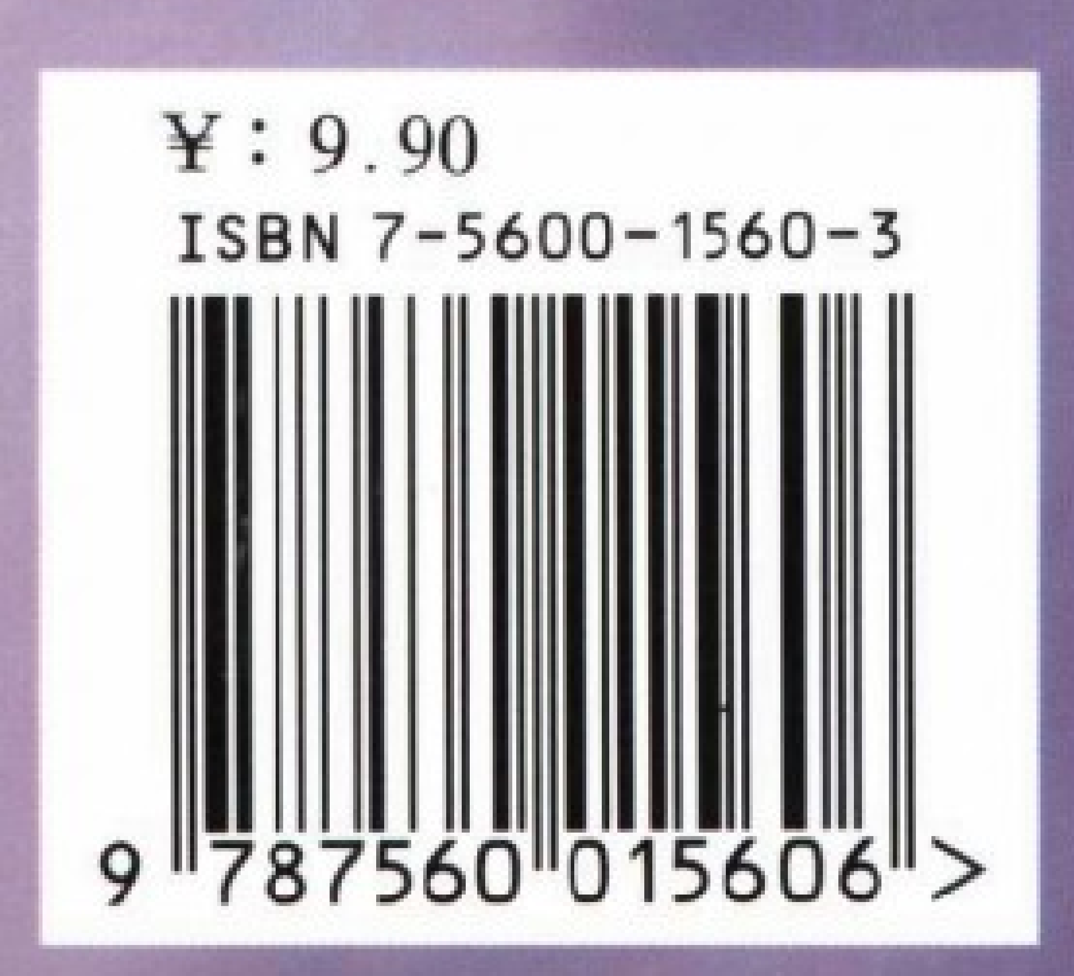
冯志臣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阿根廷文学》 盛 力
《阿拉伯文学》 齐明敏
《爱尔兰文学》 陈 恕
《巴西文学》 孙成敖
《保加利亚文学》 杨燕杰
《秘鲁文学》 刘晓眉
《波兰文学》 易丽君
《德语文学》 王炳钧
《俄罗斯文学》 张建华
《法国文学》 陈振尧
《豪萨文学》 王正龙
《捷克文学》 李 梅、杨 春
《魁北克文学》 孙桂荣
《罗马尼亚文学》 冯志臣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张 放
《美国文学》 金 莉、秦亚青
《墨西哥文学》 李德恩
《日本文学》 林为龙 等
《斯里兰卡文学》 邵铁生
《西班牙文学》 董燕生
《意大利文学》 沈萼梅
《英国文学》 何其莘

责任编辑：王红卫
封面设计：殷志维





一个学术性教育性
出版机构
网址：http://www.fltrp.com.cn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罗马尼亚文学

冯志臣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尼亚文学/冯志臣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6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ISBN 7-5600-1560-3
Ⅰ.罗… Ⅱ.冯… Ⅲ.文学史-罗马尼亚 Ⅳ.I5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456 号

罗马尼亚文学
冯志臣 著
* * *
责任编辑:王红且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1)
网　　址: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375
字　　数:185 千字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560-3/H·875
定　　价: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问世之前，我国尚无从古至今全面介绍罗马尼亚文学的专著。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把该国文学的演化浓缩成十几万字，贸然泼洒纸上，以期使读者阅后能够了解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脉络，并可就时代分野、作家介绍、作品评价等方面的某些问题，同专家们商榷。

罗马尼亚文学属小国文学，许多史实和背景鲜为人知，所以该书结合文学萌生和成长的轨迹，适度介绍了罗马尼亚民族与历史的演变过程，烘托文学发展的主脉。民间文学在该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单列一章。书面文学按时代发展的主脉，对重大事件、流派、主要作家与作品作了系统、详尽的介绍。所选材料简练、准确，对作家与作品评价相对客观、公正。介绍和评价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和作家是本书的重要部分。笔者广泛涉猎各派之言，切实把握历史事实，对该阶段的成功与失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供批评、指正。

引子

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层面，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它的萌生和演化依傍于一个民族的成长轨迹，舍此则无法理解它的诸多个性。因此，要洞察罗马尼亚文学的全貌，须对这个民族有基本的认识。

罗马尼亚地处巴尔干半岛北端，东临黑海，喀尔巴阡山纵贯全境，其南麓与东行入海的多瑙河交汇。公元前1世纪，以布雷毕斯塔为首的古代部族达契亚人在此立国。达契亚土地肥沃，森林茂盛，牧场丰饶，盛产金银、岩盐。除农、牧业外居民也从事果树与葡萄种植，原始手工业开始兴起。他们与黑海沿岸的古希腊殖民者保持贸易往来，出售粮食、蜂蜜、蜂蜡、鱼类和兽皮，换回植物油、纺织物、各类生活用具和装饰品。贸易往来促进了希腊文化对达契亚的影响。布雷毕斯塔死后，德切巴尔联合各路部族，于公元1世纪建立起集权制国家。由于精于治理，达契亚国的经济和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当前罗马尼亚境内丰富的出土文物和古堡遗址就是有力的佐证。当时，铁制用具相当普遍，白银和青铜饰物亦很精美，各式陶器通常配以花卉、动物或几何图案。农业、矿冶、金属加工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反映了那时居民的文明程度。达契亚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出土题铭都是借用古希腊字母或拉丁字母拼写而成。他们对植物、医学、天文也颇有研究，曾制定包含月份和星期划分

的达契亚历,古都塞尔米泽阶杜萨的一所环状廊柱神庙就是依上述历法定制修造的。神庙是人民生活中的一根精神支柱,各种仪式由民众遴选出的大祭祀主持。诸神之中最受崇敬的是战神扎莫尔克西斯。达契亚人骁勇善战,不畏强暴不畏死。每逢出征,必饮一口多瑙河圣水,然后跟随刻有张着大口的狼首的金属战旗拼杀于敌阵。当时,罗马帝国的决策者已经把达契亚纳入扩张范围之内,兵力从多瑙河南岸地区向北逼近,征服与反征服的战火一触即发。公元 101 年,罗马军队架舟桥北渡多瑙河,向达契亚发起进攻。数次鏖战后,达契亚处于劣势,德切巴尔于次年求和。和约的条件是苛刻的,除割让南部大片领土外,还须拆除各个要塞的防御工事。不忍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德切巴尔伺机再起,公元 105 至 106 年爆发了第二次达契亚战争。罗马大军沿几条通道向达契亚腹地挺进,国都塞尔米泽阶杜萨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时日迁延,水尽粮绝,德切巴尔率余部舍弃都城,退避山林。追兵逼近时,他杀身取义,宁死不做阶下囚。他的英雄气概载入青史,成为罗马尼亚后世文学中鼓舞民族精神的一段美谈。

公元 106 年,达契亚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自此开始了土著人大规模罗马化的过程,直至公元 271 年衰落的罗马帝国放弃这一地区。

达契亚的罗马化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罗马帝国具有较高的文化与文明;二是罗马帝国强制推行其行政、军事体制;三是土著人与罗马殖民者的大量交往和通婚。达契亚覆灭后,罗马帝国为加强这一偏远行省,从临近地区,甚至从腹地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有组织地向此移民。殖民者和罗马帝国士兵遍布城乡,土著居民在行政、军事体制的制约下逐步接受了征服者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习俗信仰。语言的更替是达契亚罗马化的主要标志,行政、司法、军事机构,乃至民间的商贸、农事和各种往来,凡有殖民者的地方都用拉丁语交流沟通,这极大地促进了达契亚的罗马化进程。几代人的通婚共处,更使这一民族融合的趋势不可逆转。

公元271年，罗马帝国放弃达契亚行省，撤回多瑙河南岸，但这并不等于融合过程中的达契亚—罗马居民的全部撤离和民族融合的终止。相反，在此后数百年的欧亚民族大迁徙中，融合过程仍在扩展和持续，直至公元7世纪左右形成罗马尼亚民族和罗马尼亚语。

罗马尼亚民族是达契亚人和罗马殖民者的后裔，罗马尼亚语的语法体系和基本词汇均直接来自拉丁语，它和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一样，属罗曼语族。虽然公元6至7世纪南部斯拉夫人对罗马尼亚产生了强劲影响，在语言、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结构方面留下深深印痕，但罗马尼亚民族的基本特征和世代相传的语言依旧保持着固有的拉丁性。

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元7至16世纪是罗马尼亚中世纪时代，而17至18世纪作为中世纪的尾声，是向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封建社会由初级的村社向更高的社会组织形式发展。村社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劳动组织形式，一个村社相当于一个自然村。村社土地由耕地和非耕地组成。耕地按户分配，非耕地包括草场、牧场、树林和池塘，归村社共同使用。村社内成员平等相处，公众事物则由集体推举的头人掌管。随着生产的发展，村社内部产生阶级分化，头人逐步侵吞土地，敛聚资产，成为贵族；丧失土地的村社成员沦为附庸农。此后，村社头人之间又互相兼并，形成了一些规模不等的小公国。据史料记载，公元9至13世纪，在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13个具有这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国家雏形，封建关系成为限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

公元14世纪，在罗马尼亚境内形成了三个封建体制的国家，史书上称之为公国，即：罗马尼亚公国（含多布罗加公国）、摩尔多瓦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这三个公国在这部文学史中要经常提及，它们同宗同源，使用同一母语，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长期分立，直至1918年才最后实现统一。在这期间，上述三个公国的文化形态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虽各有特色，但它们之间的相

互影响和紧密联系却贯彻始终，共同造就了当今罗马尼亚的文化风貌。其中有两条主线应该提及，一是罗马尼亚民族自形成以来就面临着异族入侵和周边王国、帝国的威胁，他们一直为捍卫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二是追求民族归一，摆脱民族压迫，缔造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实现世代人的共同理想。贴近生活的文学是现实的艺术反映，它的诸多聚焦点肯定不会脱离历史造就的民族演化主线，历史英雄业绩和伟大人物自然构成文学赞颂的主旋律。

以立国而言，罗马尼亚民族永远不会忘记缔造初始公国的大公们。1330 年秋，巴沙拉布一世在兼并诸侯抵御鞑靼的基础上，击败匈牙利征伐军，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建立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公国。此后，滨临黑海的多布罗加公国为抗击奥斯曼帝国入侵，并入了同宗同族的罗马尼亚公国。喀尔巴阡山东侧的大片土地属摩尔多瓦公国，它的开国大公有两位。第一位大公德拉戈什于 1343 年间为驱逐鞑靼，从马拉穆列什地区东进，建立了依附匈牙利的小公国。1539 年，另一位大公博格丹反叛匈牙利国王，亦从马拉穆列什东进，联合当地居民接管德拉戈什的后裔治理的领地，宣告摩尔多瓦公国独立。喀尔巴阡山山弓西北侧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公元 12 世纪，该地区的几个小公国陆续被匈牙利征服，形成了一个臣服匈牙利的封建公国。大公由匈牙利国王任命，但国家的管理方式依旧保持某种自治，此后的几个世纪中这里的罗马尼亚人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问题，开展了反复顽强的斗争。由于血统、语言和文化底蕴的同一性，这三个公国在长期的演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为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尤其对罗马尼亚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起了重大作用。

抗击外敌、拯国救民，永远是文学作品讴歌的主题。在整个中世纪，罗马尼亚诸公国一直遭到异族侵扰。除周边的鞑靼、波兰和匈牙利外，奥斯曼帝国当属主要威胁，其扩张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实属空前。但面对强敌，数百年中罗马尼亚诸公国举国上下并没

有退缩屈服，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保持了国家的存在，民众世代生息繁衍的土地没有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这旷日持久的民族大搏斗中，不乏名扬史册的辉煌战绩。罗马尼亚公国的老米尔恰大公在位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势力由南向北扩展到多瑙河一线。为此，老米尔恰大公加固河防，陈兵边陲，于 1394 年的洛维纳战役中击败雷帝巴亚基德素丹。数年后，奥斯曼军队再度发起进攻，占领多瑙河畔两个要塞，老米尔恰被迫臣服纳贡，但奥斯曼帝国不得干涉该公国的内部事务，从而保住了国家的存在。1418 年后，奥斯曼军队向特兰西瓦尼亚发起进攻。扬库大公联合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结成抗敌统一阵线，自 1443 年起连续取得胜利。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在博尔格拉德(现阿尔巴 — 尤利亚)击败穆罕默德二世，从而延缓了奥斯曼帝国沿多瑙河向中欧的推进。博尔格拉德大捷数天后，扬库大公死于霍乱。罗马尼亚公国的采佩什大公也曾在 15 世纪中叶英勇抗击穆罕默德二世，但由于大贵族的背叛而丧失王位，酿成了历史上的一次悲剧。摩尔多瓦公国的斯特凡大公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斗争中战功赫赫，享誉整个欧洲。他幼时就经历了同鞑靼人较量的火的洗礼，登上王位后依靠自由农和小贵族，成功遏制了大贵族的势力，屡次挫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对国家内政的干涉。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他力图同罗马尼亚公国结成同盟，派遣使者争取教皇和威尼斯的支持。成功的外交和灵活的战术，尤其是民众的支持，使他能够于 1475 年在瓦斯露伊以少量兵力击垮骄横的奥斯曼大军，赢得遭受奥斯曼威胁的欧洲各国人民的钦佩。罗马尼亚公国的勇敢的米哈依大公，是中世纪另一位抗击奥斯曼的英雄。他面对强敌入侵的威胁，首先同姊妹国家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达成协议，而后取得德国皇帝鲁道尔夫二世的允诺，抓住有利时机向奥斯曼帝国设在多瑙河沿岸的要塞发起攻击。奥斯曼素丹闻讯后，派席南伯夏率重兵增援，于 1595 年在克鲁格莱尼受挫。不久，奥斯曼军队再渡多瑙河，卷土重来，终被勇敢的米哈依大公全部歼灭。

战场失利，迫使奥斯曼素丹同罗马尼亚公国签订了和约。米哈依大公的另一历史功绩是他第一次实现了罗马尼亚人民世代追求的民族统一。他于1599年兼并特兰西瓦尼亚，次年占领摩尔多瓦，从而勇敢的米哈依成为罗马尼亚公国、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大统一的大公。1600年的统一深深印在罗马尼亚民族的心中。但此次统一为时不久就遭到大贵族的背叛和匈、波、德等外国势力的干预，勇敢的米哈依于1601年在图尔达平原的军营中被害。

公元17至18世纪，罗马尼亚诸公国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同时它们还面临着正在崛起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沙俄帝国的威胁，三大帝国的火并经常在上述三个公国的领土上进行。罗马尼亚人民热切希望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束缚，但也不愿因此而落入另外两个帝国的魔掌。所以，明智的大公们通常采取均衡外交，利用三大帝国之间的矛盾保住国家的存在，伺机巩固政权，发展社会、文化。17世纪中期，罗马尼亚公国的M.巴沙拉布大公和摩尔多瓦公国的V.卢普大公都是巧妙利用国际环境，依靠本国贵族与外部势力抗衡，在国家治理、经济与文化发展等方面取得突出建树的。18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有所削弱，罗马尼亚公国大公C.布伦科维亚努在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基础上，试图在国家独立方面反抗异族束缚。为此，他同他的四个儿子被奥斯曼素丹寻机处死。摩尔多瓦的D.刊特米尔大公是位杰出的人文学者，为了国家的独立他曾同沙俄彼得大帝结盟，共同打击奥斯曼帝国，不幸失败。面对罗马尼亚贵族的屡次反叛和广大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奥斯曼宫廷对土著大公逐渐失去信任，于是从伊斯坦布尔郊区法纳尔选派大公，自此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法纳尔王朝。异族大公的统治加剧了社会、政治与民族矛盾，最终引发了1821年的革命。在这段黑暗的时期中，罗马尼亚大部分地区遭到奥斯曼帝国的无情蹂躏，奥地利和沙俄也分别割据了罗马尼亚的大片领土。特兰西瓦尼亚于1699年被奥地利占领后，当地居民遭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在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784年爆发了由霍利亚、克洛什卡和克里山领导的具有深刻社会与民族意义的农民暴动,要求解除农奴制、赋税平等、惩罚贵族。起义失败后,领导者被当局车裂处死。

罗马尼亚中世纪文化既有整个欧洲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其反映民族生活与愿望的突出个性。在民间文学方面,无论民歌、民谣或者神话传说,都与民风民俗、村社生活、农牧劳作有密切关联,其中不乏反抗暴虐、抗击异族侵扰的英雄史篇。另一方面,文人文学则含有时代赋予的浓重文化积淀,拜占庭文化、古斯拉夫文化、来自西欧和中欧的拉丁文化,都对罗马尼亚本土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主要反映在宗教和史学两个方面。罗马尼亚文字出现之前,文化的传播载体曾是古斯拉夫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且使用范围仅限于宫廷、教会和文人,不具备广泛的群众性。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如一股春风,极大地促进了罗马尼亚文化的发展。因而,中世纪中、后期,各地陆续出现了传播知识的学堂、图书室和印刷所,有识之士开始注重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世俗生活在各类作品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反映。尤其重要的是,在这股人文主义潮流中,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拉丁血统、拉丁语源的探讨大大超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它在历史发展的若干阶段成为联系三个公国的紧密纽带,激励社会各界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在这方面,18世纪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阿尔迪亚尔学派就是明证。该学派通过历史和语言研究,充分证明了三个公国人民的拉丁渊源,并把这一思想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

18世纪末至1918年12月1日民族统一,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近代史时期。这里,有两条主线值得注意。一是三个公国力图摆脱异族统治,趋向民族统一;二是迎合时代精神,对国内各类机关进行现代化改造,适应欧洲发展的普遍潮流。

19世纪初期,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仍然处于奥斯曼法纳尔王朝的奴役下,人民不堪重负,1821年爆发了由图多尔·弗

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人民起义，革命烽火迅速蔓延罗南部奥尔特尼亚地区。农民抗租抗捐，不为地主劳作，要求分配田产。图多尔指挥义军沿途征战，攻入布加勒斯特城，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他为民执政两个月，使国内大贵族和奥斯曼素丹陷入一片恐慌，匆忙派兵镇压。义军退守奥尔特尼亚，双方对峙中，大贵族施展阴谋挑起内讧，图多尔被杀。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奥斯曼素丹惧于民众的愤怒情绪，自1822年起，不得不放弃从伊斯坦布尔选派大公的旧制，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重新由土著贵族执政。

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也波及罗马尼亚诸公国，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举起革命大旗，带领广大民众争取社会权利、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在摩尔多瓦公国，1848年3月27日，V.亚历山德里、M.考格尔尼恰努、I.库扎等文人在雅西召集大会，向大公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人民生活、撤销书刊检查、实行新闻自由等。请愿失败后，流亡的革命者又在布拉索夫起草了革命纲领，提出解放农奴分田地、取消贵族等级和公国统一等口号。在罗马尼亚公国，同年6月9日，革命者在伊斯拉兹举行集会，公布行动纲领和宪法草案，其根本要求有：公民权利平等、废除农奴制、耕者有其田、召开立宪会议和国家统一。6月11日，布加勒斯特民众起义，大公退位，革命者组成临时政府，突出的领导人有N.博尔切斯库等。正当他们准备还田于民、选举立宪会议、组织人民军队、宣布共和、统一国家时，奥斯曼军队越过多瑙河。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革命失败，主要领导人被捕或流亡国外。在特兰西瓦尼亚，A.扬库等四万余名罗马尼亚民众于1848年5月在布拉日集会，要求承认罗马尼亚民族权利、国家统一、废除农奴制、经济自由、高等教育用罗语授课等。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匈牙利革命者的支持，两股进步力量的冲突使哈布斯堡王朝有机可乘，从而导致革命失败。上述三个地区的革命发生在同一时期，具有共同的目的，虽然没有最后成功，但却使人民看到了自由与民族统一的曙光。

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罗马尼亚的革命者以全体人民做坚

实的后盾，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展开了顽强的外交和政治斗争。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巴黎和会上提出了罗马尼亚两个公国统一的问题。由于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和英国的激烈反对，只是名义上允许成立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联合公国，实际上仍保持两个政府、两个大公和两支部队。但是持进步立场的政治家们遵照人民意志，并没有完全屈从巴黎和会的决议。摩尔多瓦公国于 1859 年 1 月 5 日推举致力改革的 1848 年革命者 I. 库扎为摩尔多瓦大公。1 月 24 日，罗马尼亚公国也推举他为大公。库扎执政时间很短，仅有 7 年，但他以强烈的为国为民的热情和超人的政治、外交才干，迫使列强，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承认了罗马尼亚既成事实的统一。自此，欧洲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罗马尼亚。库扎和他的得力助手 M. 考格尔尼恰努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诸如政府机构和军队的一体化、土地法的实施等。办工厂、设银行、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两所大学也是在当时建立的。上述种种举措打破了若干世纪的封闭状态，大大推进了罗马尼亚的发展进程，为向资本主义过渡创造了初步条件。

1877 年 5 月 9 日，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罗马尼亚政府宣告国家独立，摆脱了数百年来奥斯曼帝国对这一地区的奴役和控制。这一成果来之不易，是罗马尼亚士兵协同俄军在保加利亚领土上浴血奋战，击溃奥斯曼部队后得到列强承认的。此后，1881 年，罗马尼亚宣布为王国，国王卡洛尔一世来自奥地利望族。政府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

这一时期，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统治阶层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引发了 1907 年震动全国的农民大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死伤二千五百余人，为历史和后世文学留下了悲壮、惨烈的一章。

20 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爆发了武装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开始时，罗马尼亚保持中立。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游说罗马尼亚参战，答应战争胜利后把奥匈帝国占领的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罗马尼亚，这在客观上符合罗马尼亚人民几个世纪来争取国家的民族与政治统一的愿望。权衡利弊，罗马尼亚政府于1916年8月15日参战，协同英、法、俄打击喀尔巴阡山一线的奥匈军队，解放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部分地区，此举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为挽回败局，德军调集重兵发动反攻。罗马尼亚势单力薄，国土大部沦丧，政府和军队退避摩尔多瓦，开辟新的战线。由于难民拥集，摩尔多瓦地区严重缺乏食宿、医疗条件，瘟疫夺走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但是，在这危难时刻，人民依旧满怀胜利希望，为光复国土、争取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的统一而奋斗。稍事休整后，罗马尼亚军队于1917年夏开始反攻，在奥伊图兹、莫勒什蒂和莫勒塞什蒂取得辉煌战绩，用热血和头颅守住了摩尔多瓦战线，拯救了濒临危亡的国家，加速了奥匈帝国等列强势力的削弱和解体。1918年2月，摩尔多瓦(亦称比萨拉比亚)宣布独立，摆脱自1812年开始的沙俄统治。4月，国家议会投票决定摩尔多瓦同罗马尼亚统一。同年11月，北部的布科维纳也通过其代表大会表决，与罗马尼亚联合。1918年12月1日，十万余人在阿尔巴—尤利亚集会，宣布特兰西瓦尼亚回归祖国，最终完成了罗马尼亚有史以来的民族大统一。

18世纪至1918年的近代时期，罗马尼亚的文化发展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是1848年革命前后，二是1877年国家取得独立之后。

1848年革命者追求的根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启蒙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个方面。启蒙主义直接承袭阿尔迪亚尔学派，它旨在通过文化途径证实并传播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拉丁性，达到民族解放和统一的目的。革命浪漫主义则持激进态度，主张文化行为必须具有突出的政治色彩，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唤醒和动员民众。这一阶段，G.阿萨基、I.H.勒杜列斯库和G.巴利丘的业绩尤为突出。他们分别在摩尔多瓦公国、罗马尼亚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建剧院，出版报纸，兴办教育。在他们的培育和带动下，出现了1848

年考格尔尼恰努、博尔切斯库等一代以学者和作家为主体的革命者。学术研究方面,弘扬民族精神的史学和语言学成果累累。文学纳入欧洲轨道,浪漫主义作品层出不穷,继果列斯库、穆穆列亚努之后,涌现了V.亚历山德里、G.亚历山德雷斯库、C.博利亚克、C.内格卢兹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罗马尼亚文学从而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877年罗马尼亚赢得独立后,各个领域趋向革新,喀尔巴阡山两侧的文化联系愈益密切,高涨的民族统一意识造就了杰出作家。此时,V.亚历山德里的诗歌以其赞颂独立战争中士兵的英雄事迹而达到顶峰,继而涌现出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新的作家群体。诗歌方面,M.埃米内斯库的作品凝重深邃,富于现代性,在后浪漫主义诗歌中具有国际影响。I.克良格体现了民间作家的创作天才,他的脍炙人口的故事至今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I.L.卡拉迦列不仅以戏剧享誉文坛,他的针砭时弊的讽刺小说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上述三位作家使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文学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此外,原籍特兰西瓦尼亚的I.斯拉维支、G.科什布克、O.戈加等也分别在小说、诗歌方面对民族文学的崛起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的历史发展进入现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使用得到相对集中,加之1921年土地法和扶持民族工业的政策出台,造就了1918至1938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在社会结构方面,中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大量出现,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队伍逐步形成,并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在1921年成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罗马尼亚的文化、教育、科学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国内外的适宜因素保证了罗马尼亚的综合实力在1934至1938年间得到明显发展,石油、天然气和黄金产量居欧洲国家第二位,小

麦产量居欧洲第四位，成为东南欧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此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罗马尼亚，不断冲击工农业和贸易的发展。职工大批失业，铁路、石油、印刷、冶金、采掘、纺织等行业工潮迭起，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其中，1933 年的普拉霍瓦石油工人大罢工和格里维察铁路工人大罢工最为著名，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势力也在罗马尼亚滋生繁育，排犹、反共等极端思想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铁卫军等臭名昭著的组织动辄采取暗杀手段，使国家陷入政治恐怖之中。这股势力曾一度得到实施君主极权的卡洛尔二世的支持，民主进步力量从而肩负反法西斯和反君主专制的双重任务。德国纳粹力量急剧扩张，罗马尼亚国内右翼政治集团进一步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向柏林做了某些妥协和让步。为此，政界和文化界一批著名人士，诸如 N. 约尔加、M. 拉列亚、G. 克林内斯库等奋起抗争，呼吁各界人士警惕法西斯危险，为保卫国家主权和独立而奉献自己的力量。1939 年 8 月，法、英、苏谈判破裂后苏、德条约签字，罗马尼亚的处境变得更加严峻，国家肢解、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同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马尼亚囿于国内外局势，曾在短时间内采取中立立场，并为沦丧的波兰提供方便条件。但是，由于德军在西线的节节胜利和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尤其是为了维护王室的利益，卡洛尔二世于 1940 年 5 月 20 日建议放弃中立，采取“适应现实”的政策，这实质上就是亲近德国。尽管如此，德国法西斯也没有放弃肢解罗马尼亚的计划。依据苏、德条约，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入苏联。为了满足盟友要求，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地区和多布罗加南部也被希特勒分别划归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面对这种情况，卡洛尔二世决定在军界挑选实权人物执掌政府。1940 年 9 月 4 日，I. 安东内斯库将军正式组阁，9 月 6 日卡洛尔二世被迫退位。同日，米哈依王储宣誓继位，授予政府极大权力。自此，开始了安东内斯库法西斯军事独裁时期，王室成了点缀。安东内斯库的上

台得到柏林和国内法西斯组织铁卫军的承认，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两大党派也予以支持，认为安东内斯库是一位“优秀的爱国者和军人”，期望他能在战争环境中随机运筹，保住国家的存在，在适当时机将罗马尼亚国界恢复到1918年的状态。安东内斯库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扼杀国内有限的民主和自由，并于1941年6月22日把罗马尼亚拖入反苏战争。罗军7月27日攻占并入苏联的比萨拉比亚全境后，继续向东推进，但此时战局的发展对希特勒集团愈益不利，罗军损失惨重，引起政界和军方的忧虑和不满。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纷纷抗议，要求罗马尼亚政府退出这场罪恶战争。在苏军强大攻势打击下，加上国内因素的压力，安东内斯库试图单方求和，可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和谈没有结果。在这段时间内，罗马尼亚共产党与王室和军队保持接触，于1944年4月联合左翼力量组成了工人统一阵线，旨在推翻安东内斯库政权，退出战争，加入反法西斯阵营。5月，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也加入阵线。6月，组建民族民主同盟，为罗马尼亚退出希特勒集团、解放德军占领领土、推翻独裁制度和实现和平做准备。同时，各方力量加强同王室与军方部分高级将领的联系，共同组织了8月23日的武装政变，逮捕了军事独裁者安东内斯库。自此，罗军和爱国武装力量配合盟军，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解放了罗马尼亚大片领土。战争结束后，罗马尼亚于1945年3月6日组建民族民主阵线政府，开始实施土地改革等民主措施。1947年12月30日米哈依国王退位，同日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阶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由于摆脱了数百年异族统治和束缚，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现代化进程较快。在适宜的条件下，文化、教育、科技等发展迅速，各类学科均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例如史学方面的N.约尔加、哲学领域的L.布拉加、音乐界的G.埃内斯库、绘画和雕塑艺术的N.托尼查和C.布伦库什等。

这一阶段，文学创作是在社会、政治动荡和世界各种思潮激烈

角逐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成果显著。尽管其演化环境相当复杂，但罗马尼亚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却一直保持着民主传统，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在欧洲文学中享有声誉。散文方面，M.萨多维亚努和I.雷布里亚努是两员主将，他们以高超的艺术天才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创作了大量小说，为同代人和后世树立了楷模。诗歌方面，T.阿尔盖茨和L.布拉加带动了一批新人，把罗马尼亚诗歌创作推向另一个顶峰。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人才辈出，E.洛维内斯库、G.伊布勒依里亚努、G.克林内斯库等都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目 录

一、民间文学

世世代代流传于民间的口头创作是罗马尼亚文学的源头。它伴随着罗马尼亚民族在喀尔巴阡山麓和多瑙河畔诞生、成长，以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魅力。在人类文化衍生的长河中，它对罗马尼亚语言的凝练和文学的萌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成为后世作家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其影响深远、巨大。千百年来，大量的民间文学创作以其稚嫩、通俗、明快、直露的风格为平民提供了真挚的美的享受，其中有些作品堪称不可企及的典范，成为罗马尼亚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传世瑰宝。因此，可以说舍弃民间文学，不足以洞察该民族的文学发展全貌。

民间文学是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现已采录到的早期民间作品，除少数表现人与自然搏斗的内容外，大多形成于封建社会初期阶段，同当时的村社密切关联，集中反映了群体生活的各个侧面，民风民俗、日常劳作、理想追求、哀苦欢乐是这类作品的主要表现题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对立，反压迫、反剥削、抗击异族入侵也逐渐成了民间文学的表现主题。社会主义阶段，罗马尼亚人民也创作了大量的歌颂新社会的民歌、民谣。书面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是群众文化的主要传播载体。书面文学出现之后，这两类文学沿着各自的轨迹演化发展，但又相互影响。民间文

学应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中延续至今。

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存在，研究人员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始于11世纪前半叶。在《圣徒杰拉尔德传》中有过一段记载，讲的是这位圣徒在罗马尼亚某地过夜时，听到一个磨面妇女唱的一首悲哀的歌。15世纪，摩尔多瓦公国编年史家曾记述斯特凡大公时期凡有贵族聚会，必有歌谣助兴，尤其是叙事歌谣。自16世纪起，有关民间创作的记载日益增多，内容更加具体。例如，罗马尼亚公国的巴沙拉布大公在《家训》中曾提到民间流传的乌鸫鸟的故事。匈牙利诗人巴林特在其作品中也提到一首关于罗马尼亚牧羊女在山野寻找离群绵羊的著名歌谣。1574年，波兰编年史家斯特里科夫斯基去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中，经过罗马尼亚。他说，那里有个古老习俗，人们聚会时总要唱一些颂扬勇士的民歌，而且有乐器伴奏。瑞典国王的使者保尔于1630年途经罗马尼亚时，也看到了下层百姓演唱民谣的场面。17世纪，教会人士开始重视民歌、民谣的影响，首次用文字记载了新年前后民间进行的与歌谣有直接关系的民俗活动。大主教多索夫特伊翻译《圣诗》时，曾经把民间诗歌的韵律作为楷模。1694年，编年史家康塔库吉诺在《罗马尼亚公国史》中明确指出民间创作的文献价值。他说，许多作品不仅生动描绘了前人的生活和事迹，而且也十分简练地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进入18世纪，著名学者刊特米尔和苏尔泽尔都十分推崇民间创作，高度评价民间文化。自19世纪起，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书面文学相互影响，并行发展。一方面是口头文学的创作者与传播者开始用规范的文学语言约束自己，接受书面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批文人，例如潘恩、亚历山德里等，开始到民间采风，对民间创作进行加工整理，予以出版。由于他们和后人的努力，民间创作极大地促进了书面文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甚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一些作家，都曾取材并受益于民间文学。

罗马尼亚民间文学的创作形式异常丰富。韵文中有题材多样的习俗诗、史诗、民歌、民谣、谚语、谜语、民间戏剧等；散文类包括

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童话和笑话。上述类别的作品虽然形成年代和流传地区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深厚的民族同一性,主要作品都凝聚着这个民族所共有的多彩语言、独特风俗、历史经历、人生与社会追求的积淀,成为全体人民共享的文化财富。二是对乡土的真挚的爱,每片土地和树林都浸透着民间文学创作者的全部感情和想像。他们在这里生存繁衍,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与他们的欢乐和痛苦紧密相连。热爱生活、热爱乡土贯穿了整个民间文学。

习俗诗

可供演唱的习俗诗是民间文学的核心。根据研究人员考证,罗马尼亚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口头文学均与日常劳作、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风俗有关,某些作品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开始阶段,甚至更早。鉴于这类诗歌的独特地位,文学工作者把它们称为习俗诗,列入民间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习俗诗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类,即:新年习俗诗、春夏习俗诗、生辰婚礼丧葬习俗诗和符咒。

新年习俗诗

岁末来临,新春伊始,这对从事农牧业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总要抽空庆祝一番。罗马尼亚的有关庆祝活动围绕圣诞节和元旦,在 12 月 24 日至 1 月 7 日之间展开。庆祝形式丰富多彩,其中有新春贺喜(科林德)、木犁贺喜(普路古肖尔)、柳枝贺喜(索尔科瓦)、面具舞、山羊舞、木偶剧等。下面主要介绍与民间文学关系密切的新春贺喜和木犁贺喜。

新春贺喜历史悠久,源自古时村社时期。喜令虽有大致模式,但因时因地却产生大量变种,题材相当丰富。演唱时配以笛子、小提琴等乐器,在优美的曲调和活泼的气氛中表达新春之喜和各种美好愿望。这类活动通常在圣诞夜或除夕夜举行。拜年贺喜是群体活动,参加者多为少年儿童和青年男子,偶有女孩儿参加。他们穿着民族服装结成一队,带着特制道具挨门祝贺节日。得到主人允许后,他们走进院子,先在门口或窗前唱一段节日喜令,然后进

入室内，视主人职业、年龄、地位等情况，唱一大段内容贴切的喜庆贺词。如果主人高兴，他们还可以再唱两三段小令。收到主人为他们准备的食品或礼物后，出门之前唱一段感谢词，载歌载舞回到街上，转到别家拜年。

新春喜令有两类。一类是儿童喜令，形式短小活泼，内容单纯真挚，辞旧迎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这类喜令主要涉及的方面。接受贺喜时，主人常把苹果、梨、核桃、榛子和面包圈等送给他们品尝。这时，孩子们就会唱起风趣的短歌，作为回报。有些地区杂以柳枝贺喜。拜年的儿童用事先准备好的柳枝或饰有彩纸的短棍，轻触主人家的屋门、粮仓门、畜舍门或屋梁，或者用短棍拨弄灶膛的火炭，预祝阖家幸福和来年丰收。另一类是成人喜令，题材丰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面对任何年龄、任何职业、任何处境的主人，贺喜者都能随机选择合适的喜令，予以演唱。这一段演唱是喜令的主体，内容稳定，程式少有变化，世代流传。例如，遇到农民，他们演唱田间劳作、五谷丰登；遇到年轻人，演唱猎狮捕鹿，称颂猎手矫健勇敢；遇到新婚者，演唱婚礼故事，夸奖郎勤女貌。主体部分内容古朴，情节离奇，意象美妙，夸张、比喻、象征手法比比皆是。由于喜令带有针对性，主体之前依主人情况冠以前导词，如“年轻人啊，美好的年轻人！”，“花朵般的姑娘啊，洁白的苹果花！”应音乐的需要，这种前导词在喜令中反复出现。直至结尾部分，演唱者才加上对主人的新春祝愿。

木犁贺喜在新年前后举行。贺喜人在主人家中唱完喜令之后，如果带着木犁，走出院子时还要象征性地在地上犁一道浅沟，以示来年五谷丰登。起初，使用的木犁是二至四头黄牛拉的真犁；现在，使用的是道具木犁。通常，木犁祝词不演唱，而是吟诵。长的祝词多达 500 行，叙述整个农事过程，从制作木犁、翻地播种直至把小麦磨成面粉，制成面包圈，颇似一部简明农典。例如：

尊敬的主人

……

手扶木犁
驱赶黄牛
翻耕土地
播撒麦粒。

……

上帝赐予
雨露阳光，
小麦出土了，
长高了，
成熟了。

……

主人带着
大群帮手
一起下地。

……

他们挥舞
手中镰刀
奋力收割。

……

割倒的小麦
捆成捆
垛成垛。

……

主人赶着黄牛
把丰收的小麦
装上牛车
运回家里。

……

面包圈烤熟了，
面包圈出炉了，
摆到桌子上面了。
尊敬的主人啊，
辛苦了！[1]

春夏习俗诗

大地复苏，农牧业开始新的一轮循环周期。尤其对农业来讲，春夏时节的许多习俗都同小麦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有关。这类习俗历史久远，其形式和内容随着时代和观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有些已经失传；另一些虽然在个别地区存留下来，但大多只限于外在形式的继承，例如表演程式、服装、道具、音乐、舞蹈等，这些因素逐渐演化成民间戏剧。

春夏习俗可以归为四大类。

第一类习俗围绕圣乔治节、复活节和鬼节（复活节后 50 天）进行，其中有“圣乔治泼水”、“农夫”、“新月”、“耕牛”等庆祝仪式。此类习俗多见于史料记载，属于庆祝大地回春的戏剧活动，与纯粹的民间文学关系不大。

第二类习俗反映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朴素要求。阳光、雨露是保证农作物生长的基本条件，尤其是春雨，对于农民来说更是宝贵，因此在人力难以胜天的古时，逐渐形成了祈雨的习俗。这一习俗带有某些迷信色彩，至今在个别偏僻地区仍能见到。

祈雨通常在复活节后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二和第五个星期的星期二或星期四分两次举行，体现自然之神的死亡与复苏。有时，如果旱象严重，人们也可随时组织这类活动。常见的方式是泥人祈雨（卡洛扬）。祈雨时，妇女和姑娘们用泥土捏制一个小泥人，然后把泥人放在特制的棺材里，葬在河边或井台旁。送葬时，妇女要为

---

① 本书引文均由作者译自原文，国内尚未发表。余同。

泥人号丧，祈求泥人升天，为大地降下甘霖。另一种方式是裸女祈雨(巴巴露达)。赤身女子腰缠绿色枝条，在村中街道上边歌边舞，祈求上苍降雨。祈雨词有多种，或用号丧调，或用音节式吟咏调，凄哀古朴。仅举泥人祈雨词片段为例：

祈雨泥人，泥人，
祈雨泥人，泥人，
愿你早升仙界，
敞开降雨之门。
雨流如注，
昼夜不息，
五谷吸饱甘霖。

第三类习俗旨在庆祝庄稼的成熟，可惜这类庆典没有完全流传下来。据1640年的史料记载，麦田滚起金色波浪时，五村四乡的农家姑娘总要聚到一起，推举一名相貌俊俏的女孩做首领，称之为德勒佳依卡。然后，姑娘们簇拥德勒佳依卡到田边巡视，把用麦穗编成的花环戴在她头上，饰以彩巾，再把一串粮仓钥匙塞到她的手里。返回路上，德勒佳依卡平伸双臂奔行，彩巾随风飘舞，仿佛在滚滚麦浪上飞翔。姑娘们随她载歌载舞，到各村通报丰收喜讯。歌词内容有：

嘿，德勒佳依卡，
让我们跳吧，跳吧！
难熬的冬天过去了，
不用再吃
干鱼片和玉米粑。
……
可爱的德勒佳依卡终于来了，

为我们带来金黄的麦穗。

第四类习俗与小麦开镰收割有关。农夫们辛劳一年，终于迎来麦收，心中自然充满喜悦。割麦的人群下田时，一路上通常有乐师为之伴行。整个收麦季节，田里歌声不断，小伙子和姑娘们通过歌声互相鼓励：

加油，加油，亲爱的朋友，
黄昏来临后，我们就能
喝上一杯蜂蜜甜酒。

当然，歌声中也不乏互相打趣或讽刺主人的幽默言辞。例如：

太阳落山了，
我们的主人着急了。
我看不必着急，
日落自有日出时。

收工仪式丰富多彩。以“麦穗花冠”为例，庆祝程序大致如下：几名女孩采摘最好的麦穗，在田边地头编制麦冠，然后把它戴在中选的女伴头上，大家齐唱赞颂太阳、风神等自然力量的古曲。回村的路上，头戴麦冠的女孩先走，接着是姑娘、小伙子、乐师依次随行。接近麦田主人家时，他们经常歌唱描绘收割和收成的曲子，诸如：

清晨起身，
洗漱完毕，
匆忙下地。
割呀，割呀，
割完一块地，

麦垛如林立。

由于麦收季节风雨频至，人手紧缺，为了保住收获也需村中的牧人参加收割。他们用歌声呼唤劳力，指出鸟雀和暴风雨对麦收的危害。风暴经常是通过渡鸦或乌鸦的形象表达的。如：

鸟雀飞来，
啄食麦穗；
成群的渡鸦
掠走麦捆；
乌黑的老鸹
毁掉麦垛。

割麦人群进村后，举行古老的泼水仪式。村中的男女老幼都提着水罐参加，以示吉庆。他们一边互相泼水，一边口唱吉庆歌。例如：

主人，主人，
不必忧愁，
麦田越割越少，
麦穗越割越多。
上帝保佑
大丰收：
麦穗如木勺，
麦捆赛酒桶。

走进麦田主人家后，庆典达到高潮，泼出最后一滴水，小伙子们从姑娘头上争抢麦冠，然后大家聚餐歌舞。

生辰、婚礼、丧葬习俗诗

婴儿的出生是一件喜事，给家庭、亲朋和邻居带来欢乐。新生

儿来到世上，首先从接生婆那里得到祝福。如果婴儿是个男孩，接生婆就会唱含有下述内容的祝福词：

我双手举起的
这个男孩，
将来必定吉星高照，
活泼可爱；
聪明伶俐，
博学多才；
生活富裕，
百病不来；
他前程无量，
永放异彩！

新生儿的洗礼别具特色。通常，这种场合只有妇女才能参加，每人都给产妇和孩子带来一些小礼物，并在洗浴的水盆旁摆放各种表示吉祥的物品，例如银币、鲜花、面包等。洗浴过后，教母抱起孩子，交给产妇，随即讲一段祝愿孩子健康、幸福的吉利话。例如：

祝愿孩子，
活泼健康，
聪明伶俐，
俊俏漂亮，
遇事忍让，
温驯善良。
愿他长命百岁，
长大成人后
辛勤劳作
幸福永享！

婚礼习俗丰富多彩,尤其是乡村婚礼仪式承袭了许多古风,融音乐、舞蹈、戏剧等为一体,民间文学成分十分突出。的确如此,婚礼程序和所需“台词”是根据世代相传的习俗编排的,司仪、贺喜郎担任“导演”或“舞台监督”,有时也执行“报幕员”的职务。主要“演员”当然是新郎和新娘,其次是男女傧相以及双方父母。参加婚礼的大批宾客充当“群众角色”。“演员”们按照自己的身份着装。例如,新娘的结婚礼服通常系上一条彩色羊毛带,头上的花冠饰有闪光的金属蝴蝶。报喜郎手持小木棍,木棍上扎着各色头巾和绦带,头上的毡帽必须插上花朵,脚髁上系着两串小铃铛。

婚礼的“序幕”由报喜郎揭开,他们口唱喜令挨门挨户通报结婚消息,并以新郎或新娘的名义邀请大家参加婚礼。

婚礼的前夜构成“第一幕”。按照习俗,这时的新郎和新娘必须向自己青年时期的未婚伙伴辞别。新人呆在各自家中,在伙伴们的协助下一面梳洗打扮,一面倾诉难舍难分的别离之情。例如,为新娘试穿嫁衣和梳理头发时,女友们会用哀婉的歌声向新娘唱道:

黄花女儿有双亲,
为啥要结婚……
黄花女儿有爹妈,
何必忙出嫁……

新娘抚弄花冠,也不无惆怅地唱道:

噢,花冠,可爱的花冠,
如果你是吉祥之兆,
我可以一直编到黎明;
如果你不是吉祥之兆,

我宁可把你扔进河里，
一辈子留在娘家不嫁人。

新郎家里的气氛比较欢快，一名男友为新郎刮过脸后，伙伴们会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唱几段称赞新郎英俊美貌的歌曲。此后，他们用歌声向即将成亲的小伙子道别，例如：

再见了，我们的伙伴，
我们的新郎！
我们给你盛装打扮，
为的是让你娶一位内助，
娶一个俊俏的姑娘。

吉日清晨揭开婚礼的“第二幕”。这时，女友们要给新娘重新打扮和梳理头发。她们一边为婚礼做各种准备，一边唱别离的歌曲，整个气氛是伤感的。尤其是当女友们把婚礼花冠戴到新娘头上时，新娘必须哭出声来。然后她走到院子里，跪在父母面前辞行。这时，送亲主持人代替新娘讲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女儿对待父母有过什么不周之处，务请双亲原谅。此刻，新娘眼含泪花，年轻的媳妇们则在一边唱道：

请求原谅吧，姑娘，
向你的父母，向各位亲朋……

迎亲队伍的到来，把别离仪式推向高潮。这时，送亲主持人会用绳索把关闭的大门捆牢，迎亲队伍只得停在大门外，于是迎亲人和送亲人隔着大门展开一场舌战。送亲的人们询问对方来干什么，迎亲的人们会按照传统讲述他们的“王子”外出行猎时，发现一头“小鹿”跑到这里。这头“小鹿”是一位仙女，是他们“王子”未来

的妻子。经过反复交涉和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迎亲主持人出示“王子”的信物，这件信物通常是一只装饰得十分漂亮的面包圈。作为回礼，送亲主持人把一瓶酒送给对方。进入院门后，迎亲队伍得经受新的考验，例如用枪击中悬在竿头的一只灰罐、缴纳“入境费”等。此后，迎亲主持人要求交出“仙女”，可是送亲主持人交给对方的却经常是一个小女孩、一位老婆婆或者一只布娃娃。于是，双方又展开充满情趣的舌战，博得在场宾客的阵阵笑声。

真正的新娘出场时，人们要唱大段迎新令，迎亲队伍主持人重新讲述“王子”行猎的动人情景，或者讲述他们的“王子”要从这里移走一株“花”，这株“花”将在“王子”的园圃里开得更娇艳。此后，他代表新郎向女方的父母、兄弟、亲朋、邻居等致以歉意，因为他们将要移走这株“花”。这时，新娘和在场的宾客不管情愿与否，都得流洒惜别之泪，这是习俗的约定。

“第三幕”，送亲喜宴开始了。主持人恳请宾客入席，并且吟诵大段祝福词。席间，根据各地不同风俗，人们跳起民间舞蹈，比较著名的有霍拉舞、新娘舞等，也可以穿插风趣的游艺节目，例如“山羊”、“抢新娘”等。

新娘上“轿”了，鸣枪数响，又是一番别离的仪式。尤其是在场的媳妇们，会针对新郎、新娘或者新娘的父母，即兴唱出一些短诗，情感动人。例如，她们面向送女出嫁的母亲唱道：

再见了，我的妈妈，
今后你再也喝不到
我亲手端来的甘泉水……

面向新娘，她们历数姐妹亲情：

原为三姐妹，
同枝三朵花。

恋情凭空来，
折散姐妹花。
花缺枝杈干，
可怜老妈妈。

或者恳切嘱咐新娘：

哭吧，姑娘，哭吧，
嫁到外人家，
你会无端
遭到责骂。
外人的怜悯
如同枯树发新芽。

迎亲的“轿子”是一辆彩车，新娘上“轿”后，新郎乘马在前引路，傧相、伴郎簇拥左右，一路上十分风光，歌声笑语接连不断。有些地区，人们还朝迎亲队伍的路上泼水，以示吉庆。

“第四幕”的迎亲宴是在新郎家中举行的，迎亲主持人和众宾客争相吟诵祝福词，讲笑话。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唱歌，也可以同新娘或者新郎跳舞。这种宴席有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婚礼结束后，新人们照例要到女方父母和教父母家中拜访，这也许是婚礼仪式的“尾声”吧。

民间葬礼仪式保存了许多非基督教的古老习俗。普通百姓认为阳世和阴世是相通的，正常死亡并不可怕，它只意味着人们离开自己的亲人，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但是这种旅行却没有返回之路，所以死亡对于“上路人”的亲友、乡邻来说，是悲痛的时刻。为此，人们举行专门仪式，表达对“上路人”的关怀和思念。如果死者是未婚青年，葬礼将按婚礼的仪式举行。假如有人死在异乡或战场，遗体无法运回，村里人也照例为他举行葬礼。

各地的葬礼不尽相同，但有几种仪式是比较常见的。

“枞树仪式”用于青年男女的葬礼。如果村中死了一个未婚年轻人，那么他的生前伙伴，通常是7个或者9个，就会凑到一起到树林中去砍一棵四五公尺高的枞树，削掉枝杈，留下顶部树冠，然后扛回村子。走到村口时，一群妇女口唱《枞树歌》迎接枞树。在死者家里，这棵枞树置于屋旁，树上要饰以花朵、彩带和小铃铛，有些地区还把死者的遗物，如戒指、首饰等挂在树上。出殡时，枞树由两名年轻人抬着，两侧的妇女唱丧歌。枞树插在坟前，直至数年后干枯糟朽为止。

《枞树歌》在各个地区大同小异。枞树象征青春，砍伐枞树反映青春的夭折和人们的悲伤感情。这首歌的曲调庄重深沉，歌词长达112行，充满形象的比喻，生动地叙述了砍树的过程和枞树对于死者的含义。例如：

枞树，枞树，
是谁召唤你
从高高的碎石坡
来到
沼泽地；
从高高的石崖顶
来到
平川地？
召唤我的
是那个‘上路人’
因为他需要我
冬季为他避寒，
夏季为他遮阴……

这里的“上路人”隐指死者。

“黎明仪式”是另一种常见的葬礼习俗。死者停放家中时，每当东方泛白，一群妇女就要来到户外的房角处，面向东方齐唱《黎明歌》。如果是对唱，这群妇女则分成两组，分别站在两个角落里。黎明是善的象征，乡下妇女经常把黎明人物化，视之为自己的姐妹或者女神。

通常，《黎明歌》由四个段落组成，每段行数可多可少，根据内容而定。每一段的前几行都是请求黎明晚些出现，然后分节叙述人们要利用这段时间为“上路人”准备饮食、蜡烛、车辆、买路钱、寄给亲友的信函等。例如：

黎明，黎明，
我们的姐妹，
请你不要着急，
容我们
为‘上路人’
准备好
一辆车子、
两头黄牛，
因为‘上路人’
要从一个世界
走向另一个世界……

人死之后到出殡为止，为了不让“上路人”感到孤独，人们要用两个晚上为其守灵。这时，守灵的人们可以饮酒，跳怪诞的舞蹈，演假面剧，吹笛子，讲故事或者议论村里的一些新鲜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自己驱赶困倦，二是为了给“上路人”举行最后一次告别聚会。

号丧是人们向死者表示哀悼的一种形式。亲友、邻居前来祭奠时可以号丧，下葬时和下葬后的某些忌日也可以号丧。通常，号

丧的都是妇女，号丧在日出和日落之前举行。号丧调的内容主要涉及死者在世时的生活、人们对死者的关怀，以及各种嘱托和劝告。号丧词有两类。一类是韵文，有固定曲调，继承了以往的传统。例如：

昏天黑地，
旷野荒郊无人家。
你会看到
草丛中钻出一只水獭。
千万别害怕，
你要和它交朋友，
因为它熟悉水路，
认识渡口，
它会帮你过河
免得葬身激流……

另一类是号丧人临时编成的，不见得押韵。例如：

大姐呀，我的好大姐，
你这是去哪儿呀，我的好大姐？
你要搬新家，
免受风吹，
不挨雨打，
没有夜露，
没有霜雪。
……
大姐呀，我的好大姐，
你要请求掘墓人
为你留下通气孔，

为你留下四扇窗，
一扇见月亮，
一扇进阳光，
一扇留着做弥撒，
一扇述悲伤……

符咒

符咒属于民俗诗。它历史久远，产生在原始时期。据史料记载，罗马尼亚于16世纪末已有人采集符咒，但是大量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符咒主要用于巫术、巫医，除浓厚的迷信色彩外，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奥秘的一些原始观念。它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同其他习俗交织在一起，自然引起有关的研究工作者的注意。

根据用途，符咒可以分为四大类：用于祛病和祈求健康；用于消除嫉恨、烦恼等心理失衡；用于祈祷家畜兴旺、五谷丰登；用于害人。

符咒中的人物善恶分明，大多源于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宗教。魔鬼和其他一些人格化的不吉利生物可能给人带来疾病和灾难。例如：

给你带来疾病的是
九个女魔
和九个狠毒的小魔，
九只母狼
和九只凶恶的小狼。

同样，驱逐邪恶的则是神明、对人类有益的生物、各种农具或家具。例如：

解救你的是
手持三把扫帚
和三只钉耙的
太阳的三个姐妹。

符咒大多是无韵诗，但是内在节奏十分丰富，经常采用叙事、抒情、对白、诅咒、叠句等手法，许多比喻具有神秘色彩。与民间文学中其他类别的诗歌相比，符咒的一个特点是不配曲调，只供吟诵。吟诵符咒时举行各种不同的仪式，而且若干物品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清洁环境的净水和木炭，祛除邪恶的镰刀和斧头，医治疾病的某些草药，代表力量的铁器和石块等。

民间叙事诗

民间叙事诗是罗马尼亚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形式和内容来讲，它包含人与自然之争的神话传说、描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英雄传奇、反映民众日常生活某个侧面的普通民谣。

这类叙事诗的源头与古代神话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现存的《三兄弟和九条毒龙》、《约特曼勇士和蛇》、《约万·约尔格万》、《蝎》、《诺瓦克和仙女》等为例，这些作品虽然都反映了早期人类同大自然和恶势力的搏斗，但纵观题材和故事情节，不难发现它们大都借鉴于神话传说，在此基础上，以韵文形式发展了古代的口头文学。早期的民间叙事诗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形式和内容都显得破碎。封建社会时期，自 14 世纪起，民间叙事诗开始定型。为了满足下层民众的艺术需要，一些流传较广的故事、传说继续被改编成叙事诗，在民间演唱。16 至 18 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可以说，罗马尼亚的大部分民间叙事诗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

据粗略统计，流传至今的民间叙事诗多达数千首，涉及题材近二百种。它们不同于某些民族的气势宏大的英雄史诗，一般篇幅较短，约二三百行，个别的达到 500 行。从内容、人物和表现手法来看，许多作品与多瑙河南岸各民族的叙事诗有雷同之处，说明这

些民族在历史上交往甚密。

罗马尼亚民间叙事诗以贴近生活为主要特点。这些作品基本没有王室、贵族的华丽浮躁的文化痕迹,也不具备歃血疆场、骁勇壮烈的英武之气。它们大多小巧、凝练,以反映生活的某个侧面见长。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罗马尼亚民族倍受异族入侵和阶级压迫的煎熬,所以民众的普遍反抗精神首先在这类叙事诗中得到生动体现。

自16世纪以来,反抗恶势力和异族入侵的题材屡屡出现。描述的抗击活动主要以家族或村社为中心,致力刻画小景,突出传奇人物和善恶搏斗。恶势力的代表或者是毒龙、猛兽,或者是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在这方面,流传较广的作品是诺瓦克家族系列传奇和多瑙河系列传奇。它们以现实为依托,除描述激动人心的英雄业绩和民族正气外,也深深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泪洒多瑙河畔、战场寻子的《老妈妈》民谣就是一例。

17至18世纪,具有巴尔干特色的描述绿林好汉(海杜克)的民间叙事诗趋向繁盛,它植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土壤。自然形态的村社组织解体后,庄园主大量兼并土地,许多自由农沦为农奴。在这一土地兼并过程中,有些农民离家出逃,另一些人则铤而走险,以森林为基地聚众造反,杀富济贫,涌现了一批民间广为颂扬的英雄好汉,例如蒙特尼亚地区的戈利亚、吉亚努、斯坦丘;摩尔多瓦地区的博迪亚、布若尔、科德里亚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宾蒂亚、德扬等。他们通常具有民间英雄人物豪勇、反叛、体恤穷人的普遍美德,体现了民众向往自由、追求正义的一致愿望。而恶势力的代表形象则是暴虐的贵族、贪婪的地主和奸诈的商人,以及追捕绿林英雄的凶残宪警,打击这些恶人对贫苦民众来说无疑是一大快事。因此,民谣中唱道:

兄弟们,跟我走,
杀死那条恶狗!

徭役夺走我们的饭碗，
采把野菜也得付他若干铜板。
来吧，捉住那条恶狗！

这类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叙事诗在民间主要以演唱的形式传播，正文前后由演唱者视情况加以开场引子和收场小段。据说，目前仍有个别老艺人能够演唱30至40首这类民谣。

许多民间叙事诗取材爱情和日常琐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一个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和鲜明的小景，勾勒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展示了各类人物的道德准则与不同的社会心态。

爱情的忠贞一直是人们讴歌的主题，较为知名的有《米利亚》（又名《悲伤的姑娘》），讲的是一对恋人被歹徒拆散，姑娘落入魔掌。危难中，姑娘恳求父母、兄弟和亲友的救助，或用金钱赎买，但都遭到拒绝。惟有心上人在爱情的驱使下，排除万难千险救出姑娘，终成百年伴侣。

由于习俗和道德观念的不同，爱情在民间叙事诗中经常被突出某个侧面，有着不同的结局。一名年轻妇女为了追求婚外恋，不惜毒死亲夫，事情败露后，被处以火刑。这直接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一种道德规范。为了情恋，已婚女子离家外逃，在民间也是常事。可对亲生的儿女牵肠挂肚，偷偷回家探视时，终被擒获。这类妇女的命运并不好于前者，也是被投进火中活活烧死。如果女人是被强行掠走，虽与他人成亲，重新返回时却能得到宽恕。

有些作品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故事情节与其他民族有雷同之处。例如，《戒指和手帕》讲述了一个青年出征前，交给爱妻一枚戒指。战时，如果戒指生锈，说明他已捐躯疆场。妻子也给了他一件信物——绣有金边的手帕。丈夫离开后，如果金边褪色，说明她已离开人世。年轻人刚刚踏上征途，手帕上的不祥之兆就出现了。他匆匆返回，发现妻子已被父母投入湖中溺死。悲痛之中，他也投湖自尽。并排下葬后，丈夫的坟头长出一棵枞树，妻子的坟头生出

一株葡萄。刚劲挺拔的枞树和柔韧缠绵的葡萄相互依傍,表明有情人来世也是难以分割的伴侣。故事结尾的这种处理手法,显然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

此外,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给年轻人造成的悲剧也在民间叙事诗中得到反映。值得指出的是有些作品不但生动描述了爱情的波折,也深刻反映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图多尔》讲的是一对夫妻在通衢大路开一间小酒店,生意日渐红火。可是土耳其官人看在眼中,嫉恨心里,命令他们缴纳重税。由于无力承付,图多尔只得卖妻抵税。此后,他因思念妻子一病不起。这一题材的某些变体为了冲淡严酷的结局,安排买主是图多尔离乡久别归来的兄弟,从而引出大团圆的结局。

民间叙事诗中的精品当数《小羊》和《马诺列工匠》。它们无论是艺术手法还是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寓意,都达到很高的境界。

《小羊》(*Mioraţa*)是罗马尼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首民谣,既可配器演唱,亦可即席吟诵,流传甚广,影响面大。它最初由诗人亚历山德里采集,经整理加工后于1859年发表,但未伤及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可以说自文人采风以来,在九百多种变体和片段中,亚历山德里整理加工后的《小羊》是最成功的一个。这首民谣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它离奇诱人的故事情节,而是因为它包藏着深刻的内涵和感情,焕发出永不枯竭的艺术感染力。牧业是罗马尼亚旧时农村的一根主要经济支柱,牧民的生活对下层民众而言并不陌生,因而大量与牧人有关的民间创作能够广泛流传,得到劳动阶层的充分理解和认同。《小羊》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三个牧人在山区放羊,其中一个的羊儿又多又肥,引起了其他二人的嫉妒。因此,他们私下商议,企图杀死那个年轻牧人,夺走羊群。可是,他们的罪恶图谋却被一只小羊听到了,它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主人。年轻牧人得知死亡可能来临,立刻想到他十分热爱的大自然、牧民生活和年迈的母亲,从而引发了包含民俗内容的深层次的感情。万一他被杀害,他嘱咐小羊让人把他葬在牧场旁,可以听到风

声，可以看到星光，同他心爱的羊群和牧犬永相厮守；万一他被杀害，他要求把他的牧笛放在枕边，他可以随时倾诉他内心的情感；万一他被杀害，他请求小羊通知他的老母，说他已同仙女成亲，整个大自然都参加了他的婚礼。这儿的“婚礼”是一种比喻。旧时，未婚男子夭亡时，葬礼中要加入婚礼仪式，使人生的含义更加丰满。就是这些深层次的东西，过去曾被某些研究人员曲解，认为《小羊》中的主人公面临死亡威胁而不予反抗，是“认命”、“屈从”的表现。其实，这首民谣的主旨并不在于谋杀和反谋杀，而是把谋杀作为引子，发掘危难时刻人物内心的复杂心态。恰恰是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成功，所以它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久传不衰。那“天堂入口处”的青翠牧场不能说不美，在这里放牧羊群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享受。自然、牧人和羊群构成一个整体，一旦离散，怎能割舍，所以听到死亡的威胁时，年轻牧人首先想到的是

把我葬在
羊舍旁，
同你们共厮守；
把我葬在羊栏后，
听到阵阵牧犬吼。

接着，他想起了与他朝夕相伴的牧笛。

橡树牧笛，
笛音亲切！
骨角牧笛，
笛音哀烈！
接骨木牧笛，
笛音猛如火！

这里表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眷恋。此后，他又联想到万一他离开人世，他的老母会多么悲哀，她将

眼含泪花，
旷野奔走，
逢人便问，
四处打探。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所以它能与世世代代的听众和读者沟通。

《马诺列工匠》(*Meşterul Manole*)围绕"牺牲"主题，表达了人们对完美境界的追求。牺牲和成功强烈对峙，亲情、真情和对事业的追求交织缠绵，相当感人。马诺列出身平民，他受大公之命，带领九个帮手建造阿尔杰什修道院。可是墙壁白天砌好，夜间就坍塌成一片废墟，每次都是如此。依照神示，要想造起这所修道院，必须在墙壁中砌进一名妇女。这个厄运落在了马诺列头上。施工期间，他的妻子每天都从远处的家里赶来给他送饭。敬献"牺牲"这一天，马诺列又远远看到不知情的妻子提着饭篮赶来了。他痛苦万分，多么希望妻子不出现啊。震撼的心灵感动天地，女人的面前突然长出荆棘，狂风吹折树木，洪水拦住道路，恶狼守住路口。可是女人心中只有丈夫，她不顾险象丛生，依旧朝工地走去。可怜的女人直到被砌进墙壁，还以为是丈夫在同她开玩笑。修道院即将建成，深受大公赏识。马诺列执著追求事业，也在向往修造另外一些更美的建筑物。可是大公却不愿让这些优秀的工匠落入别人手中，免得他们造出比这更好的修道院，所以竣工之前，他命令拆掉脚手架，让工匠们死在高高的屋顶上。为了求生，工匠们用长条木瓦做了翅膀，打算飞下去。同伴们无一成功，全都摔死。马诺列虽然把木翅削薄，也无济于事。他落地身亡之处立刻涌出一眼清泉，泉水是他妻子的滴滴眼泪。为了追求理想，这首民谣展示了两个悲剧，一是家庭悲剧，二是事业悲剧，发人深省。亦或是"牺牲"

现象自古有之,造成了多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引发了强烈的心理反响,所以这类题材在世界各族民间文学中并不罕见。尤其是《马诺列工匠》,它以大致相似的变体在巴尔干地区广为流传。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都有各自的"马诺列"。

民间抒情诗

民间抒情诗历史较短,是从民俗诗中的抒情部分发展起来的,16至17世纪逐步定型。1673年的《圣诗》、《诗篇》和大主教多索夫特依的许多韵文都曾以民间抒情诗的韵律作为楷模。人文学者D.刊特米尔于1716年在《摩尔多瓦记事》中曾明确提到过多依娜这种抒情短歌,可见,当时抒情作品在民间已相当流行,覆盖面非常广。由于它形式短小,易于掌握,每行诗由5至6个或7至8个音节构成,只用元音押韵,按照这种模式可以即兴填充,抒发内心的各种感情,因此,与习俗诗和叙事诗相比,它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开放性,便于反映新生活、新事物和多变微妙的心态。民间抒情诗种类较多,主要有多依娜、舞蹈伴歌和舞蹈号子。

多依娜

多依娜是民间抒情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妇孺皆知,因而许多人笼统地称之为民歌。它形式灵活,曲调简单,易于掌握。任何人,尤其是青年和妇女,在民间歌曲的普遍熏陶下,都可以通过多依娜的艺术形式,随机表达喜悦、欣慰、赞赏、爱恋、愁苦、悲哀、仇恨、反抗、乡思等感情。历史上几乎各个阶层、各类群体,如农民、牧人、商贾、市民、知识界、士兵、绿林人物等都十分热中多依娜。由于它涉及题材相当广泛,逐渐形成了恋歌、酒歌、哀歌、思乡歌、牧歌、田园歌、军旅歌、绿林英雄歌等小的类别。

恋歌占据首要地位,突出反映了青年男女婚恋生活的各个侧面。如果说内容严肃的民间叙事诗得到成年人的青睐,那么自由灵活的抒情诗则一直受到年轻人的喜爱。爱情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恋的欣喜、热恋的甜蜜、失恋的痛苦,以及包办婚姻、亲友干预等现象在这类诗歌中都有鲜明的写照。描写手法之质

朴、情感倾吐之真挚，均达到一定水平。例如，为了追求幸福，年轻的姑娘毫不隐讳地对情人说：

你把我从窗口接走，
月亮给我们主婚，
星辰做傧相。

他们特别仇恨那些蓄意破坏婚姻的亲友，对于这些人，心态的表述也是非常直露的。

谁要是破坏了爱情，
就让大火烧光他的畜栏。

爱情经常和树林、景物与劳动融为一体，情景交融，充满健康的生活气息。例如：

上苍啊，上苍，
我愿化为小小的布谷鸟，
落在你木犁的扶手上。

或者：

让我为情哥牵拉耕牛，
情哥太年轻，
驱赶耕牛牛不走。

哀歌和绿林英雄歌通常含有深刻的社会内容，集中反映了贫苦农民和农奴的社会地位，如：

从布拉依卡直至河谷，
土耳其人叫卖农奴：
‘来吧，农奴大拍卖，
黄花姑娘只卖三文钱’。

这类作品中不乏下层民众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啸聚山林、聚众造反是常见的反抗形式。例如：

苛捐、徭役，
困苦难熬！
行走、坐卧，
灾祸难逃。
官府相逼，
田赋沉沉。
无路可觅，
离乡弃农。
拿起火枪，
聚义森林。

他们的目的相当明确：

不服劳役，不纳税；
不要贵族，驱豪强。

这类诗歌有别于同一题材的叙事诗，侧重表达与绿林生活有关的思想感情，社会的压抑和造反的豪情在有限的诗句中交替出现，真实感人。常见的景物烘托取材于他们赖以藏身的树林、须臾不离的火枪和坐骑，以及绿林生涯的夜幕、风暴、林间篝火等。

18 世纪，罗马尼亚诸公国由雇佣军制转为义务兵制。所谓的

义务兵制是各地按人口比例抽丁，而实际上征兵名额都集中到穷人头上。农家子弟被迫离开亲人和家园。

脊背驮步枪，
心情比枪重。
双亲无所靠，
耕牛弃田垄。

此种景象，每逢抽丁季节比比皆是。尤其是奥匈帝国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罗马尼亚族士兵大多是被强行拉入部队的，正如一首诗中所说：

农家贫儿，
反剪双手，
押入城堡。

入伍以后，普通士兵遭到各种屈辱和非人待遇，夜夜

饥肠辘辘，
枕戈而卧。

远离家乡，倍思亲人，对妻儿老小的牵挂更使他们精神沮丧。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十分强烈，经常表露

宁做草寇
不留军伍

的愿望。

牧歌的内容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现实描写牧人生活的孤

寂和悲哀。例如：

山风吹来，
时日凄寒。
谷口风猛，
度日更难。
风卷牧场，
乡思难断。

又如：

巍峨的高山啊，
俯下你的身。
让我登上去，
望一眼我的小村，
望一眼清扫庭院的
我的心上人。

二是局外人对牧业的田园化遐思。例如：

牧羊人啊，
无忧无虑！
整日闲卧
花丛草地。
头枕蚁冢，
羊群环立。

三是牧区远离官府，有相对的自由，成为贫苦人民向往的地方。所以有些诗歌表达了

宁为牧羊人，
不做豪门仆

的追求。

舞蹈伴歌

罗马尼亚民族能歌善舞。旧时，每逢节假日，农村青年男女必着节日服装到村中或村头空场聚会，言谈嬉笑，气氛十分热闹。老人和儿童也三五成群，前来助兴。随着民间乐师奏起欢快的曲子，伙伴们纷纷步入场地，或双双对对，或携手成群，翩翩起舞。他们按照乐曲的节奏踏着舞步，经常即兴演唱各种伴歌，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情调视情况而定。有的欢快喜庆：

来呀，埃列娜，快到花园来，
为情人，
挖一株，
挖一株罂粟花。

有的诙谐幽默：

萨博列尔个头儿小，
心里的爱情比他高。
萨博列尔甜如蜜，
驱散严冬冰雪消。

有的充满恳请：

哥哥请你陪我跳舞，
让我这穷人女儿也能得到欢乐。

有的忧虑哀伤：

欲寻不知路，
情思指点我
情哥在此处。
欲寻不知途，
哀伤指点我
情哥在此处。

历史上，伴歌情况比较复杂，许多其他类型的民间短诗也在舞场上演唱。

舞蹈号子

民间舞蹈通常是集体舞。为了活跃气氛和增强舞曲与舞步的节奏，人们除即兴演唱伴歌外，还经常在舞蹈过程中呼叫号子。在这方面，舞蹈号子的功能尤其明显。首先，它是舞步节拍的一种口令，最简单的形式如："哎嘿，再来一步，哎嘿！"又如："就是这样，还是这样！"等。有时，节拍的形象通过比喻表达，显得更美。例如：

慢，慢，慢；轻，柔，缓。
轻如太阳走晴空，
柔似月亮穿浮云，
缓若情思过心田。

第二，舞蹈号子是跳舞人内心感情的由衷表露，随着舞步的节拍爆发出来。它一方面可以鼓动全场的情绪，同时也自然坦示了爱恋、仇恨、忧虑、愁苦等感情，以及个人的遭遇和对周围事物的评说。例如，为了表现男子汉的英武，在姑娘们心目中树立好的形象，有些号子这样说道：

皮带不算好，
内藏三把刀：
一把哭，一把笑，
一把杀土豪！

为了给乐师鼓劲，小伙子踏着舞步，会冲他们喊道：

小提琴，拉起来，
一直拉到琴弦断。

夸赞舞伴的号子是大量的，例如：

这个姑娘跳得好，
我会跳舞是她教。
跳舞她教我，
亲嘴向我学。

许多号子充满诙谐情趣或辛辣讽刺，矛头指向社会不公或其他不良现象，朴素的善恶标准十分鲜明。例如：

主人骂我不吃肉。
不吃肉？怎吃肉？
她把猪肉藏起来，
只有他们能吃肉。

懒惰是人人憎恶的现象，因此舞会上经常听到这类内容的号子，表现手法多样，或直讽，或泛指，或锋芒毕露，或委婉规劝，情趣盎然。例如：

整日梳妆，
灰尘充梁；
三秋积土，
桌下床上。

又如：

家有七仙女，
水井紧临墙，
老爹渴死无人帮！

或者自嘲：

我要当新郎，
我要当新郎，
割麦我不会，
拥抱、调情我在行。

舞蹈号子中，青年男女的爱慕标准也很坦诚直露，相貌端庄自然重要，而心灵美更是最基本的要求。例如：

牛至花开青草丛，
要爱就爱能干的人。
身材挺拔似青松，
脑袋不灵有啥用？
与其和丑鬼
吃香喝辣，
宁愿与美男

嚼糠咽菜。

关于舞蹈号子，于1780年已有记载，至于起于何时，则很难推断。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以形式短小、内容灵活、题材广泛、语言泼辣而受欢迎。三、五行诗句即可道出一个真理，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摇篮曲

同其他民族一样，罗马尼亚的民间摇篮曲也以宁静、单调、简练、纯真为特点。它一方面对睡在摇篮里的婴儿起催眠作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亲人，尤其是母亲，对儿女的丰富思想感情。首先是母爱，母亲们在摇篮曲中通常把孩子称为“宝贝”、“小鸡”、“小鸭”、“小羊”等温驯的小动物。例如：“睡吧，宝贝，妈妈的宝贝”。在困苦的生活中，抚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易事。母亲们虽然坐在婴儿的摇篮旁，可一直想着心事，此时，她们就会向不懂事的孩子敞开心扉。例如：

妈妈摇你睡觉觉，
你误了妈妈的好多活计。

又如：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你的妈妈要为你去赚钱，
你的爸爸正在给东家做劳役。

对孩子的期望，是摇篮曲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如：

快点睡觉喽，
睡醒长大喽，

踏着青草
顶着烈日
驱赶母牛放牧喽；
踏着青草
顶着大雨
赶着羊群上路喽。

摇篮曲多用叠句或词语的重复，比喻、昵称随处可见，音韵方面尤其注重内在节奏。

民间诗歌中还包含丰富的童谣、谜语、谚语等，这里不一一赘述。

民间散文包括故事、寓言、传说、笑话等。

民间故事

许多世纪以来，民间故事在罗马尼亚诸公国口头流传，尽管有地域和边界的限制，却一直保持着民族特征和语言的同一性。这类作品的收集整理并付诸出版，始自 1860 年阿勒丹的《民间散文集》。接着，1862 年，小说家菲利蒙在《罗马尼亚农民报》上刊出采集的民间故事时，在按语中强调指出民间文学对于罗马尼亚历史和文学的重要性，呼吁有识之士到民间采风，挽救这朵可能被时代吞没的“农民文学的稚弱的花”。此后，许多人从事了这项工作，成效显著。知名采风人中有 P. 伊斯皮雷斯库、I. C. 封德斯库、D. 斯腾切斯库等，他们出版的集子一直流传至今。

民间故事题材丰富，据统计世界各国共有 741 种类型，罗马尼亚占了 270 种，其中 140 种与别国民间故事题材相似，另外的 130 种是罗马尼亚所特有的。常见的题材中，流传较广、变体较多者不胜枚举。诸如，有些故事讲述多头毒龙劫持日月，抢掠民女，遗祸人间，勇士愤而斩之；有些故事揭示国王或财主为夺人美妻而绞尽脑汁施展伎俩，欲把对方置于死地；有些故事则描述勤劳美貌的姑娘如何遭到后母的虐待，从困境中挣脱出来。其他如《金发美少

年》、《灰姑娘》、《孪生兄弟》等类型的题材也是人所共知的。一般来讲,尽管故事内容和具体情节各不相同,但它们在神奇与现实相互交织的氛围中,总是揭示着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在正与邪、善与恶、贫与富、贵与贱的强烈对峙中,反映了人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的明确态度与评断。这里需要指出,具有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虽然是大量的且历史久远,但自封建社会以来,随着阶级分化与矛盾的加剧,也产生了不少完全反映现实的民间故事。它们的题材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斗智场面,反映劳动群众的智慧;二是通过命运、幸运、贫苦、抗争等情节,揭示下层百姓的真实生活。

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以历代加工后的美少年为原型,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名字,如约尼格、阿盖兰、庇波路什等。他们通常出身贫贱家庭,有些也可能是王子。在家里,一般是独子或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心地善良但天赋平庸,不受重视。可是通过磨练之后,却异常聪明勇敢,凝集了民间认同的各种优秀品质。有些故事中,他们被编排为马、牛、绵羊的儿子,或者母亲受孕于花香,在神秘的气氛中揭示正面人物的善良本性。

依莲娜·科申加纳或者吉拉·吉拉丽纳应该算是女主人公中完美的原型。她们不论出身贫寒、高贵,亦或本来就是仙子,都体现了民间女孩的勤劳、正派和美貌。危难时刻,她们得到美少年之类的英雄人物的救助,此后齐心协力战胜邪恶,得到美满的爱情。

恶势力通常是毒龙、林妖、蝎子等。他们面目可憎,性情残忍,贪得无厌,极具破坏力。上可偷天换日,下可劫持民女,魔法无穷。但都邪不压正,最终败在英雄人物脚下。另一类恶势力的代表取自帝王、贵族、地主和其他品行不端的人,故事内容更贴近现实。

英雄人物的助手可能是动物和昆虫,如马、牛、犬、猫、狐、熊、兔、鱼、鹰、蜜蜂、蚂蚁等,在人们心目中它们都是人类的朋友,故事中赋予它们救主的神奇力量;另一类助手是人类能力的理想化延伸,如:“千里眼”、“飞毛腿”、“击破石”、“扳到山”、“吃不饱”、“渴不

死”等。在这里，人的某些感官和本能被分离出来，极大限度地人格化，亦或也包含着特异功能的夸张。

民间故事经常求助于法宝。一类是常见物品。例如，一块燧石可变成大山，一把刷子可化为树林，一条毛巾可变成河流。第二类与古时的信仰、巫术、巫医有一定联系。例如：有求必应的戒指、吞食魔鬼的干粮袋，以及还阳草和神水等。第三类是日常用品，例如：铁砧和钳子、会飞的毯子、魔镜、金纺锤，乃至履水面如平地的靴子和千里斩魔头的宝刀。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于困难时刻往往求助神明。罗马尼亚民间故事中出现神明的频率较低，即使出现，也仅限于上帝、圣彼得、圣星期五等少数几个。他们与宗教里的神明不一样，完全被世俗化了，有着常人的面貌，过着常人的生活，仁慈、友善、乐于助人是他们的根本特征。这里应该提一下魔鬼。头上长角的魔鬼总是以滑稽的角色出现在故事中，他们自以为聪明，同上帝和人类作对，可最后却是愚蠢地败北。

与其他民族相比，罗马尼亚的民间故事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它的现实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果说俄罗斯民间故事气势宏大，充满英雄主义；日尔曼民间故事气氛神秘，布满精灵；法兰西民间故事景色明媚，趋于理性；那么罗马尼亚民间故事则更贴近生活，各类人物和场景均基于现实。

寓言

由于罗马尼亚同古印度、古希腊和后来的西方文化接触较晚，本民族的一些特殊境况缺乏滋生、发展寓言的条件，所以与民间故事相比，这一体裁在整个民间文学中所占比例甚微。有人统计，世界上的寓言题材694种，罗马尼亚约占59种，均直接来自民间。这些以动物为主要人物的小故事通常具有双重功能，除传递深刻的寓意外，还揭示了某些动物的生理特征和习性。狐狸贪婪奸诈，各国寓言都对它有生动的描绘，各有特点。罗马尼亚的一则寓言在勾勒其贪婪习性的基础上，着重渲染了它恃强凌弱的一面，以影射

人类社会中类似的现象。寓言是这样讲的:一只狐狸夺走了刺猬的所有食物,并且气势汹汹地说它只知道填饱肚皮这一条法律。刺猬拉它到一个地方去评理,它自信真理永远在强者一方,所以很爽快地跟着走了。万万没有料到那个地方是猎人布下的陷阱,它一脚踏上去,就跌了进去,受到应得的惩罚。另一些寓言注重幽默、传奇内容,在拟人化的寓意描述过程中,解说动物的生理特征和习性,例如狗熊为什么没有尾巴,猫狗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猎狗为什么追野兔等。

传说

传说含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两大类。前者致力解释自然现象,囿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所以这类解释一般不具科学性,而蒙有神话色彩;后者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许多细节同样不具备史料价值,主观臆想和传奇成分浓重。

罗马尼亚的神话传说大多反映古代宗教信仰,与后来的基督教关系不大。许多神话人物来自民间,同口头流传的故事中的人物相似,如鬼怪、林妖、仙女等。即使偶尔出现《圣经》人物,也只是假借名义。例如,上帝生于创世之后,是力量和智慧的化身。圣诞老人愚笨,由于他的妻子曾为耶稣接生,所以就砍掉了妻子的手。圣彼得是狼的守护神,危害人间。魔鬼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魔鬼,他总以滑稽的面貌出现,与上帝作对。大量神话传说涉及天地和生灵,给予特定解释。例如,天是物质的,离地不远,有时开合;地是平的,由木桩或鱼背支撑。地震是由于鱼在动,或者是巨蝎啃咬木桩;日、月本是兄妹,可他们却近亲结婚,因此受到惩罚,永不相见。涉及动、植物的神话也相当多,寓意与童话故事相近。例如,刺猬聪明,蜜蜂勤劳,狐狸狡猾。还有一些涉及饮食、疾病、药物、财宝、命运、祸福等。历史传说含有一定的史实内核,但表现手法十分夸张。有时,为了突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讲述人不惜为此增添大量神秘、离奇细节。例如,摩尔多瓦公国的斯特凡大公之所以战胜土耳其人侵军,主要是因为他政策对路,深得民心,战术灵

活,而一些历史传说却把他的胜利归于神明相助,以加大听众的好奇心和敬佩。这类传说涉及到的人物有名垂青史的大公,如德拉戈什、内格鲁、斯特凡、巴沙拉布、采佩什、库扎等;也有行侠仗义、扶困济危的民间豪杰,如达里耶、多博什、德拉古、品蒂亚等。此外,还有一些历史传说揭示山川、井泉、地名的来历,属地理方面的历史典故。例如白谷这一地名的起源,是因为过去有许多将士战死在那里,荒滩白骨累累。而红色橡树林则说一队侵略军遭擒后,被套在木犁上流着鲜血翻耕土地,播种橡籽,而后长出了这片橡树林。

笑话

罗马尼亚笑话比较盛行,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开朗、诙谐性格。它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既可以为生活增添诙谐、幽默的情趣,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武器,抨击各种不良现象和人物,或者善意规劝他人与朋友,使闻之憬悟。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笑话题材广泛。首先,欺压百姓的贪官、税警和财主等是笑话抨击的主要对象,辛辣无情的讽刺一针见血戳破他们的画皮,揭示其丑恶本质。一则笑话这样讲道:"一个富翁和一个穷人去打官司。穷汉事先没有贿赂法官,而富翁异常吝啬,自信他不用行贿也能胜诉。对簿公堂时,穷汉故意把身上的破皮袄塞得鼓鼓囊囊,暗示他有钱。法官看在眼里,心中自然明白。穷汉的官司打赢了。随后,他把皮袄中的石头取出来,说道:'你断得公正,算你走运。不然我就用石头砸你的头!'"神甫本来是教民的典范,可许多神职人员的真实生活却见不得阳光,因而他们的伪善、无知、贪婪和道德败坏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简练、苛刻的言辞勾勒出他们的面貌特征。例如:"村里的红头发孩子都是神甫传的种。"又如:"神甫饿死之前,全村人都得首先饿死。"而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些通病,诸如愚蠢、贪婪、吝啬、奸诈等,民间笑话使用的手法则比较温和和婉转,寓教于幽默之中。例如:一个青年去相亲,朋友们劝他见到姑娘时,要投以"绵羊的目光"。年轻人照办

了,立刻从肉铺买了许多羊眼睛,一到女方家就朝姑娘投掷过去。又如:一个呆子爬上树,为了站得稳当些,就用斧头砍断脚下的树杈,结果从树上跌了下来,从而引出"自作自受"的成语。

民间笑话中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是《波卡勒笑林》(*Păcală*)。波卡勒貌似愚蠢,可他在一系列令人捧腹的情节中,却充分显示了普通百姓的机智、公正和美德,巧妙的应变和犀利的语言脍炙人口,其效果可令那些对号入座的官员、神甫、宪警、村长和富翁为之胆战,令社会上的败家子、吝啬人、酒鬼、懒汉和轻浮的女人无地自容。《波卡勒笑林》源自阿拉伯世界,但经过世代加工,已经罗马尼亚化了。它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与我国维吾尔族的《阿凡提》似乎有亲缘关系。

二、封建时期的文学

罗马尼亚在14至18世纪末的漫长封建时期中,蕴涵于文化中的文学现象已相当明显,诸多因素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这一时期,与民族文学的产生有直接关系的文化现象是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民间文学的发展、古斯拉夫语的盛行、印刷术的引进、罗马尼亚语文化的出现、民间翻译作品的流传等。

宗教、历史类著作是罗马尼亚文化和书面文学的最初表现形式,并具有下列特点:在著述文字方面,这是一个从古斯拉夫语和希腊语向罗马尼亚语过渡的阶段;就各类书籍的社会思想而言,中世纪的狭隘、闭塞、神秘观念逐渐被民族意识、现实精神和人文思想所突破;宗教书籍趋向民族化和世俗化;历史书籍视野拓宽,更具现实性。

随着宗教、历史类著作的增多和个性化,造就了一批颇有文才的著作家。他们从事写作的本意虽然并不在于文学,可他们的作品却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需要,包含了文学初始阶段的一些要素。瓦尔拉姆和科斯丁的诗歌、伊维利亚努的演说词、刊特米尔的小说、内库尔切的故事堪称上述题材的初次成功尝试,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古斯拉夫语经文与史书

15世纪前，罗马尼亚文字还没有出现，文学表现形式是口头流传的丰富的民间文学。

公元14世纪，罗马尼亚境内形成三个封建公国，即：罗马尼亚公国、摩尔多瓦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它们赖以支撑的社会支柱是贵族阶层和教会势力。当时的贵族，主要是村社分化后产生的庄园主，他们在兼并的土地上拥有自己的农奴、工匠、卫队、磨房、粮仓和小教堂，俨然一个小社会，成为地域性的行政、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规模较大的教堂和修道院不依赖贵族，它们有自己的土地、下人和收入，在传播宗教和文化方面有相对的独立性。自15世纪起，为了增强王室权力，大公们在行政、军事、赋税等部门开始推行集权制，中、小贵族和教会逐渐被大公控制，王室在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成为全国的中心。而广大民众，自由农、农奴、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所处地位的差异，除社会和经济要求外，在文化方面自然也有各自的追求。农民阶层深受压迫，继续通过口头文学反映自己的处境，而新兴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则要求充分的自由权利，在商品流通、语言交际等方面与贵族利益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15至16世纪出现了一些对文学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现象，其中有古斯拉夫语的盛行、印刷术的应用和罗马尼亚文字的出现。

古斯拉夫语的盛行

在文字发展的某个阶段，文字未被广大民众掌握之前，通常被控制在上层社会手中，成为他们的一种统治工具。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类现象并不罕见。古典拉丁语曾是中欧和西欧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古典希腊语长期在本土和希腊文化圈内的一些国家沿用。同样，古斯拉夫语虽然已是死的语言，但在15世纪前后，仍作为教会和官方文字，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乌

克兰、俄罗斯和罗马尼亚诸公国盛行。

古斯拉夫语，亦称教会斯拉夫语，或者音译斯拉冯语，是西里尔兄弟于公元9世纪翻译希腊语经文时使用的一种流行于南马其顿的保加利亚方言，译经过程中又大量借用了希腊语句法和构词手段。此后，作为教会和官方语言，它虽然不断受到斯拉夫各族活的语言的影响，但自12世纪起，由于在特定范围内广泛使用，其基本形态已经固定下来，日趋僵化。

罗马尼亚人属拉丁民族，那么古斯拉夫语为什么能于10至17世纪在罗马尼亚诸公国盛行呢？地域和历史条件是促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公元271年罗马军队撤离这一地区后，虽然留下了大量移民，但该帝国同达契亚的联系却逐渐减弱。尤其是公元6至7世纪民族大迁徙后期，文明程度较高的南部斯拉夫人对罗马尼亚产生了强劲影响，在文化、习俗、语言，乃至社会、政治结构等方面留下了深深印痕。公元14世纪，罗马尼亚组建公国时，周边除匈牙利外，都是斯拉夫国家。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基业，自然要在各个方面向这些国家借鉴。以语言来讲，该民族自形成以来，若干世纪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曾经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作为文化载体和上层社会的交际工具。组建公国时，流通周边斯拉夫国家的官方语言——古斯拉夫语，也就随同国家体制的设置被引入统治阶层。罗马尼亚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东正教，中世纪巴尔干地区东正教经书除沿用希腊文外，大多是古斯拉夫语译本，教士讲经、布道均使用这种语言。因此，这也是古斯拉夫语在罗马尼亚诸公国盛行的原因之一。此外，拜占庭文化和斯拉夫文化对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影响不可忽视，而它们的传播载体之一，在那个时代恰恰也是古斯拉夫语。综上所述，在当时的罗马尼亚通行两种语言，一方面是广大民众使用的民族语言——罗马尼亚语，另一方面是宗教和上层社会的古斯拉夫语，它应用于经文、教会活动、行政文书、典章法规、商务往来等领域。

古斯拉夫语盛行这一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该语言手抄本的

流传和用这种语言进行写作。

古斯拉夫语手抄本首先是经文。除《福音书》、《弥撒书》、《祈祷书》、《使徒行传》外，富于文化意义的是各类汇编，因为它们不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早期的神学思想，而且有些篇章含有道德故事、隐士奇闻和一些社会、政治内容，更具世俗性和文学色彩。另一类是经外书，主要包括异端反叛和由《圣经》演化来的各种传说。当然，中世纪流传各国的世俗小说，例如《亚历山大传》、《瓦尔拉姆和约萨夫》，也应纳入此列。第三类是法律、法规，这是组建公国后统治阶层为中央集权和治理社会所必须采取的借鉴措施。据考证，当时流传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的古斯拉夫语法规共有 13 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使徒法规》和《法规汇编》，它们包含拜占庭古法和教会法规，依其内容分别被教会和王室采用。

在传抄古斯拉夫语图书、典籍的基础上，罗马尼亚教士、贵族和文人开始用这种语言进行写作，从而掀开了罗马尼亚书面文学的第一页。

宗教内容的著述先行一步，最早的作品有《圣母颂》、《悔罪诗》等，作者均为贵族或教士。后来，圣徒传记类数量增多，影响较大，除记述圣徒行止外，还反映某些史实。在这方面，广为人知的是詹布拉克的《新约翰传》，讲的是小亚细亚黑海岸边的一名商人乘船来到摩尔多瓦公国的白堡，因宗教信仰问题被天主教徒意大利人告密。他坚守自己的信仰，最后被担任城堡司令官的鞑靼人处决。死后，亚历山德鲁大公把他的骨殖迎到都城苏恰瓦，教会追认其为圣徒。

用古斯拉夫文写作的历史类书籍是罗马尼亚编年史的先河。这类著述的写作风格和修史手法深受拜占庭文化和斯拉夫文化的影响，史实中经常混杂神教、臆断成分。虽然讲的是本国历史，却包含大量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件，相互交错，显得混杂。下面，按三个公国的次序分别介绍。

《摩尔多瓦编年史》(*Letopisețul Țării Moldovei*)是用古斯拉夫

文写成的第一部摩尔多瓦历史,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15世纪后半叶。它有6种传世本,大同小异,总体结构是以历代大公为主线,记述了自德拉戈什追猎野牛建国,到15世纪斯特凡大公盛世时期。这部史书材料不甚详实,讹误、疏漏之处屡有发生,主要价值在于它用大量篇幅记载了斯特凡大公的生平,大至辉煌的抗敌战役,小至日常生活行止,可见作者是大公身边的文人或专事记录的修道士。该书的主旨并非客观修史,它近似官方文书,通过家系和业绩的介绍向贵族、教会以及国外王室展示大公的声威,所以没有作者署名。16世纪,陆续出现了三部署名编年史,作者分别是马卡里耶、埃夫蒂米耶和阿扎里耶。他们都是神职人员。第一部接续无名氏编年史,记载了斯特凡大公辞世后1504至1552年间的史实,另外两部涉及的年代分别为1541至1554年和1551至1574年。这三部史书有别于前者,虽然仍是奉命修撰,但其内容不再是大公生平的简单登录,在处理手法上也更注重艺术效果。

罗马尼亚公国的史书不同于摩尔多瓦公国。一是出现较晚,大约16世纪初;二是内容不完整,14至15世纪几乎是空白,后人修史往往求助于传说、铭文和国外文献;三是著述语言、年代和作者均有争议。

《尼封主教传》(*Viaţa patriarhului Nifon*)作于1517至1521年。这本书主要描述尼封的教士生活,但也记载了罗马尼亚公国1495至1521年间与四位大公有关的许多史实,侧重点是巴沙拉布大公,因为作者加夫利尔是应他的邀请为尼封立传的。该书原稿可能是希腊文。《巴沙拉布家训》(*Învăţăturile lui Neagoe Basarab către fiul său Teodosie*)是当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以古斯拉夫文手稿传世。历史上,巴沙拉布大公以崇尚文化、艺术著称,民谣《马诺列工匠》中精美的阿尔杰什修道院就是他一手监造成的。他经历千难万险登上王位,一生致力中央集权,为了把在握的政权顺利交给后代,因而撰写了这部著作。《家训》由7个部分组成,前两部分列举正反两面的帝王楷模,均取自《圣经》和罗马帝国,后5部分包

含宗教、道德、国务训示，例如：敬上帝、仁慈心、善待部下、任用贤臣、执法公正、礼仪待宾、出兵布阵、英勇为本等，行文中使用了大量艺术手法，带有拜占庭文学的痕迹。《罗马尼亚公国大事记》有两个传世本。第一个写至1546年，事件的历史年份有大量疏漏，史实评说不够客观。第二个传本自1545年写至1593年，偏向罗列具体事件，细至每周每日，但对许多重大史实，例如奥斯曼帝国的残酷奴役，却只字不提。大公之间的权力之争记载得较为详细，但也仅限于征收赋税和斩杀贵族两个方面。

勇敢的米哈依大公是罗马尼亚名声显赫的君主之一，在位期间曾圆满实现民族大统一，同时，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基督世界的安全，曾同奥斯曼军队进行英勇斗争。他的一系列光辉业绩在那个时代十分突出，自然是修史的主要内容。记载这段历史的有两个本子，统称为《米哈依编年史》(*Cronica lui Mihai Viteazul*)，成书于16世纪。一个本子见于瓦尔特的拉丁语著作，他说他译述的蓝本是由罗马尼亚语译成波兰语的一份史料，且这份史料是米哈依身边的一位大臣起草的。第二个本子见于后期的康塔库吉诺家族编年史，各种迹象表明这个本子也是用罗马尼亚语写成的。在古斯拉夫语流行王室的时代，能用罗马尼亚语撰写史料的确是一个创举。如果说摩尔多瓦公国的斯特凡大公史是用古斯拉夫语写成的第一部史书，那么罗马尼亚公国的勇敢的米哈依大公史则是用罗马尼亚语撰写的第一部史籍。记述米哈依大公的两个本子各有侧重。前者属宫廷修史，以详实材料突出大公的伟业，尤其是战功，因而除著名战将外其余官员书中一律不提。后者属贵族修史，在述及大公业绩的同时，也刻意罗列了许多贵族的名字以突出他们的作用。

特兰西瓦尼亚屡遭异族占领，公国建制缺乏连续性，因而没有完整的正史。1486年在该地区成书的有一本古斯拉夫语野史，书名为《魔鬼大公逸事》(*Povestirea despre Drăculea voievod*)，讲的是罗马尼亚公国采佩什大公。全书由多个故事组成，具有浓重的传

奇色彩,从几个侧面描绘了采佩什大公机智勇敢,但又十分残忍的个性,同时着重介绍了他抗击奥斯曼的战功。在此之前,特兰西瓦尼亚的萨什族文人曾用德语撰写了同一题材的故事,但侧重点是他魔鬼般的残忍一面,掠夺烧杀,无所不为。采佩什的具有中世纪情调的传奇故事在西方世界尤为人们熟知,曾被改编成小说和电影。

罗马尼亚文字的出现

16世纪初,随着商品交换日趋兴旺和手工业者、市民阶层及小贵族的崛起,古斯拉夫语的应用范围逐渐变得狭窄起来,大多用于王室和教会。有材料证明,16世纪末叶,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的王室文案仍通过古斯拉夫语处理,而教会直到18世纪初这种死的语言才完全被罗马尼亚语置换。促成上述两种语言的更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广大教民要求教会使用本民族语言;二是新兴社会阶层,尤其是市民和小贵族,出于商业和日常事物的需要,冲破官方规定的古斯拉夫语的束缚,自发地借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罗马尼亚语,应用于私人信件、日记、买卖合同、捐赠文书、商业账簿等方面。这类现象在1475年的史料中已有记载,但提及的原件却被岁月吞没了。目前,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份罗马尼亚语文献是1521年肯普隆市民尼亚克舒致布拉索夫市政长官的一封信。信中紧急通报奥斯曼军队已经渡过多瑙河准备北上,恳请有关当局早做准备。由于这封信函十万火急,书写人没有使用古板、晦涩的古斯拉夫语,除尊称和连词外,全文均用明快的罗马尼亚语表述。1595年的一封官方函件中,古斯拉夫词语已经完全被排除。1600年,一个被俘青年给居住在摩尔多瓦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的语言更接近现代的罗马尼亚语口语。

由于罗马尼亚语言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些宗教书籍于16世纪陆续被译成这种文字,其中有《诗篇》、《福音书》、《使徒行传》、《教义问答》等,但囿于译者文化水平,文中经常夹杂古斯拉夫词语和句法结构,使整个内容变得艰涩难懂。此外,迎合普通教民口味的

故事性和应用性较强的经外书，也被大量翻译过来，例如宗教传说、圣徒传奇、祈祷词等，其中的有些成分被民间文学加工吸收。

印刷术的应用

印刷术对罗马尼亚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下面分两个阶段介绍。

第一阶段是古斯拉夫语书籍的印刷。15 世纪初，黑山人马卡里耶受拉杜大公之邀来罗马尼亚公国设立印刷所，先后出版了《弥撒书》、《赞美诗》和《福音》三部书。当时，印刷术相当落后，虽然部分木刻版是在国内完成的，但所需纸张要从意大利和德国购入，印刷一本书的周期将近两年。这批书籍出版后，大多由大公免费赠予国内各地的教堂。大公出资设立印刷所，出版经书供给教会，其政治目的是加强王室对宗教的控制，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另一部分经书流传到了同是罗马尼亚人居住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甚至传到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无疑是对当地人民的一种精神支持。此后，1545 年，塞尔维亚人柳巴维奇从新主持印刷所的工作，出版了《祈祷书》和《使徒行传》，使经书品种更加丰富。同时，他也为摩尔多瓦公国印刷书籍，并且培养了一批罗马尼亚徒弟，为后来的印刷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值得指出的是柳巴维奇时期，印刷所不再是大公的产业，已经转入私人手中，在经营方面逐渐具备印刷所应有的功能。

第二阶段是罗马尼亚语书籍的印刷。这方面的突出人物是科列西，他往来于罗马尼亚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最后定居布拉索夫，一生共印制 35 种图书，其中 23 种为古斯拉夫语，3 种为古斯拉夫、罗马尼亚双语，9 种为罗马尼亚语。罗语书籍中最有影响的是《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教义问答》。从书籍出版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语言更替的渐进过程，反映了当时的趋势。自然，这里有科列西的一份功绩，但他的更为突出的作用是出版书籍面向分居几个公国的罗马尼亚民众，在审定来源相当复杂的译稿时做了大量修订工作，有时甚至重译，为罗马尼亚文字的规范和后来的

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在文学史中占有特殊地位。

2. 罗马尼亚语经文与史书的兴起

这一世纪,罗马尼亚诸公国世袭大公的势力日趋削弱,处于上升阶段的豪门贵族依附奥斯曼帝国,不但在经济上控制了粮食、畜牧、矿业等经济命脉,而且在政治上也逐渐掌握实权,许多家族挤进大公行列。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这些家族时而联合,时而对抗,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得错综复杂。但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主权沦丧,奥斯曼帝国加强对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的控制,使其附庸国的地位更加突出,而特兰西瓦尼亚则于 1688 年被奥地利占领;二是社会矛盾加剧,广大农奴、农民不满民族奴役和阶级压迫,经常通过暴动、逃亡等形式予以反抗。

在上述历史环境中,一些文化现象不容忽视。首先是罗马尼亚文字在市民等新兴阶层的推动下持续普及,至 17 世纪后期已被教会和官方采纳,完全替代了古斯拉夫语。1688 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第一部罗马尼亚语《圣经》全译本就是一个佐证。但是,这一时期,文化仍牢牢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强力制约,因此出版物仍局限于宗教和历史范围。与上一世纪相比较,宗教、历史类书籍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无论在形式或者内容方面都有了新的特色。宗教继续通过神权维护封建统治,但有关经书的罗马尼亚译文更趋规范化,文学手段和文学成分逐渐增多。史书的撰写由王室官员转入贵族文人手中,因而这类书籍更侧重感性和个体价值,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此时史学界已经出现人文主义的苗头,主要表现为有关学者,例如科斯丁、刊特米尔等,通过确凿的历史资料证明了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同宗同源。这一思潮的产生,一则是三个公国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是抗击异族入侵的斗争中,一直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二则是这一世纪贵族阶层和文

人突破古斯拉夫文化和奥斯曼帝国的封闭，开始同西方文化接触，眼界拓宽了；三是教育的兴办，使知识阶层逐步扩大。摩尔多瓦的V.卢普大公和罗马尼亚的C.布伦科维亚努大公是当时著名的推崇文化的君主，他们在教会的配合下，分别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成立了三圣书院和王室书院，造就了一批人才。此外，富有的贵族不满足国内教育，经常派子弟到波兰、德国、意大利和文化传统悠久的君士坦丁堡留学，直接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

教会方面，对罗马尼亚文字的普及以及书面文学的兴起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有摩尔多瓦公国的瓦尔拉姆大主教和多索夫特伊大主教、罗马尼亚公国的U.纳斯土雷尔和特兰西瓦尼亚的S.斯特凡，下面扼要介绍前两位。

瓦尔拉姆大主教(Varlaam，？—1657)，俗名V.莫措克。他在长期的教会活动中致力于推广罗马尼亚语经书，著有《布道文》、《教堂七圣礼》等。其中，长达1000页的《布道文》(*Cazania lui Varlaam*)最有文学价值，因为它不但注重语言的规范化和通俗化，而且含有艺术性散文和诗歌，是17世纪前半叶最完美的一部罗马尼亚语著作。诗歌共有三首，一首颂扬摩尔多瓦封建公国，另外两首均为宗教内容。虽然这些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显得稚嫩、笨拙，但它们确为罗马尼亚韵文开凿了先河。在散文艺术方面，他也被认为是优秀的先驱者之一。多索夫特伊大主教(Dosoftei，1624—1693)，俗名D.巴里拉。文学界认为他是罗马尼亚的第一位诗人，因为他翻译出版的《圣经·诗篇》为文人诗歌树立了最初的楷模。经书中，《诗篇》是比较难译的。最初，他把它译做散文，后来改写成韵文，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运用本民族语言，大胆采用了许多诗歌手法，民间用语和民间诗歌的节律是他借鉴的主要源泉。他的另一部译著改写本是《圣徒生平》，共四卷，在故事叙述和人物刻画方面含有一些精品。

史书方面，摩尔多瓦公国较为突出，著名学者有下列两位。

G.乌雷克(Grigore Ureche，1590—1647)出生小贵族家庭，曾

在波兰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在历史、地理、拉丁语、古希腊语等方面造诣较深。卢普大公时期曾任高官，深得大公信任。当时，摩尔多瓦的文化事业趋向繁荣，为使国人“不像禽兽那样”忘掉过去，为使已逝的岁月“不被时间淹没”，他主动提笔修史，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价值较高的史书，学术界称之为《摩尔多瓦公国史记》(*Letopisetul Tării Moldovei*)。这部书涵盖了自1359年德拉戈什立国到1594年阿隆大公执政的历史时期，其中有关斯特凡大公的业绩占了大量篇幅。与上一世纪的史书相比，这部著作的史学见解更为客观。虽然从整体上说乌雷克是贵族阶层的代表，且他的家族和他本人与更替频繁的某些王室势力处于尖锐矛盾之中，但他仍能公正评价历代人物，褒贬适度。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开篇词中提到了罗马帝国军队对达契亚的征服，明确指出三个公国的罗马尼亚人“都起源于罗马”以及罗语词汇与拉丁词汇的相似性，自此揭开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关于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起源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和探讨。在文学手法方面，他的史书也有独到之处。许多具体的历史事件表达得流畅、生动，尤以描写景物和刻画人物见长，斯特凡大公的肖像勾勒是令人难忘的。由于较高的史实真实度和文学感染性，这部史书的一些片段成为后世作家灵感的源泉，例如内格卢兹的历史小说《勒布什尼亚努》、亚历山德里的剧作《德斯波特大公》、德拉弗朗恰的《日落》三部曲、萨多维亚努的《吉德里兄弟》等均取材于乌雷克的作品。17世纪摩尔多瓦公国另一位著名史学家是M.科斯丁(Miron Costin, 1633—1691)。他的身世和乌雷克极其相似，也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举家避祸波兰，并在那里受到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青年时，作为波兰贵族，曾参加对哥萨克和鞑靼人的征伐。回国后涉身政务，数次出使国外并任高官，随军转战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等地，最后终因卷入贵族间的斗争而被斩首。他虽然饮恨离开人世，但却为后代留下了另一部珍贵的《摩尔多瓦公国史记》(*Letopisetul Tării Moldovei*)。这是一部接续乌雷克史记的断代史，时间跨度较短，起自1595年，终于1661年。这

段历史像他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暴力和动荡，他要把它记录下来传给后代，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为此，他大量收集活的资料，采编回忆录，整理耳闻目睹的各类事件，翻阅罗马尼亚、波兰等国的有关书籍，然后把它们融为一体，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述诸笔端。这部史书以材料丰富、描述生动见长，如实再现了一些大公和贵族在权利和金钱方面贪得无厌的丑恶面貌。记述某些历史事件时，能够客观反映残忍的异族压迫和人民的疾苦，评说史实不以个人恩怨为标准，尽量做到公正。至于这本著作的文学价值，首先应该看到它是一幅生动的人物画卷，各类形象有血有肉，跃然纸上。有别于前人，科斯丁在刻画人物方面能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突出人性和个性，且把这些人物放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外，由于他知识广博，修史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格言、成语，以及比喻、隐喻、直述、独白、对话等修辞手法，构成了他的史书的一大特色。像乌雷克一样，他也从历史、地理、语言等角度论证了罗马尼亚民族的拉丁起源，可惜他一生动荡，没能把这方面的研究深入下去。

罗马尼亚公国本世纪的史书共有两部，即《康塔库吉诺家族史》和《博利亚努家族史》，反映了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上述史书作者没有署名，推断是家族文吏所著。1660 年前的材料均取自一个无名氏蓝本，1660 至 1688 年是家族间论战的主要内容，表述过程中撰写人通过各种手段极力证明自己的一方是正统派，有权占据大公的位置。由于阶级利益相同，这两部史书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是抬高自己贬低对方，抬高自己求助于神权，贬低对方使用诅咒。对待奥斯曼帝国，两个家族都多方巴结，可又不得不顾及民意，偶尔指责几句。当时，为了便于统治，奥斯曼当局曾派许多希腊富人到罗马尼亚担任官职。对于他们，两个家族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民众的疾苦和反叛有时是不得不予以述及的内容，但书中只是把这类事件作为攻击对方的一个论证。至于文学特色，无突出之处可言。

这里,应该提到与中国有一定关系的学者N.米列斯库(Nicolae Milescu, 1636—1708)。他出生在摩尔多瓦,曾在君士坦丁堡求学,通晓拉丁、古希腊、古斯拉夫等语言。回国后担任要职,后为一位流亡大公出使瑞典和法国。再次回国时与新任大公发生矛盾,被迫移居君士坦丁堡,从事神学研究。1671年经人介绍,到俄国使节部任译员,翻译外交文书和宗教、哲学材料。1675年,沙皇米哈依洛维奇委派他出使中国,外交使命结束后撰写了《中国纪行》和《中国游记》。他的文化底蕴比较复杂,既有中世纪巴尔干地区的封建神学积淀,也有西欧的人文主义影响,这些因素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至于他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受沙皇之命出使中国,更应该依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客观评价。17世纪中期,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受到钳制,商路不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市场又大部被波斯和土耳其商人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其扩张计划,惟一的出路就是抢先向远东发展,罩有神秘色彩的古老中国自然成了沙皇垂涎的一个目标。为此,米列斯库被任命率团出使中国,执行特殊的外交使命,即:综合考察乌拉尔以东的大片领地,同远东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全面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米列斯库完成了上述三个使命,前两项写人《中国纪行》中,1678年返回莫斯科后立即交使节部存档,长时间鲜为人知。第三项反映在《中国游记》里,修订到满意程度后才交有关部门,在某种意义上挽回了沙皇米哈依洛维奇死后他的失宠地位。这就是上述两本著作问世的政治背景。

《中国纪行》(*Jurnal de călătorie în China*)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关于西伯利亚,二是关于中国。从总体上看,它超出了普通外交报告的局限,其材料之丰富,文笔之细腻,更近似一部游记。一路上的风光、景物,诸如花草林木、飞禽走兽、河流湖泊、高山平川等尽在他的笔下展露异彩,使人感到新奇。因为这是一部考察报告,旨在向沙俄当局全面介绍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情况,所以作者尤其注重地理、人文、经济方面的见闻,沿途的重要地貌,诸如鄂

毕河、贝加尔湖、黑龙江等,以及他所遇到过的一些以渔猎为生的部族,都尽其所知在书中做了记载。关于中国部分,他对参加接待和谈判的一些官员刻画入微,其中既有知识广博的智者,也有贪图小利而丧失尊严的腐败之辈。普通中国民众的勤劳、坚毅和才能是米列斯库盛赞的内容之一,充满感情。但是,由于他是沙俄的外交代表,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对主子负责的,所以关键时刻他会说出“沙皇既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向,也没有挑起仇恨或者进行威胁的企图。如果邻国的君主执意刁难和挑衅……那么我的伟大的主人也可以述诸战争。”

《中国游记》(*Descrierea Chinei*)富于文学性和纪实性,在许多方面摆脱了外交使命的制约。这里,米列斯库更像一位旅行家,凭其敏感的直觉和丰富的想像力,把他在中国的大量游历见闻记录下来,向外部世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个古老的国度。当然,撰写过程中,他也参考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档案资料和作品,其中有瑞典人 I. 纽霍夫的作品和塞尔维亚修士 J. 克里扬奇的两份手稿,并把相关部分充实到《中国游记》中。全书含 58 章,前 20 章是专题介绍,后 38 章按行政区划描述,许多段落充满对中国文明的惊诧和赞美,尤其突出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善良、礼让等优秀品德。各地风光和习俗也是他记述的一个重要侧面,书中提及的有些礼仪、典故和传说可能出于猎奇,或者以讹传讹,难以考证。此书用古斯拉夫文撰写,问世后立即有俄文和希腊文手抄本流传,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引起某些人的兴趣。

17 世纪,除用罗马尼亚语撰写的宗教、历史类著作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些含有文学成分的国外通俗性书籍译文,这对后来的文学萌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类书籍故事性强,通常带有神秘色彩,侧重道德、启蒙教育。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下列几部:《亚历山大传》(*Alexandria*)最早的译本完成于 1620 年,讲的是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和事迹。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注重英雄业绩的描述,突出征伐和男性的英勇气质;第二部分大量使用

格言、警句，寓道德教育于故事之中。当然，这些故事都是与亚历山大大帝的行止有关的。例如，一个强盗被擒后鼓足勇气对皇帝说："我杀个把人夺其财物只是因为贫穷，而陛下为了掠夺却杀戳成千上万的人，屠灭全城。"亚历山大听后饶恕了他，并任命他为千人长。《瓦尔拉姆和约萨夫》(*Varlaam și ioasaf*)源于释迦牟尼传说。据考证，该传说首先在波斯流行，译成阿拉伯文后传至耶路撒冷，后又译成希腊文传到欧洲。罗马尼亚语译本是1649年从古斯拉夫文翻译过来的，书中的释迦牟尼按基督教习惯改称为约萨夫。他生活在一个远离人间苦难的宫廷，青年时出游看到一个驼背和一个盲人，感悟到人类倍受疾患折磨；看到一个老人，感悟到青春易逝；看到一个死人，感悟到人生短促。因而，他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思索。但是，要想达到最高的认识境界，只靠冥思苦想是不够的，还需履行诸如洗礼、圣餐等教会仪式。于是，隐修士瓦尔拉姆承担了这个使命。他化装成商人，面见王子，说教布道，为其施以圣礼。在罗马尼亚，这个故事对宗教壁画和民间文学有较大影响，尼亚姆茨修道院的拱顶上就绘有与此相关的32幅宗教画。《小蜜蜂》(*Albinușa*)是一本品德教育书，最早的译本有两种，分别完成于1620年和1693年。全书分34篇，每篇述及一种美德或一个恶习。各篇的结构大致如下：给美德或恶习下定义，与某些动物相比较，罗列取自《圣经》和古代学者的有关格言和警句，附以一篇小故事。例如，《智慧篇》中从前事不忘、善别真伪、预见未来、博采忠告等角度设定"智慧"后，立即与蚂蚁的夏储食物防冬饥做比较，接着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至理名言，最后以一篇罗马皇帝求知于哲人、免遭杀身之祸的小故事结尾。该书翻译过程中插入了一些罗马尼亚民间传说，例如《贞洁篇》中就有雌雄斑鸠生死相伴的故事。除上述影响较大的民间图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星象书和宗教故事书广为传抄。

3. 人文主义与文学

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仍属古代范围,具有个性的民族文学还没有真正兴起,诸多的文化现象只是给后来的文学创造了必要的萌生和发展条件。

社会、历史状况是制约文化走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罗马尼亚诸公国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持续加剧。在庄园主兼并土地、增加徭役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或者沦为农奴,或者大量逃亡,苦不堪言。至于民族奴役,特兰西瓦尼亚仍处于奥地利统治之下,而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只是在内部事物方面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外交和军事基本被土耳其控制。尤其是自18世纪30年代起,奥斯曼素丹开始从本土向上述两个公国派遣大公和其他官员,使他们同土著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更为加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罗马尼亚文学的滋生和发展严重缺乏自由土壤,文化思想受到异族统治者的钳制,从而出现了本民族书面文学进展迟缓的现象,而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却逐步加深,主要表现在学校教育和著述方面,此后土耳其语也成了社会交际中的一种时髦语言,一批词汇渗透到罗语中。当然,本世纪中期罗马尼亚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往来有所增加,法语文化也开始被一些文人吸收,但尚未构成主流。因此,这一时期罗马尼亚文化的底蕴中只有希腊和土耳其的影响较为明显。

A.伊维利亚努(Antim Ivireanu, ? —1716)是宗教文学方面的突出人物,曾在罗马尼亚公国兴办印刷业,一生共印制四十余种希腊文和罗马尼亚文经书,出版物正文前通常附有他亲自撰写的具有爱国和哲理、道德内容的前言。他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把布道由朗读改为宣讲,收入《布道集》(*Didahii*)的1709至1716年间的布道词内容相当通俗,富于诗意。许多篇章带有鲜明的争辩性质,为演说体树立了典范。他秉性耿直,对当时贵族的堕落时尚给予

了尖刻的抨击。由于他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奴役,被逮捕后惨遭毒手,死于流放途中。

于宗教界相比,史坛的学术气氛比较宽松,在人文主义思想深入传播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个性鲜明的史学家。他们注重材料的真实,综合看待历史事件并予以评断,强调语言规范,追求形式完美。以上各点构成了罗马尼亚史学晚期人文主义的特点,使历史著作走向一个新阶段。

C.康塔库吉诺(Constantin Cantacuzino, 1640—1716)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在国外受到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回国后卷入贵族间的权力角逐,他的家庭一度得势。他自己虽然没做大公,但他的兄长、外甥和儿子统治罗马尼亚公国时,重要的外交政策都是由他左右的,主导思想是逐渐疏远奥斯曼帝国,希望求得俄国或奥地利的帮助维护国家主权。为此,他和他的儿子均被土耳其杀害。作为学者,他除参加翻译《圣经》等宗教书籍外,主要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罗马尼亚公国史》(*Istoria Tării Românesti*)。这部史书虽然没能最后结稿,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因为它标志罗马尼亚史学研究走入一个新的里程。该书与前期同类作品比较,显著特点是注重修史的科学性。康塔库吉诺不再像前人那样致力刻画人物肖像或者求助对话等文学手法描绘历史,而是讲究材料的翔实与准确,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和提出问题。他对于材料的筛选是相当严格的,不轻易搬用,因而大量史实的可信度较高。该书的《前言》和正文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修史的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政治、道德教训;历史像动、植物一样生死接续,周而复始,循环发展;分居各地的罗马尼亚民族同宗同源,而且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存。当然,从总体上看,康塔库吉诺无法摆脱自身的阶级立场。他认为封建等级和神权是天经地义的,只要不滥用职权就可以了。在文体方面,他排斥语言的通俗性,强调文字的典雅、艰深,因而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了希腊、拉丁和意大利词语,且句法结构臃肿累赘。

这一时期，罗马尼亚公国知名的史学家还有R.格雷恰努、R.波佩斯库等。

摩尔多瓦公国的D.刊特米尔(Dimitrie Cantemir, 1673—1723)是本世纪罗马尼亚最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他的功绩远远超出史学范畴，研究领域涵盖了神学、哲学、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他生于大公家庭，幼时在国内读书，后来作为大公家族的人质在君士坦丁堡断断续续住了二十余年。于当地的希腊学院求学深造之余，他熟悉了穆斯林世界、阿拉伯古老文明和东方民族的信仰，在历史、神学、民俗学等方面成为罗马尼亚第一位卓有建树的东方学研究者。学业结束后，他曾涉身外事，同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多次接触，扩大了眼界，并随同土耳其军队异地征伐，积累了军事知识。这段期间，他撰写了《灵与肉的审判》、《玄学》、《逻辑》、《土耳其音乐专论》和《秘史》。1710年回国任大公，其治国纲领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内主张君主集权，排斥大贵族势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欧洲的政体改革潮流；二是对外联合沙俄，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俄罗联军于1711年的战役中失利，彼得大帝退出摩尔多瓦，刊特米尔也随之避居俄国，直至辞世。在俄国的这段期间，他曾任沙皇参事，出于沙俄对别国国情研究的需要，他撰写了《摩尔多瓦记事》，为此他当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此后，又相继发表了《奥斯曼帝国史》、《伊斯兰教体系》、《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史》。他一生的著作涉及范围相当广，但纵观其发展过程，从第一部神哲内容的《灵与肉的审判》到后期的一些史书，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已经从中世纪的陈腐观念转向人文主义，注重著述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由于他的身世和所处历史环境，他的作品除第一部、最后一部和《秘史》外，都是用拉丁语起草的，这样更便于向国外介绍自己的思想，因为当时的拉丁语还是欧洲官方和学术界的通用书面语言。

在他的各类著作中，《秘史》(或译作《象形文字史》)(*Istoria ieroglifică*)是一部寓意很强的文学性作品，如象形文字一样，一般

人很难看得懂。全书共 12 章，通过巧妙奥秘的寓言形式描绘了 1703 至 1705 年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的一段历史。当时，这两个公国的命运都是由君士坦丁堡决定的，而作者本人作为大公家族的人质也在此地，所以他十分了解权力争夺的各种内幕。罗马尼亚公国的布伦科维亚努大公为了在摩尔多瓦公国安插一个驯服的工具，用钱买通了奥斯曼素丹，把拉科维察推上了摩尔多瓦公国的大公位置。刊特米尔兄弟不满于拉科维察的昏庸无道和土耳其对国人的残酷压榨，采取各种办法推翻了这个小朝廷。而后，作者的兄弟买通了土耳其人，于 1705 年登上大公宝座，作者本人也得到了心理和物质上的满足。为了反映这段历史，刊特米尔精心设计了各种令人迷幻的离奇情节，书中的人物全部取自动物界。作者是神话中的独角兽。四足野兽类代表摩尔多瓦贵族，猛禽类体现罗马尼亚公国的达官贵人，他们嗜血成性，时时刻刻在制造死亡。民众地位卑贱，昆虫是他们的化身。小小昆虫势单力薄，可一旦遭到无端欺辱，也会群起造反，要求公正和法制。神庙是奥斯曼帝国的缩影，那里灯烛辉煌，供奉着贪婪女神。任何向她顶礼膜拜的人都得掏空自己的衣袋，不留分文，而女神身边的侍者全是收纳贿赂的奴性十足之辈。女神宝座下面是一堆永不熄灭的火，有朝一日它将毁掉这宏大的庙宇，对贪婪女神给以无情惩罚。终读《秘史》之后，了解时代背景的读者可以解开大部分谜底，体会到该书的政治和社会含义。为了增加读者兴趣，文中经常插入作者的哲理思考或格言、警句，有时也镶入一首小诗，成为《秘史》的一大特色。

在摩尔多瓦公国的史学家中，I. 内库尔切（Ion Neculce, 1672—1745）是最具文学才能的一位。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前期宦途坎坷。刊特米尔大公执政时，曾任部队最高统帅。1711 年与俄军联手抗土失败后，流亡俄国和波兰，长达 9 年。回国后不受重用，晚年致力修史。《摩尔多瓦公国史》（*Letopisețul Țării Moldovei*）是他留下的惟一作品，该书通过生动的艺术手法再现了 1661

至1743年间的历史风云。在这82年中,如果以1711年刊特米尔大公抗土战争为中界,前期的特点是奥斯曼帝国任意摆布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的大公,稍有不满即予以更换,谁给的贡品丰实就扶谁上台。而登上王位的大公心里明白手中的权力随时都可能丢掉,所以执政时拼命吮吸民脂民膏,聚敛钱财。在野的贵族毫不示弱,除极力维护受大公威胁的封建特权外,还施展各种阴谋妄图篡夺王位,因而贵族与大公、贵族与贵族之间也展开了殊死的角逐。这一阶段的后期,即抗土战争以后,土耳其人不再信任罗马尼亚土著贵族,经常是从君士坦丁堡派希腊富人到上述两个公国任大公。这些异族统治者更是贪婪、残暴,赋税持续沉重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对于这种社会、政治状况,内库尔切耳闻目睹,深有感触,感发于中,写出了这部文学纪实性极为突出的史书。他牢牢把握那个时代的几条主线,一是奥斯曼帝国的暴虐,二是国内大公的昏庸。他忧心这种社会现状,呼吁祖国有朝一日能够获得独立。另一方面,民众的疾苦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尤其是日益沉重的赋税,为此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土耳其统治者和希腊族大公。但是,他的历史观是有局限性的,他仍认为神的意志主宰着历史的发展,而农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违背了历史的本意。值得重视的是该书正文前面附有《絮语录丛》(*O samă de cuvinte*),其中有些篇章取自前人的文字材料,加以改写,另一些直接采于民间。这组作品共42篇,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接近现代意义的小说,集中体现了内库尔切的文学才能。历史部分也好,传说部分也好,在艺术手法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工于勾勒人物形象,其次是擅长铺陈、描述。书中涉及的十多位大公和名人,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都跃然纸上。许多枯燥的历史事件,由他润色变得情节迭起,趣味横生。他的语言也十分丰富,更贴近口语,时而幽默,时而尖刻,生动形象。由于他的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许多篇章成为后世作家创作的楷模。

18世纪后叶,摩尔多瓦公国的部分史书用希腊文撰写,其学术

价值和文学价值都低于前人，比较知名的有久列斯库、德帕斯塔等人的著作。

鉴于希腊文化的影响和同俄国的接触，这一世纪许多通俗性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在民间流传，这对罗马尼亚本民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和培养读者的艺术兴趣无疑是一个促进。

《阿尔希里和阿纳丹》(*Archirie şi Anadan*)的最早译本始于1708年，此后又陆续有别的抄本问世。故事讲述某国谋臣阿尔希里收养义子阿纳丹，多方培养使其成人，最后义子接替了他的职位。可是阿纳丹恩将仇报，设计诱义父率兵闯宫，被处死刑。埃及法老听到该国谋臣已死，立刻派使者面见国王，要求他为法老建造空中楼阁，否则就得向埃及纳贡。国王悔恨斩了谋士，痛心不已，可典狱长却将秘密藏在地窖中的阿尔希里带了上来。国王立即让他亲赴埃及。在那里，他用他的智慧挫败法老，救了国王。故事中的许多成语后来被 A. 潘恩收入《成语故事》中。《伊索寓言》共有15个译本，最早的一种完成于1703年。这些传本大多译自希腊文或俄文，由于翻译时依据的蓝本不同，内容各有增删，但译文的文字流畅，忠实反映了原文的特点。《辛迪巴》(*Sindipa*)的最初译本始自1703年，但到18世纪下半叶才广为流传。这是一部类似《天方夜谭》的小说。波斯国王吉拉委托哲人辛迪巴教子，限期6个月。辛迪巴采用图画式教法，提前把王子培养成哲人。但根据卜算，王子回到国王身边的7天内，必须保持沉默，否则将招致杀身大祸。王子答应了。国王见他整日不言不语，就派一名爱妃去开导。爱妃心怀邪念，多方诱惑不成，就诬陷王子企图强暴她。为此，王子被处死刑。行刑之前，国王又征求7个哲人的意见。哲人们惟恐国王日后反悔，把灾难转嫁到他们头上，所以私下商议每人陪伴国王一天，向他讲女人奸邪的故事。这样，每次听完故事，国王都有意赦免王子死罪，可爱妃又插了进来，改变国王的决定。最后，七天过去了，王子可以说话了，故事以圆满结局告终。罗马尼亚语译本共含24个故事，其中14个是七位哲人讲的，7个出自爱

妃之口，王子讲了两个，辛迪巴一个。

这一时期，影响较广的通俗性翻译小说还有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和《一千零一日》、希腊爱情小说《埃塞俄比亚姑娘》、意大利骑士小说《特洛伊覆灭记》、意大利讽刺作品《贝尔特尔多》等。

三、1780—1867 年的文学

经历了长达 5 个世纪的封建时期之后,罗马尼亚文学自 1780 年起开始了一个向近代文学转化的过渡阶段。这种转化是由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但也受到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的制约。

1780 至 1867 年间,罗马尼亚诸公国经历了一个中世纪封建关系瓦解和资本主义关系开始形成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均带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这期间,整个文化和文学活动是围绕几件具有深远社会意义的大事展开的。18 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对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公国的压榨日益严酷,终于引发了 1821 年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由奥斯曼帝国扶持的封建统治。自此,土耳其势力开始削弱,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公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加强了同西欧国家的接触。1848 年革命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件大事。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下,它向封建制度发起了全面挑战。最后,革命浪潮虽然被压制下去,但旧的社会体制和奥斯曼帝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却面临崩溃。这次革命更加激发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意识,1859 年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实现联合,此后民选大公库扎推行了一系列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

与上述社会环境相适应,这一时期在文学发展方面形成了三

个小的阶段。1780 至 1830 年间，以 S.米库、Gh.辛盖、P.马约尔等人为代表的阿尔迪亚尔学派受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在语言学、历史学和文学方面推崇时代性和民族精神，为近代社会学科的发展开辟了先河。1830 至 1860 年，文学以 1848 年革命为依托，造就了一批富于战斗精神的优秀作家，其中有 H.勒杜列斯库、Gh.阿萨基、V.亚历山德里、N.博尔切斯库等。1860 至 1867 年，在公国统一后的短短 7 年中，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的"48 文学"进一步发展，创作手法上开始采用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有 N.菲利蒙。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通过 B.P.哈斯德乌和 A.奥多贝斯库的努力，被放到指导文学发展的重要位置。

1. 启蒙运动与阿尔迪亚尔学派

阿尔迪亚尔是位于罗马尼亚西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别称。阿尔迪亚尔学派则是 18 世纪末叶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出现的文化潮流，它标志着罗马尼亚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文化思想登上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潮流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兴起是由特定的内外因素促成的。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长期遭受奥匈帝国奴役的特兰西瓦尼亚人民渴求社会解放和民族统一，唤起民族意识已经成为知识阶层的普遍愿望。为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在罗马、维也纳等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批文人首先接受了西方的进步思想，试图通过文化启蒙的途径与异族统治者抗争。他们的活动主要表现在语言学、史学、文学和科学普及四个方面，主旨是通过科学手段，从各个角度论证罗马尼亚民族的同一性和延续性，以期在政治上为本民族争得平等权利和社会解放。尽管这一潮流是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 特兰西瓦尼亚发起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学者，但它的社会影响极为深远，推动了罗马尼亚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

S.米库(Samuil Micu, 1745—1806)是阿尔迪亚尔学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曾在维也纳求学，知识广博，被誉为世纪之交罗马

尼亚近代文化的第一位开拓者。他一生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撰写了62种著作,可惜作者在世时绝大部分未能出版。他在史学方面贡献突出,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位史学家。他的著述有别于中世纪史书,贯穿了科学性和人文主义思想,其中一部分用拉丁文起草,旨在使国外学术界了解罗马尼亚民族;另一部分用本民族语言撰写,带有明显的启蒙特点,以便在民众之中唤起民族意识,激发民族自豪感。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是《罗马尼亚人的历史、经历和事件》(*Istoria, lucrurile şi întâmplările românilor*)。它打破公国界限,把罗马尼亚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全面介绍了这个民族的过去。全书分四卷。第一卷从语言与民族的形成写到作者在世时的特兰西瓦尼亚社会状况;第二卷是罗马尼亚公国史,截止于1724年;第三卷主要介绍摩尔多瓦公国的历史风云,终于1795年;第四卷是阿尔迪亚尔地区罗马尼亚教会史,主要介绍公元4世纪以来罗马尼亚教会的情况。他的历史著作有下列特点:在科学论证罗马尼亚民族拉丁渊源和连续性方面,过分强调了这个民族的纯拉丁血统,排斥了土著达契亚人对民族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严厉抨击了封建体系和农奴制,但在社会改革方面仍把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试图通过上书与改良手段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语言研究成果显著。为了证实罗马尼亚民族的拉丁渊源,他推出拉丁化的罗语词源和正字法体系,并且第一次用拉丁字母印刷了罗语书籍,从而打破了该语言只能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偏见。罗马尼亚语的第一本语法书也是由他编写的。该书含"正字法"、"词源"、"句法"、"构词法"等篇章,书后附有罗语—拉丁语词汇表。这本著作虽然夸大了古典拉丁语对罗语形成的作用,但毕竟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语言现象,欧洲语言学界把罗语并入罗曼语支的主要依据就是这本语法书。他还是罗语辞书编纂工作的第一位倡导者,《布达词典》的大部分词条是由他完成的。

阿尔迪亚尔学派还有两位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是Gh.辛盖

(Gheorghe Şincai, 1754—1816)和 P.马约尔(Petru Maior, 1760—1821)。辛盖出身小贵族家庭,罗马求学归国后致力教育工作,对乡村学堂的课本建设和师资培养起了突出作用。此后,由于受到迫害,长期颠沛流离,但他不顾生活坎坷,仍致力于民族文化事业的振兴,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史学界评价相当高的《罗马尼亚及其他民族的历史》(*Hronicul românilor şi a mai multor neamuri*)。这部著作资料丰富,详述了公元 86 年至 1739 年的罗马尼亚史,同时揭示了罗马尼亚同周边民族的关系。该书的宗旨除阿尔迪亚尔学派倡导的罗马尼亚民族拉丁渊源和连续性外,还通过历史事实证明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最早的居民是罗马尼亚人。他在语言学方面也有建树,全面修订了米库推出的《罗语语法》,使之更具科学性,并在"前言"中简述了罗语史。此外,他还有许多科普著作。马约尔是该学派另一位知名学者,他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一直持续到 1848 年革命时期。民族解放和文化振兴是他一生追求的核心目标,他把青年时期在罗马和维也纳获得的广博知识全部投入关系民族存亡的事业中。在语言探索方面,他发表了《罗语初始》等专著,指出罗语来自民间拉丁语,具有鲜明的罗曼语特征。他的史学研究尤为突出,《达契亚罗马尼亚溯源》(*Istoria pentru începutul românilor în Dachia*)以其翔实的资料、严密的逻辑、激昂的抗辩和明快的文体赢得好评,被后世列为史学界必读书籍之一。

阿尔迪亚尔学派的主要领导者并非全是历史或语言学者,他们当中也有优秀的文学家,I. 布达依—德利亚努(Ion Budai-Deleanu, 1760—1820)就是一例。在书面文学刚刚起步的时代,他的与启蒙主义密切相关的文学活动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作为该学派的倡导者之一,他在语言研究方面也同上述学者一样做了大量工作,编写过罗语语法和几本双语词典,引进了语法术语,制定了拉丁字母拼写规则,同时指出罗语源自民间拉丁语,形成过程中受到斯拉夫语的影响。这在当时的语言研究方面是一个进步。此外,他也撰写过历史书籍。但所有这些同他的文学成就相比都

显的逊色，因为他的代表作《茨冈史诗》不但全面反映了他的启蒙主义思想，而且在艺术上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茨冈史诗》（*Ţiganiada*）有两个传本，一个作于1800年，另一个完成于1812年。影响较大的是第二个传本。这部充满讽刺和喜剧成分的英雄史诗从艺术形式上看带有古典主义的印痕，但也不乏民间文学的影响。在思想上它显得自由、激进，大大超越了阿尔迪亚尔学派其他学者的神权观念，对宗教、国家和社会制度等提出质疑。便于形象表达罗马尼亚民族世代的心声，作者把故事安排在15世纪采佩什大公执政的罗马尼亚公国。采佩什大公率领民众抗击奥斯曼入侵军，这是故事的主线。征战过程中，为了不让流浪的茨冈人成为入侵军的帮凶，采佩什大公把各个部族的茨冈人组织起来，检阅之后让他们到另一个地点集结。但是在转移的路途上，由于意见分歧和争吵，他们时停时走。这期间，支持土耳其的魔王撒旦把一位姑娘掠走，藏到密林中的魔室里，姑娘的情人追踪寻觅。由于爱神的解救，姑娘被送到另一个地方。小伙子失魂落魄地在树林中游荡，喝了圣水，勇气倍增，返回大队后跟随采佩什大公斩杀敌人。茨冈人大队到达目的地后，几经磨难的小伙子同姑娘结了婚，并且向宾客讲述他寻觅姑娘时的天堂和地狱之行。这部史诗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采用了许多隐喻和象征。采佩什大公是英雄人物的代表，他勇于征战，严于执法，令贪官污吏和入侵之敌闻风丧胆。茨冈群体是民众的化身，他们有许多长处，但也不乏各种各样的缺点。茨冈部族的首领们各有各的特点，形象十分突出，肖像刻画、心理衬托、举止做派、语言特征、姓氏双关等是作者经常使用的艺术手法。基于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布达依—德利亚努通过旁白、茨冈人的争辩和天堂、地狱的描写，严厉抨击了专制制度、贵族阶层和堕落的教会，提出共和或者君主、贵族、民主合而为一的政体。此外，他也批评了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一些弱点，诸如：胆怯、懒惰、奴性、不和、自卑等。只有战胜专制制度和外敌，克服自身的不足之处，整个民族才能统一、强盛起来。所以故事结尾处，面对

茨冈部族意见不和一哄而散，采佩什又被迫流亡时，一名青年仍坚持提出继续战斗的口号。《三勇士》是布达依—德利亚努的另一部诗作，可惜没有最终完成。

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兴起的启蒙运动很快波及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表现在思想观念的改变、文化视野的扩大、文学体裁的增多、哲学问题的探讨以及公共教育的兴办等诸多方面。

境外旅游是开拓视野、接触新鲜事物的便捷途径。如果说罗马尼亚文人以往的国外旅行通常带有政治性或者包含外交目的，而且旅游地点大多集中于君士坦丁堡和波兰两个方向，那么在启蒙时代文人旅游便增添了娱乐性和教育含义，旅行方向则是文明程度发展较高的西欧国家。这些旅行者们不是简单的观光客，而是接触新的事物之后写成观感，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准备移植到自己的国家中来。D.果列斯库(Dinicu Golescu, 1777—1830)就是其中颇有成就的游记作家之一。他生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曾任官府要职，平平稳稳度过了前半生。年近半百时，时代潮流急剧变化，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影响，使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1824年，为送儿子们出外求学，他花费了3年时间游历了匈牙利、奥地利、德国、瑞士和意大利，沿途所见所闻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强烈震动。面对外部世界的文明，他起初只是惊愕，继而感到羞愧，羞愧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那么落后。于是他放下贵族的架子，提起笔来，把凡是值得借鉴的东西全都记载下来，大至行政体制、经济状况、民俗民情，小则机关、学校、剧院、农舍、医院、博物馆、养老院，以便旅行结束后告知自己的同胞。这样，一部相当出色的《游记》(*Însemnare a călătoriei mele*)就在强烈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写成了。这部作品材料丰富，描述细腻，情感真实，富有诗意。虽然有些段落显得幼稚，但仍不失为罗马尼亚第一部成功的游记。果列斯库的观感不只停留在纸上，国外观光归来后他身体力行，协助教育家拉泽尔开办了第一所用罗语授课的高等学堂，帮助学者勒杜列斯库出版了第一份报纸《罗马尼亚信使报》，此外他还和其他志

同道合的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学协会。

在启蒙思想深入影响的情况下,罗马尼亚公国的诗歌突破中世纪的束缚,首先得到了发展。鉴于同希腊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接触,它的演化轨迹基本是从阿那克里翁风格向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过渡,这一现象明显体现在沃科雷斯库家族的作品中。

I.沃科雷斯库(Ianache Văcărescu, 1740—1797)生于官宦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通晓多种语言,熟悉西方古典文学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品。在罗马尼亚文学从人文主义走向启蒙主义,从希腊风格趋向西方文学的过程中,他是抒情诗歌形成阶段的代表。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风格是他的诗作的主要情调,题材大多与游乐、爱情有关,其中有些作品被乐师采用,流传甚广。民间诗歌对他的创作有一定影响,《悲哀的斑鸠》(*Amărâtă turturea*)取材于民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I.沃科雷斯库有两个儿子,即A.沃科雷斯库(Alecu Văcărescu)和N.沃科雷斯库(Nicolae Văcărescu)。他们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都进行诗歌创作,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与他们的父亲相似。扬库·沃科雷斯库(Iancu Văcărescu, 1792—1863)是A.沃科雷斯库的儿子;他在这个贵族家庭中没有像他祖父和父辈那样任过高官,但却继承了家族的诗歌传统。他热中文化事业,大力支持民族教育,主持过剧院和文学协会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罗马尼亚诗歌开始从阿那克里翁风格向浪漫主义过渡。他的较为知名的诗作有《爱情的春天》(*Primăvara amorului*)、《真理》等。

2. 改革浪潮与"48"文学

这一时期的文学与1848年革命有紧密联系,通称"48"文学。同时,它又是罗马尼亚文学向近代转折的阶段,亦称前近代文学。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简单分野,在社会、文化潮流的承袭链条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启蒙主义曾在前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但它

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1860年，与这一期间社会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科技上的实验主义融为一体。

“48”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作家基本都是革命者，文学创作活动紧密依托社会、历史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充满强烈的战斗性，成为当时宣传鼓动民族与社会解放的有力武器。这一特点的形成，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

1848年革命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事件。革命前夕，三个公国的广大民众在进步力量的带动下对内外统治者进行了艰苦斗争，尤其是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人民起义和亚得里亚诺波尔和约签订后，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和国内的封建统治受到严重动摇，罗马尼亚在各个方面逐步获得一定的自由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广大民众充分意识到自身团结的力量，民族意识变得更加强烈。为了使国家摆脱封闭、落后的状况，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自觉地向西方学习，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模式改变国内的封建制度。文化活动密切配合社会斗争，在借鉴西方方面更是先行一步，为革命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当时，民众情绪普遍高涨，聚众起事此起彼伏，终于造成了1848年的总爆发。在这次席卷各地的革命活动中，人们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包括：取消劳役、还田于民、人人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社会各阶层选派代表组成立法会议、大公任期5年、组织国民卫队、出版自由、争取三个公国的统一等。但是，由于内外条件尚未成熟，革命活动连续遭到镇压，大批进步人士逃往国外。低谷期间，革命者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们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利用克里米亚战争和巴黎和会后的有利时机，重新提出统一的要求。经过不懈努力，1859年1月24日终于实现了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的统一，A. I. 库扎为民选大公。

由于土耳其势力的逐步削弱和罗马尼亚诸公国在经贸、思想方面开始同西方接触，1830年后的罗马尼亚文化急剧发展，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成果之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难以比拟的。它

涉及近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都是首创之举。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抱负的时代。

教育方面，开始推行学校公立化，注重中学和专业技术教育，扩充高等学堂的科系设置。各类学校均试行用母语授课。在有关条件逐步成熟的情况下，1860 年和 1864 年，雅西大学和布加勒斯特大学相继宣告成立。它们是罗马尼亚首批的两所大学。戏剧是这一时期文人极力推崇的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工具。为了提高戏剧质量，1833 年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两地分别创立了戏剧学校，培养人才。这样，1840 年后，逐步实现了剧团由业余爱好向专业化的转变，而且建造了固定剧场。报刊创办是近代社会的明显标志。1829 年，《罗马尼亚信使报》和《罗马尼亚蜜蜂报》分别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问世，主要转载国外新闻，以免新闻检查带来麻烦。数年后，这两份刊物都增加了文艺副刊，侧重文化启蒙工作。《达契亚文学》和《繁荣》是 1848 年革命前夕的两份重要文学出版物，它们以突出的文学批判精神和民族性指导当时的文学潮流，为罗马尼亚近代文学奠定了初步基础。革命后，《罗马尼亚文学》继承了文艺杂志的优良传统，《多瑙河之星》则主要为公国的统一做鼓动工作。为了振兴祖国和摆脱民族的政治奴役，这一时期大批文人和开明贵族纷纷以各种名义结社，但在各类社团建立公共教育、创办报刊杂志、倡导民族文学、鼓励译著、兴建剧院、发展戏剧等具体目标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政治追求，诸如：改革奥斯曼封建体制、摆脱沙俄军事庇护、解放农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选、公国统一等。在这些社团中，影响比较大的是 1845 年成立的以普及文学知识、鼓励出版为宗旨的“罗马尼亚文学社”。起初，它吸引了布加勒斯特全部有才华的青年文化人，后来又接纳了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两个地区有影响的人士。由于该社团的鼓励和资助，一批文学、教育、社科、科技类图书得以出版，为封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生活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48”文学应运而生，充分体现

了整个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由附庸向独立、由中世纪文化向近代文化、由公国分立向民族统一国家转化的过渡性质。“48文学”大约涵盖了三十余个春秋,由于各类作品产生的环境、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宗旨的一致性,所以它们通常具有下列共同特征,即:创作从属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理想;对劳苦大众,尤其是农民,给以深切同情;题材民族化,侧重怀古、民俗和国内现实;抨击封建制度的各种弊病;倡导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

这一时期的文化主将涉及两代人。老一辈中有Gh.阿萨基、A.潘恩、I.H.勒杜列斯库、C.内格卢兹等。年轻人是主体,如:Gr.亚历山德雷斯库、G.巴利丘、C.博利亚克、C.A.罗塞蒂、A.穆雷沙努、I.吉卡、M.考格尔尼恰努、N.博尔切斯库、A.鲁梭、N.菲利蒙、D.博林蒂内亚努、V.亚历山德里等。他们大多出身中、小贵族家庭,在西方受过近代教育,民族意识和改革思想比较突出,文学上推崇能与革命内容相结合的浪漫主义,政治上为振兴国家忘我奋斗。因此,这批文化人既是作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形成了该时期作家群体的一个特征。

“48”文学可以分成两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840年以前,以作家阿萨基、勒杜列斯库及他们主办的《罗马尼亚信使报》和《罗马尼亚蜜蜂报》为核心。第二阶段是1840至1860年,它包括了与《达契亚文学》、《繁荣》和《罗马尼亚文学》等刊物有关连的一批作家和文学现象。

第一阶段(1830—1840年):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在I.H.勒杜列斯库和Gh.阿萨基的带动下,社会文化生活仍以推行启蒙主义为特征,这是具体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当时,为了尽快摆脱落后局面,有识之士以欧洲先进国家为楷模,在文化领域全面出击,普及知识、提高素养、兴办教育、出版刊物、发展戏剧等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讲,比前一时期阿尔迪亚尔学派的启蒙运动大大前进了一步,少了一些空泛的人文主义理论,结合国情的针对性和务实性更加突出。在这一文化潮流中,

近代文学刚刚起步，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尽管如此，勒杜列斯库等著名文人已经预见到了文学、戏剧的社会效应。在作家队伍、读者素养和文学氛围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们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广泛呼吁知识阶层提笔写作，善待任何作品，不扼杀任何一株民族文学的幼苗。这种导向具体归结到两个方面：鼓励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突出译著的借鉴作用。据统计，1830 至 1840 年间，布加勒斯特出版了 90 种翻译作品，雅西较少，但也有 27 种译著问世，可见当时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文学对翻译的重视。在这一导向的指引下，许多文人身体力行，《罗马尼亚信使报》和《罗马尼亚蜜蜂报》更是为近代文学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造就了一代知识广博的创作家。

I.H.勒杜列斯库（Ion Heliade Rădulescu，1802—1872）是 1848 年革命前罗马尼亚公国的文化主将。这位主要靠自学成材的知识界代表活动广泛，曾主办圣萨瓦高等学堂并亲自执教，曾出版罗语语法，曾主编罗马尼亚第一份刊物《罗马尼亚信使报》及副刊，曾创办文学社和音乐协会，曾大量译介世界文学名著，曾从事诗歌和散文创作，曾参与起草 1848 年革命宣言。由于各方面贡献突出，他被后人誉为知名学者、语言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罗马尼亚文学之父。尽管他的文学设想十分浩瀚，许多作品没有最终完成，尽管他的文艺导向侧重译介，对年轻人的习作只有鼓励没有批评，但他毕竟为这一阶段的开拓性文学创造了适宜环境。因此，“文学之父”的称谓他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失败后，他曾流亡国外，同积极向上的文化潮流逐步疏远。

在勒杜列斯库和《罗马尼亚信使报》的影响和熏陶下，罗马尼亚公国涌现出了一批成熟的作家。V.柯尔洛瓦（Vasile Cârlova，1809—1831）于新阿那克里翁风格仍然盛行的情况下，1830 年在《罗马尼亚信使报》上发表了《特尔戈维什蒂遗迹》（*Ruinurile Târgoviştii*）、《悲哀的牧人》和《昏暮》三首诗歌，为凝滞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浪漫主义气息，开创了怀古喻今的诗歌题材。此后，罗

马尼亚组建军队时,他又创作了《部队进行曲》,强烈的爱国内容使之广为流传。Gr.亚历山德雷斯库(Grigore Alexandrescu, 1810—1885)的处女作也是在勒杜列斯库主办的《罗马尼亚信使报》上发表的。初期阶段,由于父母早亡情感压抑,他的诗作以哀歌为主。1840年后,在民族解放的革命气氛影响下,他大量创作充满爱国激情的社会诗和哲理诗。《1840年》(*Anul 1840*)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它通过浪漫主义手法生动表现了罗马尼亚诸公国革命前夕的社会气氛。与同期其他诗人相比,他的作品除具有明显的浪漫风格外,也不乏现实主义成分。缅怀先人光辉业绩时,他总是能让读者透过激昂的诗句看到民众在内忧外患的时代里所经受的苦难。怀古诗中著名篇章有《米尔恰的影子》(*Umbra lui Mircea*)、《月亮升起的时候》、《坟墓》等,无论是意境还是语言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是诗体寓言的创作大师,由于他的努力,这一文体在罗马尼亚得到充分发展。这类作品形式简练,针对性强,深得人民喜爱。《狗和小狗》、《牛和小牛》、《雄狮断案》、《自由派狐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由于他的寓言诗内容广泛,艺术价值高,所以后人经常誉之为缩微的"人间喜剧"。C.博利亚克(Cezar Bolliac, 1813—1881)是这一时期社会诗的积极开拓者,《压迫》、《工人》、《大家闺秀和茨冈女》、《佃农》等充分反映了这位革命者的立场和思想感情。A.潘恩(Anton Pann, 1797—1854)是民间文学的采风家,谚语、笑话、故事、民歌、民谣等都是他采集的对象,并且为部分作品记谱。在世时,他曾出版各类集子一百余种,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民间文学遗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针砭时尚的《寓言与故事》和《谚语故事》(*Povestea Vorbii*),后者是罗马尼亚最早的一部谚语集。它按题材分成许多章节,每组谚语之后附有一段韵文故事,总数达101个。这些故事主题贴切,语言幽默,突出了谚语的形象性和寓意。

这一阶段,摩尔多瓦公国的文化主将是Gr.阿萨基,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1848年革命前夕另一支作家队伍。

Gh.阿萨基(Gheorghe Asachi, 1788—1869)曾在维也纳、罗马等地受过教育,深入研究了西方社会和文化,年轻时眼界比较开放,成为摩尔多瓦文化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开拓者,在罗语授课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剧团组建和演出、主办报刊杂志(如《罗马尼亚蜜蜂报》)、印刷出版等方面他都是这一地区的首创人。1840 年后,他的思想日趋保守,甚至对革命活动和公国统一持反对态度,与时代潮流逐渐疏远。他的一生,文化开拓实绩远远大于他诗歌、散文方面的文学成就。

C.内格卢兹(Costache Negruzzi, 1808—1868)早期曾为《罗马尼亚蜜蜂报》撰文,热中民众的文化启蒙工作。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业绩表现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两个方面。他曾是雅西民族剧院的主持人之一,创作并公演话剧《两个农夫和五只羊羔》,推动了后来的剧本写作工作。小说创作是他的强项,爱情故事《卓耶》和《跑马》情节曲折,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而《亚历山德鲁·勒布什尼亚努》(*Alexandru Lăpuşneanu*)则是罗马尼亚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作者的历史观的一个转折。他不再为流逝的历史刻意罩上理想的面纱,而是从多种角度清醒地对待往昔人物。这部作品取材于乌雷克和科斯丁的史书,生动地再现了摩尔多瓦公国的一段权力争夺史。全书分四章。第一章描述勒布什尼亚努大公复辟后同贵族阶层的尖锐对峙,在展现小说主线的同时,用明快、透彻的手法刻画了勒布什尼亚努大公专权、冷酷的形象,以及贵族们的阴险、多变的性格。第二章插入爱情场面。大公夫人替贵族求情,但遭到拒绝,爱情化为仇恨,为大公的暴死埋下伏笔。第三章中君臣冲突达到顶点,从设宴、搏斗、斩杀,直至把 47 颗贵族首级按官职高低叠成金字塔,在剧情急剧跳荡的令人屏息的气氛中全面揭示了勒布什尼亚努的多重性格。第四章是全书的结尾。刚烈、严酷的大公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终于被自己的妻子、近臣和主教联手毒死。该书具有浓郁的戏剧性,无论是整体布局、艺术视角、人物刻画还是凝练的对白,都超越了前人的水平。A.多尼

奇(Alexandru Donici, 1806—1866)终生从事法律工作,可当时的文学和社会感召却促使他出版了两部诗体寓言。他的作品虽然大多带有克雷洛夫寓言的痕迹,但主要内容还是针对摩尔多瓦现实的,对官府、贵族的劣迹和每况日下的社会风尚给予了尖锐的抨击。

特兰西瓦尼亚的文学状况较为特殊。虽然前一时期阿尔迪亚尔学派的启蒙运动影响很大,但由于奥匈帝国的统治,罗马尼亚文化进展缓慢。尽管如此,爱国文人仍为本民族的文化生存而不懈斗争,G.巴利丘(George Bariţiu, 1812—1893)就是一例。他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新闻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为普及文化、传播文学、唤醒民族意识做了大量工作。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罗马尼亚公国的勒杜列斯库处于同等地位。

第二阶段(1840—1860年):罗马尼亚经历了决定民族历史命运的两件大事:1848年革命和1859年的公国统一。在这短短的20年中,尽管动荡的社会条件对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有利,但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却步入繁荣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这一阶段的著名人物,例如:M.考格尔尼恰努、V.亚历山德里、A.鲁梭、N.博尔切斯库、D.博林蒂内亚努、I.吉卡等,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民族文学是革命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一代人的核心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国内外受过良好教育,熟悉近代欧洲的主要思想潮流,了解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现状,因而能够摆脱旧的文化模式,具备了驾御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能力。由于他们的努力,“48”文学无论是指导原则还是实绩,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达契亚文学》、《繁荣》和《罗马尼亚文学》等文学刊物对统一作家队伍和奠定文学发展方向起了突出作用。考格尔尼恰努在《达契亚文学》(*Dacia literară*)发刊词中提出的观点是三个地区的作家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的,其主要思想是:坚持文学的民族方向;民族性是一个文学的最可宝贵的属性;译介西方名著的同时,

必须杜绝有损民族文学的机械模仿和低劣的翻译;文学创作应取材于本国丰富的历史与现实;全体人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文学;加强文学批评,突出客观标准,对有害书籍决不姑息。上述思想在传统与借鉴、创作与翻译相互交错的文学转轨阶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遵循这种文学导向,一批作家在《达契亚文学》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作品,形成一种健康声势。文学种类极大丰富,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文学批评到随笔,从哲理散文到叙事诗与抒情诗,从闹剧到喜剧和历史剧,应有尽有。尽管作品数量不是很多,而且水平参差不齐,但是这一代作家的整体力量却使罗马尼亚文学登上新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潜力。与此同时,保证文学发展的其他因素也不断完善。这一阶段,文学语言更加规范,统一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罗语。专业出版社陆续成立,引入版权、稿酬支付等机制,与西方接轨。

M.考格尔尼恰努(Mihail Kogălniceanu, 1817—1891)是罗马尼亚著名政治家,曾任统一后的罗马尼亚政府首相,为国家转向近代社会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作为历史学家,他出版了《瓦拉几亚史》,主张史书的人民性,而不是记载大公们的生平,从而为近代历史的修撰奠定了基础。他的文化功绩异常突出,是世代公认的1848年前后罗马尼亚文化的改革者和倡导人。他除大力支持教育和戏剧外,还创办了《达契亚文学》等数种刊物,在制定文学发展方向和培育作家队伍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他文学成果不是很多,著有中篇小说《幻灭的梦想》和长篇小说《心灵的秘密》(片段)等。

V.亚历山德里(Vasile Alecsandri, 1818—1890)是“48”革命前后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开明的小贵族家庭,自幼受到文化的熏陶。1834至1839年间在巴黎攻读文学,回国后投身文化运动,积极为进步刊物《达契亚文学》撰稿。1840年他和考格尔尼恰努、内格卢兹共同领导雅西民族剧院,分管戏剧脚本创作,为民族剧目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改

革的伟大理想，他参加了 1848 年的革命活动，革命失败后过了一段流亡生活。1849 年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为罗马尼亚两个公国的统一不懈地奋斗。这一时期他的文学活动相当活跃，除主办《罗马尼亚文学》杂志外，两次加工出版由他采集的民歌、民谣，其中包含《小羊》等家喻户晓的精品。他的功绩不在于率先采风，而是当新阿那克里翁风格依旧流行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模式大量渗入的时候，为诗坛带来清醇的民族气息。在民间文学的影响下，他创作并发表了诗集《多依娜和泪花》(*Doine şi Lăcrimioare*)。多依娜组诗完全屏弃同代文人矫柔造作之风，充满了田园野景之真气，青年男女之纯情。泪花组诗多为爱情内容，虽内在冲突显得飘浮，但作者的情感却是真挚的。革命和公国统一期间，他的诗作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鼓动性，《罗马尼亚的觉醒》(*Deşteptarea României*)、《统一霍拉舞》(*Hora Unirii*)等一时间成为向往自由的号召书，"自由点燃灿烂的骄阳"、"团结就是力量"等诗句一直流传至今。1860 至 1880 年间，他的诗歌成就达到顶点。《田园诗集》(*Pastelurile*)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景物通透自然，笔法流畅舒展，为这类诗歌树立了典范。叙事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大多涉及历史传说和英雄人物，《红树林》、《好汉丹恩》等都是名篇。《我们的战士》(*Ostaşii noştri*)是一部爱国诗集，作者通过亲切、真诚而又略带诙谐的语言赞扬了罗马尼亚军人之威武。散文方面他为后人留下了几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一枚金币的历史》全面勾勒了摩尔多瓦上层社会的堕落风气，予以尖刻抨击。《非洲游记》(*O călătorie în Africa*)富含情趣，文笔欢快，生活气息浓厚。戏剧创作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统计，在 1840 年后的 45 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创作了五十余种剧本，其中有小品、闹剧、通俗笑剧、喜剧、社会剧和历史剧。1840 年他担任雅西民族剧院领导工作期间，为了改变外国戏剧的翻译本和改写本充斥话剧舞台的局面，他开始了建设该剧院民族剧目的艰苦工作，首先推出三幕喜剧《赫尔勒乌的巫师》。第二个剧本是独幕喜剧，起初的

剧名为《受骗的骗子》,后来改作《女帽商太太和小官吏》。这两个剧本是他戏剧创作的初步尝试,虽然在许多方面还不够成熟,但毕竟为民族剧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沙达古拉的约尔古》是一部讽刺世界主义的三幕喜剧,有力抨击了蔑视民族特性的社会风气。这部剧作不仅是作者在戏剧创作方面的首次成功,也是罗马尼亚戏剧文学中第一部优秀作品。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侍卫官哈茨马楚基》、《债权人》、《打赌》等。《狂欢的雅西》(*Iașii în carnaval*)是他的另一部成功之作,该剧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观众的口味、演员的演技和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从而剧作者把对专制政府和不良时尚的批评巧妙地揉合在轻松幽默的剧情之中。《农民婚礼》是他在革命高潮中推出的一台独幕话剧。该剧首次把农民形象搬上舞台,突出渲染了传统的民风、民情,以期赢得社会各界对这个倍受压迫的劳动阶层的理解和同情。当时,革命者们经常以该剧的排练活动为掩护,召集秘密会议。1850 至 1852 年,亚历山德里的创作活动十分活跃,连续发表了《两个活死人》、《新月》等多种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幕喜剧《吉丽察在雅西》(*Cucoana Chirița în Iași*)和两幕喜剧《吉丽察在外省》(*Cucoana Chirița în provincie*)。这两部喜剧用明快、泼辣的手法勾勒了 19 世纪中期摩尔多瓦的社会风貌,抨击了 1848 年革命后政治暴发户们的贪婪本性,揭示了这些新贵的无知、堕落和盲目模仿西方的丑态。上述两个喜剧屡演不衰,为了深入发掘这一题材,作者又创作了《吉丽察太太去旅行》和《吉丽察太太乘气球》。自 1865 年起,亚历山德里在戏剧题材和表现手法方面有新的突破,创作了社会剧《哈吉·佩特库的女婿》和《贵族与二地主》,前者反映了贵族阶层的衰落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后者抨击了本国政客和外国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压榨。《德斯波特大公》(*Despot-Vodă*)是一部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优秀历史剧,为这一剧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部剧作生动刻画了德斯波特大公的复杂性格,在猛烈抨击贪婪狡诈的旧时贵族的同时,也巧妙地影射了现实。《申季亚娜和佩佩利亚》取材于民间故事,在神奇的

传说色彩中渗透着针砭时弊的政治讽刺。他的最后两部剧作《布兰杜几亚水井》和《奥维德》(*Ovidiu*)均取材于古代的罗马世界,为了表达他晚年雄心不已和奉献艺术的乐观心情,或许他在贺拉斯和奥维德身上寻找到了两个自我。他性格开朗,富于幽默感,创作激情一直保持到暮年。

这一阶段,应该介绍的著名作家还有下列几位。

A. 鲁梭(Alecu Russo, 1819—1859)是1848年革命和公国统一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把戏剧舞台看成是传播进步思想的最佳讲坛,因而创作了《野心勃勃的女商人》和《仓廪官瓦德勒》(*Jignicerul Vadră*)两部喜剧,于1846年公演。由于《仓》剧抨击了摩尔多瓦的政治制度,严重违反了书刊检查的有关规定,所以剧本被当局查抄,剧作家和演员们也在演出后的次日夜间遭到逮捕,被关押到索维亚修道院中。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散文长诗《歌颂罗马尼亚》(*Cântarea României*),共有65节。该诗通过反衬、对比等手法,使美好山河与民众疾苦、光辉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通篇充满动人心弦的爱国激情。初稿用法语写成,革命失败后作者将其译成罗语,并公开发表,旨在坚定民众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他的《沉思集》和《回忆录》也别具特色。D. 博林蒂内亚努(Dimitrie Bolintineanu, 1819—1872)是一位多产作家,辞世前共出版五十余卷作品,囊括各种文学体裁,艺术价值参差不齐。诗歌类成就最高,尤其是民谣和史诗,气势悲壮,音乐性强。历代英威大公是他颂扬的核心人物,但他不侧重打击外敌的战斗场面,而是刻意渲染大公们的爱国举止,以便唤起读者的民族良知,献身祖国解放和统一事业,《米赫尼亚与老婆婆》(*Mihnea şi baba*)、《斯特凡大公的母亲》等都是这类诗作中的名篇。在罗马尼亚近代文学刚刚起步的阶段,他也是小说创作的拓荒者之一。在西方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下,他结合国内的社会实际,发表了《马诺依尔》、《埃列娜》等几部充满伤感、孤寂情调的爱情小说。此外,他还著有大量针对现实的杂文和游记,反映了这位

革命者各个时期的立场和心态。N.博尔切斯库(Nicolae Bălcescu,1819—1852)和C.A.罗塞蒂(Constantin A Rosetti,1816—1885)虽是这一阶段文化生活中的著名人物,但他们主要从事政治斗争和学术研究,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他们的成就不如其他同代人。前者是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勇敢的米哈依大公治下的罗马尼亚人》;后者多年从政,长于随笔和浪漫主义诗歌,出版的诗集有《欣慰的时刻》。A.穆雷沙努(Andrei Mureşanu,1816—1863)也是后人经常提到的作家,他的爱国主义诗歌《反响》(*Un răsunet*)由潘恩谱曲,成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革命者的一首战歌。

3."48"文学之余波

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批进步人士并没有放弃斗争,借助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于1859年实现了除特兰西瓦尼亚以外的两个公国的统一。在库扎大公的治理下,部分实现了还田予民、兴办教育、设立新的国家机构和制定法律等改革措施,使罗马尼亚向近代社会靠近了一步。但是没过多久,革命成果就遭到贵族、地主阶级的背叛,库扎大公被赶下台。面对这一社会状况,以浪漫主义为主导的"48"文学开始发生变化,主要作家在保持理想和信念的情况下客观对待世事,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许多现实主义成分;而另一部分人,其中大多是二流作家,则陷入悲观、消沉的状态中。

N.菲利蒙(Nicolae Filimon,1819—1865)出身卑微,曾在教堂唱诗班、歌剧团和档案馆工作,完全靠自学成材,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青年时期他以撰写音乐评论见长,此后转向创作小说。最初的作品《马蒂奥·契普里阿尼》和《费连德里希·斯塔普》用典型的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意大利和德国民众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斗争,但自《贫民区的绅士》起,他开始摆脱西方浪漫主义小说模式,向现实主义潮流靠拢。《新旧豪绅》(*Ciocoii vechi şi noi*)(又名《禀性难移》)是他的代表作,发表于1863年,成为罗马尼亚

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故事取材于1848年革命前的罗马尼亚公国,旨在通过对豪绅阶层的解剖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作者在序文中明确指出了豪绅的虚伪、狡诈、贪婪、冷酷、野心勃勃的特征。他们地位卑贱时对主人奴颜卑膝,百般讨好,骨子里却是不择手段向上爬。一旦得势,他们将把众人踩在脚下,无所不为,祸国殃民。作者目睹过两种豪绅:一是身穿长袍、腰悬墨水壶的土耳其式旧豪绅;二是身着燕尾服、手戴白手套的新式豪绅。虽然穿着打扮随着时代的转化而改变了,但他们的本性却完全一样。可惜作者只刻画了第一类豪绅,原来构思的第二部分没有完成。该书的核心人物是迪努·波杜里格,他出身贫贱,在一政治暴发户的家里当仆人。他表面上奴性十足,深得主人喜爱,可实际上却日夜梦想吞噬主人的财产,然后在宦途上出人头地。他和主人的妻子联手,终于达到目的。随着官职的升迁,他恣意榨取民脂民膏,镇压人民起义,杀害起义领袖图多尔。最后,在民愤激昂的情况下,大公不得不判他到盐矿服苦役,了结一生。该书有不足之处,但其整体结构和人物的性格刻画还是相当成功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氛尤为鲜明,景物、建筑、服饰描绘等均表明作者写实的准确性。

这一阶段,罗马尼亚文坛涌现出两位优秀的学者兼作家,他们对文化发展起了突出作用。

B.P.哈什德乌(Bogdan Petriceicu Hasdeu, 1838—1907)知识广博,青年时期曾创办《罗马尼亚》等多种刊物,撰写历史、民俗、语言、文学、文艺批评等方面的文章,大力开拓文化领域亟待耕耘的土地。由于他知识功底深厚,视野宽广,加之雄心勃勃,所以在许多学科名声显赫,曾任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国家档案馆馆长、巴黎语言学学会成员、彼得堡和纽约科学院院士等。他是罗马尼亚语文学和民俗学的奠基者之一,在诠注、分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通晓26种语言的哈什德乌还对世界民歌、民谣做了比较研究。《罗马尼亚词源大全》按照作者的构思应是一部收词浩瀚的辞书,每个词目附有词源、词形变化和最细微的词义,配

以大量佐证。但由于工程过大，只编到字母B中的“男人”(Bărbat)一词。他的历史研究成果显著，主要作品有资料汇编《罗马尼亚历史档案》、专著《罗马尼亚历史评断》和《伊昂大公》。作为诗人，他偏爱历史题材和时事讽刺，语言粗犷，情感外露，代表性作品有《约纳什库大公》、《一场梦》等。散文方面，他曾创作小说《米库察，一名大学生的三天三夜》(*Micuța*)(又名《玛穆卡小姐，一名大学生的回忆》)。这部作品基于写实，含有社会批判内容，但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使大学生与房东女儿之间的情感游戏和性场面过于暴露，引起文坛的异议。此后，他构思创作历史题材系列严肃小说《莫措克的童年》，完成第一部《命运》，第二部《发迹》仅开了个头。文学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诗剧《勒兹万和维德腊》(*Răzvan și Vidra*)。该剧以1595年的史实为依据，描述了勒兹万在爱情和权力方面的悲惨结局。这位深受同伴喜爱的主人公出生在吉卜赛家庭，年轻时险些沦为奴隶，后来不堪忍受压迫，加入绿林好汉的行列，在那里结识了野心勃勃的贵族姑娘维德腊。在她的一再鼓励和撺掇下，年轻诚实的勒兹万屈服于爱情压力，成了波兰军队手中的一件工具。为了满足维德腊的权力欲望，他后来率部下向自己心爱的祖国发动进攻，取得胜利。可是就在他登上大公宝座不久的时候却遭到暗算，爱情和权力全都破灭了。除了这部为罗马尼亚历史剧奠定基础的作品外，哈什德乌还创作了喜剧《东方的三位王子》(*Trei crai de la răsărit*)。该剧通过三个身世不同、思想迥异的求婚者，揭示了19世纪后半叶盲目求新、顽固保守、追求物质享受等各类社会倾向，在创作技巧方面有新的发展。

A.奥多贝斯库(Alexandru Odobescu，1834—1895)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他出身高级军官家庭，曾在巴黎攻读考古和文学，回国后主持讲座“罗马尼亚艺术的未来”，并发表学术论文《民族文学的基础》，强调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要性。他曾发表小说《米赫尼亚大公》和《佳什娜夫人》，在承袭历史小说传统上有新的发展，即史实和杜撰融为一体，情节、场景细腻真实，艺术想像趋于

自然。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是《伪狩猎书》(*Pseudo-Kynigheticos*),堪称一部奇书。从文学类别上讲,它并非狩猎专著。说它是随笔,可又插以故事。抑或它是科学或哲学论文集,但其笔法却充斥文学的遐想。鉴于这种情况,有些批评家权且称之为“艺术万花筒”或“古今艺术颂歌”。归类难定,作品内容更不易介绍。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它“像一只口袋,装满了从各地收集来的形形色色布条和小木块”。透过这些无序的“布条”和“木块”,读者可以在不同领域和意境中遨游,获得美的享受。全书含 12 章。第一章,作者直白对于狩猎并不内行,继而根据童年回忆对狩猎场所博勒干大平原做了精彩的自然风光描写。第二章述及飞禽。第三章谈到狩猎故事。第四章加入艺术话题,追忆往昔狩猎与艺术的内在联系。狩猎可以使艺术家通过这类题材反映人的生机和力量;如果只是把它作为消遣,狩猎在艺术上则仅仅表现人类的冷漠和病态。作者在这类描述和评论中,侧重美学、历史和考古知识的融通。第五、第六章谈到与狩猎有关的诗歌和音乐作品,作者认为某些诗歌的狩猎场景写得过于呆滞,缺少生活气息,而音乐则是狩猎不可或缺的附属品。第七、第八章继续以绘画为主题,对一些名品做了艺术评价。第九章转向狩猎散文,与美术作品相比较。第十章和十一章,作者把经过加工的民间故事《王子出猎》泼洒纸上,但又不把它写完,让读者慢慢品尝和补充它的滋味。第十二章是空白,著作人诙谐地注明这是“读者最喜欢的一章”。

四、1867—1918年的文学

罗马尼亚公国与摩尔多瓦公国实现统一后，这个国家于1878年又经历了独立战争，此后摆脱土耳其的控制，1881年宣布为王国。在获得主权和部分自由的情况下，罗马尼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同欧洲各国建立了关系，商业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国家银行统一了币制，城市和港口相继发展。自19世纪60年代初期雅西大学和布加勒斯特大学成立之后，1867年又创建了罗马尼亚科学院的前身——科学协会，成员遍及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的各个地区，对团结和培育知识阶层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各种社会思潮陆续出现。除原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外，1871年组建了首批社会主义小组，1872年成立了罗马尼亚工人总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活动日趋活跃，一批文坛新人在继承传统、借鉴外国的基础上力求振兴民族文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首先体现在1867至1892年的"青年社"文学现象，即经典作家时期；然后是1893至1918年世纪之交的文学发展。下面分两节介绍。

1. 文学鼎盛与经典作家

顾名思义，此时的罗马尼亚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推出了各类

文学体裁的典范性作家，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一高潮的出现，除了非文学性因素的影响外，是与“青年社”有直接关系的。

文学社团“青年社”(Junimea)于 1863 年成立于雅西，1885 年迁到布加勒斯特，发起人有 T. 马约雷斯库、I. 内格卢兹、P. P. 卡尔普、Th. 罗塞蒂、V. 波格尔，他们都是在德、法等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初期阶段，该社团并没有明确的文学纲领，只是利用大学教室或其他公共场所聚会，就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问题各抒己见，切磋学问，气氛相当自由。一段时间内，他们把罗马尼亚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朗读一遍，然后加以评论，分清优劣，在美学、艺术标准、语言、文学手法、思想内涵等方面深入研究。由于该社学术气氛浓厚，精神领袖马约雷斯库领导有方，因此吸引了人文学科的大量名人。尤其是老诗人 V. 亚历山德里和青年作家 M. 埃米内斯库、I. 克良格、I. 斯拉维支、I. L. 卡拉迦列加入“青年社”后，这一社团在指导文学发展、培育文坛新秀方面更上一个台阶。1867 年是“青年社”成熟的标志。这一年，该社创办了刊物《文学谈话》，刊登来自各地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知识界、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使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经典作家埃米内斯库、克良格、卡拉迦列、斯拉维支等人的一部分代表作就是在社内朗读、修改后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此时，“青年社”的文学纲领已逐步明朗，主要体现在马约雷斯库的《论罗马尼亚诗歌》、《罗马尼亚诗歌、散文新方向》等几篇文章中，其内涵是：加大批评力度、尊重实际、推崇良才、面向现实与可能、弘扬民间文学等。

“青年社”的核心人物是美学家、文学批评家 T. 马约雷斯库(Titu Maiorescu, 1840—1917)。他曾在维也纳、柏林、巴黎等地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执教，任雅西大学校长。1874 年移居布加勒斯特，担任教育部长、首相等职。他的文学活动与“青年社”及其刊物《文学谈话》密不可分。通过这一文学社团，他

为罗马尼亚的近代文艺批评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以其宽广的胸怀、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审美观,发现并培育了埃米内斯库、斯拉维支等文坛新人。可以说,当时所有优秀作家,不论来自哪个地区,不管出身、地位、年龄如何,几乎都得到了他的关照。他对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他对阿尔迪亚尔学派的罗语书面语词源主义提出异议,推出科学的正音法和正字法,为此他发表了《罗语之书写》、《新词》、《修辞狂》等文章。其二,他把美学标准引入文学批评。自 1867 年开始,就这一领域的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专门文章。《论罗马尼亚诗歌》从美学角度对诗的定义做了明确阐述,澄清了许多模糊概念。在《罗马尼亚文化当前潮流批判》中,他严厉抨击了“追求形式不顾内容”的错误倾向。他说,这种不尊重实际的坏风气不仅表现在诗歌中,思想界、政治界、语言学界等各个领域都屡见不鲜。纠其原因,那就是有些人不加鉴别地引进西方文明的外在形式,完全不顾及内容,从而造成了形形色色的扭曲现象,制造了虚假的进步、虚假的文明。《罗马尼亚诗歌、散文新方向》对“青年社”成立以后涌现的作家做了全面评价。尽管当时埃米内斯库只发表了几篇诗歌,可马约雷斯库已觉察到了这位未来的伟大诗人的文学才能,把他列在诗坛领袖亚历山德里之后。1880 年后,他又发表了《罗马尼亚文学与国外》,号召作家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诗人与批评家》就亚历山德里遭到诋毁一事,简述了艺术家与批评界的紧密联系。《卡拉迦列的喜剧》、《埃米内斯库和他的诗歌》、《萨多维亚努的故事集》、《戈加的诗作》等,除点评艺术外,对正确引导年轻作家起了典范性作用。

在这一健康向上的文学氛围中,罗马尼亚诗坛涌现出一颗“金星”,他就是倍受人们尊崇的伟大诗人 M. 埃米内斯库(Mihai Eminescu, 1850—1889)。他生于摩尔多瓦地区的博托沙尼,父亲是小职员。1866 年在切尔纳乌茨读中学期间首次在《家庭》杂志上发表诗歌《如果我有……》。同年,由于厌恶当时的教育制度而逃离学校,在特兰西瓦尼亚和蒙特尼亚地区流浪,当过流动剧团和布加勒

斯特民族剧院的提词员和脚本抄写员。在父亲的劝说下,1869 至 1872 年他在维也纳大学旁听哲学、语文学、法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大大扩展了知识面。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维纳斯和圣母》、《不肖的后辈》、《天使和魔鬼》、《蓝色的花》等优秀诗篇,陆续发表在雅西“青年社”刊物《文学谈话》上,引起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当时他发表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批评家们却认为他是在艺术上仅次于亚历山德里的最有希望的年轻诗人。为了造就人才,在马约雷斯库的建议下,“青年社”于 1872 年向他提供奖学金,派他到柏林大学进修。在那里,埃米内斯库广泛涉猎了哲学、历史、比较神学、梵文、政治经济学和法学,他专心吸取知识,根本不考虑学位问题。1874 年回国后,他陆续担任过雅西大学图书管理员、学监、报刊编辑等平凡工作。由于生活十分清苦,工作过度劳累,加之环境不尽人意,埃米内斯库于 1883 年 6 月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同年年底,他惟一的一本诗集出版。当马约雷斯库把这本书摆在他的病榻旁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此后的六年中,他的诗歌集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是诗人却一直遭到病魔的折磨,1889 年离开人世时身边竟无一个亲人。

他的《诗集》(*Poesii*)一共收了 65 首诗歌,其中有爱情诗(如:《维纳斯和圣母》、《蓝色的花》、《湖》、《山岗上的黄昏》、《心愿》、《不成双的杨树旁》等)、哲理诗(如:《伤感》、《她死了!》、《注释》、《金星》、《望星》等)、社会诗(如:《皇帝和无产者》)、讽喻诗(如:《信》五首、《致我的批评者们》等)、民俗诗(如:《科林》、《重逢》等)。此外,他在世时还发表了传奇小说《可怜的酒神》(*Sărmanul Dionis*)、浪漫主义爱情故事《切扎拉》、《周年》等。这些得以问世的作品同诗人留下来的一万五千余页手稿相比,在数量上是微乎其微的。据有关专家估计,他的未发表的手稿就其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来讲,要大大超过他生前出版的《诗集》。关于埃米内斯库作品的评论文章是非常多的。一个世纪以来,罗马尼亚国内外出版的有价值的评著不下三四千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认识也

在不断深化。这是因为埃米内斯库真正体现了罗马尼亚的民族精神，透过他的作品人们可以深入了解有关这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民俗民情、可歌可泣的历史、秀丽的山河和众多的杰出人物。至于他依托于现实生活的精神世界，更是表现得透彻细腻。因此他一直被誉为民族诗人，他的作品成为后世的不可多得的典范。埃米内斯库是世界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知识广博，熟悉古希腊文化、佛教教理和德国学者叔本华、康德、黑格尔等的哲学思想。宽阔的视野使他在宏观与微观世界、宏观与微观时间、天使与魔鬼、自然与爱情、天才与艺术、梦想与现实等重大题材方面，得以驰骋人世与宇宙，把罗马尼亚诗歌推向新的高度。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他不仅在浪漫主义诗歌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一部分作品也包含了古典主义和后来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成分。他的诗句有时令人联想到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的诗歌的音乐性、马拉梅作品中的深邃意境、兰波在创作中追求的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埃米内斯库也是罗马尼亚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者之一。

I.克良格(Ion Creangǎ, 1839—1889)也是“青年社”造就的优秀作家之一，他依据民间题材创作的故事闻名世界，堪称罗马尼亚这一文学体裁的典范。他出生于摩尔多瓦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47年在本村教堂附属学校读书，启蒙老师是瓦西列执事。中途辍学一年后，转入邻村小学校。1853年考入尼亚姆茨皇家学堂，次年在佛尔蒂切尼教理学校学习。该校解散后转到雅西神学讲习所，直接升入二年级。读完四年初级班后，无意继续深造，于1859年被分配到雅西三圣教堂任执事。1864年他到文学批评家马约雷斯库主持的师范学堂读书，由于学业优良，被聘为师范学堂附属学校的教师，同时兼任教堂执事。在此期间，他与同事合作编写了一批小学课本，其中的《读写新方法》再版二十余次。这批课本收入了克良格为孩子们编写的小故事，比较突出的有《冬季的小鸟》、《不劳动者不得食》、《人类的愚蠢》、《亚麻与衬衣》等，后来这些故

事在他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展。1871年,由于和教会发生冲突,他被撤消了执事职务。次年,总教区致函教育部,他又被赶出学校。为了糊口活命,只好在雅西街头摆了个烟摊儿。1874年马约雷斯库接任教育部长,克良格被请回学校继续执教。此时,担任学监的诗人埃米内斯库结识了他,十分欣赏他写的故事,介绍他参加"青年社"的活动。在那里,他向众人朗读了《一婆三媳》(*Soacra cu trei nurori*),得到一致好评。此后,他在该社刊物《文学谈话》上连续发表了传世之作《母山羊和三只小山羊》、《装有两枚硬币的钱袋》、《德尼勒·普雷佩莱亚克》、《猪的故事》、《尼基弗尔老爹》、《白奴的故事》、《伊万·图尔宾格》、《杜胡神甫》等。1875至1883年,由于"青年社"和埃米内斯库的热情支持,克良格的文学天才得到充分发挥,虽然发表的作品不是很多,但均为优秀之作。1884年他身染疾病,创作能力逐年下降,加之"青年社"迁出雅西,清苦的生活又蒙上孤寂的阴影。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他参加了贝尔迪恰努主持的文化社团活动,朗读了《童年回忆》(*Amintiri din copilărie*)最后一部分。作者逝世后,这部充满幻想与现实的儿童文学珍品才正式出版。克良格的作品来自民间文学,但又高于民间文学,突出表现了他写作故事的优异才能和独特风格。他的故事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到目前为止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占据显要地位的剧作家、小说家I.L.卡拉迦列(Ion Luca Caragiale, 1852—1912)生于一个具有戏剧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到法院工作之前曾是演员,两个叔父均从事戏剧工作,那个年月他们在私人剧团里操持全面行当,既是演员、导演,也是编剧人和剧团经理。1867年他在普洛耶什蒂结束初中学业,次年进入布加勒斯特戏剧学院,从师叔父科斯塔凯学习朗读技巧和表演艺术。1870年父亲去世,由于生活所迫,他在法院当过书记员,后来又到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担任提词员和脚本抄写员。1873年他在讽刺性刊物《荆棘》上首次发表作品,此后陆续担任过

一些刊物的校对和编辑。他在《时代》报编辑部工作期间,结识了诗人埃米内斯库和小说家斯拉维支,通过他们的介绍参加了"青年社"的活动,朗读了他创作的喜剧《暴风雨之夜》和《廖尼达先生面对反动派》。1881年离开《时代》编辑部后,他又当过学监和公司职员。1884年他的代表作《一封遗失的信》在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公演,引起轰动。一年后,《狂欢游戏》也被搬上话剧舞台。由于成果突出,1888年他担任了民族剧院院长职务,对戏剧艺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卡拉迦列的戏剧生涯充满坎坷,他的喜剧作品演出之后招致了评论界一些人的恶意攻击和官方的压制,所以1889年后他离开剧院,开始从事心理小说《复活节火炬》(*O făclie de Paşti*)和正剧《冤狱》(*Năpasta*)的创作。1891年,科学院对他出版的《戏剧集》和《冤狱》采取歧视态度,不予授奖。为此,他脱离了"青年社",并着手创作短篇讽刺小说,于1901年收入《时文与小说》一书中。这部针砭时弊的小说集问世后,又遭到一些人的蓄意攻击。由于长期不得志,他于1905年携家迁往柏林。侨居国外期间,他一直关心祖国的政治、文化动向,1907年罗马尼亚爆发农民大起义时他在德国发表了谴责政府的文章,题为《1907年从春到秋》。1911年他曾回国观光飞行表演,重申自己对民族统一的期望,但是次年返回柏林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遗骨于1912年运回国内安葬。

卡拉迦列的文学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战斗性,尤其是他的喜剧,在罗马尼亚和世界剧坛上享有盛名,曾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演出。两幕讽刺喜剧《暴风雨之夜》(*O noapte furtunoasă*)是他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于1879年由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首次公演。该剧上演时曾遭到守旧文人的攻击,指责它"有伤风化",自由党人也组织暴徒在剧场门口守侯,企图殴打卡拉迦列,因为该剧讽刺了自由党的公民卫队,把他们肮脏的私生活曝了光,戳穿了他们所谓革命派的正人君子面孔。剧中的杜米特拉凯是个傲慢、专横的木材商人,兼任自由党公民卫队队长,既有资产,又有权势。

在家庭生活方面他绝对相信妻子对他的忠诚，不过他也时时提防着社会上的“流氓”会来勾引他的女人，因此每当他夜间到街上巡视治安情况时，总是委派自己的亲信基里亚克“陪伴”他的妻子，可实际上却为这对情人提供了幽会的好时机。一天夜里，经过一番打斗，他们真的捉住了一个“坏蛋”，可这人竟是自由党的理论家，他为寻情妇弄错了门牌号码，才误入公民卫队队长的家。继该剧之后，《廖尼达先生面对反动派》(*Conul Leonida faţă cu reacţiunea*)也于同年公演。这是一部独幕喜剧，它通过廖尼达先生一夜之间的经历，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自由党人贪生怕死的可怜相。廖尼达是个退休职员，喜欢空谈革命。一天夜里他又向妻子吹嘘他如何勇敢地参加过推翻库扎大公的“革命行动”，如何热情支持“民主与共和”。可是当他做着“共和”的美梦昏昏入睡后，街上却突然传来枪声和嘈杂的人声。他以为“反动派”逼近家门了，惊恐之中准备逃命。这时，敲门声越来越猛，原来敲门人是每天清晨来替他们生火的女用人。她告诉这对老夫妻外面根本没有什么反动派，不过是一些人在街角的酒馆喧闹酗酒，一名巡警为他们鸣枪助兴。如果说上述两部喜剧只是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某个侧面，那么五幕讽刺喜剧《一封遗失的信》(*O scrisoare pierdută*)则对资产阶级政客们的丑恶灵魂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剖析。在罗马尼亚山区某个小城里，竞选活动进入高潮。该城执政党核心人物——县议长特拉哈纳克和县长蒂波特斯库——突然面临尴尬局面，竞选形势十分危急，因为反对派竞选人卡察温库在一个偶然机会，从醉汉那里得到了县长写给县议长妻子卓叶的一封情书。卡察温库把情书作为讹诈筹码，扬言得不到议员席位就公布情书，揭穿对方的隐私，让执政党头面人物名声扫地。可是情书得而复失，卡察温库不但失掉了讹诈的把柄，而且他盗用公款的罪证又被执政党掌握，一时间成了落水狗，千方百计向对手乞怜求饶。剧情发展到这里，似乎该城执政党候选人应该稳操胜券了。可是，布加勒斯特总部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派来了另一名候选人，指令该地党部一定要

让他当选。这人的来头为什么这么大？原来他手里也掌握着总部某位要员写给姘头的一封情书。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发誓要永远把这个筹码捏在手里。1885 年，卡拉迦列发表了他的第四部喜剧《狂欢游戏》。该剧用轻松、诙谐的手法向观众展示了小市民盲目仿效上层社会的各种荒唐的所谓爱情。他在该剧中启示人们，只在形式和生活方式上模仿西方，社会是不会前进的。总之，他的喜剧人物性格鲜明，在发掘社会层次、心理层次和语言层次方面具有突出特点。除上述喜剧和正剧外，他还著有通俗笑剧《一位婆婆》、戏剧小说《4 月 1 日》等。卡拉迦列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喜剧大师，也是一位优秀的讽刺小说家。1891 年后，他写了大量杂文、讽刺小品和小说，后来收集在《时文与小说》(*Momente şi schiţe*)中。他的讽刺作品形式短小，情节诱人，手法新奇，语言泼辣，艺术价值相当高，堪称上品。在内容方面，这本集子涉及的社会层面非常广泛，上自国王、政客、议员、法官，下至谣言公司的新闻记者、愚蠢的教书先生、堕落的职员和小市民，都是他讽刺的对象，读来脍炙人口。其中，突出的名篇有《两张彩票》、《拜访》、《果耶先生》、《政治与时鲜》等。

I. 斯拉维支(Ioan Slavici, 1848—1925)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著名小说家，他的中、短篇作品以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客观性和深刻的人物心理分析而著称。他生于农民家庭，1870 年读完中学后到维也纳攻读法律，在那里，参加罗马尼亚大学生协会的活动时结识了诗人埃米内斯库。在他的鼓励下，斯拉维支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向《文学谈话》投稿，成为“青年社”的积极成员之一。1872 年返回家乡后，他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深入了解了农民的困苦生活。1874 年他来到雅西，任历史文献委员会秘书，此后不久迁居布加勒斯特，任中学教师和《时代》报编辑。1881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集子《平民小说》(*Novele din popor*)，其中有《幸运磨房》、《坦达神甫》等优秀小说，不久被译成德文，赢得好评。1882 年，他荣任科学院院士。1884 年，在锡比乌创办《论坛》报。这份刊物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特兰西

瓦尼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撰写争取罗马尼亚民族权利的文章，斯拉维支于1888年遭到奥匈帝国当局的监禁。返回布加勒斯特后，他曾与卡拉迦列和科什布克共同创办传统主义文学刊物《家园》,并在该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玛拉》(*Mara*)。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持《今日》报的编辑工作。1918年,由于亲德倾向,他被关入牢房。获释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

斯拉维支的初期作品以故事为主,较为著名的有《黎明女神》、《机智的伊丽亚娜》、《树林中的佛洛丽察》等。这些故事基本保持了民间传说的特点,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自1871年起,他陆续创作了《村长的女儿》、《魔鬼的息肉》、《博格丹大公》等多种闹剧和历史剧,但都不大成功。他真正的文学才华表现在小说创作上,首先是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致分为田园牧歌型、民俗民风型、幽默讽刺型和道德教化型。《斯科尔蒙》和《十字路口》在田园式的背景中描写了青年农民的真挚爱情。《搬弄是非》是民俗小说的典范,它通过曲折的爱情故事生动再现了农村操办喜事的各种风俗。《爸爸的布杜里亚》充满幽默情趣,梦想出人头地的主人公虽然达到了他追求的目的,但他并不爱恋城市生活和令人羡慕的职务,而是回到乡下,同乡村教师的女儿结了婚,使父母和乡亲皆大欢喜。《坦达神甫》、《财宝》(*Comoara*)和《幸运磨房》(*Moara cu noroc*)属于道德教化型作品,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劝说世人不要懒惰,不要酗酒,不要追求名利。斯拉维支还著有7部长篇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玛拉》(*Mara*)。这部小说透过家庭、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描绘了农村寡妇玛拉的刚强形象和一对不同民族的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

2. 世纪之交

世纪之交指1893至1918年这段时间。此时,罗马尼亚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矛盾不断加剧,工潮初起,尤其是广大农民在

地主—资产阶级专制下倍受压榨和剥削，终于爆发了1907年的大起义。在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各种思潮相继出现，在文学领域也有明显反映，大致有五个类型。第一类，部分作家沿袭“青年社”传统，就文学派别来讲，介于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他们之中有D.赞菲雷斯库、B.S.德拉弗朗恰、G.科什布克等。第二类以C.多布罗加努—盖利亚为首，主张倾向性文学，他们的作品大多含有初期无产阶级文学特点。较为知名的作家有N.贝尔迪恰努、S.纳德什德、O.卡尔普等。第三类的出发点是回归“文化本源”，即在资本主义因素大量出现、城乡反差加剧的情况下，一批作家提出把文学视野移向农村，移向传统，创作题材集中于回顾光辉的过去、颂扬土著开明贵族、赞美田园式农村生活、弘扬民间文学、侧重民众的启蒙与教化等。作为反衬，日益扭曲的城镇生活和凶残的外来户，都在他们的抨击之列。这一潮流最先由《耕耘》杂志提出，参加者有St.O.约塞夫、O.戈加、M.萨多维亚努、I.阿格尔比恰努等多人，形成了罗马尼亚文学史上的耕耘派。第四类是民粹主义，提倡文学的民族性和现实精神，作家要对民众充满同情心，要把农村生活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代表性作家有G.伊布勒依利亚努、C.斯特雷、G.加拉克蒂昂、J.巴尔特等。第五类主张罗马尼亚文学应该与欧洲文学同步，向现代潮流靠拢，因而A.马切东斯基、I.米努列斯库、G.巴科维亚等人率先倡导象征主义，坚持文学革新，吸收外国现代流派。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的一些文学潮流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时期，上述文学流派大多处于尝试、探索的初始阶段，创作成果不甚丰厚，有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条件适宜时进一步发展。参与各类文学派别的作家在指导思想方面也并非一成不变，经常从一个潮流转向另一个潮流，且多数作家初登文坛，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本节只介绍其中最重要的几位，其余在以后的章节中分别提及。

D.赞菲雷斯库(Duiliu Zamfirescu, 1858—1922)幼时受过良好

家庭教育,法律系毕业后曾操律师业,1887年开始外交生涯。驻外期间游历许多国家,对古希腊、罗马有深入研究,结识了一些西方名人。由于他文化贡献较为突出,曾被选为科学院副院长。青年时期他同马约雷斯库关系密切,曾在《文学谈话》发表作品。他的诗歌深沉、凝重,具有新古典主义特征,出版的诗集有《另外的地平线》、《蛮族颂歌》、《新诗》等。小说创作是他对文学的主要贡献,后人认为除菲利蒙和斯拉维支外,他也是罗马尼亚近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科莫内什蒂亚努》系列小说是他的代表作,含《乡居》、《特纳色·斯卡蒂乌》和《战时》三个部分。作为系列三部曲,这在罗马尼亚文学史上是个首创。《乡居》(*Viaţa la ţară*)展示了田园生活的宁静、醇厚。贵族与农民关系融洽,各得其所。那里的人们既尊重传统,也乐于接受新的事物,人物显得丰满,心理状态十分平衡。《特纳色·斯卡蒂乌》(*Tănase Scatiu*)仍以贵族庄园为依托,描述了平步青云的二地主斯卡蒂乌对传统庄园构成的威胁。作者对这类暴发户怀有不可遏制的憎恶感情,所以刻画人物时他不时丢开他所追求的文学客观性,斯卡蒂乌的形象显得概念化。《战时》(*În război*)反映了科莫内什蒂亚努家族的自省和再生,新的一代为国家独立和主权奔赴疆场,流血牺牲。其中也穿插了一些爱情情节。与前两部相比,《战时》的艺术价值稍有逊色。此外,他还著有书信集和大量杂文。

B. St. 德拉弗朗恰(Barbu Ştefănescu Delavrancea, 1858—1918)出身平民,自幼表现出文学和绘画才能。大学期间在国内和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当过律师并从事政治活动,是著名的演说家,曾在数届政府中担任部长。他喜爱艺术,善交际,同剧作家卡拉迦列和画家格里果列斯库等人均是挚友。在文学倾向上他是个活跃分子,尝试过各种流派,著有浪漫主义小说《苏尔特尼卡》,景物描写借鉴绘画技巧。《宁静》、《行吟诗人》、《寄生者》等具有明显的写实特征,塑造了失意、潦倒、不合时宜的小知识分子典型类型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寄生者。《卓比叶》和《乞求者》带有自然主义倾向,而

其他一些作品田园气息和民俗成分则相当浓重。尽管他的小说受到不同流派的影响，但其基调仍是现实主义。确切地说，是一种缤纷多彩、充满抒情意味的现实主义。《哈吉·图多塞》(*Hagi Tudose*)是这个方面的成功之作，对罗马尼亚乡间吝啬人刻画得细腻入微，跃然纸上。他的文学成就尤其表现在艺术成熟时期创作的历史剧三部曲《日落》、《风暴》和《金星》中。《日落》(*Apus de soare*)的主人公是罗马尼亚人民敬仰的传奇式人物斯特凡大公，他在历史上以抗击异族入侵、打击贵族势力而著称。该剧的特点是在环环紧扣的戏剧冲突中着意揭示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以此表现斯特凡大公仇视敌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光辉形象。已近晚年的大公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是为了国家和祖先的基业，他战胜了年迈体衰的困扰和病体伤痛的折磨，在危险时刻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终于挫败了外敌的威胁和内奸的反叛。《风暴》(*Viforul*)是一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它在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对抗中深入刻画了斯特凡大公的孙子斯特凡尼察的暴君形象。此人性情乖戾、暴躁，沉迷酒色，嗜杀成性，置阿尔博尔等老臣的忠告于不顾，完全背弃了祖父爱国、爱民的临终遗言，最后被妻子用药酒毒死。《金星》(*Luceafărul*)是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描绘了佩特鲁·拉雷什大公为恢复前人的开明之治所做的一切努力。

A.弗拉胡察(Alexandru Vlahuţă, 1858—1919)的文学成就不甚突出，诗作带有模仿前人的明显痕迹，缺乏抒情和创新精神，显得刻板，小说也富含说教和伤感成分。尽管如此，他的作品在当时却深受读者欢迎，这是因为他肯于面对现实，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疾苦。他没有读完大学，年轻时从事校对、教师等平凡职业，后来投身报刊编辑工作。由于受到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他对社会上的不公现象特别敏感，激愤之情集中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人间苦难》(*Din durerile lumii*)、《阿苔拉》、《捉迷藏》、《清算》、《乡下》、《打谷场》等大量短篇小说对形形色色的政客、豪绅、律师、记者、军官以

及各类社会渣滓给以无情抨击，而对遭受欺凌的农民和失意的文人则寄以深切同情。

G.科什布克(George Coşbuc，1866—1918)生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个神甫家庭。他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读小学时就开始模仿民歌试着写诗。他曾攻读神学和哲学，未及毕业就从事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乡土气息浓烈的诗作。1889年他移居布加勒斯特，参加"青年社"的文学活动。自1897年起，他投身农村的文化启蒙，后来与弗拉胡察一起主办《耕耘者》，倡导耕耘派的乡土文学。由于他的诗歌生动反映了农村生活，表达了农民的追求和愿望，所以他被誉为农民的诗人。他的诗作介于传统和创新之间，具有突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延续了阿尔迪亚尔学派的战斗精神。《民谣、田园诗》(*Balade şi idile*)和《纺绩集》(*Fire de tort*)包含了他的创作精华，内容集中于乡间生活。其中，《赞菲拉的婚礼》与《富尔及尔之死》取材于民间传说，形象表现了人生重大题材——爱情与死亡。《我们要土地》直接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痛苦和仇恨相互交织，情感极其强烈。《德切巴尔致人民》以达契亚—罗马战争为契机，道出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而英勇搏斗、宁死不屈的精神。其他许多有关农事、爱情、景物等的作品也都写得十分精彩，满含生活气息。《战歌集》(*Cântece de vitejie*)从多种角度反映了独立战争时的壮烈场面。此外，他还著有《浪子杂记》等。

倾向性文学的理论家是C.多布罗加努—盖利亚(Constantin Dobrogeanu-Gherea，1855—1920)。他早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著有《经济唯物主义与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和倾向性艺术》、《社会理想与艺术》等。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大致是：艺术属于上层建筑；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生活环境的产物并表达时代的理想；文学作品有正面或负面道德影响，称之为倾向；倾向不可混同于命题；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肩负公民责任；文学批评应该研究作品源流、倾向和艺术手法等。他的理论指导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不足之处是片面夸张了

文学的社会性和机械的因果关系。他对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率先对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家做了全面的评价，其中有埃米内斯库、卡拉迦列、科什布克、弗拉胡察等。

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为劳苦大众呐喊的作家。诗歌方面，N.贝尔迪恰努(Nicolae Beldiceanu, 1844—1896)著有《失去田产的人们》、《多依娜》；鞋匠出身的 Th.内库卢察(Dumitru Theodor Neculuţă,1859—1902)发表了《走向正义之岸》。小说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倡导者 S.纳德什德(Sofia Nădejde, 1858—1946)出版了《生活的苦难》；I.果隆(Ion Gorun, 1863—1928)发表了《白与黑》；社会活动家 C.米列(Constantin Mille, 1861—1927)著有《溺婴者》和《迪努·米里亚》；A.巴卡尔巴沙(Anton Bacalbaşa,1865—1899)熟悉军营生活，创作了《蒂亚格老爹》等。

参与耕耘派活动的文学工作者数量较多，不便详述。主要作家中，除下一章将要介绍的萨多维亚努和阿格尔比恰努外，本节只概述以下几位。

St.O.约塞夫(Ştefan Octavian Iosif, 1875—1913)的诗歌属于伤感、温和型，不追求宏伟的气势和宽广的意境。对他来讲，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上，似乎只有农村仍是一片保有纯洁的绿洲。因此，他的诗歌大多与静谧的田园、动人的牧歌和慈祥的长辈有关。怀古抚今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赞颂英雄、勇士、名人之余，给人留下浓浓的哀婉之情。但是，同样生于特兰西瓦尼亚，同样关注贫苦农民，O.戈加(Octavian Goga, 1881—1938)的诗歌却充满了战斗性和号召力。他曾在布达佩斯和柏林求学，积极参与民族解放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求学期间，他与人合办《金星》杂志，发表了初期作品，立即引起马约雷斯库等批评家的重视，享誉文坛。此后，他花费大量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为争取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罗马尼亚人的社会与民族解放而斗争，历任政府部长和首相，晚年政治立场向右偏移。他的作品主要收录于《诗集》、《土地向我们呼唤》(*Ne cheamă pământul*)、《没有祖国的歌》(*Cântece*

fără țară)、《大墙背后》等几个集子中，构成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幅画卷。农村生活是他描绘的重点，但其基调则是苦难、悲愤和希望。土地荒废，木犁弃置，田亩绝收，农夫倍受凌辱。惟一的光明来自尚未实现的追求，它预示着化农具为武器，奋起反抗，迎接一个摧枯拉朽的新时代。E. 格尔利亚努(Emil Gârleanu, 1878—1914)是一位小说家，受耕耘派的影响，他创作了颂扬同资产阶层对立的开明贵族《老一代》和描述传统农民衰败的《奥多巴克的核桃树》。他的描写动物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会说话的世界》(*Din lumea celor ce nu cuvântă*)流传甚广。

民粹主义作为文学流派的倡导者是 G. 伊布勒依利亚努(Garabet Ibrăileanu, 1871—1936)，他主张作家必须对劳苦大众怀有真挚的同情心，而且作品应该具有民族性。在文学批评上，他既重视社会层面，同时也强调心理层面，提倡对文学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曾编辑多种杂志，并任雅西大学教授，为培养新一代作家和促进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著有《罗马尼亚文化中的批判精神》、《作家与流派》、《文学研究》、《罗马尼亚文学的民族性》、《创作与分析》等。C. 斯特雷(Constantin Stere, 1865—1936)也是民粹派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因反对沙皇被流放西伯利亚，返回雅西后任法学教授和大学校长，并积极参与组建党派的活动。晚年，依据自身的经历，创作了 8 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前后》(*În preajma revoluției*)，引起震动，评论界褒贬不一。小说第一卷回忆童年和家庭生活；第二、三卷描写求学期间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第四、五卷集中叙述流放生活，对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和西伯利亚风光有详尽描述；后三卷以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为背景，介绍了主人公的境遇。

受这一流派影响的知名作家还有 C. 霍加什(Calistrat Hogaș, 1847—1917)，著有回忆录《游记》、《尼亚姆茨山区》；G. 加拉克蒂昂(Gala Galaction，1879—1961)，著有小说《罗萨娜》、《马哈穆德的拖鞋》、《戴风大夫》等；J. 巴尔特(Jean Bart，1874—1933)，著有小说

《遗忘的债务》、《海的小说》、《航海日志》、《富翁海外归》等。

A. 马切东斯基(Alexandru Macedonski, 1854—1920)是主张文学革新的代表。他生于高级军官家庭,曾在奥地利和意大利求学,多次游历法国,对西方文学了解较深,受此影响他主张罗马尼亚文学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接纳新事物,力争与西方文学同步发展。为此,他曾发表演讲,题为"近十年的文学运动",并对声誉极高的"青年社"文学方向提出异议,撰写批评著名诗人埃米内斯库的文章,鼓动思想自由。这些活动预示他将在文学发展中另辟蹊径,掀起象征主义现代潮流。在这方面,他既是理论倡导人,也是实践者。理论性文章有《诗的逻辑》、《未来的诗歌》、《诗的情感》、《世纪之交》等,主要诗作是《诗集》、《精益求精》(*Excelsior*)、《青铜》、《圣花》、《回旋诗》(*Poema rondelurilor*)等集子。他的诗歌处于理想与现实、迷幻与清醒、躁动与平静、超脱与回落的各种矛盾之中,在抒情的气氛中追求幻想、形象、音乐和色彩的效应,为抒情诗歌引入了新的创作手法。

在现代流派中做出成功尝试的还有 D. 安格尔(Dimitrie Anghel, 1872—1914),他的诗集《在花园里》(*În grădină*)充分显示了他对馨香、音律的驾御技巧,创造了一个富于动感的幻想与花的音乐世界,被誉为花卉诗人。I. 米努列斯库(Ion Minulescu, 1881—1944)得益巴黎文化的强烈熏陶,他的诗歌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外在形式,诸如:数字顽念、死的叠加、名词大写、专有名称寓意奇特读音响亮等特点。诗的意境有如雾气中驶离港湾的航船,漂向不可知的彼岸或孤岛,充满朦胧的哀婉之情和神秘感。主要诗集有《为后人创作的浪漫曲》(*Romanțe pentru mai târziu*)、《与自我对话》、《大众诗歌》等。

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演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马尼亚进入历史发展的现代阶段。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和德国的失败,1918 年 12 月 1 日特兰西瓦尼亚回归祖国,完成了人民世代追求的民族大统一。版图扩大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相对集中,促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明显体现在各个领域突破延续若干世纪的狭隘、封闭的地区观念,力争与欧洲现代化进程同步。另一方面,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1921 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潮流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此外,在欧洲各种思潮逐步渗入的情况下,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势力也在罗马尼亚滋生繁育,推行反共、排犹、残害民主力量等极端思想。此后,这股势力终于与希特勒合流,使罗马尼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

在这种由国内外各类因素造成的社会氛围中,该时期罗马尼亚文化具有下列两个鲜明特征。其一,在深入发掘民族性的同时,太力与欧洲文化接轨,促进现代化进程。其二,思潮迭起,民主、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反动势力抗争,大部分知识分子卷入了这场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激烈搏斗中。

纵观罗马尼亚文学发展的轨迹,这一期间的文学是继经典作家时期后的又一个繁盛时期,无论是作家数量、文学种类还是作品

的价值，都有长足进步，接近或达到欧洲水平，可与许多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就文学倾向来讲，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构成两大潮流，但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在继承和创新的根本问题上虽然相互否定，但又互为补充。传统主义在继承的同时刻意求新，现代主义引进新流派的根基离不开传统。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主义主要代表是耕耘派，那么战后这一潮流的继承者则是《思想》杂志。它的立论在于面对世界主义的侵袭，应该保护罗马尼亚文化精髓，即民族精神，因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罗马尼亚稚弱、纯真的民族性互不相容，文明与文化之间存在一条断裂带。耕耘派认为民族性在文学中的体现归结为历史和民俗，《思想》杂志则批驳这一观点过于偏狭和物化。它认为作家不应该只是双眼紧紧盯住祖国的大地，更需要举目观天，精神世界的"天"。罗马尼亚民族性必须增加基本的精神因素，即东正教。具体地说，《思想》杂志在沿袭耕耘主义主体思想的同时，又倡导文学的宗教性和神秘主义。但是，与这一潮流有关的绝大部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理会这一说教，而是在弘扬传统的过程中力求手法和技巧的革新，有些甚至转向现代流派。

现代主义的倡导人是 E. 洛维内斯库（Eugen Lovinescu，1881—1943），他以杂志《飞来的精灵》和相关的文学社团为核心开展活动，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其影响有如上个世纪的"青年社"。这一流派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发现和培育青年作家，二是传播现代主义。第一个目标在下文中自会述及，第二个目标需做简要介绍。洛维内斯库倡导现代主义的出发点在于强调"时代精神"，这意味着各国文明一体化和同步发展势在必行。但是，现实情况是各民族之间的文明程度存在差异，后进者将受益于发达文明，通过"摹拟"和"同步"两个步骤发展自己。"摹拟"不是简单引进文明形式，而是移植之后创建自身的独有内容；"同步"指价值交流和接纳、吸收别国文学的新鲜成分和现代性，使民族文学在美学标准上与欧洲一致。在这一点上，洛维内斯库并不反对传统和民

族性，而是主张文学应该克服狭隘的地区观念，力争革新。他认为罗马尼亚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初，自欧洲革新思想渗透进来以后，整个社会逐步挣脱东方类型的束缚，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就文学来讲，在这个基础上它的演化趋势必然是与“时代精神”同步，与社会本身及其固有的各种思潮和问题同步。为此，他认为文学必须在题材和美学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即：乡村文学向城市文学过渡、叙事诗向抒情诗过渡、提倡散文的客观性、发展分析性小说。他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标准得到了同时代许多作家的认同。

这一时期，罗马尼亚的民主刊物中，诸如《无产阶级文化》、《蓝工装》、《通讯员》、《宣言》、《新世纪》、《言论自由》等，有一些是共产党人直接创办或参与撰稿的，代表了民主、进步和革命潮流。但是，上述刊物大多为综合性报刊杂志，主要发表政治、经济、文化类文章，所以没有形成述诸文字的文学纲领。尽管如此，在这些出版物上与读者见面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却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方向，即无产阶级文学方向，它意味着革命文艺为劳苦大众服务，捍卫民主和自由，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这一潮流推出了取材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家Al.萨希亚；诗人V.蒂奥多雷斯库、D.波泰兹、M.R.帕拉斯基维斯库；散文作家N.D.科契亚、A.巴朗格、G.博格察等。自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呼唤新时代的革命诗和社会诗日渐增多，新一代作家陆续出现。

20年代，由《当代》、《点》、《全部》、《乌尔穆兹》、《一》等刊物传播、鼓励，先锋派在罗马尼亚悄然兴起。它源于罗马尼亚血统诗人扎拉在苏黎世发起的达达主义，流传到罗马尼亚后分成两个分支，即：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诗人I.维尼亚领导的《当代》，参加人中既有作家，如：T.阿尔盖茨、I.巴尔布、Cm.佩特雷斯库，也有画家、雕塑家、演员和导演。这一流派主张艺术需要和科技发展的当代精神相吻合。既然科技可以创造新的形式，与大自然较量高低，那么艺术就应该摹仿现代科技，依靠

想像塑造新的“纯粹”形式。一时间，抽象派、立体派绘画、雕塑和粘贴诗相继出现。在这一艺术氛围中，罗马尼亚著名雕塑家C.布伦库什脱颖而出，他的作品“无限柱”等是现代艺术与民间传统的完美结合，在世界雕塑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超现实主义的代表性刊物有《乌尔穆兹》、《一》、《藻类》等，诗人T.扎拉、B.封多亚努以及G.博格察、S.帕纳等都是积极参加者。他们主张艺术应该发掘梦幻、呓语等不受大脑控制的潜意识，因为通常的现实被人们因袭、刻板的意识扭曲了，只有在潜意识、超现实中才能发现真实、完整的现实。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先锋主义在罗马尼亚文学中留下的痕迹不是很深。有些作家，如博格察、巴朗格等，稍加尝试之后即转向另外的文学流派。尽管如此，它作为一种流派，还是为后期的文学发展埋下了伏笔，同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

在作家和文学种类急剧增多的情况下，诗歌实现了主体化、抒情化的转变过程，散文的客观性、现实性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家处于文学更新阶段，在社会思潮迭起、文学环境多变的氛围中，他们的文学倾向和创作手法也相应改变，各类作品风格纷繁，既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巴洛克主义成分，也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神秘主义、印象派、未来派的印痕。

鉴于这种情况，下面将按诗歌、小说等类别分节，对该时期文学做概要介绍。

1. 诗歌

1919至1944年是罗马尼亚文学史中诗歌繁盛时期。在继承埃米内斯库和象征主义诗歌的传统上，名家、名诗层出不穷。题材冲出农舍、田园，向其他领域扩展。叙事、写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诗歌的抒情性。上述三点应该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总的特点。

就文学倾向和诗人队伍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现代诗包含带有象征主义倾向的诗歌作品,倡导宽广的意境、深邃的内涵、多变的技巧、创新的语言。主要诗人有T.阿尔盖茨、I.巴尔布、Al.菲利皮德、A.马纽、D.波泰兹等。传统诗沿袭耕耘派风格,继续讴歌田园、山河、民俗和历史,突出人物是Z.斯坦库、I.皮拉特、L.布拉加、V.沃伊库列斯库等。先锋派不仅反对传统主义,广义的现代主义有时也在它的批驳之列。代表性诗人有I.维尼亚、I.沃伦卡、S.帕纳等。

在著名诗人行列中,阿尔盖茨、布拉加、巴尔布、巴科维亚、菲利皮德等都是跨时代作家,他们在二战后的经历和作品将在下一章中介绍。

T.阿尔盖茨(Tudor Arghezi, 1880—1967)原名I.N.迪奥多雷斯库,生于布加勒斯特。他早年丧父,11岁离开家庭,边学习边谋生。1896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向马切东斯基主办的杂志投稿,作品受到赞扬。1899年他进入修道院,五年后返回文学界,与人合编先锋派刊物《直线》。1905年去瑞士进修神学,不久就离弃教士生活,自谋生计。国外的那段日子是赤贫的,他当过搬运工,卖过画,学过戒指和表壳制作,靠微薄的收入游历了法国。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但并不急于发表。1911至1916年,他的文学活动相当丰富,为《罗马尼亚生活》、《火炬》等多种杂志投寄诗歌和散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新闻观点招致罪名,被关入监牢,牢房生活促使他后来创作了组诗《霉花》。1927年诗人47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和谐的词》,这本集子收录了他曾在报刊发表的部分精品。起初,文学界对该诗集持有异议,但是新一代的批评家拉里亚等却大力赞扬,认为阿尔盖茨是埃米内斯库后的最伟大的诗人。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又出版了《黄昏小诗》、《霍拉曲》及其他散文集,并主办杂志《卦帖》,发表了一系列杂文。1943年,由于撰写讽刺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的短文,被法西斯分子关进集中营。社会主义时期,他曾任科学院院士和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多

次获国家文学奖,被尊为民族诗人,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也并不那么顺利。

阿尔盖茨在文学园地耕耘七十余载,主要作品达三十多种,丰富的创作活动有如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他突出的文学成就首先是诗歌,这类作品以其丰富的题材、多变的手法和崭新的语言享誉诗坛,高超的诗艺和精深的内涵体现在整个诗歌作品中。人生是他关注的首要课题,在这类哲理意味浓重的诗歌中他对宇宙中人类生存的意义、价值和条件等提出各种问题,但都没有明确答案,深刻反映了他矛盾的心态和片刻不得宁静的感情,既有生的乐趣,也有死的恐惧。诗集《和谐的词》(*Cuvinte potrivite*)包含多篇《圣歌》,是人生题材的代表作。这里应该明确的是,《圣歌》并非宗教诗,也不是对上帝的赞颂,因为作者不能肯定上帝的存在,也不对他寄予厚望,只是借助这种形式表白自己迷惑、求索和茫然的孤寂感。既然上帝并不存在,或者他是某人、任何人、子虚乌有,而且天堂的门紧闭着,上了锁,那么诗人的目光自然移向大地,神圣的大地以及依赖它生存的各种生物。他讴歌世间的一切:生活和死亡、繁盛和衰败、美与丑、善与恶,因为乐园不在天上,而在人世,在卑贱的生物之中。爱情是生活的强烈表现形式,它在阿尔盖茨的诗作中也有突出表现。诗集《和谐的词》中的《哀伤》、《秋》、《别离》等都是名篇,沿用埃米内斯库的手法生动描绘了丛林、水边青年男女幽会和别离的场面。《黄昏小诗》(*Cărticică de seară*)这本集子包含多篇爱情诗,世间的爱情同美好的自然和可亲的生物融成一体,构成温馨的人间天堂。阿尔盖茨也是著名的社会诗人,但是他的社会诗内涵宽广,与口号式的刻板作品有本质区别,诗集《霉花》(*Flori de mucigai*)是他在这方面的第一部力作。在这本集子中,为了再现充满盗贼、妓女、杀人犯和吉卜赛泼妇的贫民窟,他在诗歌语言中使用了大量黑话、俚语和粗俗下流的言辞,使作品的风格异乎寻常,从而引出评论界的“丑的美学”。作者之所以尝试这种革新,是因为他认为任何社会和个体的人,不管其多么堕落和

卑贱,都还含有一丝灵气和人性的闪光,美存在于丑,道德存在于堕落,美的回归既是道德的回归,也是人性的回归。当然,阿尔盖茨的社会诗更包含着对美好事物和传统的颂扬,其基本支撑点是人类的智慧和各种成就均来自貌似卑贱的劳动大众,《遗嘱》等名篇就是佐证。对于人类和下层百姓的尊崇是诗人终生怀有的"顽念",这在后期反映农民起义的《1907年》和长篇组诗《人的颂歌》中有深刻体现。他不但是严肃题材的诗歌大师,而且对少儿也袒露无限慈爱之情。他的《玩具库》等集子语言风趣,充满童心,不但深得儿童喜爱,也吸引了许多成年读者。除诗歌外,他还著有杂文集《木头圣像》、《黑色的大门》和小说《丽娜》(*Lina*)等,不一一赘述。阿尔盖茨一生尝试过各种文学流派,但他始终保持自己的独有风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L.布拉加(Lucian Blaga, 1895—1961),著名诗人、剧作家、哲学家。他生于乡村牧师家庭,浓郁的民风民俗为他的成长积淀了深厚的底蕴。1914年在布拉索夫读完中学后,为了逃避在奥匈帝国部队中服兵役,考入锡比乌神学院。1917至1920年间,他在维也纳攻读哲学,并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文化与认识》。1920至1926年,他一边从事创作,一边担任《文化》、《巴纳特》等期刊的编辑。此后他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驻波兰、捷克、瑞士、奥地利、葡萄牙等国大使馆的新闻秘书和参赞。1935年获科学院大奖,次年当选为院士。1939年他离开外交界后,到克卢日大学任教,主持专门为他设立的文化哲学教研室的工作。自1948年起,由于教育部门的极"左"政策,他被调离大学,转到科学院克卢日分院从事研究工作,长时间受到压制。

布拉加15岁时开始写诗,发表在《论坛》报上,但他对自己的作品极不满意,随即放弃诗歌,热中学习哲学。中学毕业之前,他已经熟悉了叔本华、柏格森和康德的哲学思想。1914年在神学院读书时,他开始向报刊杂志投稿,发表了数篇哲学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诗歌重新产生浓厚兴趣,于1919年发表了他的

成名之作《光明诗集》,此后陆续问世的还有《先知的脚步》(*Pașii profetului*)、《伟大的过渡》、《睡眠颂》、《分水岭》、《在遐想的庭院里》、《坚实的台阶》等。社会主义时期他发表的作品较少,文学成就比前期逊色。如上文所述,布拉加不仅是诗人,也是知名的哲学家,著有《认识三部曲》、《文化三部曲》、《价值三部曲》以及论文《风格哲学》、《世纪面面观》、《论哲学意识》等,在罗马尼亚哲学史中自成体系。因此,要想充分认识他的诗歌,必须对他的哲学思想有个概括了解。一般来讲,他的早期作品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紧密联系,是他哲学著作的韵文化表述,而后期作品虽相对独立于哲学,但却突出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他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两点。一是认识世界及认识形式;二是文化哲学,即对文化类型与风格的界定。布拉加认为存在就其实质来看,是神秘的,只靠逻辑思维和理性不能达到认识。于是,人们试图借助艺术、宗教和哲学揭示奥秘,可伟大的匿名者却在人类和完全认识之间设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只能接受奥秘这个事实,不是缩小它,而是增加它的奥秘度。而诗歌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借助神话、象征和其他各种遐思手法,比理性和逻辑思维更能穿透宇宙万物,在揭示奥秘中增添更多奥秘。《光明诗集》(*Poemele luminii*)中的《我不践踏世界的奇妙花冠》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哲学观念。广博的大地充满奥秘,它们像美丽的花朵一样装点着人间,构成了"世界的奇妙花冠"。该诗的首句通过一个"我"字,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诗人对待美如花冠的世界奥秘所采取的"不践踏"态度。"我"是诗中的关键词,反复出现,用以强调作者有别于"他人"的鲜明立场。作为哲学家,他认为奥秘是人类存在的主要特征。奥秘遮掩着存在,它既是激发人类认识的强大动力,也是阻碍人类认识的严重障碍。诗歌属于情感层次,它能够使人们通过悟性更好地感受这个世界,所以在唯理主义和反唯理主义面前,他选择了后者,不但"不践踏"、"不用理智杀害"各种奥秘,而且要"增强"和"丰富"世界的神秘性。布拉加为什么要保护和培植奇妙的奥秘?他在篇末点破了主题,因为他"既爱鲜

花和眼睛，也爱嘴唇和墓地”。这里的“鲜花”、“眼睛”、“嘴唇”和“墓地”都具象征含义，它们是无所不在的奥秘的具体表现。诗中的“爱”字分量很重，它不单单是情感的强烈流露，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人们只有对周围事物怀有爱，才能从个别走向一般，抵达奥秘的深处。在诗歌语言处理上，布拉加避免用枯燥的词句向读者进行哲理说教，抽象的概念是通过生动的诗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例如“光明”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我的光明”代表了诗人的形象思维，“他人的光明”则指广义的逻辑思维。总之，布拉加认为光是启迪的象征，万物赖以生存的源泉，所以他在早期作品里热情颂扬了光明，他自己也被誉为“光明诗人”。他的诗作的另一层底蕴来自神话和民俗，按照他的文化哲学理论，文化分为小文化和大文化，小文化指古朴醇厚的民族传统和乡风，它是反映城市风采的大文化的基础。针对罗马尼亚的文化类型，他在《伟大的过渡》、《睡眠颂》、《分水岭》等集子中，结合自己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认识程度和随社会境遇而变的复杂心态，深入发掘了自童年时期起就诱惑他的这个层面。此外，布拉加还用表现主义的抒情手法创作了多种剧本，以民族与世界神话为题材的有《扎莫尔克塞》(*Zamolxe*)、《马诺列工匠》、《诺亚方舟》等，用传奇手法展示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有《大洪水》(*Tulburarea apelor*)、《阿弗拉姆·扬库》、《安东·潘恩》等。他在《达利亚》(*Daria*)等剧作中对发掘潜意识做了尝试。

I. 巴尔布(Ion Barbu, 1895—1961)，又名 D. 巴尔比里安，是位艺术风格十分独特的诗人。他生于法官家庭，数学造诣很高，1924年后一直在中学和大学教授数学，曾到德国和奥地利讲学。据他自己讲，他从事诗歌创作是为了向同学证明他也有文学天赋，因此读大学期间数学和诗歌成了他的两大嗜好，有时对诗歌的兴趣大大超过数学。1918 年，他在马切东斯基主办的《文学家》杂志上首次发表诗作，得到好评。1921 年出版诗集《捉蜗牛》(*După melci*)，1930 年《折射游戏》(*Joc secund*)问世，被权威评论家视为“对以往

文学的清算”。此后，他逐渐脱离文学界，潜心研究数学。《博尔切斯库仍然活着》是他1956年发表的最后一首诗。

他的诗作艰深、隐晦，让人不容易接近，其原因有三。第一，他持有的诗歌观念有别于常人。他认为诗歌的冲动不是来自爱情、友情、伤感、痛苦等个人感受，也不是来自对风光美景的欣赏或者对温馨童年的回味，而是来自对总体世界的遐思冥想。这种遐思可以高度激发精神境界，促使诗人越过表象同宇宙的本质沟通。基于这一观念，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现代主义或者传统主义的“惰性诗歌”，追求超凡脱俗的纯抒情。第二，巴尔布是位数学家，他的数学的抽象思维方式深深切入诗歌创作中。尽管数学和诗歌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是他认为“在几何学的某个高深的领域它们却有一个明亮的交汇点”。像对待几何学问题一样，他把诗歌理解为“某种代表可能的存在形式的象征体系”。换言之，诗歌是几何学的延伸。他是诗人，可他从未离开过几何学这一神圣领域。第三，他的诗歌演化有时也让人捉摸不透，尽管不同时期的作品基调是一致的，但表现形式迥异。为此，评论家把他的诗歌创作分成三个阶段。其一，高蹈派阶段，含1919至1920年在《飞来的精灵》上发表的诗作。诸如《熔岩》、《群山》、《树》等。该阶段作品大多反映认识的二元性，地质的宇宙和花卉的宇宙不是充满活力和激情，就是被观赏理想世界的超脱精神所笼罩，其间不乏神话联想，诗律优美，词语抽象。其二，东方叙事诗阶段，含1921至1925年在《罗马尼亚生活》和《当代》上发表的诗作，诸如《捉蜗牛》、《伊萨尔勒克》、《里加·克里普托和拉波娜·恩尼格》等。这类诗歌发掘了巴尔干民俗和几乎无人涉足的民间秘术，寓意深邃，语言粗犷，特色鲜明，且篇幅稍长，叙事成分较多。其三，隐晦诗阶段，含1926年后发表的诗作，诸如《教理之卵》、《折射游戏》、《音色》等。这类诗歌涉及两个方面，即对宇宙抽象模式的遐思冥想和对世界万物存在形态与颜色的观赏，其隐晦性来自费解的象征和不可思议的语法问题。总之，巴尔布是罗马尼亚诗歌史上风格奇特的诗人，可谓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

G.巴科维亚（George Bacovia，1881—1957）是象征派诗人，罗马尼亚现代诗歌的先行者。他生于商人家庭，自幼喜爱绘画和音乐。青年时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学过法律，毕业后任小职员和教师，经常贫病交加，几十年过着困苦的生活，直至祖国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由于处境凄凉、心情郁闷，暗淡的秋色、酷暑严寒、连绵夜雨、枯树昏鸦、荒废的田园、贫民窟、疯人院、屠宰场等都成了他在诗歌中抒发悲愤的主题。颜色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感情的象征手法。黄色象征疾病、绝望和死亡，黑色是衰竭、焦化的表现，白色代表空虚，黑白两色则是墓地、丧葬的标志，紫色引起人们的幻觉，铅色意味着沉闷和压抑。在他的笔下，线条、形状、颜色、运动、静止、嘈杂、沉默以及诗歌的韵律等都是表意的符号。就文学成就来讲，他是马切东斯基之后最有代表性的象征派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铅》（*Plumb*）、《黄色的火花》（*Scântei galbene*）、《和你们一起》、《现实喜剧》、《资产者组诗》等集子。

V.沃伊库列斯库（Vasile Voiculescu，1884—1963）生于农家，在传统乡村环境中度过童年。青年时期曾攻读文学和医学，1910年任乡村医生，长期生活在下层民众之中。他自1916年起就从事诗歌创作，发表了大量作品。初期诗歌沿袭耕耘派传统，充满民俗和田园气息，如《降灵节》、《山鹰》以及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士兵拼杀疆场的《六个十字架》等。1921年后陆续出版的《初熟》（*Pârgă*）、《天使诗》、《命运》、《攀登》等诗集表明诗人已向现代诗歌过渡，内心冲突、道德升华、发掘神话、向往上帝逐渐成为诗歌表现的基调。诗集《朦胧》（*Înrezăriri*）发表于1944年，自此揭开爱情诗的序幕，有关爱情的诗歌在他社会主义年代创作的《续莎士比亚14行诗》中达到艺术顶峰。他也是位出色的散文家，他的志异小说将在下一章中作概要介绍。

A.菲利皮德（Alexandru Philippide，1900—1979）以创作新浪漫主义诗歌见长。他生于雅西的一个学者家庭，在该城读完法律

系和文学、哲学系后，到柏林和巴黎进修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1928年回国，曾在外交部和宣传部供职。1919年后他开始写诗，陆续发表了诗集《华而不实的金子》(*Aur sterp*)、《被闪电击中的石崖》(*Stânci fulgerate*)、《时代轰鸣声中的梦想》(*Visuri în vuietul vremii*)等。年轻时，菲利皮德曾是一位怀有远大理想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真理探索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经常感到压抑，感到孤独，这种情绪在他当时创作的诗歌中有所反映。这类诗歌的题材差不多都是同探索和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弄清某些问题，他不得不孤单单地在时间和空间中漫游，向古代英雄和希腊诸神求助。为了更好地理解他当时的诗歌，可以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语言概括他的矛盾心情，那就是这位新浪漫主义诗人是脚踏着现代的水面，同时又不得不向着古希腊的天空拍动翅膀。除诗歌外，菲利皮德还著有传奇小说集《深谷中的花》、评论集《文学研究》等。

2. 小说

长篇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散文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于文学更新的转折过程中，作品数量、风格和艺术价值均有大幅度提高，产生一些引人注目的质的变化。自19世纪中叶起，长篇小说开始在文坛崛起，《新旧豪绅》、《乡居》、《特纳色·斯卡蒂乌》、《玛拉》等优秀作品陆续问世，开辟了小说天地。但是，上述小说的作者仍然带有旧式故事作家的深深印痕，倾向离奇诱人的情节，再现生活时注入大量个人的情感成分，从而造成小说的抒情化。1920年，雷布里亚努出版了长篇小说《伊昂》，用冷漠的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农村严酷的社会面貌，这预示着罗马尼亚小说开始了从主观向客观的转化进程，在文学现代化的大趋势中风格、手法日渐丰富。一批文学工作者从故事作者变成了小说家。

传统主义小说由主观向客观的转化尤为明显，社会生活得到

真实反映,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跃然纸上,许多作品构成一幅幅生动的时代画卷。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多样化,作品题材日益拓宽。农村仍是作家十分关注的领域,这方面的知名小说家有 I. 雷布里亚努、M. 萨多维亚努、I. 阿格尔比恰努等。同资本主义相关的城市生活、知识界、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属于题材拓宽之列,这在 Cz. 佩特雷斯库、I. 蒂奥多利亚努、G. 米赫耶斯库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心理分析小说,又称过渡性小说,在沿袭客观性的同时,侧重从新的视角观察人物和世界,心理分析是主要的文学手段之一。这类作品大多剖析罗马尼亚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和困惑、徘徊的知识阶层,代表性小说家有 H. 巴巴达特—本杰斯库和 Cm. 佩特雷斯库。1930 至 1940 年,在心理分析小说的基础上衍生了新小说,主要倡导者有 A. 霍尔班、M. 塞巴斯蒂安、M. 布莱克尔等。新小说的主要特征是作家多用第一人称披露个人经历或私生活,进行心理探索时揭示潜意识;逻辑混乱,语言无序;热中描绘无典型意义的小人物或病态人物。除上述类型的小说外,还有一些知名作品难以归类,如:M. 卡拉迦列的融现实、神奇、荒诞为一体的《无赖汉》、G. 伊布勒依利亚努的爱情分析小说《阿苔拉》、G. 克林内斯库的近似巴尔扎克风格的《欧蒂丽亚的秘密》、I. M. 萨多维亚努的具有托马斯小说特征的《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

L. 雷布里亚努(Liviu Rebreanu, 1885—1944)是现实主义传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教师家庭,由于当时该地区仍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所以他读中学时就熟练掌握了德语和匈牙利语。1900 至 1906 年,他在当地步兵学校和布达佩斯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奥匈帝国部队服役,军衔是少尉。1908 年因和上司发生矛盾,退出军队,在地方乡公所任职员。1909 年 10 月他越过边境来到罗马尼亚,定居布加勒斯特,在《光明》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作品。次年,由于奥匈帝国的要求,他被引渡出境,遭到监禁。不久获释,重新回到布加勒斯特,投身报界。在此期间,他主办过戏剧杂志《脚灯》,写了大量剧评,并担任克拉约瓦

民族剧院文学秘书，结识了女演员法妮，1912年结婚。同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动荡》，此后又发表了《穷汉》、《表白》、《争斗》等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军以逃避兵役、不服调动的罪名在布加勒斯特逮捕了他。后来他越狱逃跑，流落雅西，但又受到自己同胞的无端怀疑，那段生活反映在笔记小说《苦难》中。战后，他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闲暇时间也为文学、戏剧刊物撰文。1920年，他的代表作《伊昂》经过几次修改后问世，被评论界誉为罗马尼亚现代长篇小说的开端，获科学院奖。两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力作《绞刑森林》，获小说大奖。1932年，第三部长篇小说《起义》与读者见面。由于卓越的文学创作活动，1923年他被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1925年任主席。此时，他主办了《文学运动》和《罗马尼亚文学》等杂志。1928至1930年和1940至1944年期间，他两度担任民族剧院院长职务，为罗马尼亚戏剧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届时发表了题为《赞颂罗马尼亚农民》的入院演说。晚年他退居乡下，临终时手头还有《波卡勒和邓达勒》等两部小说没有完成。

雷布里亚努是罗马尼亚现代小说的奠基人，开创并推动了客观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他的初期作品均为中、短篇小说，敏锐的洞察力和严格的现实态度是这些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他的笔下，农村生活不再是田园小说的描绘素材，而是包藏着各种矛盾、冲突和人间悲剧的场所，因而他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农民形象，启迪读者对人的生存条件进行反思。城镇贫民、小职员和小市民的生活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有反映，侧重揭示了他们的卑贱地位和灰暗、迷惘心理。一般来讲，这类作品虽然在雷布里亚努的整个创作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和他的长篇相比，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上毕竟处于从属地位。长篇小说《伊昂》(*Ion*)是雷布里亚努的成名之作，讲述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个名叫伊昂的贫苦农民渴求土地的故事。全书分为两部：土地的呼唤和爱情的呼唤。在资本主义因素逐步渗透农村经济的情况下，这位原本质朴

的青年农民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人格和道德急剧蜕变，简直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千方百计想与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结亲，借陪嫁名义索要土地和财物，从而在家庭、爱情上造成一系列悲剧，他自己也成了土地的牺牲品。通过这个故事，雷布里亚努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农村面貌。《绞刑森林》(*Pădurea spânzuraţilor*)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一个罗马尼亚族军官经过剧烈思想斗争，终于调转枪口反击奥匈帝国军队的转变过程。由于所谓的背叛罪，这个曾经目睹绞死逃兵的军官也被处以绞刑。《王子》(*Crăişorul*)反映了 1784 年莫茨人暴动。在此基础上，雷布里亚努创作了另一部力作《起义》(*Răscoala*)，从而罗马尼亚 1907 年农民大起义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在文学作品中首次得到生动体现。除上述三部代表作外，雷布里亚努还著有套叠式灵魂转生小说《亚当和夏娃》、揭示遗传恶果的《丘莲德拉》以及反映城市生活的《火》、《猩猩》、《两个》等。他的剧作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四对舞》、《信封》和《使徒》。

M.萨多维亚努(Mihail Sadoveanu，1880—1961)擅长故事创作，风格古朴、恬静，鲁迅先生曾介绍过他的作品。他的父亲是律师，母亲出身农家。童年是在罗马尼亚北部景色秀丽的乡下度过的。1892 年在故乡读完小学后，他到弗尔蒂切尼和雅西继续读中学，直到 1900 年。中学时期他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开始创作，1897 年首次发表了短篇小说《弗尔蒂切尼的 M 小姐》，此后《新生活》等多种杂志刊登了他的诗文。中学毕业后，父亲让他到布加勒斯特学习法律，可他却报考了语言、文学系。录取后他没踏入大学课堂，随即返回家乡结了婚。1902 年他在弗尔蒂切尼和奥克纳镇服兵役，那段经历为他后来创作反映军营生活的作品提供了素材。1903 年他参加编辑传统主义文学刊物《耕耘者》，次年迁居布加勒斯特，同时出版了四部作品：《故事集》、《压抑的痛苦》、《普雷库老爹的酒店》和《群鹰》，从而蜚声文坛。但是，当时的创作

收入毕竟是有限的,由于生活所迫,他 1904 年后担任过抄写员工作,后来回到弗尔蒂切尼,和他兄弟一起经营果园。1907 年罗马尼亚爆发农民大起义时,他因同情农民,被当局视为起义的煽动者,家里受到搜查。同年,他被教育部任命为摩尔多瓦地区文化团体和民间图书馆的视察员,与人合作创办了普及文化的双月刊《人民书信》。1908 年组建作家协会时,他被选为副主席,1910 至 1919 年担任雅西民族剧院院长职务。在此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萨多维亚努作为预备役军官走上前线,主办战时刊物《罗马尼亚》。战争结束后他定居雅西,担任《文学记事》的编辑工作。1921 年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入院演说题为《民间诗歌》。此后他一直从事创作和刊物编辑工作,1936 至 1938 年主办报纸《真理》和《早晨》。由于在文学创作和新闻工作中坚持民主立场,1937 年右派势力和法西斯刊物向他发起攻击,暴徒们在大街和广场上焚毁他的著作。对此,广大知识界非常气愤,萨多维亚努也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予以回击。为了声援这位优秀作家,雅西大学于 1938 年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二战期间,他对法西斯战争持反对态度。罗马尼亚解放以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担任过大国民会议主席团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萨多维亚努是罗马尼亚人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一百多部作品,按题材大致分成四类。一类是历史题材小说,如《战争故事》(*Povestiri din război*)、《鹰的家族》、《巨蟹宫》、《鲁克桑德拉公主的婚礼》、《金树枝》、《斯特凡大公传》、《吉德里兄弟》、《马蹄铁尼古拉》等。这类作品涉及的历史相当广泛,上起公元前的达契亚时代(《金树枝》),下至 1877 年的独立战争(《战争故事》),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但是萨多维亚努在作品中描写得最多的还是 15 至 17 世纪摩尔多瓦公国从鼎盛趋向没落的历史进程。斯特凡大公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公国国力强盛,成功地抵御了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屡次入侵,扼守了欧洲的东大门。他的光辉形象在《斯特凡大公传》和《吉

德里兄弟》(*Fraţii Jderi*)两部书中得到生动描绘,而吉德里一家则是支持大公各项政策的人民群众的缩影。第二类是农村题材小说,如《泥棚户》、《席列特河上漂来的磨房》、《安古察客店》(*Hanu Ancuţei*)、《斧头》、《狼岛》、《花的诱惑》等。在这类作品里,萨多维亚努集中描写了农夫、牧民、捕鱼者、看林人、放排工、养蜂人等的困苦生活,同时也揭露了地主阶级对他们的残酷剥削。中篇小说《斧头》(*Baltagul*)塑造了一位刚强、智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的丈夫是牧羊人,转场途中被人谋杀。为了找到凶手,她只身一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为丈夫报了仇,按照传统仪式埋葬了他。第三类为集镇题材小说,如《凋零的花》(*Floare ofilită*)、《玛尔格丽达小姐》、《哈亚·萨妮斯》、《平静的地方》等。19 世纪末叶,萨多维亚努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小镇是相当闭塞的,各种类型的居民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甚至爱情也笼罩在伤感的气氛之中。上述作品反映了这类集镇的病态生活。第四类是描写自然风光的小说,如《浓雾背后的国度》(*Ţara de dincolo de negură*)、《水的王国》、《美女河谷》、《一个渔翁的回忆》等。萨多维亚努喜欢旅行、捕鱼和狩猎,到过许多风景秀丽的地方。他的作品记述了遨游自然、接触劳动者的由衷感受。

I. 阿格尔比恰努(Ion Agârbiceanu, 1882—1962)也是传统主义小说知名作家。他青年时攻读神学,做过乡村牧师,熟悉矿工和农民生活。自读中学起开始文学创作,1906 年出版第一本故事集《乡下》。1910 年后差不多每年发表一部作品,其中较为知名的小说集有《黑暗中》、《深渊》、《债务》、《曼恩神甫》、《蜡像》等,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稍差,《大天使》、《圣彼得记事》、《旋涡》等为读者熟知。他的作品以冷漠的现实主义为基调,有时扩展至自然主义。描绘手法偶尔间杂情感因素。他是一位揭示人间苦难的小说家,作品人物多为农民、手工业者、矿工、职员、教师和神甫,对于他们的屈辱和不幸给予无限同情。例如,短篇小说《菲菲莉亚格》(*Fefeleaga*)描绘了一位寡妇连续丧子,为了埋葬最后一个儿子,凄苦的女人不

得不买掉她赖以生存的惟一的老马。《卢米妮察》(*Luminița*)用徐缓的笔调向人们揭示了一位老农妇离开人世前的悲惨场面。

Cz. 佩特雷斯库(Cezar Petrescu, 1892—1961)对传统小说有新的发展,首先是题材向城市生活扩大,其次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现代小说手法。他年轻时学习法律,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主办《思想》、《言论》、《罗马尼亚文学》等杂志。丰富的采访活动和编辑生活使他沿着乡村—城市—首都和追溯历史根源两个系列对罗马尼亚社会做了全面的透视,结论是整个国家处于顽固的封建主义和巨变的资本主义对抗之中,加之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东方生存方式与西方生存方式、表象与实质等不兼容因素的影响,各类矛盾日益加剧,从而造成无数现代悲剧。鉴于这一认识,佩特雷斯库把由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地理条件等限定的个人和集体命运,作为文学反映的主题。为此,他 1922 年发表第一部耕耘派风格短篇小说集《自耕农信札》之后,就开始创作综合反映 20 世纪罗马尼亚面貌的系列小说,于 1942 年完成。这套系列小说由短篇集和长篇组成,分为 5 类,即:大地的果实(含《使徒》、《1907》等)、战争与和平(含《不留地址的人》、《鬼魂的眼睛》等)、死的城镇(含《杨树路》、《传统城市》等)、杀人的首都(含《盲人的周日》、《圆梦》等)、内在的神奇(含《梦中人》、《神奇交响乐》等)、放荡(含《芦荟花》、《该隐和阿贝尔》等),它们容纳了罗马尼亚历史上几个重要事件,诸如 1848 年革命、1907 年农民大起义、世界大战等。在相对独立于这个系列的长篇小说中,《黑暗》(*Întunecare*)是一部较为突出的作品。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依托,在展示罗马尼亚社会风貌和一代人命运的过程中,着意刻画了一个由社会和个人因素造成的失败者,成为文学人物中一个特征鲜明的类型。此外,他还著有反映传统农村衰败的《德罗米克国王的财宝》和《黑色的金子》(*Aurul negru*)、描绘堕落大都会的《胜利大街》(*Calea Victoriei*)等。

这一时期,心理分析小说萌生文坛,涌现出几位知名作家。

H.巴巴达特—本杰斯库(Hortensia Papadat-Bengescu, 1876—1955)堪称罗马尼亚现代心理小说的奠基人和女性文学的突出代表。她生于军人家庭,自幼喜爱文学和音乐,成年后经常为报刊杂志撰写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评论文章,表现出自由、开放的艺术气质。初期,她曾受益于批评家伊布勒依利亚努的帮助,创作并发表了小说集《深水》(*Ape adânci*)。这部集子中的带有抒情意味的短篇小说是自我心灵透视的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对女人内心的一次勇敢的扫描,观察、搜索、自省、分析等手法运用得体。此后,由于家庭的迁徙,她又得到另一位批评家洛维内斯库的指导,使《镜子面前的女人》等小说的文学抒情性和分析精神逐步被客观尺度所制约,抒情性最终让位予客观性,这体现在笔记小说《毒龙》(*Balaurul*)中。"毒龙"是战争的拟人化,经历战争悲剧的女人尽力忘怀情感的压抑,但在重笔描述人类自残的过程中客观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揭示出人们面对死亡的不同反应。哈里巴家族系列小说是她这方面的代表作,共有三部,即:《长发披散的处女》(*Fecioarele despletite*)、《巴赫音乐会》(*Concert de muzică de Bach*)和《隐秘之路》(*Drum ascuns*)。这三部小说的基本特征是从内在视角观察世界,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某些"佼佼者"的心态和隐私进行观察、探索、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讲,故事涉及到哈里巴家族的两代人,他们的心理变化和道德的双重性被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家族成员们一方面是极力维护资产者的所谓体面,另一方面却又抵挡不住本能的强烈诱惑,这必然导致全面的堕落。作者认为人物的"心灵躯体"是那个交织着利益、虚荣和衰退的世界的关键,所以她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至于情节则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可以排除。尽管如此,上述三部小说仍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人物的形象是在经历一系列心理变化之后定型的。某些批评家认为《根》和《陌生人》是哈里巴家族系列小说的续篇,但后一部没有全部完成。

Cm.佩特雷斯库(Camil Petrescu, 1894—1957)是积极推崇现

代主义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他早年失去父母，这对他的幼小心灵是一次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战场上丧失部分听力，更加助长了他孤僻、倔强的性格。大学期间他曾攻读哲学。毕业以后主要从事期刊出版和文学创作，著有小说《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最初一夜》、《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等，蜚声文坛。1933 至 1943 年他曾潜心研究哲学，试图建立自己的实体论哲学体系。战后，他投身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

他倡导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有其自己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文学必须改造，尽快消除差距。这首先要求小说家更新关于"真实"的旧观念。按照时代精神，"真实"应该理解为一个过程，持续变化着的过程，而不是机械的因果链条。这不意味突出非理性，只是要排除简单化的定数论。至于"真实"的形式，它难以表述，不可重复，应该具有惟一性。因此，需要对认识问题做出修正，即人的思想必须与"真实"的新结构相适应。基于这一理论，佩特雷斯库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崇尚绝对、突出争辩、尝试革新、摈弃高雅等特征，这明显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中。《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最初一夜》(*Ultima noapte de dragoste, întâia noapte de război*)分为两部，主人公是一位充满失落感的消沉文人。第一部通过主人公的自省和心理分析追述了同嫉妒交织在一起的昔日爱情，爱情的纠葛又与资产阶级世界的虚伪和堕落缠绕在一处。按照表达"真实"的精神，作者把注意力转向意识，通过自我感觉描述的办法达到认识的目的。叙述采用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以便保证视角的同一性和意识展开的完整性。第二部描述人物的战争经历，战事使人割舍爱情，变得更加清醒。故事行文不加修饰，有如战地日记。另一部长篇小说《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Patul lui Procust*)揭示了两种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及它们的悲剧式结局。小说标题取自希腊神话，它提示人们爱情有如魔床，它任意缩短或加长当事人的身体，直至扭曲人格。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由于无力挣脱自己固有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观，终于选择了自杀的

归宿。这部小说采用多视角透视法,通过客观批判精神,展示了人们的精神同类。为了确保真实度,作者立足于具体事例和自白,采用了一些新的手法,诸如:引用日记和书信、镶入题外段落和联想、摈弃华丽和高雅。在社会主义年代,他又创作了《一位杰出的人》和《象牙之塔》,用新的观点探索了知识分子问题。

戏剧活动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在剧本创作、导演艺术、戏剧理论与批评等领域均有独到建树。1937 年作为博士论文他发表了《戏剧美学》,1939 年担任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院长之职,1947 年出版了囊括全部剧作的三卷本《戏剧集》。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从事剧本创作,第一部作品是《白衣精灵舞》,此后陆续发表了《威尼斯的一幕》、《坚强的人》、《当东》、《米蒂格·波佩斯库》、《米娃拉》、《这就是我爱的女人》等。他的作品基本属于心理剧或思想剧,剧中人物大多是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渴求绝对真理。他们的心理世界十分丰富,心理冲突胜过性格冲突。他们为之拼搏的不是命运,而是理想化的社会、正义和崇高的爱情。《白衣精灵舞》(*Jocul ielelor*)中的杰鲁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认为实现理想的首要条件是坚定信念,没有信念就无真理可言,更谈不到人间的幸福和纯真的爱。《坚强的人》(*Suflete tari*)表现了安德列的顽强精神。他出身农家,在贵族庄园里管理图书,可他却爱上了贵族小姐。为了实现追求,他不顾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同贵族老爷展开激烈争辩,以期证明自己并不亚于贵族阶层。米蒂格·波佩斯库在同名话剧里是卡拉迦列式的喜剧人物。这个银行职员为了适应堕落的社会风尚,平时经常出入酒馆,表面上装出目空一切、夸夸其谈的样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身份。其实他心地善良,生活并不富裕,微薄的工资仅能养活卧床的老母与贫苦的姐姐。有一天,一个做了高官的熟人认出了他,他们在战争期间曾是亲密战友。那人接济了他,同时也挽救了濒临倒闭的银行。他的戏剧作品侧重心理剖析,缺乏诱人的情节,不符合某些层次观众的

口味，所以大多未能及时搬上舞台，但其艺术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却不容忽视。

M.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知识广博，是欧洲知名小说家、宗教史家和哲学家。在文学方面，他开创了异国情调文学，同时也是志异小说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出生军人家庭，读中学时首次发表志异故事《我怎样找到了试金石》，并对东方文化表现出特殊兴趣。1928 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哲学系毕业后，赴加尔各答大学学习梵文和印度哲学，寄居导师家中。这段经历集中反映在他的成名小说《梅特蕾依》(*Maitreyi*)中。1931 年回国服兵役，同 C.诺依卡、E.乔兰等一批年轻人组建“标准”社团，逐渐成为青年一代文学家的精神领袖。1933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到布加勒斯特大学著名理论家 N.约内斯库主持的教研室任教，开设宗教史课程，并发表了《天堂归来》、《熄灭的光》等小说。1940 年从事外交工作，在伦敦和里斯本任文化随员。二战后定居巴黎，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在宗教史和东方学领域取得重要成绩。1956 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除宗教著作外还发表了《门图里亚萨大街》、《仲夏日之夜》等文学作品。

埃里亚德文化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热中神话研究，因为神话“为人类操行提供了楷模，从而它也揭示了存在的价值”。主要著作有《永恒回归的神话》、《神圣与凡俗》、《从扎莫尔克西斯到成吉思汗》等。宗教史研究基于“神圣现象学”、“对立之偶合”等理论，其成果使其驰名世界。代表性著作有《瑜伽，印度神秘学溯源》、《宗教史》、《宗教信仰与宗教思想史》等。

埃里亚德是 1930 年后文学界青年一代的突出代表。他的小说遵循存在主义理论，追求直接感受的真实，因为他认为现代小说不应排斥理论叙述，不应要求小说家只注重描写和揭示情感，成功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的认识手段、生活的含义、人的价值以及科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基于这一思想，他的文笔趋向直叙，接近佩特雷斯库倡导的朴实无华的美学风格。初期作品属

"纯叙事小说"或"间接小说",即极度清醒的主人公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根据日记的精确记载整理人生的感受。其中有同印度导师的女儿发生爱情纠葛的《梅特蕾依》,充满异国神秘情调的《伊萨贝尔与魔鬼河》(*Isabel şi apele diavolului*)、《工地》,以及反映寻觅已逝天堂的青年一代命运的《天堂归来》(*Întoarcerea din rai*)、《无赖》等。中、后期作品基于国内外神话传说和"神圣与凡俗"理论,突出反映了文学的志异性,向读者展示现实与梦幻、神魔与世俗之间复杂的奥秘关系。这类作品很多,知名的有《熄灭的光》、《克里丝蒂娜小姐》、《蛇》、《仲夏日之夜》、《门图里亚萨大街》等。

G.克林内斯库(Gheorghe Călinescu, 1899—1965)既是小说家,也是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他出生职员家庭,1923年语文系毕业后赴意大利考察。两年后回国,在中学教书,同时为文学刊物撰稿。1933年他参加《罗马尼亚生活》的编辑工作。1936年在雅西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开设美学和文学批评讲座。二战期间由于坚持民主立场,遭到安东内斯库军事法西斯政权的种种侮辱。罗马尼亚解放初期,他曾主编《人民论坛》、《世界》等刊物。自1945年起,主持布加勒斯特大学罗马尼亚文学史教研室工作。1949年,由于"左"的教育方针,他一度被迫离开大学。

他知识广博,著述丰富。二战前,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埃米内斯库的作品》、《克良格生平与作品》、《美学原理》和《罗马尼亚文学通史》(*Istorie a literaturii române de la origini până în prezent*)。其中的后者卷帙浩繁,内容翔实,观点明确,分析精辟,在文学史界享有很高的权威性。他也是20世纪优秀的小说家。第一部长篇小说《婚礼的篇章》通过刚从国外归来的年轻人吉姆寻求配偶的故事,描写了新旧两代人对待生活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欧蒂丽亚的秘密》(*Enigma Otiliei*)围绕遗产问题剖析了一个家庭的各种矛盾。社会主义年代,他又发表了《可怜的约阿尼德》等作品。

3. 戏剧文学

这一时期,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戏剧文学,是在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推动下不断丰富和提高的,其主要发展方向仍是由亚历山德里和卡拉迦列开创的社会、政治喜剧。一般来讲,此时的喜剧作品在艺术成就方面均未达到卡拉迦列鼎盛时期的水平,但是在创作特色方面却有新的建树,那就是在苛刻的讽刺基调上增添了若干抒情意味和伤感情趣。波帕的喜剧作品以温和、宽容见长,穆沙特斯库注重语言的诙谐性,塞巴斯蒂安的剧中人物充满了伤感和遐思,基利采斯库的泼辣笔锋透出苦涩的味道,齐普里安的讽刺经常使观众陷入困惑。由哈斯德乌、亚历山德里等人奠基的历史剧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佩特雷斯库、埃夫蒂米乌等创作的历史剧不但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有重大革新,吸收了现代派的创作技巧。此外,在世界戏剧潮流的影响下,罗马尼亚戏剧园地也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心理剧、思想剧、哲理剧、诗剧、悲喜剧、民俗剧、神话剧、荒诞剧和表现主义戏剧。上述剧种具有鲜明的特色,大多植根本国现实,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罗马尼亚的社会现实、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前一阶段相比,戏剧创作题材极大丰富。波帕和穆沙特斯库在他们的作品中揭示了外省小镇的社会风貌,赞菲雷斯库描写了城郊居民的真实生活,佩特雷斯库和塞巴斯蒂安探索了知识阶层的心理状态,布拉加等人试图通过民俗与神话反映社会现实。就戏剧构成来讲,许多作家对心理分析、荒诞效应、叙事手法、表现主义技巧等做了实地尝试。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在塑造人物方面也有创新,出现了一批性格突出的剧中人,其中有孤傲失意的知识分子、丧失心理平衡的普通百姓、在爱情中寻求解脱的纯真女性,以及一些心地善良的小市民。他们的性格和文化层次虽极不相同,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却成了他们的共同心理特征。面对冷酷、龌龊的

现实，他们鼓起勇气拼命挣扎，极力维护自己的理想和情操，可到头来仍然无法改变现状，终于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有的以自杀了结一生。这些人物身上深深刻着时代的烙印。

V.埃夫蒂米乌(Victor Eftimiu，1889—1972)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成名。他出生商人家庭，多次担任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院长职务。他于1957年出版《戏剧集》时，曾把一生创作的四十余部作品按题材分成几大系列，即：梦幻剧《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真实故事》、《黑公鸡》；历史剧《琳加拉》、《绿林好汉》；古代悲剧《普罗米修斯》、《关于忒拜的传说》；中世纪剧《西班牙的故事》、《蒂奥克里斯》；农村悲喜剧《阿基姆》、《财富》；喜剧《看见死神的人》、《刺猬和鼹鼠》；讽刺剧《百万富翁舞会》、《听忏悔的神甫》；外国题材剧《拿破仑》、《魔术师》等。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参差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是迎合某些层次的观众口味的应时之作。真正体现他戏剧创作才能的作品是梦幻剧和历史传说剧。《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真实故事》(*Înşir-te mărgărite*)一直被视为发掘民间传说的梦幻诗剧的典范，奇妙的场景和悠扬的韵文把观众带进了扑朔迷离的神奇世界。从前，白皇帝有三个女儿，长女和次女都嫁给了王子，只有小女儿索琳娜不遵父命，在与布滋杜冈成亲之夜逃离宫门，在女巫的鼓励下追寻心目中的美王子。但是，美王子并不爱她，他的情人是落入毒龙之手的伊莲娜。为此，美王子斩杀毒龙，救出伊莲娜，实现了他对爱情的真挚追求。这一结局引起剧中人物的不同反应，失意的布滋杜冈认为爱情不可强求，多情的索琳娜终于醒悟爱情并不是永恒的东西。

M.索尔布(Mihail Sorbul，1886—1966)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已成名的剧作家。早期，他曾发表《我们的英雄》、《春风》等多种短剧，但是没有引起戏剧界的注意。他的成名作品是连续推出的三部力作，即：《编年史》、《红色冲动》和《逃兵》。《编年史》(*Letopiseţi*)是一部历史剧，描写了16世纪摩尔多瓦的传奇人物严酷的伊昂大公。《红色冲动》(*Patima roşie*)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

出著名的悲喜剧，以心理透视和自然主义描写见长。托芳娜是个贫苦的女大学生，性情乖戾暴躁，经常不能约束自己。家境富裕的卡特里什爱上了她，征得父母同意后准备和她结婚。但是不知怎么她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或者由于多变的性格，她突然拒绝了这门亲事，转而追求无赖青年鲁迪。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爱鲁迪就是因为“所有的女人都爱鲁迪”，这个家伙是个“可爱的畜生”。但是鲁迪惧怕她的暴烈，对她采取回避态度。自此鲁迪改弦更张，不再沾花惹草，专一跟科琳娜相爱。托芳娜有一个堂兄，名叫斯比尔茨，是个屡次留级、整日酗酒的大学生。可巧，他爱的也是科琳娜。由于爱情引起的仇恨，他挑唆堂妹托芳娜对鲁迪进行报复，屡次提示她不要忘记祖父是个杀狗人，她的血管里流着祖父的嗜杀成癖的红色血液，血的冲动是不可遏止的。一天夜里，托芳娜带着堂兄交给她的手枪闯进鲁迪和科琳娜的卧室，要求做爱，以羞辱另一个女人。鲁迪不从，与她争吵，她在神志清醒可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鲁迪。血的冲动在她身上起了作用，终于酿成悲剧。《逃兵》(*Dezertorul*)也是一部悲喜剧，讲的是1916年德国军队占领布加勒斯特时发生的一个故事。除上述作品外，索尔布还著有《复仇》、《深渊》、《第二个青春》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年轻的剧作家成长起来，他们的作品虽然大多没有达到前辈的艺术水平，但对丰富剧目和革新创作手法却起了积极作用。

T.穆沙特斯库(Tudor Muşatescu，1903—1970)是当时比较知名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喜剧尤其受到中下层观众的欢迎，演出率相当高。1923年他开始创作剧本，第一部作品是用法语写成的《财宝之火》。此后，他继承卡拉迦列的戏剧传统，发表了大量作品，喜剧类有《今晚抵达》、《泰坦尼克号与华尔兹》、《……埃斯库》等；通俗喜剧类有《萤火虫》、《蝴蝶小姐》、《山茶花先生》等；悲喜剧有《航标》、《冬夜之梦》等。他的戏剧作品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就其深度来讲，真正站得住脚的为数不多，纳入传统剧目的只有《泰坦尼克

号与华尔兹》(*Titanic-Vals*)、《……埃斯库》(... *Escu*)等几部喜剧。《泰》剧以平静的外省小镇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家庭的喜剧风波。斯皮拉克是善良正直的小职员,对生活要求不高,工作之余满足于一张报纸和一杯咖啡。他虽说是一家之长,但众多的家庭成员都可以拿他开心。一天,噩耗传来,他的一位富有的兄弟因泰坦尼克号遇难而死于非命,巨额的遗产立刻把这个家庭卷入了狂热的旋涡。妻子、岳母、女儿和两个儿子纷纷要求购置别墅、赛马或者小汽车,以便改变现有的寒酸生活。激烈争执之后,他们一致达成协议首先应该拨出一定的款项为斯皮拉克投资,让他竞选议员。对此,斯皮拉克是极力反对的,但他拗不过家庭的决议,只得登台竞选。发表竞选词时,这位老好人明白无误地讲出了自己不想当议员的真实愿望,可恰恰就是这点却感动了选民,他糊里糊涂地当选了。对待社会问题和家庭纠纷,斯皮拉克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憎恶竞选制度,也厌恶家人贪得无厌的金钱欲望。为此,他借助律师的帮助,对兄弟的遗产做出另外的解释,迫使家人就范,帮助前妻之女过上了美满生活。

V.I.波帕(Victor Ion Popa, 1895—1946)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和绘画。1922至1932年是他戏剧活动的繁盛时期,除创作剧本外,还在一些剧院担任导演,创办了大众剧院,首次组织了儿童剧团,并在戏剧学院执教。他创作的正剧有《母鹿》、《大路口》、《手铐》等,这些作品受到现代主义潮流影响,尤其带有表现主义戏剧的痕迹。喜剧最为突出,知名作品是《窗口的绣球花》、《塔凯、扬凯和卡德尔》。乡村剧是他戏剧创作的一个方面,《纳税》、《尝试》都属于这类作品。他还著有儿童剧,如《小绒毛》、《小胡子》等。《母鹿》(*Ciuta*)是波帕的成名之作,这部易卜生式的情节剧描写了一位母鹿般纯真的女性。她叫安达,生性活泼,热爱生活,由于幼年丧父,只得寄居姑母家中。成年以后,贪财的姑母把她许给富翁为妻。这人不但又老又丑,而且道德极坏。姑娘奋力抗婚,逃到情人家中,要求保护。可是情人在关键时刻却变成了懦夫。最后一线希

望破灭了，姑娘以自杀诀别人生，正如剧终台词中说的那样，野性的母鹿渴求纯洁和自由，如果得不到这些东西，毋宁死去。波帕的喜剧作品以情调温和、节奏缓慢而著称，幽默、诙谐中包藏着深厚的善意和宽容之情。《塔凯、扬凯和卡德尔》(*Take, Ianke şi Cadîr*)是他的代表性喜剧。该剧通过三个不同民族(罗马尼亚族、犹太族和土耳其族)商人的交往，反映了普通百姓之间的友好相处关系。他们三人店铺毗连，既是竞争对手又是亲密朋友。尤其是前两者，为了消磨时光，总是喜欢斗嘴取乐，而独身的土耳其人卡德尔却沉默寡言，悔恨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有儿有女，店铺关门后可以享受家庭的欢乐。虽然他们的民族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互相之间却情同手足，似乎没有任何嫌隙。可是，世俗观念和民族偏见长期以来埋下的种子一旦条件适宜就要萌发，这一次造成不和的直接原因是塔凯和扬凯的一儿一女打算成亲。作为有知识的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把种族和宗教的差异视为爱情的障碍。老年人的观点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是大逆不道，儿女亲事眼看就要危及两家之间的深厚友谊。好在这种冲突没有酿成悲剧，卡德尔站在年轻人一边，及时说服了双方老人，情感喜剧收到圆满结局。

A.基利采斯库(Alexandru Kiriţescu, 1888—1961)生于铁路员工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戏剧活动。由喜剧《安妮索拉的诱惑》、《芙洛莲蒂娜》和《扯闲话的女人》(*Gaiţele*)构成的资产者三部曲使他的戏剧创作达到了顶峰，其中尤以后者著称话剧舞台。该剧描写了一些贪图享乐、沉迷情场的已经西欧化的时髦青年，但这毕竟是次要情节，剧作者的真正意图是以此为契机，用大量笔墨集中刻画了三个爱扯闲话的没落贵族阶层的老年妇女。她们贪婪、冷漠，敌视周围的一切，尤其憎恶年轻人。由于整日无所事事，凑到一起就是打牌和喝咖啡，用刻薄的语言造谣中伤，以发泄心中郁结的怨气。一次，她们的一个亲属自杀身亡，这事本该引起悲痛，可她们不但无动于衷，反而把葬礼也作为搬弄是非的话题，说东道西，似乎主宰世界的只有她们。

G. 齐普里安(Gheorghe Ciprian, 1883—1968)既是出色的演员,也是别具风格的剧作家。戏剧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创作思想剧,代表作是《人与瘦马》(*Omul cu mârţoaga*)。这部带有德国表现主义印痕的作品基于强烈的戏剧冲突,把剧中人物分为“人”与“非人”两大类。作者坚信在现实生活中意志坚定的人才是强者,因为他们能够看到“非人”所看不到的前景,《人》剧的主人公基利克就属于这类人物。热中赛马的档案管理员基利克不怕别人讥笑和妻子的背离,把最后一点积蓄押在一匹瘦马身上。为此,剧中的其余人物分成了两派,支持者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相信坚定和坦诚可以使人独具慧眼;反对者极力嘲笑他,说他是傻瓜,白日做梦。最后基利克获胜了,赢得金钱与荣光,但他在一片赞扬声中仍旧保持清醒头脑。三幕荒诞剧《鸭头》(*Capul de răţoi*)是一部先锋派作品。该剧没有完整的情节,戏剧冲突不连贯,用反传统讽刺手法抨击了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鸭头协会有四名会员,他们的宗旨是“希望摆脱逻辑的束缚,渴求在分割黑暗与光明、疯狂与理智的刀刃上翻跟头”。为此,他们搞了一连串的恶作剧,诸如夜深之时在马路上拦截行人,对各类人物做人性哲学调查。他们把总部迁到一棵树上,然后从树上往下扔钞票,观察人们的反应。他们甚至闯进警察局,试图用反常的滑稽手法使警官恢复人性。

M. 塞巴斯蒂安(Mihail Sebastian, 1907—1945)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剧作家。他主张运用虚假的幻想为观众作戏,不能过分推崇戏剧真实,否则戏剧将不成其为戏剧。戏剧的任务不是再现现实,而是表现人们超脱平庸的现实生活的幻想,进而表达幻觉的真实性。根据这种创作思想,他于1938年推出了名剧《假期游戏》(*Jocul de-a vacanţa*)。该剧没有连贯的戏剧冲突,主要是通过舞台气氛启迪观众的幻想。剧中人斯特凡建议暂居山间别墅的来自各地的游客做一次假期游戏,或者名之为幸福游戏和遗忘游戏。他们割断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要日历,不要钟表,不要收音机和电话,从而在超脱尘世的环境中剖析每个人物的心态。一个少年忘

记了数学补考的苦恼,整日和斯特凡打乒乓球消遣,并且偷偷爱着科琳娜。小职员科琳娜怀有女人特有的憧憬,想像自己同文艺界的名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明媚的阳光下到意大利旅行。政府雇员在梦幻中抓住一切机会对苛刻的上司进行报复,渴望在无拘无束的海洋上遨游。在这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剧中人完全进入了乐不思返的境地。可是有人不慎讲出了假期结束的日期,这无疑使他们的心理遭受了极大的冲击。他们沉迷幻想和追求超脱是对外部世界的无言抗议。《无名星》(*Steaua fără nume*)是一部充满浓郁抒情意味的作品,剧中的两个人物象征着两个不同的世界。蒙娜容貌美丽,出身上层社会,由于偶然的原因使她滞留某个小镇,与平凡的教师米洛尤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米洛尤热中天文,通过长期的计算发现了一颗不可见的新星。几小时的相处使他们的感情逐步交融,超脱世俗的爱情画卷在灿烂的星空下慢慢展开。黎明来临,他们不得不分手。人的命运像夜空上的星辰,无法摆脱自己的轨道,但是超越轨道的梦却永远是美好的。《最后一小时》和《岛》由于剧作者遭到车祸突然离开人世,于1946年才与观众见面。从总体上讲,他的剧作充满诗意和抒情成分,为罗马尼亚的戏剧增添了新的色彩。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戏剧创作的除专业剧作家外,还有一批小说家和诗人,其中成就突出的是上文介绍过的佩特雷斯库、布拉加和雷布里亚努。

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衰与影响

1944至1989年在罗马尼亚文学发展长河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鉴于特定的外部政治、社会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制约,走过了一条异常曲折、艰难的路,45年的文坛风雨饱含功过是非,为罗马尼亚留下一份值得认真评价的文学遗产。

1944年8月23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经历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同时它也标志着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的起始。这一天,曾受希特勒控制的罗马尼亚王国发生武装政变,推翻安东内斯库军事独裁,调转枪口向法西斯宣战。此后,罗军协同盟军解放了本国和别国大片领土,直至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搏斗中,罗马尼亚作家功不可没,他们始终坚持民主进步立场,在文化思想战线同法西斯倾向和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民族精神,推进了民主进程。全国解放时,从年龄上看,有三代作家活跃在文学战线上。其一,本世纪初业已成名的T.阿尔盖茨、M.萨多维亚努、I.阿格尔比恰努、G.巴科维亚等均步入60至80岁高龄,他们是文坛元老,在文学领域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批评界认同的作家,如:L.布拉加、I.巴尔布、A.菲利皮德、Cm.佩特雷斯库、Cz.佩特雷斯库、H.巴巴达特—本杰斯库、I.皮拉特、G.克林内斯库、G.博格察、Z.斯坦库等,1944年时都处于40至60岁的年龄

段，他们精力旺盛，勇于革新，创造风格大多印有欧洲现代主义痕迹，对当时的文坛具有很大影响。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年龄不足四十岁的年轻作家步入文坛，其中有 G. 杜米特雷斯库、M. 普雷达、E. 热贝利亚努、M. 贝纽克、I. 卡拉扬、C. 托内加鲁等，他们在动荡的战争岁月中，对黑暗势力横行的旧的社会体制和某些陈旧的文学模式提出挑战。在谴责法西斯统治和呼唤新时代的同时，他们的文学创作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促成了革命文学、反叛文学和超现实主义文学于战后数年在罗马尼亚的兴起。上述三代人构成了社会主义文学起始阶段的强大作家阵容，保证了罗马尼亚文学优良传统的延续性，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倾向性，文学创作必须为新的社会制度服务是时代向它提出的基本要求，在战后 45 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沿着这条主线向前发展，开花结果，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文艺导向的偏颇和失误，或者非文学因素的不恰当干预，它也经受了严重挫折，在低谷徘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仍然按照其内在规律顽强表现自己，在坎坷的境遇中以相应的形式作出反应。这里，必须对某些直接影响文学的社会、政治状况予以介绍，舍此则无法理解文学阶段的划分、多变的演化过程、扭曲的文学现象以及作家队伍的构成。

1944 年 8 月至 1947 年底是新时期文学经历的第一阶段。具有深远意义的“8·23”武装政变之后，对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曾起促进作用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立即在合法条件下开展活动，改建各级组织，统一工人阶级队伍，制定政治纲领，积极参加君主政体下的联合政府，为民主改革做了充分准备。在此基础上，1944 至 1947 年间，罗共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团结进步力量，陆续完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改造，其中包括 1945 年 3 月 6 日成立的以左派力量为主体的第一届工农民主革命政府、同年实施的土地改革以及后来的议会选举、银行国有化、国家机构民主化、清除国家

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等，从而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在革命潮流的强大压力下，1947 年 12 月 30 日米哈依国王被迫退位，当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至此，共产党人完全控制了国家权力。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方面的斗争焦点集中在政权过渡问题上，文学艺术领域没有全面实施统一的整顿和管理，处于半无政府的自由状态。各种文化思潮和艺术流派借助战后的混乱局面，仍有条件得以滋生和发展，扩大自己的影响。文学创作在延续战前传统的同时，诗歌界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锡比乌文学社、信天翁文学小组和超现实主义新潮流，尝试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小说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辉煌阶段后，此时又出现了一批新人、新作，I. M. 萨多维亚努发表了《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P. 杜米特鲁和 M. 普雷达分别出版了《尤丽迪丝》和《大地相遇》，这些作品以新的视角和创作手法对战前小说有新的突破。应该指出，此时以左翼文人为主体的作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他们开展了以建立新文化秩序为宗旨的斗争。左派刊物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始占领阵地。1940 年遭到查禁的《罗马尼亚生活》重新出版，非利皮德、贝纽克等知名人士都是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帕拉斯基维斯库主办了《地平线》，后更名《火焰》。《世界》和《当代》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化刊物。左翼作家为推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出不懈努力，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致力为新文学的兴起铺平道路。但是，囿于复杂的社会环境，推行新文化面临各种矛盾，圆满完成这项使命并非一件易事。首先，战后数年中代表各种倾向的社会势力依然合法存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文学问题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其次，苏联驻军和文化顾问的武断干预严重伤害了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感情，为文学的正常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第三，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几乎没有，新闻记者、党的活动分子和一些末流作家成了指导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有关评论中用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对知名作家和重要文学作品进行清洗。许多刊物，诸

如《正义》、《自由罗马尼亚》、《火花报》等，都热中于作家的“政治审查”，布拉加、巴尔布、埃里亚德、阿尔盖茨、克林内斯库等都陆续成了报刊的攻击对象，战前或战后的任何不恰当表现都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罪名。1944年，著名小说家雷布里亚努刚刚逝世，就有人攻击他是盖世太保的间谍，唆使人们到他的墓前啐唾沫。一个相当活跃的作家甚至撰文，说雷布里亚努不值得赞扬，他的全部作品加到一起也抵不上一个肖洛霍夫。对滞留国外的作家更是深恶痛绝，有人提议要判处E.乔兰和M.埃里亚德的名义死刑。第四，文学界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以政治代替艺术的不健康苗头。1944年9月作家代表大会曾发出动议，要依据苏联的模式对作家进行清理，一时间表面上的“重新评价”成了文人相互攻击、以期在政治上表白自己的争斗，使整个文坛陷入某种混乱之中。上述种种极左倾向，为下一阶段的文学埋下了隐患。

1948年至50年代末，是罗马尼亚文学经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罗马尼亚工人党，并制定下一阶段纲领性任务。1948年6月实现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驱逐资本家，为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准备。1949年3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由于种种原因进展十分缓慢，直至1962年才勉强完成。这一期间，出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口号，开始对党内异己分子、前政府官员、资产阶级政党首领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及宗教界人士进行清洗，以期巩固革命成果。上述举措从总体上看确实收到显著效果，但实施过程中鉴于某些环节的严重失误，也着实铸成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后遗症，成为此后整个社会和文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合作化初期有8万农民因迟交农业税或不同意入社而遭到逮捕。又如，解放初期，尤其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肃反运动存在严重扩大化倾向，株连人数达50万，其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大多因偶然的言论或一本日记而锒铛入狱。这一倾向也直接危及了文学界，沃伊库列斯库、卡拉扬等多人都因创作问题而被

捕，也有的作家流亡国外。党内的政治斗争、各级干部的以权代法、合作化、肃反运动、监牢、多瑙河—黑海运河劳改营等，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经久不散的阴影，成为后期政治小说、反思文学、纪实文学、影射文学的主要创作题材。著名作家普雷达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困惑的十年”，它既是历史的困惑，也是文学界的困惑。

1948 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全面铺开，也对文化领域实施了绝对的统一领导。文学界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惟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强调文学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创作题材应直接反映现实，基本限定于战前党的地下斗争、反法西斯战争、全国解放后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等，作品内容要健康向上，具有符合现实要求的社会效应和教育功能，体现新型文学服务劳动者的突出特征。在这一创作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热情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老作家积极配合党的政策，讴歌新社会，正面塑造了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文学形象，起到了鼓动民众、教育民众的作用，为奠定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迈出了第一步。诗人 M. 贝纽克、E. 热贝利亚努、M. 巴努什等，小说家 M. 萨多维亚努、Z. 斯坦库、T. 波波维奇等，剧作家 A. 巴朗格、L. 德麦特留斯等，都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在罗马尼亚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为改造和推动文学，尤其是服务社会的积极一面，但由于不顾国情和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用行政手段硬性规定它是惟一的创作方法并教条式地加以模仿和套用，它也就逐渐演化成了阻碍文学发展的僵化模式，造成一系列弊病，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50 年代的罗马尼亚文学在崇尚模式、主题先行、追求预先规定的社会效应的过程中，出现了背离传统的扭曲的文学现象。抒情诗、景物诗、爱情诗、哲理诗均被逐出文艺园地，口号式的社会诗和韵文化的英雄传奇独霸诗苑，A. 托马的《安德烈抢救矿井》和 D. 德什里乌的《卢斯卡的拉泽尔》等是这类诗歌的突出代表。

小说、戏剧趋向极度的简单化，故事情节无不遵循图解政治的善恶二元论的模式，因而这个阶段的许多作品大都缺乏艺术价值，而且患有虚假症，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例如I.克卢格鲁的长篇小说《钢与面包》、M.达维道格鲁的剧作《钢都》等。为了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学批评界进行了严格清理。首先，战前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马约雷斯库和洛维内斯库遭到彻底否定，他们的著作在图书馆中被定为禁书，老一代中惟一得到推崇的是具有革命倾向的多布罗加努—盖利亚。1948年，一直追随进步力量的批评家克林内斯库被逐出大学讲坛，他的位置由维特内尔、布拉图等人取代。此后，又陆续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名的批评家，例如乔古列斯库、斯特莱依努以及皮鲁、马利诺等年轻人进行压制和打击，以极左面目出现的莫拉鲁、诺维科夫、托马等开始活跃在大学讲坛和批评界，文学评论园地形成了一言堂。对待作家及其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惟一的评价标准。文坛以此划界，非此即彼，视其他流派或创作倾向均属没落资产阶级范畴，文学中的唯美主义、神秘主义、抽象主义、心理主义不但受到批判，而且往往招致政治罪名。1948年，著名诗人布拉加因曾从事唯心主义哲学研究，而被赶出克卢日大学，带着不可知论者的政治标签直至1962年辞世。老诗人阿尔盖茨被指责陷入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泥潭，无限期停止他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两位诗人被逐出文坛，意味着罗马尼亚文学中现代主义的中止。其他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作家，例如马纽、皮拉特等，无不遭到严厉批判。浪漫主义诗人菲利皮德由于注重非社会诗和强调诗歌创作风格的必要性，而被斥为“固守象牙之塔”。甚至民族诗人埃米内斯库的诗歌，在学校里也只有两三首可以同学生见面。鉴于这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局面，有些作家出于种种原因停止写作，直至60年代文坛气氛趋向宽松后才重新执笔。另一些作家则尽量避开敏感的现实，转而从事自己所熟悉的历史题材或传统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为这一阶段增添了几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其中有萨

多维亚努的《马蹄铁尼古拉》、普雷达的《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杜米特鲁的《家庭纪事》和巴尔布的《坑》等。

自50年代中期起,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弊病,文学界悄然出现回归传统的要求,它的演化过程是以社会大气候为依托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文学环境有所改善。克林内斯库返回文坛,在《当代》周刊上辟"乐观主义随笔"专栏发表文章;克卢日的具有开放倾向的文学刊物《星》也陆续向读者介绍了一些古典作家。诗人阿尔盖茨重新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推出组诗《1907年》;普雷达的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印痕的《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顺利问世。这种情况持续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对文化领域的管理又趋严峻,文学界受到直接冲击。在此期间,罗历史上有几件大事值得注意。1955年,罗共提出依据本国具体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经济上,反对经互会把罗马尼亚划为农业区,倾向发展石油化工、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态势。1957年,经济部门开始向西方国家开放,外贸额显著增长。1958年,经过多次谈判,苏军撤出罗马尼亚。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文坛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动作,通过各种形式试图挣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诗歌方面,以A.巴康斯基、A.勒乌等人为主体的克卢日市文学杂志《星》所倡导的文学方向在青年诗人当中具有代表意义,他们针对已经模式化了的革命诗、社会诗、大众诗,尤其是英雄叙事诗给诗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抒情诗的回归问题,并在1956年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模拟型诗歌提出批评,指出用平淡无奇的手法把日常生活韵文化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它将使诗歌逐步退化。同一时期,布加勒斯特的《文学报》也为诗歌改革提供了便利条件,在那里工作的年轻诗人N.斯特内斯库和他的一些同事思想都很活跃。他们自称是"秘密的现代派",要求革新诗歌,但并不蔑视和否定过去的一切,而是要求继承战前的传统,力争与世界诗歌发展保持同步。在这次诗歌革新浪潮中,贡献突出的应是年

轻诗人N.拉比什,他对模式的反叛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通过独具特色的诗作对以往的诗歌语言、诗的意境和套路予以批判,为60年代的诗人作出榜样。小说和戏剧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也开始松动,题材范围逐步拓宽,许多作家尝试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人物形象趋向多元化和内心化。正面人物不再是完人,允许具有一定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对于社会不良现象可以提出中肯批评,但是禁区仍然很多,掩饰矛盾、图解政治的作品依旧存在,对此普雷达等许多知名作家极为不满,小说界和戏剧界明里暗里也在酝酿改革浪潮。

文学演化的第三阶段始于60年代初期,此后的二十余年中罗马尼亚文学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时起时伏,顽强表现自己。总的趋势是借助一切有利时机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在回归传统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整个6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中期后的五六年间,出现了适宜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1962至1964年,罗马尼亚顶住各种压力与中国发展关系,同时继续向西方开放,努力摆脱苏联的控制。国内政治稳定,释放了全部政治犯。1965年乔治乌·德治去世时,党和政府的威望比较高,经济发展呈良好势头。同年,齐奥塞斯库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对内继续实行改革、团结、宽松政策。在此期间,为50年代的许多政治犯恢复了名誉,企业自主权得到重视,在营造住房等方面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大力发展教育和轮训干部,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多年禁止讲授的社会学科。外交方面尤其活跃,突出独立自主精神,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关当局对作家队伍给予了应有的关怀和重视,号召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接受新思想、研究新问题,用优秀作品反映新时代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核心口号是文学艺术应该充分发挥其特有的战斗性和教育功能,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它包含了革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等几个方面。L.布拉加、I.巴尔布等50年代受到压制的诗人得到正确评

价,大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重新出版。文艺理论界为T.马约雷斯库和E.洛维内斯库这两位先驱人物平了反,S.乔古列斯库、A.皮鲁等受到排斥的批评家重返评论园地。尤其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在T.维亚努的培育下,涌现出一批眼界开阔的年轻评论家,其中有E.西蒙、N.马诺列斯库等,他们为美学原则的回归和彻底清除教条主义模式做出了突出贡献。上述种种社会因素和文学因素,尤其是民族尊严、独立自主和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了作家队伍,调动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一些多年停止写作的文化人重新执笔,60至70年代登上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尤其活跃,在开拓创作题材、丰富创作手法、培育新的流派等方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才能。这种态势自60年代兴起,几经波折,一直延续到80年代。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制约虽不像50年代那样粗暴、公开和全面,但始终是强劲的。它虽然不能完全限定文学发展的轨迹,但也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印上了独有的痕迹。1971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为维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和境内外掀起的自由化浪潮,罗共高级领导层制定了"七月提纲",发动小"文化革命",对思想文化战线进行整顿。鉴于当时的形势,大部分作家对此采取理解或默认态度,但也有人十分抵触,甚至公开反对,出现了借助西方舆论同国内政策相对抗的"尼古拉·布列班事件"和"保尔·戈马现象"。1974年后,党内产生个人崇拜、家族统治、任人唯亲的苗头,并且愈演愈烈。人事大调动中,许多不懂业务的政工干部登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各级领导岗位,这些人为了取悦上司,不惜采取谎报下情、压制打击、弄虚作假、吹捧颂扬等手法,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凡此种种引起人民的愤懑,为此后的社会危机埋下祸患,而且也必然要反映到对社会和政治现象十分敏感的文学中来。80年代,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罗马尼亚实施了一些重大举措,以求振兴。但是由于忽视国情和民情,拒绝改革、开放,善良的愿望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农村集体化政策失败,劳动积极性不高。强行搬迁、归并农户的村社规划伤害了许多

百姓的心。硬性执行的工业化(尤其是无原料和动力保证的冶金工业和石油化工)、大型土木工程(多瑙河 — 黑海运河、共和国宫等)和偿还巨额外债耗尽了原本并不充裕的国民收入。最后几个五年计划基本没有完成,日益恶化的经济迫使人们勒紧裤带搞建设,情绪压抑、食品短缺、物资匮乏成了当时生活的突出写照。为了净化精神环境,文学艺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行政干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电视台、影剧院偶尔有新节目出台,都会产生轰动效应,惟一受到推崇的是以歌颂领袖和祖国为主调的“歌唱罗马尼亚”群众性歌舞活动。至于文学作品,只要稍稍触动时弊,委婉表达人民埋在内心的情绪,就会成为“抢手货”,而且这一过程,从作者著书经由书店到读者手里,经常是以隐蔽形式进行的。

这一阶段,文学环境由宽松趋向严峻,作家队伍随着政治、社会气候的变化在创作活动中采取了极不相同的态度和立场。许多作家破除教条主义模式之后,在新的起点上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正面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题材的范围、透视生活的角度、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表现手法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囿于行政干预,这类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情况并不罕见。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思想内容,例如农村合作化、50年代党内生活、罗苏关系等,大多依据上层人士观点的变化而变化,缺乏深层次的启迪和艺术感染力。另一种主要倾向是借助“美学策略”,求得对文艺导向某些方面的“合法”背离。它产生于60年代中期,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以强劲之势冲击当时的文坛。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家,例如普雷达、波佩斯库、布祖拉、卡拉扬、布兰迪亚纳等,均是文学界的主将,他们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对以往的文学有重大突破,力求发掘无法全面反映的社会真实。历史的必然与人的命运、理想与现实、权力与真理、法制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本质与伦理道德等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对此,有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巧妙设计一些情节,部分触及某些现象

或借助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这都需要一定的勇气。也有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超出限度，因而作品不能问世，或者受到批判，例如O.帕列尔的《一个幸运的人》、M.辛的《变颜》、N.斯坦因哈德的《幸福日记》等。大部分作家避免正面反映现实，采用隐喻、讽喻、暗示、象征、荒诞等隐晦的“美学策略”对以往和当前的生活做出折射。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那就是作者道出的一半真理由读者体验的另一半真理作补充。这种倾向促成了60至70年代诸多文学派别的产生。第三种潮流是对政治和现实持冷漠态度，采取不公开介入的立场，在唯美主义中寻求出路。解放初期，布拉加和沃伊库列斯库采取过这种方法，1960年后这类文学重新抬头，诗歌领域的S.A.多依纳什和小说界的S.勃努列斯库具有代表性。70至80年代出现的梦幻派、唯智派、后现代主义等也是作家回避现实的一种文学表现。1944年后，一些作家由于各种原因滞留或流亡国外，其中老一代比较知名的有M.埃里亚德、E.乔兰等，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得到批评界的认同。多数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例如P.杜米特鲁、V.霍里亚、P.戈马、D.采佩尼亚格、D.图多兰等，这些作家在境外基本不用罗语写作，而且作品内容具有强烈的随机性，极端的政治维度掩盖了艺术标准，许多随笔和文章超出文学界限，很难对其做出总体评价。

鉴于外部环境的变化，60年代诗歌领域空前高涨，涌现了以N.斯特内斯库为主体的60年代诗人，他们在回归抒情诗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创作题材，诗歌的意境、语言和表现手法日趋丰富。N.斯特内斯库等人的爱情诗、M.索雷斯库等人的讽喻怪诞诗、C.巴尔塔格等人的象征诗、I.格奥尔基等人的社会诗、A.波乌内斯库等人的政治诗、I.亚历山德鲁等人的表现主义诗歌、L.迪莫夫等人的梦幻派诗作，以及A.布兰迪亚纳、C.布泽亚等女诗人的作品无不独具特色，极大地丰富了沉闷多年的诗歌园地。因此，有的评论家称这一阶段的诗歌发展为“诗的爆炸”。70年代，M.科尔特雷斯库、I.斯特拉丹、N.达尼洛夫等推出后现代主义，80年代超现实

主义诗歌有所回潮。

小说也在努力摆脱外部干预的倾向中逐步与欧洲文学接轨，不断推出新的创作手法。60年代初的社会大气候为小说发展提供了适宜条件，6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具有突出艺术风格的作家开始成熟，其中有：D. R. 波佩斯库、F. 尼亚古、A. 伊瓦修克、C. 措尤、N. 布列班、A. 布祖拉、S. 勃努列斯库、N. 维利亚、S. 蒂特尔等多人。由于题材和其他方面的放宽，"困惑的十年"率先成了小说创作的热点，1948至1958年的一些历史现象，诸如肃反斗争、农业合作化、党内生活、干部作风等，在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部分反映。作家探索历史的必然和人的命运的关系时，重点移向人的命运，存在主义分析手法广泛运用。70年代后，大量问世的小说依据题材和表现手法可以分为若干类，例如M. 普雷达等人的政治小说、P. 安格尔等人的历史小说、D. R. 波佩斯库等人的怪诞小说、S. 勃努列斯库等人的魔幻小说、G. 勃勒依察等人的隐喻象征小说、I. 勃耶舒等人的幽默讽刺小说等。在此期间，出现了以M. H. 西苗内斯库、R. 佩特雷斯库等人为代表的特尔戈维什蒂派。这一流派人数不多，推崇重形式轻内容的"纯艺术"作品。8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小说领域有所表现，典型代表是"青年社"的一批年轻人，其中有M. 内德尔丘、S. 普雷达、I. 勒库斯特等，他们大多创作短篇，强调作品的自我参照系。

60年代后，戏剧在题材和表现手法方面也逐步开放，反思历史、针砭时弊、触动现实的剧作尤其受到欢迎。其中，特色突出的是喜剧、历史剧、思想剧、道德哲理剧和神话传说剧，主要剧作家有H. 洛维内斯库、A. 巴朗格、T. 马季鲁等多人。

1. 诗歌

1944年后的罗马尼亚诗歌随着社会体制和文学导向的巨变，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新时代气

息，题材和表现手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如此，它同战前的诗歌仍然保持着内在的联系。

迎来反法西斯胜利的有两部分人。老一代诗人是T.阿尔盖茨、L.布拉加、I.巴尔布、G.巴科维亚、V.沃伊库列斯库、A.菲利皮德等，他们在二战以前就名扬诗苑。二战前夕和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诗人中包括E.热贝利亚努、M.R.帕拉斯基维斯库、M.巴努什、M.贝纽克、G.杜米特雷斯库、I.卡拉扬、C.托内加鲁、S.A.多依纳什等。由于社会环境、文学观点和写作风格的差异，他们在诗歌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前一时期，即1919至1944年，是罗马尼亚诗歌发展最辉煌的历史阶段之一，诗苑花木竞生，传统派、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先锋派以及为数不多的革命诗争奇斗艳，田园、牧歌题材被彻底突破，诗歌朝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表现手法从单一的描绘、叙事、写景向主体情感的抒发转化，诗歌语言在不同流派中几经创新。

1944至1947年，战前延续下来的诗歌活动仍有明显表现，其一是锡比乌文学社，其二是信天翁文学小组，其三是超现实主义新浪潮。这些文学组织的主体都是年轻人。

锡比乌文学社成立于1942至1943年间，主要成员有R.斯坦卡、I.内戈依采斯库、A.S.多依纳什等，他们均为克卢日大学的学生（战时，该大学迁至锡比乌，文学社由此得名）。1945年，斯坦卡在《文学社杂志》上发表纲领性文章，题为《民谣体诗歌的兴起》。他们反对超现实主义诗人取消诗的情节和内容、蔑视诗的格律、抽象表白内心世界的做法，主张抒情诗价值的多元化，使古老的民谣体诗歌获得新生，为当前的时代服务。多依纳什的《生着银牙的野猪》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

《信天翁》杂志创刊于1941年，以该杂志为核心形成了布加勒斯特的信天翁文学小组，主要人物是现代派诗人G.杜米特雷斯库、I.卡拉扬、C.托内加鲁等。这批出身社会下层的年轻人对法西

斯战争和官方文化持敌对态度，在诗歌中用苛刻的言辞抨击时政和陈腐的文学艺术，主张诗歌的非诗化，从而成为一代反叛诗人。这一期间，上述三位作家分别发表了诗集《开枪的自由》、《映在天上的人影》和《种植园》。

超现实主义新潮流试图把辨证唯物主义融入诗歌创作，Ch. 卢卡、D. 特洛斯特于 1945 年发表了《辩证法的辨证》，表白他们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G. 诺木和 V. 蒂奥多雷斯库批驳了旧的先锋派，要求对梦幻派诗歌进行革新，把布加勒斯特变成超现实主义的国际中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急剧兴起，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继而大部分超现实主义诗人接受了新的创作手法。

1944 年后的三年中，老一代有名望的诗人仍受到重视。1946 年举行了阿尔盖茨文学创作 50 周年庆祝会，向他颁发了国家诗歌奖，次年他又出版了《诗歌 101 首》。巴尔布也在友人之中组织文学社，开展活动。当时，尽管文艺当局已经准备清理“旧文人”和“旧文学”，但文坛的总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的。可是自 1948 年起，由于文艺界全面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之“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出台，文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文坛气氛骤然变得严峻了。一些老诗人受到批判压制，不准写作和出版作品，更有一些“历史不甚清白”的文人被投入监牢。1948 年，布拉加失掉他在克卢日大学的文化哲学教授位置。同年，二流记者 S. 托马在罗共机关报《火花报》上抛出题为《腐烂的诗歌或诗歌的腐烂》文章，指责阿尔盖茨陷入“腐朽资产阶级的思想泥潭”。一年前还是诗苑主将的阿尔盖茨被逐出文坛。巴尔布也退出诗歌园地，潜心研究数学。老一代诗人遭到清理，被迫沉默了十年左右。这对经受了各种磨难，终于迎来新时代的一批进步文人来说，不能不是一场劫难，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曾经繁盛的诗苑出现了革命诗歌一花独放的局面，战前的其他流派销声灭迹了。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诗歌最能体现时代的脉搏，及时表达民众的心声。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工人作家内库卢察通过他的

革命诗歌为无产者呼唤正义。两次世界大战间，帕拉斯基维斯库、蒂奥多雷斯库等左翼诗人的作品中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1944 年后，以反法西斯胜利、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旋律的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歌颂英雄的新诗大量出现和传播，形成一股压倒一切的主流。一些成功的作品再现了工农光辉形象，反映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期望和感情，起到了鼓动人民、教育民众的作用。但是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后果深远的偏差。

1948 年至 50 年代末是罗马尼亚诗歌“叙事化”、“史诗化”阶段。这是指用韵文体叙述英雄事迹和重大的社会变革，民谣诗、英雄传奇诗和史诗把具有优良传统的抒情诗，诸如爱情诗、景物诗、哲理诗等，完全逐出诗歌园地。D. 德什里乌(Dan Deşliu, 1927—1992)的作品最为典型，用民谣体写成的英雄颂歌《卢斯卡的拉泽尔》(*Lazăr de la Rusca*)和《马拉穆雷什的矿工》均获当时的文学奖。尽管这两部长诗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和热烈的鼓动性，但观念化的构思、虚假的情节和口号式的诗句只能使它们名噪一时，此后就渐渐被人们忘记了。对那个时代的过错，德什里乌于 60 年代曾在作协做过诚恳检讨，声明在以后的岁月里要把正直和真理作为处世和创作的准则。他信守诺言，直至辞世。

这一阶段的诗坛主将是 M. 贝纽克(Mihai Beniuc, 1907—1988)。他曾就读克卢日大学哲学系，后到汉堡主修动物心理学。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为杂志撰稿。30 年代参加革命活动，出版了谴责法西斯战争、呼唤新时代的诗集《灾难之歌》(*Cântece de pierzanie*)、《新诗》、《陷落的城市》。战后曾任克卢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1946 年推出新作《等待日出的人》(*Un om aşteaptă răsăritul*)。同年，出任罗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两年后回国，活动在当时的文学界，发表了《诗选》、《旗帜》、《向前，共产党人》、《党教导我》等。与前期作品相比，这些诗歌显得拘泥、平淡，没有突出的特色。为了反映历史巨变和歌颂人民革命后的新生活，他极力调整自己的琴弦，放弃了年轻时期狂放、抗争、无所顾及

的风格。遵循特定的创作模式,他加入并且指挥了适合新时期需要的诗歌大联唱。他的这类诗歌通俗、明快,号召力强,但在艺术方面过于简单化。例如,他把艺术概括为:

当你抡起板斧,
劈开石崖,
就会有一股清泉喷涌而出,
年轻人,这就是艺术!

在题材方面,颂诗、颂歌过多过滥。为了紧跟形势,突出政治标准和教育功能,许多政治口号变成了诗句。至于意境的雷同和平庸,更是一大弊病。党经常被比喻为解救人民的"大道"、跨越险阻的"大桥"、茫茫黑夜中的"灯光"、打击敌人的"利剑"、迷途中的"指针和向导"、关怀人民的"父亲"。但是,这一阶段也不乏优秀之作,《路边的苹果树》就很有代表性。祖国不是概念化的祖国,他写道:

我是路边一株不设围栏的苹果树,
火红的果实在绿叶丛中闪现。
过路的行人啊,请你随意摘取,
不必担心有人把你阻拦。
假如你想致谢,
你就感谢我植根的大地。
她是抚养我们的祖国,
她用乳汁把你、我哺育。

由于他属于战前左翼作家,战后又迅速吸收了新的文艺理论并付诸实践,所以他在当时的文坛占有特殊地位,1949 至 1965 年连续担任作家协会书记、第一书记和主席的职务。主持作协工作期间他功过兼有,主要过失表现在不顾国情,按照苏联模式强制推

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也伤害了一批作家。1965 年后,他到大学任教,但仍孜孜不倦从事创作。这位“新时代的鼓手”和“乐观的革命者”,1944 年后共发表了 32 本诗集、3 部小说、两部剧作及其他一些作品,内容涉及战后罗马尼亚经历的各个重要阶段。除后期的部分诗歌外,他的作品一直以歌颂进步为主调,保持了火热的革命气息,这在他的同代人中是比较罕见的。

同属战前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 E. 热贝利亚努(Eugen Jebeleanu, 1911—)沿着另一条轨迹发展。他生于职员家庭,读中学时就开始创作和发表诗歌。在布加勒斯特攻读法律时,一边学习一边为报刊供稿,大学毕业后继续为当时的反法西斯刊物撰写文章。他在新闻界很活跃,积极保卫正义事业,为罗马尼亚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生存同右翼极端势力抗争。1937 年,小说家萨多维亚努被列入黑名单时,他站在保卫进步文学的立场,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抗议》。1944 年后曾任《农民阵线》、《罗马尼亚生活》等刊物的编辑、作家协会领导成员、科学院院士。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 1929 年,但是他的成名之作则是 1930 年发表的《刀剑下的心》(*Inimi sub săbii*)。这部诗集充满了时代感和激情,表达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抗议情绪,也是他参与精神的初步表露。1944 年,反法西斯诗集《不能忘记》(*Ceea ce nu se uită*)问世,他的诗再一次同被伤害的世界连在一起,与之共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盛行的那个年代,他也顺应形势按照特定模式写了一些作品,如《和平盾牌》、《和平与战斗诗》、《在萨希亚的故乡》等,但这些诗集有违他的诗品和人品,在他艺术成就的天平上只占微小的分量。对他来讲,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回顾人类经历的重大劫难,有义务通过诗歌表达民众的心声。当时,反帝反战是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题材,这既顺应民心又不受太多的模式限制,更适合他多年来倾向揭示人类苦难和遭遇的创作特点,因此他把美军在日本的原子屠杀作为素材,创作了长诗《广岛的微笑》(*Surâsul Hiroşimei*)。该诗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热烈欢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一些和平组织也把它视为反战宣

言。《广岛的微笑》这部大型交响诗通过凝练的诗句、幻迷的意境、撼人肺腑的比喻再现了原子浩劫的悲惨景象。大地化为一片火海，整个空间形成一口大棺木，河水奔涌，大海咆哮，城镇死寂。突然，随着节律的急骤转折，多音部的生物、山川的悲吼和抗议此起彼伏，构成了悲壮的主旋律。进入尾声时，希望压倒了死亡，给人以光明。从《哀歌献给凋零的花》(*Elegii pentru floarea secerată*)到《汉尼拔》(*Hanibal*)问世，他的诗歌转入内向化，围绕自身的遭遇，尤其是妻子死后给他造成的痛苦，他开始探讨时间、死亡、孤寂等题材。但是他没有沉浸在永久的回忆和求索中，从《汉尼拔》中第二组诗歌《公民寓言》起，这位严厉孤独的歌手用清醒冷漠的目光注视人生，对社会上各种丑恶予以猛烈抨击，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由衷义愤。他在《自然》这首诗中写道：

很清楚，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幸福，
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
可有些人向往过上舒服日子，
出门乘坐豪华轿车，
完全为了个人的私利。
……
既然一切都显得这么自然，
我还有什么必要再写诗？

这类诗歌短小精悍，不注重过多修饰，矛头直指普通百姓欲言又止的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汉尼拔》是这一阶段的一篇精品。历史上不可一世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曾数次战胜罗马军队，后来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半岛。但这位气势汹汹的常胜将军最终还是一个失败者。作者借古讽今，揭示了一条真理：权力征服不了民心，武力压不倒自由。从《广岛的微笑》到《汉尼拔》，以及1980年发表的《秘密武器》，诗人全面揭示了残害人类

的战争、暴政、权力欲、饥饿、贫穷、贪婪、嫉妒等社会毒瘤。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他的许多诗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硫酸刻在木板上。诗人的这种品格难能可贵。

女诗人 M.巴努什(Maria Banuş, 1914—)1944 年后立即投身革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时代发表了《喜悦》、《大地》、《美国,我对你说》、《显现的世界》、《天堂入口》、《洪流》等诗集,表达了她对新社会的由衷支持。但是,创作新诗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她的诗一向以秀丽清新著称,得到批评界好评的第一本诗集《女儿国》(*Ţara fetelor*)充满了少女的纯真无邪。诗歌的内向化、抒情化是她的创作特点,这与高亢的革命诗不相协调。为此,1951 至 1952 年间她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67 年是她诗歌创作的另一个转折点,《刚刚退出竞技场》、《法尤姆的肖像》、《人与物》、《纯净的 11 月》等诗集说明作者已回归自我,作品在揭示情感这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更细腻、更深邃、更真实。前后对比,50 年代发表的作品就显得有些拘泥,内在的真诚似乎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M.R.帕拉斯基维斯库(Miron Radu Paraschivescu, 1911—1971)是另一种类型的新诗歌的代表。他 30 年代同先锋派和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为左翼报刊撰稿。二战期间,他以《回声》报为基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41 年出版《吉卜赛歌谣》(*Cântice ţigăneşti*),暗含对法西斯的抗议。1944 年后投身各种社会活动,出任《文学报》主编,陆续发表了《歌颂罗马尼亚》、《颂歌》、《热烈声明》等。这些诗作同他的报告文学、回忆录和散文一样,没有过多的修饰,语言力求平淡通俗,但却具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强烈的鼓动性和革命气势。对于战后罗马尼亚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他是完全地投入,不懈讴歌。《悲哀》是他的晚期作品,透过这本诗集可以发现他想摆脱动荡的现实,平静地对一些往事进行反思。

50 年代后期兴起的诗歌革新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反动,因诗歌创作的僵化模式而普遍感到不满的作家们以抒情诗的

回归作为突破口,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讨、争论和尝试。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来自多方面的阻力,不无风险,因此它的演化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因时因人而异。概括地说,促使革新健康发展的有三股力量,即重返诗坛的老诗人、战前成长起来的反叛作家和50年代的部分年轻人。

老诗人T.阿尔盖茨(1880—1967)于1948年受到批判,被无限期停止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对年近七十高龄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不致断送终生从事的文学生涯,惟一的办法是适应新环境,使自己的作品既符合文学大方向,又可保持个人的艺术风格。他拥护新制度,却又不能像有些诗人那样紧跟形势。为此,他首先选定了历史上的1907年农民大起义作为创作题材,这符合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剥削者和权贵人物怀有的由衷憎恶。组诗《1907—小景》(*1907-Peizaje*)问世后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电台、报刊争相介绍。的确,这是一篇成功的上乘之作,是一幅再现农民斗争的历史画卷。组诗共含40首,集叙事、抒情为一体。开篇诗对农民大起义的时间、地点做过介绍后,立即通过不同画面对农民、工匠的奴隶境地和官府、豪绅的残酷无情做了描述。有压迫就有反抗。为了后代的生存,为了替父辈复仇,农民手持铁叉和棍棒造反了。"冲上去!咬死他,烧死他!""捉住这个二地主,像削辣根一样把他削成碎片!"积郁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不可遏制。起义遭到武装镇压,景象是悲惨的,但它却含有一丝希望。

死难兄弟静静卧在村子里,但他们的眼中
依旧残留一线微弱的光,仿佛一种声音。

《人的颂歌》(*Cântare omului*)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新文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成功原因是从辨证角度用诗的形象语言描绘了人类从蒙昧时期到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演化过程,突出了人在宇宙和历史中的地位。它内涵深邃,30首相对独立的诗歌从不同方面

和各种角度勾勒了人的形象，尤其是对人类制造工具的智能描写得生动入微。但从整体来看，诗的气氛有些凝滞，某些段落强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难免有牵强之嫌。此后，老诗人开始了第二个创作青春，连续发表了《杂咏》、《诗集》、《叶》、《新诗》、《韵律》、《节奏》、《你的叶片》、《树枝》等集子。上述作品大多摆脱了政治和宣传内容，诗人的艺术风格得以恢复和发展，作品显得自然、明快、活泼多了。鉴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1967 年逝世时政府为这位科学院院士、作协名誉主席、国家文学奖获得者举行了国葬。

在罗马尼亚文学发展史上以《光明诗》享誉文坛的哲理诗人 L. 布拉加(1895—1961)于 1948 年被调离大学课堂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他的全部诗作也被归入禁书之列，直至 1959 年开禁后，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才真正领略到他的诗歌的魅力。这一期间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分为四组，即：《1940—1944 铁的年龄》、《火之歌》、《载着灰烬的航船》、《独角兽所闻》。这些诗稿于 1961 年作者逝世后收入集子中正式出版。其中的部分诗篇，如《神奇的种子》等比较有名。他的作品，尤其是战前的诗歌，对这一阶段诗坛出现的革新浪潮起了促进作用。

象征派诗人 G. 巴科维亚(1881—1957)不仅是秋雨、孤寂、忧思诗人，也是旧制度的反抗者，这在他解放前发表的《工人小夜曲》中有所反映。他认为应该痛斥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纪”，作为一个孤独的诗人，只能通过诗歌表达他的愤怒。他写道：

我全身的神经都要爆裂……
噢，来吧，伟大的时代。

为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1944 年终于迎来了解放。他在《我思》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的：

所有的预言

政治预言
均已实现。
我感到幸福。

他的主要作品《铅》、《黄色的火花》等都是战前发表的,解放后只出版了《资产者组诗》。此后,大约中断了十年时间,他的作品才允许出版,促进了50年代诗歌的革新。

A.菲利皮德(1900—1979)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年代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也没有出版诗集。可能是为了避嫌,也可能是不愿赶时髦、追潮流,他躲在书房中潜心翻译世界名家的作品。1962年和1965年文坛气氛好转时,他的前期作品曾经选编再版。1967年推出诗集《巴比伦独白》(*Monolog în Babilon*),1979年发表《梦想与追求》。他善于描写梦幻的境界,让读者寻求梦的真谛。梦幻是第二生活,是现实生活的补充。他曾说:"我接受我得以生存的这个时代,就像树木接受它植根的土地,但是我的想像却飞往另外的时代。"他总是在寻求,不停地寻求,直至去世。

老一代中,以创作隐秘诗著称的I.巴尔布(1895—1961)于1944年后基本没有发表作品,但他对诗歌园地的影响却一直存在。V.沃伊库列斯库(1884—1963)于1958年被捕入狱前曾创作《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Ultimele sonete închipuite ale lui Shakespeare*),即在莎翁的154首之后续写90首。这些诗格言性强,摆脱了时间和历史的限制,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遗憾的是这部手稿在作者去世后的1964年才得以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步入文坛的诗人,例如A.St.多依纳什和I.杜米特雷斯库,50年代期间基本保持沉默。多依纳什(Augustin Ştefan Doinaş, 1922—)曾是锡比乌文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倡导民谣体诗歌的兴起,1945年创作的《生着银牙的野猪》(*Mistreţul cu colţi de argint*)于60年代收入诗集《持罗盘者》中。这首诗通过一个民间传说,成功地塑造了为理想而奋斗、为理想而献身的坚韧不

拔的人物形象。他后来发表了许多诗集,如《拉奥孔的后裔》、《第二个我》、《纸莎草》等,诗中经常采用雕塑式的诗的象征,用实体表达抽象概念,诸如"肉的果实"是"接吻"的同义语,"洁白的神庙"是女人的象征。他善于控制情感,有时近乎冷漠。对他来说,诗歌创作似乎是一种艺术鉴赏。以反叛诗人知名的杜米特雷斯库(Geo Dumitrescu 1920—)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如果说他在《开枪的自由》(*Libertatea de a trage cu puşca*)中是向传统诗歌宣战,在《肖像》中把大脑比为一台"具体的仪器",心脏是"火柴头大小的斑点",两只眼睛如"问号",思想是"一堆肮脏的衣裳",那么他在后来的诗歌中则把抨击的范围扩展到政治、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讽刺揶揄仍是那么尖刻,比喻之奇特随处可见。他的坦荡无私的胸怀尤其可敬,在《瞧着我的眼睛》中他这样写道:

不要把桂冠加在我的头上…
当我的目光燃起怒火,疑问的锋芒
变得咄咄逼人时,你再把我奖赏。

60年代起他重新发表作品,其中有《抒情冒险》、《军旅记事》、《诗选》等。这一代中有些诗人的境遇比较坎坷,I.卡拉扬(Ion Caraion, 1923—1986)就是一例。1947年,在反对"没落文学"的斗争中逐渐加强对文坛的控制,出现了文学走向封闭和僵化的迹象。为了扩大文学视野,维护作家的创作个性,I.卡拉扬和V.叶隆卡在布加勒斯特创办了《政治集会广场》,就创作问题向国内外名家约稿。该刊仅出一期就被查封。为此,1950年卡拉扬被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两次坐牢。但他1964年第二次获释后,仍能以极大热情投入创作,连续发表作品,其中有《漫笔》(*Eseu*)、《不属于任何人的清晨》、《窗子中的陌生人》、《星辰上的坟地》等,表达了孤寂、恐惧、抗争的情绪。

战后十余年的文学环境也造就了一代新人,通常称之为50年

代诗人，其中有A.E.巴康斯基、A.安德里措尤、I.布拉德、V.波隆巴库、N.卡西安、I.霍里亚、I.格奥尔基、A.勒乌、T.吴丹等。他们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前期作品都带有那个阶段的烙印。但是自50年代中期起，随着政治和文艺气候的改变，他们的创作朝着不同方向演化。这批诗人作为新生力量，也对诗歌的革新起了促进作用。

50年代中期，以巴康斯基、勒乌等为主体的克卢日市文学杂志《星》所倡导的文学方向在青年作家群中是有代表性的，它为空气凝滞的诗坛吹来一丝清新的风。针对逐渐模式化的革命诗、社会诗、英雄叙事诗给诗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公开提出了抒情诗的回归问题。1956年，在罗马尼亚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巴康斯基批评模拟型诗歌时说："我认为在虚假的现实主义庇护下，用平淡无奇的手法把日常事务韵文化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它将使文学，"尤其是诗歌，逐步退化"。1957年，他在《抒情诗与时代性》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诗歌首先是抒情的，在认识和艺术表现的过程中它与主体因素密切相关，而且情感占主要地位。此外，他对诗歌语言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诗歌语言的双重性格"或"诗歌语言的二分性"。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由于诗人匠心独具，可以赋予普通词语新的功用和内涵，在新旧参照系的强烈反差中加强诗歌的表现力。同时，他还指出现代诗歌语言力求简洁、不重修饰、逐步贴近共同语的倾向。巴康斯基(Anatol E Baconsky，1925—1977)不是文艺理论家，他的观点不可能十分全面、十分透彻，但是针对性却很强，表达了大部分诗人想要说的话。作为诗人，他的前期作品，例如《诗集》、《阿里耶什河谷的孩子们》、《白昼之歌，黑夜之歌》等，都是迎合形势按照特定模式创作的，革命内容有余，艺术水平值得商榷。1957年后，他的创作发生了转折，基本放弃叙事、情节冲突等手法，采用情寓于景、以景抒情的技巧，创作了许多作品，例如《冬天的那边》、《记忆的潮流》、《黎明颂歌》(*Imn către zorii de zi*)、《败子》等。

在这次革新浪潮中，贡献突出的是青年诗人N.拉比什(Nicolae Labiş, 1935—1956)。他生于乡村教师家庭，15岁时开始写诗。1951年，在罗马尼亚语言文学全国比赛中获一等奖，引起《罗马尼亚生活》杂志编辑们的注意，并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街头报刊》。1952年去布加勒斯特就读于埃米内斯库文学与文学批评专科学校，两年后毕业。由于思想活跃、才能突出，1954年任《当代》周刊和《文学报》编辑。1956年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发表长诗《小鹿之死》和诗集《初恋》(*Primele iubiri*)，并准备出版下一部诗集，却不幸因车祸身亡，时年21岁。其他作品，如《与惰性斗争》(*Lupta cu inerţia*)、《被杀害的信天翁》、《青铜时代》、《我是深沉的灵魂》等，都是作者死后手稿经别人整理出版的。拉比什的诗歌同他的人品一样，坦诚真实，不追时尚，不求虚荣，不随大流。尽管当时他很年轻，但已深察社会上和文学界暴露出的一些弊病。他在《惊悸》中写道：

> 可能我朦胧中做了噩梦，
> ……
> 满天星斗
> 把冰冷的毒汁滴到我的脸上。

对此，他主张批判和斗争，因而在《无产阶级人性偶记》中又写道：

> 我了解你们了解的一切，
> 我相信你们相信的事情。
> 但是，这里应该少一些浅薄的狂热，
> 少一些某种屈从。

他不回避现实题材，歌颂祖国、歌颂新社会、歌颂领袖都是他

的创作题目，可他不屑模仿别人用滥了的套路，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用新的表现手法做这些题目。从古至今，“爱”一直是诗歌颂扬的对象。但在那个历史时期，诗中“爱”的形象被扭曲了。

我们的爱浸在毒汁里，
已经泡得鼓胀变质。
……
许久以来，我们把各种爱
只是视作供人欣赏的装饰。

拉比什对新社会的爱有别于口号式的爱，他的爱是“彩虹”，是“闪光的溪流”，是“林涛回荡的森林”，是“挂满果实的葡萄园”。在这充满爱的气氛中，最后他也化为了一首歌。又如，对领袖人物的描写通常都是慎而又慎，不敢有稍许差错，而拉比什为了使领袖形象跃然纸上，竟能从另一个视角勾勒出他们的伟大之处。

马克思，我现在想起了你。
你背上驮着孩子，哄他戏耍，可是此刻
你的脑海里却思潮如涌，
告诉世人哪里是无底深渊，哪里有光明。

《小鹿之死》(*Moartea căprioarei*)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少年时代跟随父亲捕猎小鹿时的复杂心理。猎物是父子俩的共同追求，但是这种追求曲折跌荡，捕捉、宰杀、烹调小鹿的过程不断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冲击。诗歌的内心化、感情化十分突出，与当时的概念化诗歌形成强烈的反差。创作这首诗歌时他才 19 岁。他纯真无邪，不带偏见，所以他对现实总能有另一番感受，纯而又纯的感受。正是这种深层次的东西使他的诗歌得以脱俗，得以创新，成为 60 年代诗人的楷模。

进入 60 年代，罗马尼亚诗歌几经摸索，从新认识了自身的价值，逐步恢复了抒情诗，与传统接轨。各种年龄和层次的诗人都比较活跃，出现了评论家们经常提到的“诗歌爆炸”时期。首先是题材大大拓宽，突破了革命型、宣传型、歌颂型诗歌的限定范围。诗人们不再是受命写诗或限题写诗，而是在大至宇宙小则心灵的各个层面漫步，有感而发。时间和空间、绝对和永恒、历史和社会、命运和迷茫、道义和责任、生与死，乃至人类的各种细微感情，都在诗人的笔下得到反映。诗歌的意境、语言和表现手法日趋丰富。社会诗承继阿尔盖茨、热贝利亚努的主脉，在安德里措尤、霍里亚、布拉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延续。而 60 年代诗人 N.斯特内斯库、C.巴尔塔格、I.格奥尔基、I.亚历山德鲁、A.波乌内斯库、C.布泽亚等人的爱国抒情诗则各有特色，他们经常把社会、政治和历史事件作为自白或反思材料，从不同角度透视人类面临的问题。通过平淡无奇的题材，运用幽默、讽刺、怪诞手法表达深奥含义，是 40 年代中期杜米特雷斯库、托内加鲁等人的诗歌特点。60 年代，这类诗歌在 M.索雷斯库、M.伊沃内斯库等人的精心培育下，得到新的发展。隐晦和象征是当代诗歌的另一种倾向，这类作品追求形象的概念化，而诗的语言则是高度抽象化的一系列符号。象征包容着深层含义。N.斯特内斯库和其他一些诗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表现主义诗歌虽然经常取材于古老的乡土神话、民俗和历史，但却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感，因为诗人的意图是通过此类作品实现人与自然的对话。单线条勾勒、变形、形象的堆砌、自然的活化等都是表现主义诗歌经常采用的艺术技巧。I.亚历山德鲁等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

N.斯特内斯库(Nichita Stănescu, 1933—1983)是近 30 年来最受推崇的诗人，罗马尼亚的所有评论家几乎都围绕他的作品发表过文章或专著，称他是继埃米内斯库、阿尔盖茨之后又一个“开创时代”的诗人。他生于普洛耶什蒂，幼时喜欢音乐。1944 年读完小学，曾获品学兼优一等奖。1944 至 1948 年读初中时对文学产生浓

厚兴趣，阅读了大量书籍，同时开始写诗，诗歌的音乐性吸引着他。1948年升入高中，此时的斯特内斯库虽然仍然热爱文学和诗歌，但却遵照父母之命选择了理科班。他生性诙谐但又比较腼腆，听课听得厌倦时总是悄悄构思诗歌，课间向同学们背诵。1952年他本该报考工学院，可他却考了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这件事使他的父母大失所望。入学后，斯特内斯库学习之余创作了诙谐的隐语诗，这些诗歌与当时的文学模式大相径庭，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只能在同学和老师之间流传。1956年他结识倡导诗歌革新的年轻诗人拉比什和抽象派画家楚尔库列斯库，这对他后来的现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57年他在《论坛》和《文学报》上首次发表了社会抒情诗《许多人》、《土地》等，此后不久他的爱情诗《清晨别离》、《二人游戏》等也相继问世，但这些诗歌却被评论界斥为现代主义的复活。对此，斯特内斯库不加理睬，执意走自己的文学道路。1957年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文学报》诗歌组任编辑。当时，布加勒斯特的这家文学刊物与克卢日的《星》有某种默契，南北呼应共同推动新潮流。斯特内斯库和编辑部的同事们，其中有维里亚、迪米西亚努等，思想都很活跃。他们自称"秘密的现代派"，午后和晚上经常聚到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的各种问题。他们要求革新诗歌，但并不蔑视和否定过去的一切，而是要求继承战前的优良传统，力争与世界诗歌保持同步。196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爱的含义》(*Sensul iubirii*)，这部集子再现了童年生活和战前岁月的某些片段。但是从《情感的形象》(*O viziune a sentimentelor*)开始，诗人突然显示了自己特有的诗的性格。这一阶段，他的诗歌充满新鲜感，表达的感知热情奔放，掷地有声。对于诗人来说，情感不是抽象的，不是生活体验的简单表白。情感可以幻化为有形物质，可以奔跑，可以运动，可以构成感人的故事。同样，物质的东西也可以非物质化。在异乎寻常的诗歌空间里，自然界的各种规律已经失去效用，支配诗歌意境的是另外的法则。斯特内斯库就是在充分发掘这些微妙法则的基础上，为他的诗歌找到了另外的万有

引力。这样,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在他的笔下重新组合,形成一幅幅奇特的画面。情感的交流有如

我站在时间的一端,
你站在另一端,
仿佛是尖底陶瓮的两只提环。
只有飞翔着的词句
来往于你我之间。

无形的词句在情感的作用下"卷起了隐约的旋涡",跳荡的话语有如雄狮"把野草踏弯",而热恋中的情人则是"两首不同的歌互相碰撞,互相协调",热恋的幸福

比我自己还强烈,比我的骨骼,
你曾拥抱得咯咯作响的骨骼,还要坚硬。
它,永远带着苦味,却又那么甜。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哀歌 11 首》、《垂直的红色》、《蛋与球体》、《托勒密颂》、《非词语》(*Necuvintele*)等,围绕"自我"和"语词"这两个概念全面展示他诗歌意境的空间,侧重抽象思维,杂乱的语句乃至数字和字母都可以在新的凝聚力作用下构成诗歌,因为他认为"词语是物质结构的影子"。1970 年后,他又发表了《甜蜜的古典风格》、《冷的威严》、《诗的状态》、《结绳与记事》等诗集。这一阶段的诗歌气质比较凝重,以往的热情和奔放完全消失了。沉重的现实吞没了梦幻和甜蜜,欣慰变成了忧虑。诗中的景物不再像天使那样飘浮飞升,而是沉重得令人窒息。《结绳和记事》更加突出了诗人的孤寂、焦虑和恐惧死亡的感情。

M.索雷斯库(Marin Sorescu, 1936—1997)的诗歌贵在一个"奇"字和一个"俗"字,奇特的意境和通俗的语言使他的作品独具

特色，在脍炙人口的幽默讽刺氛围中让人读来另有一番品味。他生于多尔日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5 年考入雅西大学语文系，1960 年毕业。大学期间他开始创作诗歌，1957 年首次发表作品。1962 年后在《金星》等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编辑和主编。自 1964 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多种诗集，其中有《独立于诗人行列》(*Singur printre poeți*)、《时钟之死》(*Moartea ceasului*)、《吉珂德先生的年轻时代》、《咳嗽》、《这样》、《利里耶奇公墓》、《符咒集》、《云》、《海中的井》等。关于他的诗歌评论很多，有人认为他是反神秘主义的现代抒情诗的代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作品倾向于大众哲理诗。但是有一点是众所公认的，即他的作品意境新颖，形式灵活，语言诙谐，寓意深刻，是罗马尼亚当代诗歌中的一个新的流派。在他的笔下，任何极其平凡的事物，任何与传统诗歌毫不相干的东西，都能构成诗的形象和比喻的依托，因为他认为诗意并非物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感情的流露。例如，绘画用的丁字尺能够通过诗的渲染，变成教条主义的象征，于是

你可以用它
顺利地阅读文学作品。

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利用丁字尺，
你会发现声音、景物、心灵
都超过了限度。
听人说话时要用丁字尺，
观赏节目带上丁字尺。
假如你的胸前
没有挂着丁字尺，
千万不要谈恋爱，

不要太幼稚。

同样，对着空椅子说话也可以表达诗人的孤寂感情，于是他

每天晚上
都从邻居家里
把闲置的椅子收拢来，
给它们读诗。

A.布兰迪亚纳（Ana Blandiana，1942— ）生于蒂米什瓦拉市，1967年从克卢日大学语文系毕业后曾任《大学生生活》和《阶梯教室》的编辑，以后又在作家协会和高等院校工作。她的文学尝试始于1959年，为《论坛》、《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等刊物撰稿。196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复数第一人称》（*Persoana întâia plural*），表现了60年代诗人初登文坛时所特有的纯真和成熟。《脆弱的足跟》和《第三种秘密》（*A treia taină*）是她的成名之作，在这两部集子里诗人用细腻的笔触揭示了她对纯真的追求以及追求纯真时与堕落的时尚发生的冲突。她

在这块
时阴时晴的土地上，
一直寻找
恶的开端。
……
可是，没有发现恶的边缘
恶就停止了，
没等弄清善的源头，
恶又洒向人间。

在后来的许多作品中，如《诗歌 50 首》、《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睡眠中的睡眠》、《蟋蟀的眼睛》、《沙漏》等，她继续探讨纯真、堕落、爱情、死亡等永恒主题，但诗歌的气氛充满静观、思索、惊悸和忧虑，不似前期作品那样明朗向上。

即使是瞬间，我也不敢闭上眼睛，
惟恐
世界被眼睑剪断。
……
茫然四顾，
我十分怜惜这
不设防的世界，
它将在我闭上的眼睛中泯灭。

她的诗作是一个整体，每首诗都反映了她在特定时期的心声。细腻的感情、优美的意境、精练的语言透过一首首小诗散发出淡淡清香，体现了女性诗歌的美。但是有些时候，尤其是命运同现实发生激烈冲突时，她的诗也会失去以往的平静节奏，变得异常苛刻严厉。例如，勾勒社会景象的《一切》几乎就是 45 个单词或词组的简单罗列。这 45 个单词或词组代表着一些典型事物，任何人都能以此拼凑出罗马尼亚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停滞、物资匮乏、政治狂热、个人崇拜的社会图景。

60 年代诗人中，亚历山德鲁和波乌内斯库也颇有影响。I. 亚历山德鲁(Ioan Alexandru, 1941—)的诗歌明丽清秀，在寻求感情的理想境界时努力探索生活的哲理。就其发展轨迹来讲，他是从充满田园气息的传统主义逐步向表现主义演化的，前期作品有《怎么对您说》、《暂时的生活》、《荒漠的关卡》。1970 年后，他又转向颂体诗，成为诗歌园地突出的颂诗创作者，连续发表了《愉快颂》、《特兰西瓦尼亚颂》、《摩尔多瓦颂》、《罗马尼亚公国颂》、《爱的颂歌》

等。A.波乌内斯库(Adrian Păunescu, 1943—)是诗坛的活跃分子。他1968年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曾任《罗马尼亚文学》副主编、《金星》副主编和《火焰》主编。他的作品很多,其中有《超感情》、《梦游的井》、《一秒钟的历史》、《今日以前的诗》、《关于大地健康的宣言》、《炮车上相爱》、《关于三十世纪的宣言》等。发掘一秒钟里的永恒,聆听历史事件的心声——这是诗人的一个愿望。他爱冒风险,喜欢用尖刻的语言鞭挞社会时弊。对于自己,他经常毫无保留地向读者揭示隐蔽的心态,尽管他有时不招人喜欢。他主张诗歌应该赶到历史的前面去,向历史挑战。这样,勇于承担风险的诗人才能充分揭示埋在内心的感情。同时,他也是一位歌颂祖国、歌颂新事物的热情歌手。这类诗同50年代的革命诗相比,在手法和技巧上都有革新。但是,为了迎合形势和某些庆典的需要,他也写了一些内容空泛、赞词连篇的颂歌,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60至70年代,活跃文坛的诗人还有L.迪莫夫、G.哈久、I.莫兰乔尤、C.伊沃内斯库、M.迪内斯库等多人。

8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开始抬头。这一流派尽管总的趋势是一致的,但具体到每个诗人,个性特色则有所差异。有人强调诗歌的沟通性和传记性,有人侧重抽象、隐晦和无人称。这些作品通常排斥诗歌的高雅品格,语言上突出通俗化和口语化。代表人物有M.科尔特雷斯库、I.斯特拉丹、N.达尼洛夫等。

2. 小说

罗马尼亚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某些西方国家走过的近百年的路,在作家基本队伍的构成、题材开拓的广度和深度、创作技巧的继承和借鉴、小说流派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价值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可以说这一代作家为罗马尼亚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 年 8 月 23 日后，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文学也被急剧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无论是对文学本身还是对作家队伍，都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和震撼。文学需要转轨，作家面临严峻的抉择和适应问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小说家，除雷布里亚努于 1944 年逝世外，均跨入了社会主义年代，大多继续从事写作。这批作家在法西斯猖獗的日子里，一直坚持民主进步立场，为反对黑暗势力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艺观点和创作手法也符合新制度的需要。战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及相关文学在罗马尼亚根基不深，多布罗加努—盖利亚和萨希亚是这方面的理论家和小说家，可他们的作品影响面相当窄，几乎被文学界所忽视。至于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这批作家来说更是陌生。且不说文学的党性、阶级性、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就是题材也有特定的范围，只限于战前地下斗争、"8·23"武装起义、民主改革、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和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等。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作家们都得一切从头做起，以便顺应形势需要。首先文艺观念必须革命化，然后还得摸索能够表现新题材的创作手法。如何把艺术个性和政治标准完满结合起来，是每一位作家面临的课题。缺乏思想准备和缺乏生活体验是两大难题，再加上没有正确的文学批评加以引导，所以他们在这种探索和尝试中虽有成功之处，但更多的却是痛苦的教训。

就时间分野来讲，1944 年 8 月至 1947 年底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战前的文艺思潮和流派仍能有所表露，I.M.萨多维亚努发表了《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P.杜米特鲁和 M.普雷达分别出版了《尤丽迪丝》和《大地相遇》，但由于局势的动荡，这些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此时，以革命面目出现的极端倾向也开始抬头。这股潮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在实际运用上则不问青红皂白，对革命胜利前的文学艺术成果一概否定，动辄加以罪名。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老一代小说家雷布里亚努、佩

特罗维奇、布勒特斯库一沃依内什蒂等受到无端攻击，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被封存，不许同读者见面。当时把持文学阵地的大多是武断专横的新闻记者、末流作家和党的“活动分子”，他们从一开始就严重伤害了新生文学的健康发展。

摸索、适应阶段，亦可称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大致从1948年延续到1960年。在此期间，文学界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坚实基础，大批作家为形势所迫匆匆学习有关方面著作，往往不得深入消化即用以指导创作，造成了文学艺术政治化、创作手法模式化、现实生活图解化等一系列错误倾向，而当时的导向更是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把文学创作引入误区。因而，这一阶段围绕反法西斯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规定题材创作的作品大多缺乏生命力。例如，I. 克卢格鲁的《我下令开枪》和《钢与面包》、E. 卡米拉尔的《雾》和《基础》、I. 帕斯的《锁链》等，都是出版后未过几年就被人们淡忘了。这类作品的失败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有些现象值得人们深思，诸如以政治代替艺术、创作脱离生活、套用苏联模式、限定创作手法、划定文学禁区等等。尤其是有些新生事物未待沉积澄清，在深层情况和发展趋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立即配合宣传进行创作，必然导致一些肤浅作品出笼，不能真实反映现实。尽管这一阶段小说创作存在严重弊病，但是几经磨练和探索，毕竟也产生了一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其中有 Z. 斯坦库的《赤足》、M. 萨多维亚努的《马蹄铁尼古拉》、G. 克林内斯库的《可怜的约阿尼德》、M. 普雷达的《莫洛米特一家》、T. 波波维奇的《陌生人》、P. 杜米特鲁的《家庭纪事》、Cm. 佩特雷斯库的《一位杰出的人》、E. 加兰的《勃勒干大平原》、E. 巴尔布的《坑》等。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创作同战前的小说传统接了轨，作家本人能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新分析和对待他们各自熟悉的历史、农村、知识界或贫民区等各个方面的原始素材，从而他们的艺术个性得以发挥。尤其是老一辈作家，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

M.萨多维亚努(1880—1961)是老一辈中名望甚高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坚持进步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许多知识界名人一样,对法西斯战争持反对态度。1944年,他的爱子在疆场战死,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罗马尼亚全国解放后,他积极投身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突出的文学成就和社会活动,曾获金质和平奖章和列宁奖金。他在罗马尼亚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1961年逝世时,著名作家博格察在悼词中称他是"罗马尼亚文学中的斯特凡大公"。的确,他对现代文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一百多部作品。1944年前,萨多维亚努的创作风格已经定型,他的传统主义在小说界有广泛影响。他崇尚历史,崇尚大自然,对农、牧、渔、樵和小镇风情十分熟悉,对此他习惯用讲故事的语调予以徐缓的静观描绘。在他的作品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他主张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因而萨多维亚努的人物经常是从属自然融于环境的,而不侧重性格的突出,人物只是整个构图中的一小部分。他虽然也创作过《泥棚户》一类反映农民遭受奴役的小说,但感人之处仍是气氛。可是1944年后,新的文学必须有革命内容,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是创作的主旋律,在这类斗争和变革中,人应该占据首要位置。这些新的要求是萨多维亚努的创作风格所不能适应的。迫于需要,他必须重新学习,但要突然改变他自己所熟悉的创作题材、艺术风格乃至语言,并非一件易事。因而他1944年后的作品往往显得幼稚、拘谨,故事情节的安排倾向模式化,从整体上看没有完全达到战前的艺术水平。

1946年他出访苏联,回国后出版游记《万花筒》。该书从机场、旅馆、街景等若干侧面记述了他的观感,赞颂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活。由于是走马观花,且接触的方面相当窄,有些段落只是为了赞扬而赞扬,难免显得十分勉强。1948年他发表《小帕乌纳村》,这是他在新的文艺导向指引下进行的初次创作尝试。小说记述几个年轻人在分得村边土质低劣的田地后凑到一起商量,决定成立互助组。由于大家齐心协力,这个互助组很快成了荒原中的一面旗帜。

作者的意图是想通过这个故事突出农民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同时也可以发挥他自己的艺术特长，描绘河沼地区的特有风光。但是作品出版后，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只写农民的自发行为，集体劳动组织中没有干部的干预，没有党的领导。1949年萨多维亚努发表长篇小说《米特里亚·珂珂尔》(*Mitrea Cocor*)，故事一开始就从阶级角度对一户农民家庭的四个成员进行了剖析。一方是正直的父亲和二儿子杜米特鲁，绰号米特里亚·珂珂尔；另一方是生性贪婪、一心想当富农婆的主妇和他们的长子磨房主吉察。这母子俩和地主串通一气，对前来磨面的农民进行盘剥。双亲死后，兄长为了独占田产，把弟弟送到地主家当长工。接下去，故事的发展脉络基本按照特定的模式予以安排。米特里亚在地主家里挨打受气做苦工，每餐吃的是发了霉的玉米糊，多次反抗都没有成功。后来他被送上反苏战场，被俘，在俘虏营中受到教育。接触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回国后参加武装起义，在驱逐德军的战斗中负了伤。接着是复员回乡，找到受尽折磨的恋人，结婚，生子，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由于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符合当时的文艺导向，所以出版后立即得到普遍赞扬，被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楷模。但是从多视角观察，故事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映缺乏深度，有些情节概念化，政治说教多于艺术感染，平面式的人物显得呆滞。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完全失去了萨多维亚努所特有的艺术风格，所以若干年后就被批评界彻底否定了。此后，他又有几部小说陆续问世。《花之诱惑》(*Nada florilor*)以社会主义运动为背景，通过渔民生活描写了一群出没芦苇荡的穷人和对现实不满的革命分子。这部小说是在《水的王国》的基础上，用新时代的观点改写而成的。《铁喙》讲的是杜米特拉克受到富农指使，企图迫害进步农民的故事。《创业多瑙河》讲述前地下党员波波维奇工程师领导一批人在多瑙河谷创建国营农场的事。此外，这一期间他还创作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米娃拉之歌》、富于寓言色彩的《东方幻想》、爱情故事《丽莎维塔》等。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萨多维亚努在不违背现实题材的情况下，逐步恢复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小说《马蹄铁尼古拉》(*Nicoară Potcoavă*)。故事取材于16世纪下半叶伊昂大公在位时的摩尔多瓦公国。为了振兴趋于衰败的国家，伊昂大公严厉镇压了贪官污吏，动员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但是以莫维拉为首的贵族却与外敌勾结，把他杀害了。伊昂大公的异父兄弟尼古拉和亚历山德鲁在人民的支持下，奋起为兄复仇。一次，他们避难在老臣家中，同时爱上了仇敌莫维拉的女儿，由此导致了爱情悲剧。后来，他们协同哥萨克人击败土耳其操纵的大公部队。胜利后，尼古拉下令处死叛徒莫维拉及其同伙，其中也有他的生身父亲根日，但是尼古拉并不晓得往昔的实情。在那权力频繁更迭的年月里，尼古拉不久又被波兰人杀害了。这部小说的前身是《鹰的家族》，但它的文学价值却远远超出它的前身。浓重的历史色彩、独特的乡土气息、感人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使这部小说成为萨多维努最后一部十分成功的作品。

Cm.佩特雷斯库(1894—1957)也是战前已经名扬文坛的老一代作家。战后，他除发表中篇小说《付出生命的人们》和描写知识分子问题的短篇小说集《象牙塔》外，占突出地位的是多卷本小说《一位杰出的人》(*Un om între oameni*)(三卷)，共二千多页，最后一卷没有全部完成。这部小说以大量笔墨描写了1848年革命领袖博尔切斯库的生平活动，可贵的是在不失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作者用独特艺术手法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佩特雷斯库曾经提倡小说创作的自白体和日记体，严格要求原始素材的准确性。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更是一丝不苟。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研究参阅了大量资料，创作过程中正确处理了艺术中的真实与杜撰的辨证关系，从而他得以用娴熟的笔调勾勒出19世纪中叶罗马尼亚的社会面貌。农村的黑暗与赤贫是促使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佩特雷斯库从社会、经济、民俗等多种角度探索了这个问题，写得相当透彻真实，而且丰满。如果说瓦杜—勒乌村在他的笔下是

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那么布加勒斯特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在那里,冬季白雪皑皑,夏季人潮如流,秋季送来阵阵葡萄香。入夜,形形色色的市民聚在街边的芦棚下饮酒谈天,直至黎明。而那些巨贾显贵则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一场赌局可以持续几天几夜,赌资少则数千金币,多则动用家财地产,动荡的社会似乎和他们根本无关。重要历史人物的描写都以资料为基础,每个形象都刻画得细腻入微,有血有肉,言谈举止跃然纸上。人物的服饰,甚至房屋、庭院、家具等微末细节无不渗透出历史的准确性。当然,受50年代文风的影响,他对部分贵族人物也采用了脸谱化的表现手法,把他们描写得形似恶魔,而小说中的俄国人,不管其政治倾向与历史功过,一律被视为救星和朋友。又如,有些革命者的讲演过于简单化,这也是小说的一处败笔。

战后初期的历史题材小说还应该包括I.M.萨多维亚努(Ion Marin Sadoveanu, 1893—1964)的作品。这位知名的戏剧家和诗人在小说园地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Sfârşit de veac în Bucureşti*)是他的一篇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扬库出身卑微,可他雄心勃勃,不择手段搞垮了他的主人巴尔布男爵,一时间平步青云,身价百倍。而他作为旧时代的贵族,面对新兴资产者的挑战,却也一步步走向衰败。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得十分细腻,个性鲜明,尤其是心态得到充分透视。在19世纪末叶的时代气氛中,房舍、街景、室内装饰等也描写得恰到好处。《扬·申图》(*Ion Sântu*)是《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的续篇,描述了扬库的孙子的成长过程和情感经历,故事跨越20世纪初、1907年农民大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工人运动等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这部作品对社会变革的描写有些概念化,人物的心理透视也不如前者那样深厚。按作者的原来设计还有第三部,即《扬·申图的成功》,以期形成三部曲,可惜没有完成。

G.克林内斯库(1899—1965)既是文学史家,也是小说家。《欧蒂丽亚的秘密》、《罗马尼亚文学通史》使他名扬文坛。战后初期他

曾主编《人民论坛》、《世界》等刊物。从1945年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主持文学史教研室工作，1948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次年，由于"左"的文艺路线和教育方针，他被迫离开大学到文学史与民俗研究所任所长，自此他遭到一段时间的冷落。1953年他到中国访问，回国后发表了游记《我到过新中国》。1961年他的名誉得到完全恢复，被布加勒斯特大学重新聘为教授。逆境之中，他没有停止文学活动，而是选择他所熟悉的近期一段历史题材，创作了《可怜的约阿尼德》(*Bietul Ioanide*)。这部小说以二战前夕的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建筑师约阿尼德等一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对待职业、家庭、社会和法西斯恐怖所表现出的复杂混乱心理状态。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圈子，恩恩怨怨随着社会的动荡不时迸发出来。《黑色的柜橱》(*Scrinul negru*)在某种意义上是前一部小说的续篇，它除继续描写以约阿尼德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外，侧重揭示了上流社会女人卡蒂通过婚恋、遗产继承等途径对名利的追求，从而透视了解放前后处于瓦解状态的贵族阶层。上述两部小说中的某些知识界人物均以生活原型为依托。这些人进入新社会后大多力图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此类描写在作品中所占篇幅甚少，艺术也显得苍白。

可见，老一代作家由于时代的突然转变，经常是不适应或者跟不上新时期的文学要求，因而在围绕革命变革题材进行创作时难免出现失误。鉴于这种情况，萨多维亚努、佩特雷斯库、克林内斯库等都在不违背文学大方向的情况下，开始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活动进行调整，避开现实问题，转向历史题材。他们通过新的视角观察某些历史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其他一些老一代作家由于各自境况迥异，文学活动不尽相同。女作家H.帕帕达特—本杰斯库1946年70寿辰获国家小说奖后，基本停止写作。Cz.佩特雷斯库主要从事其他活动，与战前相比小说创作大大减少，能够提及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仅有《请到这里来》、《观感与反思》。R.图多兰主要创作适合青年口味的惊险小说，其

中最著名的是《扬帆》。

这一阶段，V. 沃伊库列斯库(1884—1963)的志异小说是个例外。他早年在农村行医，几乎走遍全国，接触到大量民间习俗和离奇的传闻逸事。1946年老伴去世，已经退休的沃伊库列斯库精神受到很大损伤。他沉默寡言，从62岁到70岁关在家中整理以前收集的素材，写了数百页志异小说，在那个时期并不期望出版发表。可就是这些书稿给他带来一场大祸。1958年清理作家队伍时，说他搞神秘主义，74岁被捕入狱。这批书稿一押就是十余个春秋，于1966年作者死后才与读者见面。两卷本《故事集》(*Povestiri*)的问世使当时的文坛为之一震，因为刚好前一年S. 勃努列斯库发表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男人的冬天》，批评界对这类文学的讨论方兴未艾。《故事集》中并非全是怪异故事，许多作品是作者对民间流传的一些趣闻，真实的或者虚构的，进行了巧妙艺术加工，以便引起读者兴趣。其中有笑话(《爪哇姑娘》等)、传说(《野牛头》等)、动物故事(《野兽的反叛》等)、渔猎故事(《梦中的小鹿》等)、医疗趣闻(《蛇》等)、强盗故事(《白色的魔鬼》等)。的确，书中的一些题材与蒙有神秘色彩的民间习俗和信仰有关。例如，《暴风雪》中讲述一队士兵在罗保边界巡逻时狂风骤起，密密层层的雪片铺天盖地压下来。为了保护战士，两名上司首先冻死了，但是他们的魂魄仍然忠于职守，使手下的战士们得以生还。又如，《渔民阿明》讲的是人类回归本原的故事。阿明虽是多瑙河三角洲的一个渔民，但他对鱼类却怀有本能的同情心，他那饱经风吹雨淋的皮肤似乎也罩着一层鳞片。一次，人们捕到一尾大鱼，试图把它拉到岸上来。可是阿明扑过去，与他的图腾一起没入水中。鱼群簇拥着大鱼和阿明，游向永恒的世界。对于这类题材，沃伊库列斯库十分重视情节的幻妙，只是偶尔才做一些科学性的点拨。他的讲述故事的技巧相当高超，可以同萨多维亚努相媲美。许多艺术手法源于他接触过的渔民、猎人、牧人、看林人、律师和神甫，从而保证了故事的新奇性、怪异性、趣味性和诙谐性。除上述作品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

《盲人扎赫》(*Zahei orbul*),该书于1970年出版。

报告文学承袭战前传统,在这一阶段有了新的发展,突出体现在G.博格察(Geo Bogza, 1908—1993)的创作活动中。他也属于老一代作家,战前以反法西斯战士著称。1937年他作为《罗马尼亚世界》杂志的战地特派记者赴西班牙采访,目睹了那场战争的严酷现实和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战斗精神,以此为素材创作发表了系列报道《巴斯克人民的悲剧》。1941至1944年,为抗议罗马尼亚政界右翼势力抬头,曾放弃记者行业。1945年重返新闻界后在《胜利》、《火花报》、《自由罗马尼亚》等报社工作。1948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55年担任全国保卫和平理事会理事。作为和平战士,曾出访世界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中国。自1966年起,每周在《当代周刊》上发表一篇专栏文章。1971年后逐步避开事物性活动,潜心修订再版自己的作品。报告文学是博格察的创作特长。他自脱离先锋派起,用自己的毕生才华培植了这一文学体裁。他不赞成超现实主义的纯报告文学,主张作家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汲取营养,关注自我以外的公众生活,创作出能够真实反映社会面貌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他全面突破了新闻记者式的报道,把这种体裁推到了文学作品的高度。他的《石油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石油工人的非人处境,《皮匠》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皮革工人的苦难生活。罗马尼亚西部山区历来以穷乡僻壤而闻名,那里的生活状况在《石头的国度》(*Ţara de piatră*)中得到反映。1945年问世的《奥尔特见闻》(*Cartea Oltului*)是博格察报告文学的顶峰。这是一部大型散文,全书由7组歌组成,分别表述奥尔特河沿岸的矿物、植物、伟大历史等7个层次。从表面上看,这像是一部关于奥尔特河的地理志或其他什么专著,实际上它是把现实、传说、写景、抒情与遐想融为一体的优美散文诗。奥尔特河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在一般游客眼中也许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但是博格察的观察力极强,他能看到别人想像不出的东西。一块石头、一条山溪,在他的笔下尽可引发无限遐思。抒情化、诗歌化、拟人化以及象征、夸张等手

法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本特色。《日乌河谷的人与煤》(*Oameni şi cărbuni în Valea Jiului*)在他这一阶段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赞扬矿工劳动的同时,也介绍了煤的生成和采掘过程,行文中直陈和说教用的较多。他这样做在当时或许有一定道理,一则可以通过报告文学向一些人普及科学知识,二则使这类作品具有一定的实在内容,因为当时报告文学只重宣传,内容空泛,甚至含有虚假成分。后来的作品,如《史诗的开端》、《分水岭工地》、《预报暴风雨》、《苏联经纬》等稍有逊色。由于文风影响,加之作者过多应付社会活动,无暇实地考察,所以作品中出现内容平庸、堆砌赞词等弊病。晚年,他十分注重修辞,行文气势有如他威严的仪表,绝不允许别人改动片言只字。除报告文学外,他 1949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雅科布·奥尼西亚之死》(*Sfârşitul lui Iacob Onisia*)也是一篇精品。矿工雅科布为了赶回家中过圣诞,偷偷爬上索道缆车,不幸中途停电,缆车悬在山崖上。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构想种种自救办法,最后攀拉钢缆时体力不支,从高空坠地身亡。这篇小说情节真实,人物心理描写得十分细腻,耐人回味。

1944 年后,立即从事小说创作的还有 Z.斯坦库、M.普雷达、T.波波维奇、E.巴尔布、P.杜米特鲁、L.富尔加、E.加兰等。他们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不属于老一代作家。就文学创作来讲,反法西斯胜利时他们的艺术风格还没有完全形成,或者说文学活动起步不久,对新形势基本不存在适应问题,而且新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天地,所以这批作家构成了 50 年代小说界的中坚力量。

Z.斯坦库(Zaharia Stancu, 1902—1974)是他们当中的年长者,解放初期对新小说创作起了突出促进作用。他生于特利奥尔曼县萨尔契亚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期经历了 1907 年农民大起义和 1913 年巴尔干战争后发生的瘟疫。由于家庭生活困苦,他读完小学五年级后便被父母送到附近一座小城的皮革店当学徒。1916 年罗马尼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返回家乡在一个大庄园

里当雇工。1917 年夏季他离开庄园在巴尔干半岛流浪，这一段冒险生活后来被他写进了小说《死亡的游戏》(*Jocul cu moartea*)。同年秋，他来到布加勒斯特，靠卖报为生。1918 至 1920 年他在图尔努—莫古雷尔法院当资料员期间，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他于 1920 年开始读中学，两年后又到布加勒斯特边工作边自修。1929 年出版的《简单的诗》曾获作家协会奖。1931 年考入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语文系，但不久就退学从事新闻工作，主编《今日》、《信仰》、《罗马尼亚杂志》等刊物。1943 年，由于坚持反法西斯观点被关入集中营。这段经历反映在他的回忆录《在集中营的日子里》。1944 年罗马尼亚解放后，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身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曾任作协主席、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院长、国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他主持作协期间宽厚待人，困难时刻保护了一些作家。他本人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活中硕果累累，发表了四十余部作品和数千篇文章，其中 1944 年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有《赤足》、《犬》、《苦根》、《死亡游戏》、《疯狂的树林》、《吉普赛营》、《我多么爱你》、《风与雨》等；中短篇小说有《窄而深的垄沟》、《为了生活》、《第一步》、《回忆》、《大地的花朵》、《草》、《康士坦丁娜》等；回忆录有《在集中营的日子里》、《苏联游记》、《盐是甜的》、《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理性的胜利》等。在这许多作品中，小说创作是他文学活动的主要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揭示旧时代农村贫苦落后面貌的《赤足》(*Desculţ*)。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好评，原因是这部小说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实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农村状况，为这类题材的新时期文学做了首次尝试。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主人公是农家穷孩子达里亚，背景依托多瑙河平原上的奥米达村。作家通过这个少年的见闻和经历，揭示了 1907 年农民大起义前后广大农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阶级压迫、经济剥削、饥饿和瘟疫迫使农民走上了起义之路。小说不以情节安排和性格刻画见长，而是注重片段的积累和人物群体的相互烘托，使整个作品产生

一种感人的气势，构成一幅农村的完整画面。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结尾不够完整，起义的场面只凭孩子的回忆予以描绘，未免显得过于单薄。达里亚天真无邪，他观察到的现实是真实的，但是有时让他说出一些只有成年人才能说出的话，或者让他表达几十年后党的文件上的观点，就显得很不和谐。另外，某些章节中混杂了报刊文体、回忆录或杂文式的段落，破坏了小说的统一性，这可能与他长期从事记者职业或者创作期间时间急迫有关。这本书的成功促使斯坦库朝向自传体小说发展，除描写二战期间吉普赛部落悲惨遭遇的《吉普赛营》(*Şatra*)之外，其他作品中都有达里亚的影子。《苦根》(*Rădăcinile sunt amare*)描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和新闻界，《我多么爱你》(*Ce mult te-am iubit*)是怀念母亲的优秀挽歌，同时也展示了多瑙河地区的古老习俗。

M.普雷达(Marin Preda, 1922—1980)于50年代成名，他和斯坦库一样也是生于特利奥尔曼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本村读完小学后，于1937年考入阿尔鲁德师范学校，次年转入克里斯图尔—奥多尔黑师范，1940年随校迁入布加勒斯特。1941年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他中止学业，当了两年报刊校对员和统计局职员。此时他开始文学创作，发表短篇小说《无用的人》。1943至1945年他在部队服兵役，但仍同文学界保持联系，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马》、《女妖》、《刺槐》、《夜》、《在田野上》等。1945年返回布加勒斯特后，他一边从事校对职业，同时坚持创作，发表了《大夫》、《爱》等作品。1948年，短篇小说集《大地相遇》(*Întâlnirea din pământuri*)出版，使他在小说界立稳足跟。集子中的8篇作品主要以多瑙河平原上荒野农村为背景，在浓重的乡土气息和民俗氛围中刻画了一系列粗犷质朴的农民形象，尤其注重用冷静的客观手法剖析人物心理，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1947至1948年，普雷达在作家协会任职员，1952年到《罗马尼亚生活》杂志编辑部工作，1957至1958年任该杂志副主编。鉴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

1968 年他被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时担任书籍出版社社长职务。他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前一阶段根据时代要求,小说主题基本都与农村生活相关。1960 年后,随着文坛气氛的宽松,创作活动朝深度和广度扩展。50 年代,他的以农村合作化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有《开展》、《黑洞洞的窗口》和《勇敢》。创作这些作品时他没有完全遵从当时的小说模式,而是侧重透视人物心理,描绘具有独立意识、勇于维护个人尊严的新型农民形象。长篇小说《莫洛米特一家》(*Moromeții*)(第一卷)的文学价值尤为突出,是这一阶段同类题材小说中的精品。该书通过二战前夕自耕农的解体过程,揭示了急剧变化的历史猛烈冲击着千百年来农民所习惯的传统生产方式和顽强的生活观念。莫洛米特一家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生活还算过得去,家长伊利耶的地位也相当牢固。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因素在农村的渗透和时局的日益动荡,家庭成员在土地与债务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一户好端端的人家终于四分五裂。农民和农民的命运一直是普雷达关心的问题,对小说主人公伊利耶的形象刻画和心理分析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功的艺术尝试。故事开始时,传统的农村生活似乎井然有序,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向前发展。可是时代却不等人,它将在这个典型的家长统治的家庭里引起急剧变化。伊利耶精明强干,有主见,治家处世也颇有心计,在村里算个头面人物,在家里享有绝对权威,老伴和六个子女(前妻留下三个儿子,续室生了一男二女)对他不敢有任何违抗。他的信条是拥有土地即意味着拥有尊严和地位,幸福、欢乐以及广阔的前景也随之而来。可是年轻的一代却逐渐变了,他们只认金钱和物质利益,首先是前妻留下的三个儿子要求分家,后来他们变卖羊群盗走马匹,逃到城里谋生。小儿子尼古拉(作者的化身)要钱上学,再加上贷款、税款和债务步步紧逼,他只能变卖他珍贵的土地了。先前在村中相当活跃的伊利耶在失去儿子、平静和土地的情况下彻底变了,变得孤独沉默了。这种结局意味着传统农民意识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伊利耶维护和追求

的那个世界完全破灭了。1960年后，他像许多同时期作家一样，对50年代的创作倾向进行了反思。这一阶段，他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出版的长篇小说相当丰富，其中有《莫洛米特一家》(第二卷)、《不速之客》、《败子》、《伟大的孤独者》、《呓语》、《劫掠般的生活》、《世上最可爱的人》等。普雷达创作《莫洛米特一家》第二卷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坛的束缚已基本清除，加之当时对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新的评价，所以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与50年代同类小说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书中的主要人物依旧是莫洛米特一家人，伊利耶仍然幻想恢复家长的尊严和已经破灭的小农经济，可实际上他已力不从心，不是从前那个精明干练的农民了。首先，他的小农经济思想遭到1945年土改和1949年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无情冲击，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为此，他经常与已经当上党的干部的小儿子尼古拉进行争辩。他是个正直的农民，虽然他的守旧思想已经过时，但是他对村干部的所作所为却有公断。当权者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且越换越坏。他们鱼肉乡里，敲诈勒索，甚至逼死人命。地下党员楚古尔兰那样的好干部找不到了，这使他十分伤心。村中的老友死的死，走的走，疏远的疏远，他又看不上那些新人，没有说话的地方，陷入孤独之中。在家里，他的话已经不具权威性。为了保住家庭完整，他曾去布加勒斯特劝说前妻留下的三个儿子回来务农，并答应把家产分给他们，但是遭到儿子们的拒绝。由于家庭纠葛，老伴也离开了他，到女儿家中单过。刚强了一辈子的伊利耶最后郁闷而死。这部小说有自己的特色，人物刻画已彻底摈弃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概念，描述中经常采用归纳法、回忆或者倒叙。有时，情节的过分交错和突然转换使小说显得有些零乱。就整体结构和艺术风格来讲，它与第一卷不甚衔接。《伟大的孤独者》和《呓语》似乎是《莫洛米特一家》的续篇，但是小说题材已经从农村转到了知识界。《伟大的孤独者》(*Marele singuratic*)描写了党的干部的思想波动。伊利耶的小儿子尼古拉参加革命后犯了错

误，变得十分消沉，企图用改行从事园艺的办法逃避现实，但是女画家的纯真爱情终于唤醒了他的生活热情。《呓语》(*Delirul*)的主人公也是莫洛米特家族的一个成员。通过他的一系列遭遇，作者再现了安东内斯库法西斯独裁时期罗马尼亚的社会面貌，对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了新的评价。普雷达的另一部代表作是他逝世前夕发表的三卷本《世上最可爱的人》(*Cel mai iubit dintre pământeni*)，描写了战后十年中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遭到压抑的不幸处境以及当时的社会道德风貌。书中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哲学教师，由于不肯随波逐流而被赶出哲学系，在社会上从事各种与知识分子不相称的工作。他涉嫌坐过牢，妻子背叛了他。但是他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在连续的爱情纠葛中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和写作欲望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面对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他永远是个抗议者。这部小说涉及的问题相当广，许多情节和人物虽以资料为依托，但仍难免有失误之处。大量的哲学伦理议论也降低了小说的感染力。普雷达推崇现实主义文学，他认为小说如果脱离了历史和真实，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尽管他的创作中存在时代造成的这样或那样问题，他仍不失为罗马尼亚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

50年代的优秀小说还有《陌生人》和《渴望》，它们均出自T.波波维奇(Titus Popovici, 1930—1994)之手。这位作家生于奥拉迪亚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布加勒斯特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小说，1955年推出《陌生人》(*Străinul*)，跨入小说家行列。这部作品以二战末期和“8·23”武装起义为背景，描述了中学生沙宾由自发的反叛到自觉革命的成长过程。在中学读书时，由于一篇带有反战倾向的作文，他被学校开除。此后，他开始在社会上闯荡，严酷的战争环境和反法西斯斗争使他从迷茫中走上正确道路，接着又经历了一系列重大革命考验，时代终于把他造就成一名先进分子。《渴望》(*Setea*)围绕1945年的土地改革，从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角度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热切追求和地主阶级的伺机反抗，描绘了具

有朴素政治觉悟的农民群体和农村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两部小说情节安排合理，故事性强，人物刻画简练生动，艺术手法相当高超。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的束缚，解放初期的某些现象未能得到完全真实的反映，善与恶一律通过阶级斗争的观念予以描绘，人物的心理转化被硬性框入"说服动员"、"政治教育"等呆板模式，使某些情节显得不够自然。应该说波波维奇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在小说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但他出版上述两部作品后却突然把全部精力投向电影脚本创作，成果近四十种，其中不乏精品，如：《多瑙河之波》、《达契亚人》、《勇敢的米哈依》、《权力与真理》等。直至 1970 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伊卜之死》(*Moartea lui Ipu*)，在这个故事中他借助一个孩子的敏锐视角，客观描述了二战期间某村的一名德国占领军被杀，如果找不到凶手，德国人就要枪毙村里的头面人物。这时，头面人物们想到了弱智青年伊卜，让他自首承担"罪责"。伊卜同意了，条件是在他未死之前就为他举行葬礼。找到了抵罪替身，那些人欣喜若狂，饮酒庆贺。可是伊卜没有死，因为当天夜里德国军队从村子里撤走了。为此，伊卜不是高兴，反而号啕大哭，因为他失去了做一名真正人的惟一机会。这篇小说的含义和艺术特色都比较新颖，被认为是战后最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之一。

《坑》(*Groapa*)是 E. 巴尔布(Eugen Barbu，1924—1993)于 50 年代发表的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它通过马赛克式的镶拼手法，用粗犷的笔调再现了解放以前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凄凉堕落的贫民区。那是个小偷、流氓、流浪汉的世界，充斥着暴力和其他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各种隐秘；另一条主线以小酒馆为中心，展示了被推向社会边缘的穷苦人的生活。这部小说创作历时 10 年之久，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出版时得到普遍赞扬。但小说中也有不足之处，过多使用了下层社会的粗俗语言和俚语，引起批评界的异议。某些情节的描写也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北方公路》(*Şoseaua Nordului*)以反法西斯地下斗争和"8·23"武装起义为主

题,描写了一批为和平与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者。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方面只注重情节的铺陈,忽略了人物的内心刻画,许多人物落入脸谱化、概念化的俗套。这一点在他反映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建设新社会的《创世》中有所克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给予了充分重视。巴尔布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人品和文学活动在文坛引起的争论也较多。60年代任《金星》杂志主编期间,他曾热情鼓励年轻人从事创作,培养了亚历山德鲁、迪莫夫等一批作家,可是70年代主办刊物《每周》时却利用手中的方便条件发表文章,中伤了文学界的一些同行。1960年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揭示权力之争的历史小说《大公》、以二战为背景的介于真实与杜撰之间的惊险小说《隐姓埋名》以及《疯人的一周》等。批评界认为他的后期作品与《坑》相比,显得粗糙杂乱。对此,他经常是作品再版时予以补救,而他的短篇小说则要精练得多。他对各种体裁的创作都做了尝试,尤其热中电影脚本和电视剧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P.杜米特鲁(Petru Dumitru, 1924—)曾是50年代文坛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由于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成果突出,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尘之路》(*Drum fără pulbere*)描写了多瑙河—黑海运河的开掘。对他来说,这个题材十分敏感,写得好可以出名,写不好容易出问题,因为挖掘运河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头号工程,挖河人又大多是各种类型的劳改犯(其中也有他曾任旧政权高级将领的父亲),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好在他成功了,但仍心有余悸。1952年运河工程停工后,他从创作中得出一条教训,认为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不能对形势跟得太紧,尽量避免写当代人。为此,他发表《风暴鸟》之后,转向伸缩余地比较大的历史题材,创作了使他名扬文坛的《家庭纪事》(*Cronică de familie*)。这部三卷本小说以娴熟的艺术手法描写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贵族家庭的糜烂生活以及被权力、金钱、嫉妒、虚荣等主宰着的上层社会。人物的虚伪性和双重性格表现得十分突出,

华贵、傲慢遮掩着龌龊和丑恶，乱伦、通奸、谋害亲夫等都可以成为他们向上攀登的一级台阶。而另一方面，广大百姓却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由于作者用新的观点重新透视了那一段历史，所以小说的内容极富教育意义。1960年杜米特鲁滞留国外，发表了回忆录性质的作品《相逢于最后审判》、《隐名》等。

60年代后，小说创作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逐渐清除，强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深刻的民主性、爱国性和参与性，应该全面地、深层次地反映当前的社会。新的文艺方针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宽松条件，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作家的积极性。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更新、作品内涵的深化都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对此，普雷达等前一阶段活跃文坛的作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尤为重要的是一批新人涌现出来，在小说创作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有D.R.波佩斯库、F.尼亚古、A.伊瓦修克、N.布列班、M.乔班努、I.伦克冷让、C.措尤、A.布祖拉、S.勃努列斯库、G.勃勒依察、I.勃耶舒、S.蒂特尔等多人。

与前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作品具有鲜明特征。其一，题材的急剧扩大。突破50年代的限定题材束缚后，小说朝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历史、现实、城市、农村乃至神话传说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尤其是近期历史和当前社会现状更是作家们热中的创作题目，力求通过不同视角予以重新认识，从中发掘更深层次的含义和真髓，以儆后人。由于作家们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经历不尽相同，对待近期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态度千差万别，所以他们作品的倾向性也各不相同。大部分作品出于良好愿望，对社会和党内的一些不良现象提出中肯批评，以求改正。另一些作品对现实流露出强烈不满和抗争，个别作品则对1944年后的社会变革持批判态度。其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对陈旧模式的破除和创造性地运用新的写作技巧。文学界同国外的交流逐渐增多，西方流派也开始对罗马尼亚小说界产生了影响。伊瓦修克创作了无情节、无特定人物的现代派小说(《前室》、《夜识》)，波佩斯库大量运用意

识流、怪诞、内心独白等现代创作技巧(《御猎》等),普雷达成功借用戏剧场景连缀手法(《败子》、《不速之客》),布祖拉的独白式小说别具特色(《缺席者》),尼亚古的隐喻小说自成一体(《天使在呼唤》)。但是,有时对新的写作技巧的过度追求,使一些作品变成了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的混合体,显得不十分和谐。个别作家不顾本国文化传统,一味模仿西方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大大影响了与读者的沟通。其三,人物刻画发生了根本变化。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典型人物等概念基本从小说园地消失。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只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根据故事的需要,人物可以是线条式、平面式、立体式,或者根据情况突出某个侧面。雷布里亚努和萨多维亚努曾以描绘农民形象而著称,在罗马尼亚小说界很有影响。但是60年代后的小说中,质朴和粗犷已经不再是农民形象的基本特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突出农民的综合性格和透彻的心理分析是描写农村人物的基本要求。

这一阶段,历史小说在数量上仍然占据重要位置,选题范围集中在对当代有借鉴或教育意义的几个历史时期。公元前的达契亚人是罗马尼亚民族的祖先之一,曾英勇抵抗罗马帝国的入侵。这段历史在I.托波洛格的《兄弟》、A.博特兹的《思念的半球》、B.斯蒂赫的《狼的冬天》等作品中有所反映。H.斯坦库的《法纳尔》描绘了17世纪的法纳尔王朝。1877年的独立战争涉及到巴尔干国家的独立和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两大列强,围绕这段历史P.安格尔从爱国主义教育角度创作了预计将含9种作品的系列小说《百年前的雪》。特兰西瓦尼亚曾被奥匈帝国占领,那里的民族解放和回归祖国的斗争持续了几百年之久。对此,F.波库拉里乌创作了《时代与风暴》四部曲,含《创世》、《天平星座》、《迷宫》、《文身不存衣帽间》,从历史、社会和政治角度再现了1848至1940年间当地人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同样,R.乔班努的富于战斗性的《传令官》和P.文蒂勒的《凌晨一点钟》也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和奥匈帝国的衰落。1944年"8·23"武装起义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仍是一些作家的创作题材,这类作品有H.金科的《预定进攻的时刻》、C.列乌的《伟大的一天》、E.巴尔布的《隐姓埋名》、A.米哈莱的三部曲(《黑色的火》、《白色的火》和《红色的火》)、L.富尔加的《希望之星》等。历史题材小说经常侧重描绘以往的一些著名人物。R.蒂奥多鲁的四卷本《鹰》展示了15世纪中叶抗击异族入侵、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画卷,其中的核心人物是一直得到人民颂扬的勇敢的米哈依大公。M.迪亚康内斯库的《希望》刻画了摩尔多瓦的基卡大公的形象,这位大公曾于18世纪改革农业政策,鼓励教育和公益事业,支持民族统一。V.什蒂尔布的《伟大的印痕》描述了1848年革命领袖博尔切斯库的生平和活动。霍利亚是1784至1785年间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人民起义领袖。这位农奴曾四次赴维也纳情愿,要求民族权利,后来被迫同克洛什卡、克里山一起率领人民起义,战败后被捕,车裂处死。他的壮烈的一生在日尔曼族作家O.W.契塞克的小说《燎原之火》(含《克里山》和《霍利亚》)中得到突出表现。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契塞克曾在国内和维也纳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来,霍利亚起义百年纪念时,又有一批同类小说问世,其中有I.穆沙特的《达契亚之王霍利亚》、R.塞列让的《车裂》、T.波波维奇的《判决》、E.乌利卡鲁的《1784—动荡的年代》等。

社会、政治小说呈迅猛增长势头。这类作品大多以反思近期历史上重大变革和政治运动为题材,涉及到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国有化、肃反、监禁、多瑙河—黑海运河工程、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新政权建立后领导层面对的权与法、干群关系等,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由于政策的失误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曾经伤害了一些人,浓重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许多人的心头,而50年代小说对此则采取回避、掩盖或美化态度。鉴于这种情况,作家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艺术手法再现那段历史予以评说,儆戒来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小说不应该是资料的简单堆砌或仅仅满足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它也不应该是某些政治口号的系列图

解或抛弃艺术标准的文章汇编。这类小说必须具有强烈的现实感，通过尽量完美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同读者交流，开拓读者的内心世界，使其通过阅读作品了解外部社会的同时也进行自我认识。这一阶段，许多作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围绕历史的必然与人的命运、理想与现实、权力与真理、法制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与伦理道德等问题进行创作。但是囿于客观条件，也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例如，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作家不掌握全面材料，有些深层次的问题不能触动，即使涉及了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材料也往往支离破碎，欲言又止，形不成完整的感人故事，加之笼统的哲理道德议论过于繁琐，许多隐喻让人摸不到头脑，这些都影响了与读者的沟通，降低了这类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价值。从表现形式来看，大部分作品仍旧沿袭现实主义传统揭示近期历史或当代社会的某个侧面，但与以往的小说相比，情节大大淡化了，让位予思维空间的开拓和人物的内心刻画。借题发挥的议论和内心独白占据大量篇幅，故事的结尾大多是开放式的。部分作品并非政治小说，但也蜻蜓点水式地触动某些敏感问题，掀起微微涟漪。7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一批堆砌资料的作品。这类"信息文学"试图用档案材料或书信、笔记等表现文学的认识性，但艺术价值往往欠佳。也有大量作品不肯直接面对现实，而是采取影射、象征、隐喻、怪诞等艺术手法间接议论问题，启迪读者的想像和思维。80年代后，由于社会风尚和经济状况的衰落，也促使一些作家对此做出反应，但这类作品往往受到压制或不得出版，没有形成气候。至于持不同政见者和境外作家，他们的创作则应用另外的政治标准和艺术尺度予以评价。

M.普雷达(1922—1980)是政治小说的开拓者之一。他虽于50年代名扬文坛，却一直对文学状况不满。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曾说：除20世纪后半叶的重大历史变革外，他经常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人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为此，他首先以《败子》作为尝试。该小说在广阔的社会空间背景中描写了两代人的生活。老一

代大多是经受过考验的革命者；年轻一代家庭出身好，有知识，有地位，时代对他们极为有利，可就是这些堪称世之骄子的人们却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中摔了跟头，成为可悲的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肯正视错误。1967年，普雷达在《莫洛米特一家》第二卷中从某些侧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做了描述。在这本书中，他没有简单化地颂扬农民对合作化所表现出的高涨热情，而是在把握政治因素的情况下，描写了各方面人物对这一运动的心理反应，揭示了农村一些党员干部为权力而勾心斗角，为邀功而欺上瞒下，为私利而鱼肉乡里。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其他一些作品，直至揭示知识分子遭遇的《世上最可爱的人》，为政治、社会小说的崛起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A.伊瓦修克(Alexandru Ivasiuc, 1933—1977)以创作随笔式政治小说而见长。他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51至1956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医学系读书，毕业前曾因政治嫌疑入狱，获释后从事各种职业，1970至1974年曾任书籍出版社总编、作协秘书等职。正当他创作活动处于巅峰时期，却在1977年的大地震中不幸身亡。初期的三部小说《前室》(*Vestibul*)、《间隔》和《夜识》围绕人生价值、爱情和家族传统束缚等令人困扰的问题揭示了人们的复杂心态和情感危机。此后，他的作品《鸟》(*Păsările*)、《水》、《感悟》和《虾》突出反映了革命与社会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造成的一些后果。核心问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必然与自由这一对辨证的矛盾。小说通过各种事例和感受向读者揭示了个人或群体的自由必须遵从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性总会对事情的发展、演化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公乃至暴力做出恰当的解释。只要理解这一点，许多往事就不难承受了。一般来讲，他的作品不注重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而是把能够引发话题的关键事件放在恰当位置，推动小说向前发展。因而有些批评家认为他的小说无情节，无特定人物。实际上，相当贫乏的情节有时只是故事的简单依托，借以引出无穷的回忆、自白、辩解和议论，而人物形象大多趋于象征化和概

念化,政治维度掩盖了人物的其他特征,思想冲突取代了性格冲突,所以也有人称他的作品是思想小说。作为文学现象,他的小说明显区别于同代作家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现代主义风格,在思想内容和技巧等方面都有创新。

D.R.波佩斯库(Dumitru Radu Popescu, 1935—)的小说蒙有浓厚的怪诞色彩。他善于通过离奇的故事和魔幻人物展现人世百态,尤其是近期历史和社会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的各种扭曲,从而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丰富了政治、社会类型小说。他毕业于克卢日大学,1954 年在文学刊物《星》上发表处女作《一盘国际象棋》,此后又陆续出版其他作品,1958 年收入小说集《逃跑》中。这本集子里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没有超越当时流行文坛的图解生活的创作模式,出版后受到刚刚兴起的反教条主义潮流的批驳。在这种情况下,波佩斯库立即意识到小说创作必须革新,应该突破旧的模式的束缚。他的革新精神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阳伞》、《南方姑娘》、《大地的梦》、《思恋》、《白雨》、《蓝色的狮子》等中短篇小说集是他成熟时期的作品,风格独特,内容新颖。中篇小说《阿纳丝塔西亚依恋地走了》(*Duios Anastasia trecea*)带有浓厚传奇色彩,被认为是波佩斯库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故事发生在多瑙河畔的一个小城中,德国法西斯捉到一名逃入罗马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员,枪杀之后陈尸广场,以示儆戒。阿纳丝塔西亚不顾危险和情人的劝阻,按照宗教仪式埋葬了这位战士。为此,她自己也被法西斯杀害了。这篇作品集真实、梦幻和怪诞为一体,在写作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自此,他的含有丰富哲理、道德和政治意义的怪诞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得到发展,尤其表现在长篇小说中,赢得好评的作品有《F》、《采巴的两个人》、《御猎》、《给我的马儿一升啤酒》、《旧时的雨》、《蒂隆·B 的生平与作品》(第一卷《瘸腿的兔子》,第二卷《冰桥》)等。其中,《F》通过断断续续的怪诞情节,叙述了青年检察官调查父亲如何被害的过程。但是他在各地的取证非但没有揭示案情真相,反而由于调查过程中

发现的一起又一起的凶杀，使案情变得更加真伪难辨了。借助这一主题，作者试图表现传统农村的悲剧和那一时期出现的各种践踏法制的丑恶现象。《蒂隆·B的生平与作品》以战争年代为背景，描写了人与命运的激烈冲突，从而引发出真理何在、正义何在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疑问。波佩斯库的小说采用了大量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诸如情节的时空倒错、群体人物的多层面独白、真理的相对性和多内涵、故事的怪诞性和人物形象的扭曲、深奥的象征含义和神话底蕴等。作者对运用这些技巧反映现实的解释是：因为世界本身就不具备完美的逻辑性和理智性。尽管他的浩繁的作品包藏着许多读者一时难以理解的奥秘，但有几个层次基本是清楚的。政治方面：战争、武装起义、1945年后重大变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它们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反响。社会方面：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农村的猛烈冲击和由此引发的一些负面效应。日常生活方面：善与恶的冲突以及人们对真理和正义的渴求。哲理方面：存在危机和对生活的悲观情绪。除小说外，他还著有多种剧本。曾任文学刊物《论坛》主编和作家协会主席。

N.布列班(Nicolae Breban，1934—)是罗马尼亚文坛思想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他生于神甫家庭，读中学时因为成分不好而被开除，17岁时任小职员，18岁在工厂当车工，后来考入布加勒斯特大学，但系主任认为他是可疑分子，又被开除学籍。21岁在财政部当司机，刻苦自学。50年代末结识诗人斯特内斯库，开始发表文学作品。60年代中期成名文坛后，在政治方面也很走红，曾主编《罗马尼亚文学报》。1971年发动小“文化革命”的《七月提纲》出台时，正在法国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布列班声明反对，并辞掉《罗马尼亚文学报》主编职务。回国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经常往来布加勒斯特—巴黎之间。他的小说以探索内心世界、揭示心灵隐私和描绘多视角人物而著称，内容涉及40至50年代的各种社会现象，诸如激情与幼稚、坦诚与权力欲、适应与反叛等，在强者和弱者的拼搏中突出真挚和纯净的道德价值。《弗兰齐斯卡》(*Francisca*)讲述某

工厂干部基里安爱上了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卫生室护士弗兰齐斯卡。为了改造这个姑娘，谈情说爱时他对她进行了无产阶级教育，使她摆脱了儿时受到的家庭影响，站到正确立场上来，成为新人。这样，主人公用他顽强的个性和信念征服了姑娘。《主人不在时》(*În absența stăpânilor*)围绕主人角色的问题对各种年龄和性别的人(老人、妇女、儿童)进行了细腻的心理分析，文笔潇洒，近似散文诗。《病态动物》(*Animale bolnave*)透过一名精神病患者的眼睛描写了两起朦胧的凶杀案，借以分析人物的原始心理。《石膏天使》(*Îngerul de gips*)讲述著名内科医生同上层社会女人结婚后正步步高升时，竟不顾自己已经得到的名誉和地位，突然同坏女人搞到一起。为此，他受到蔑视，朋友、同事没人理解他。可他却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叛经离道，换了一种人格。《福音》(*Bunavestire*)揭示了某干部的典型生活方式。他每天随身携带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身穿社会流行的尼龙绸外衣，装出一副渴求文化的样子，在爱情和事业上都是个成功者。《堂璜》通过某司长海滨度假时与人暂时调换妻子的故事，揭示了丑恶的时尚与人物的变态心理。

A. 布祖拉(Augustin Buzura, 1938—)主张文学作品应该积极反映现实，必须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建设性和参与精神。这意味着文学创作不仅要真实地揭示人和社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应该面向未来，促使人类和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为此，他认为作家不应该回避当前的时代，而是要弘扬它的成就，更要有勇气暴露它的阴暗面。本着这种思想，他于1970至1984年间陆续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即《缺席者》(*Absenții*)、《沉默的人》、《傲骨》(*Orgolii*)、《夜之声》和《归宿》，从个人精神道德危机和群体历史命运两个侧面，对近期社会变革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提出质疑，寻求答案。《夜之声》中的斯特凡为了帮助父母营造一所房子而离开大学哲学系，冒着铅中毒的危险到一家工厂做工。失望之余，他曾向社会发出种种责问。布祖拉经常是通过这种人与社会冲突的艺术手法揭示问题的。《沉默的人》(*Fețele tăcerii*)中，记者托马不赞成撰写弄虚

作假的稿件,可他又不敢如实表白自己的意见,怕丢饭碗。他偶尔写一些内容真实的文章,而编辑部总是给他改过来,为此他终日惶惶不安,睡不着觉,怕这样下去一辈子说谎,愚弄群众毕竟是一种罪过。他的这种反常心理被人发觉了,同事们疏远他,妻子责怪他可能给家庭带来灾难,让他设法补救。书中的另一个主要情节,是通过退休后的合作化干部与当时的一名受害者针锋相对表述各自的观点,揭示了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偏差和错误。那时,由于一些干部专横跋扈,滥用职权,逼死了受害者的两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无路可走,在地下室里躲藏多年。历史给这个正直农民的家庭造成了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他的小说在70年代很受欢迎,因为读者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获得一些信息,诸如权力至上、违法乱纪、工人怠工、告密成风、工人宿舍的龌龊、报刊语言的虚假等,使那个时期的人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平衡。

《野葡萄遮掩的前廊》(*Galeria cu viţă sălbatică*)是C.措尤(Constantin Ţoiu, 1923—)的一部代表作。为了这部表达人们心声的长篇小说,他整整酝酿了十年,修改了三稿。用作者的话说,小说是"双重忍耐的产物:自我忍耐和社会忍耐",而他的成功秘诀在于了解和干预生活,在于用批判的思想再现生活的勇气。《前廊》的主人公吉里尔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普通党员。1950年审干时,由于他坚持真理而被开除党籍,这件事在他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围绕这一主线,小说中的各类人物从不同角度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前廊》的另一条潜在主线是吉里尔的私人笔记本的丢失。开除党籍后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但是他没有消沉,除了积极做编辑工作外,仍在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共产主义、共产党员的品德、人在新社会中的地位、祖国的前途等等。于是,他把对各种问题的想法和一些名言摘录到了本子上。可是,有一次去服装店购买衣服时,却把本子丢在试衣间了,从此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找到。在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泛滥的情况下,他写在本子上的那些东西很可能被人利用,构成逮捕他的罪名。这个伏笔

一直折磨着吉里尔和他的朋友们,小说结尾时笔记本终于构成了加在他头上的罪名,酿成了时代悲剧。布满绿荫的孤岛般的前廊是吉里尔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一组由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普通人构成的群像。他们有过不同的经历,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各不相似,但他们都是时代和历史的见证者,肯于在朋友中间坦露胸怀,评论耳闻目睹或亲身感受的各种事情。前廊也是"记忆库",它又像是一架"缝纫机",把许许多多历史片段、故事和格言接到一起,用镶拼的艺术手法向读者展示了时代与社会的画卷。另一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代表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主流,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奥利克是个纯朴忠厚的印刷工人,当小说主人公吉里尔和他的妹妹成为孤儿时,奥利克夫妇收养了他们,直至吉里尔大学毕业,能够自立。在唯成分论盛行的日子里,奥利克敢于冲破种种社会偏见,同解放前曾当过牢房医生的吉里尔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这足以说明他的正直和勇气。吉里尔被开除党籍时,也是他不避嫌疑多方奔走,征询老共产党员阿列克辛的意见。他们在关键时刻帮助和支持了遭到迫害的吉里尔,使他能够正确认识社会,正确对待革命。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共产党员是火车司机出身的麦尔夫,他曾主持1950年审查党员的会议,会上他对吉里尔的发言十分担心,曾设法挽回局面。对于他们,吉里尔怀着尊敬的心情在笔记本中写道:"A(指阿列克辛)是我见到过的最诚挚的共产党员… 能够为革命赴汤蹈火。他追求的是什么?是勇气、正直、谦虚和革命者的其他美德。领导者不能忘记自己的阶级出身,也不能文过饰非… 涉及到有关党的路线和重大决定时,一个真正的党员应该胸怀坦白,不怕被撤职开除,不怕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怕被杀头。"这段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能为A招致大祸,所以吉里尔后来因这个本子受审时,至死没有交代A是谁,从而保护了那位老党员。谈到另一位党员麦尔夫时,他接着写道:"我认为他也是工人阶级的忠实代表…当然,一两个人是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可是如果那人具备了工人

阶级最优秀的品质，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实际上就代表了整个工人阶级。可以肯定，他比千千万万思想意识仍有污垢的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这些话既是吉里尔对真正共产党人做出的评价，也是他本人追求的目标。同上述这组群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革命洪流中泛起的沉渣。他们虽然也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但干的却是危害党的事业的勾当。极"左"是他们得以平步青云的一件法宝，书中有一句话把他们刻画得入木三分："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只吮吸过她左侧乳房的奶水。"这部小说曾获作协奖和科学院奖，是70年代优秀小说之一。此外，他还著有《树林中的惨案》、《哑人的星期天》、《陪同者》等。

这一类小说中，应该提及的还有P.塞尔库迪亚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D.波佩斯库的《拳与掌》、V.杜达的《回忆中的战争》、P.帕尔德乌的《清晨的时光》、C.列乌的《康斯坦丁·哈基乌的私生活》、M.辛的《变颜》等，文体风格各有所异。

农村题材一直是罗马尼亚作家的创作热点，自战前的雷布里亚努、萨多维亚努到战后的斯坦库和普雷达，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屡屡问世。进入60年代后，这类作品大多从反思角度透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揭示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复杂心理状态和他们的不同遭遇。近期历史上的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现实性。因此，单纯的农村题材小说已经成为不可能，布祖拉的《沉默的人》和伦克冷让的《求雨泥人》就是例证。

I.伦克冷让(Ion Lăncrănjan, 1928—1991)以创作农村小说著称，《科尔多万一家》(*Cordovanii*)描述了战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某村所经历的动荡与变化。在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大变革中，传统的小农思想同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发生了激烈冲突。对此，作者没有按照50年代善恶二元论的模式予以简单化处理，而是客观、形象地描述旧的观念的渐渐消亡，新生事物的逐步成长和

完善。小说主人公拉耶·科尔多万的经历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人物的内心生活相当丰富。《后人的痛苦》(*Suferința urmașilor*)中,主人公莫努是个正直农民,他怀着期望和恐惧的复杂心情经历了解放后的各次重大变革,最后在孤寂中死去。这部小说集梦想与忧虑、激情与冷漠、理解与严酷为一体,反映了农民的群体命运。《求雨泥人》(*Caloianul*)仿佛一架艺术万花筒,通过场景、事件、小传、肖像、回忆、直述、自白等手法描述了近期社会出现的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例如合作化与监禁、反抗与屈从、真诚与伪善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政治小说。

D.塞拉鲁(Dinu Săraru,1932—)反映奥尔特尼亚地区农村面貌的《农民们》、以党的工作者为核心人物的《时刻》以及 I.勃耶舒的《天平》等,都是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精品。开拓这类小说的作家还有 N.维利亚、F.尼亚古、Gh.苏丘、P.安格尔、S.扎莫拉等。

工业题材小说比较薄弱。50 年代较为突出的作品是 N.伊斯特万的《最高度》和 F.蒙特亚努的《穆列什河畔的城》,故事情节相当简单,内容涉及生产资料国有化、工人阶级忘我劳动、阶级敌人蓄意破坏等。60 年代后,纯粹工业题材小说十分罕见,偶尔有一些这类作品出现,艺术价值也不突出,例如 D.德勒干和 C.斯特凡纳克的小说基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此类题材作品仍有自己的特色,即突出生产过程中的革新精神和领导层的责任感与原则性,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放在首要地位。此外,有些小说虽以工厂或工地为依托,但真正的内容是探讨人的命运和遭遇,因而获得成功,例如普雷达的《不速之客》和布祖拉的《夜之声》。工业题材的政治化也是这一阶段的一种倾向。

幽默、讽刺作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现实。它通过轻松的艺术形式展现人世百态,鞭挞社会丑恶,从平凡人物和日常琐事中揭示生活真谛,从而取得严肃题材和其他类型作品所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在这方面,I.勃耶舒(Ion Băieșu, 1933—1992)是一位成就较为突出的作家。他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表现出机灵幽默的

天赋，大学毕业后凭着他对生活的锐敏洞察力，创作了大量讽刺小品、小说、话剧、电视剧和体育评论，赢得读者好评。他对创作执著追求，有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尽管有时他意识到辛辣的笔锋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但他全然不顾，照旧写下去。他写的东西很多很多，无人统计得清。就小说而言，50 年代比较突出的有《女拖拉机手伊丽亚娜》、《苦恼与欢乐》等，60 年代后发表了《爱情之夜》、《有幽默感的人们》、《一起痛苦》、《爱情是件大事》和《天平》(*Balanța*)，其中以后三部较为著名。同样，以言辞刻薄、无情剖析等艺术手法见长的 T. 马季鲁(1930—1980)也以创作讽刺小说而著称，主要作品有《扯闲话的人们》、《讽刺小说集》等。

这一阶段的怪异、象征类小说大多以民俗、神话和各种传说为底蕴，在精心设计的虚幻、离奇的艺术氛围中使其与现实和历史接轨，在迷离恍惚的交错中揭示政治、社会、道德、哲理等方面的有关含义。50 年代有些小说部分尝试了这类手法，例如普雷达的《大地相遇》、巴尔布的《坑》、克林内斯库的《可怜的约阿尼德》等。而 60 年代后，大量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按照这类手法设计的。由于作家的文学观念、艺术素养和创作风格因人而异，所以小说的表现形式相当繁杂，各有各的特色。

G. 勃勒依察(George Bălăiță, 1935—)用隐喻、象征手法创作了几部小说。《关于约内斯科的对话》和《牛奶太阳之夜发生的事情》把读者引向一个怪诞的梦幻世界，那里充斥着恐怖、焦虑、憎恨和愤怒。《两天的世界》(*Lumea în două zile*)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小说情节在主人公安提帕的两场梦中展开。一场是清醒中的梦，一场是睡眠中的梦。第一天，12 月 21 日，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法官、证人和主人公围绕一桩案子，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交错重叠的时空里穿梭出现。第二天，6 月 21 日，白昼最长的一天，以往的隐秘逐步明朗化，揭示了小说的哲理、道德含义。《不听话的门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天的世界》的续篇。

F. 尼亚古(Fănuș Neagu, 1932—)的作品以古朴多彩的民俗

启示为依托,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罗马尼亚南部和多瑙河下游地区梦幻式的传奇故事。中篇小说《沙丘的那边》(*Dincolo de nisipuri*)在令人压抑的旱灾气氛中,讲述了一群人对水源的近似癫狂的追求。《天使的呼唤》(*Îngerul a strigat*)是一部板块式长篇小说。1934年,亚历山德鲁亲王为建造飞机场征用土地,强迫布勒依拉平原上13户农民迁往多布罗加地区。搬迁途中,几家小店铺被抢。遭到拘押的嫌疑犯,搬迁农民之一莫赫里亚努试图逃跑时被枪杀。他的儿子伊昂知道谁是案犯,可他未能替父伸冤,因为那个布勒依拉的惯盗在一次赛马中死于非命。20年后,由于别人造谣中伤,伊昂也在劳动营中被一个陌生人杀害,又造成一起不明不白的冤案。通过这个具有浓厚色彩的故事,作者揭示了当权者和司法机关任何微小的差错都可能给人们带来不可想像的灾难。他的作品还有《勃勒干的雪》、《令人发昏的夏天》、《布加勒斯特的白马》、《大城市的可爱的疯子》等。

S.勃努列斯库(Ştefan Bănulescu, 1929—)是一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善于从神话和史前传奇中挖掘深奥的象征含义,作品风格与埃里亚德、沃伊库列斯库的小说一脉相承。小说集《男人的冬天》(*Iarna bărbaţilor*)是他成名之作。尽管这部集子含有多种短篇,但却具有和谐的统一性。时间是朦胧的现代,可现代中又包含着远古乃至原始。历史层面也是现代,使人联想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农村生活、战后数年的社会萧条、武装起义、50年代的社会变革等,但接触这段历史的却是一群仍然保留着部落遗风或具有神秘色彩的粗犷的人。传奇遮住了历史,赋予它新的含义。面对急剧扩张的现代,封闭的人群力求保持古风,突出其永恒含义。大鸨、公鸡、柳树、槐树、祈雨泥人或裸体妇女在水、旱、酷热、战乱所造成的迷幻情景中成为载有某种含义的特殊象征。在这部小说集中,较为突出的是《驯服的野猪》、《大鸨》、《镜台》等。他的作品不是很多,1968年发表的组诗《平原之歌》是对他魔幻、怪异小说的一种补充。70年代的散文作品有《外省信札》和《百万富翁传》。

对象征、怪异类小说做出贡献的还有:L.富尔加(《奇怪的天堂》)、R.古加(《疯人和花》)、M.乔班努(《历史》)、P.塞尔库迪亚努(《亚历山大图书馆》)、P.杰奥尔杰斯库(《除夕》、《巴洛克之夏》)、S.蒂特尔(《飞速的时刻》、《女人,这是你的儿子》)等。

70年代,罗马尼亚小说界出现一种重形式轻内容、崇尚“纯艺术”的特尔戈维什蒂派,代表人物有M.H.西苗内斯库(《有节制的技巧》)、R.佩特雷斯库(《马泰·伊里耶斯库》)、P.克雷奇亚(《云》)等,他们倾向创作没有实质内容的准小说和创作笔记式作品。8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以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为中心的“青年社”的一批年轻人于1983年推出小说集《登陆》,揭开了这一潮流的序幕。他们大多创作短篇,艺术上强调作品的自我参照系。他们自称是80年代作家,但却没有得到读者的真正认同。至于作品内容的晦涩,他们认为这是对现实的一种腻烦。突出代表有M.内德尔丘、S.普雷达、I.勒库斯特、N.伊利耶斯库等。

3. 戏剧文学

1944年后,罗马尼亚戏剧经历了与小说和诗歌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

由于时代的要求,这一时期出版的剧作不胜枚举,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毕竟有限。按时间顺序筛选,罗马尼亚评论界认为能够说明问题的剧作大概有三十余种,其中包括描写工人阶级英雄事迹的《矿工》、讽刺官僚主义的新喜剧《疯狂的羔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解体的《被摧毁的城堡》、展示创作工作者心态的《艺术家之死》、存在主义讽刺剧《月光下的白痴》、用现代主义手法探讨青年问题的《我不是埃菲尔铁塔》、新编历史剧《佩特鲁·拉雷什》、驳斥神化工人阶级的《地下》、揭示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生活复杂性的《这些悲哀的天使》、哲理认识悲剧《约拿》、反思解放初期某些人严重违法乱纪的《除夕夜之猫》、现代悲剧《老天使或疯人喜剧》、哲理

剧《提奥奇尼斯》、历史悲剧《冷漠》、象征剧《利奥尔迪亚努一家》等等。透过上述作品，可以概括了解近几十年罗马尼亚戏剧创作的发展脉络，因为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创作手法上都具有时代赋予的明显特征。

就剧种来讲，反映现实的社会剧受到推崇，主要以正剧的形式出现。讽刺喜剧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往往带有含蓄的温和色彩。历史剧延续以往的传统，仍然是剧作家们刻意追求的主要剧种，但这类剧作不再渲染历史的浪漫色彩，而是吊古评今，突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60年代以后，间接反映人们心态的心理剧、神化剧、象征剧和荒诞剧有了明显的发展。

在题材方面，鉴于战后罗马尼亚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教育和宣传手段的戏剧必然密切配合形势，反映现实和近期历史的要求成为戏剧创作面临的主要课题。描写共产党人地下斗争(《黑暗的年代》、《沉默的人们》等)、"8·23"武装起义(《凯旋门》、《燃烧的城市》等)、社会主义建设(《权力与真理》等)、工人生活(《矿工》、《钢都》等)、农业合作化(《弗拉依库和他的儿子们》、《城堡婚礼》等)、资产阶级解体(《被摧毁的城堡》、《三代人》等)、伦理道德与家庭冲突(《敞开的窗口》、《无形接力棒》、《科琳娜错了吗?》等)、新与旧的斗争(《疯狂的羔羊》、《公正舆论》等)的戏剧大量出台，以现代社会为背景正面描写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形象。

1944至1947年底，老一代的剧作家佩特雷斯库、布拉加、埃夫蒂米乌、穆沙特斯库、基利采斯库、斯特凡内斯库等人仍在写作，努力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但他们推出的作品毕竟带有旧时的痕迹，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相反，一批年轻人却紧跟形势，创作了许多迅速反映社会变革的应时之作。

1948年后直至整个50年代，戏剧创作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戏剧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教育性和宣传性。由于它直接面向观众，戏剧内容受到理论工作者和批评家的严格审

查和控制，所以这一阶段的戏剧文学经常被人们称作“批评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戏剧文学”。表现手法也相当单一，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模式。例如，人物的塑造必须具有典型意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脸谱化，界限分明。正面人物一定是共产党员、反法西斯战士、党的干部、具有忘我精神的企业领导、新旧斗争中的闯将等。戏剧冲突也渐渐演化为乏味的模式，千变万化跳不出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圈子。只是冲突场所可以稍加变动，或者是工地、矿山、工厂、企业，或者是农村、城市、会议室和单元楼。有些戏剧套路带有明显的人为雕琢痕迹。例如，工地倍受剧作家的青睐，为了表现工人的劳动热情，剧作者经常凭空设计一些突发事故，以此来引发英雄事迹。讽刺喜剧也面临许多禁区，能够触动的仅限于会议迷、文牍主义之类，剧情的发展蒙着一层温和的道德说教色彩。尽管如此，这一阶段也不乏优秀作品。

M.达维道格鲁(Mihail Davidoglu, 1910—1987)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的开拓者之一，他率先把阶级冲突和工人题材引入戏剧，1947 至 1950 年蜚声戏剧界，此后名望逐渐跌落。《恰塔尔人》(*Omul din Ceatal*)是他的第一部剧作，该剧以多瑙河三角洲为背景，围绕一户家庭描写了战前渔民的困苦生活和阶级觉悟的苏醒。《矿工》也是以一户家庭为中心，刻画了日乌河谷煤矿工人安东的英雄形象。为了多产煤，他忘我劳动。可是一小撮敌人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安东和他的同伴们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在这出戏里，阶级斗争占据突出地位，正、反人物的鲜明对比是前所未有的。

L.德麦特留斯(Lucia Demetrius, 1910—1992)毕业于戏剧学院，当过演员，著有心理分析小说。战后她开始创作戏剧，她的作品成功反映了社会变革在人们身上引起的心理冲突。《分水岭》(*Cumpăna*)以企业国有化为主线，生动揭示了米尔恰的心理状态。他是一家私人企业的职员，由于家庭和社会影响，他倾向共产主义，可是在物质诱惑面前，他又想忠于老板。正当他徘徊不定时，他与老板娘之间的奇怪的爱情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工人接收工

厂的前一天，他为老板偷出了企业的账册。在工人眼中他无疑是个叛徒，但是剧作者没有根据某种模式对他进行简单化处理，剧本结尾时给他留下了觉悟的余地。《三代人》(*Trei generații*)是德麦特留斯的一部代表作，在50年代很有影响。这个剧本以异乎寻常的时空跨度，描写了一家三代在半个世纪中的生活境遇。外祖母卢桑德拉、女儿艾莉莎和外孙女维洛妮卡的婚姻问题反映了妇女追求解放的长期过程。外祖母年轻时曾有所爱，但她顺从了赌场失败的父亲，嫁给了一个老富翁。她不想让女儿艾莉莎遭到自己那样的命运，可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艾莉莎还是成了强迫婚姻的牺牲品。外孙女生活在新时代，这个富有的家庭虽然破落了，但维洛妮卡却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在婚姻方面充分享有自主权利。《族谱树》(*Arborele genealogic*)也是反映贵族家族衰败的一部成功作品，此后她又发表了以农村合作化为主题的《弗拉依库和他的儿子们》。1965年后她放弃传统手法，用现代派技巧创作了剧作者寻找剧中人或剧中人寻找剧作者的《上帝之园》及其他一些作品。

A. 巴朗格(Aurel Baranga, 1913—1979)是战后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喜剧作家。他青年时代曾从事新闻工作并创作先锋派诗歌，33岁时开始写剧本。在二十多年的戏剧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喜剧风格。他的戏剧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了迎合时局创作的剧本，具有强烈的鼓动性，艺术价值参差不齐，其中有描写共产党人地下斗争的《为了人民的幸福》、再现“8·23”武装起义的《凯旋门》、歌颂农业合作化的《金色的收获》、反映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的《害草》、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帝斗争的《自由之歌》等。作者本人对上述作品也并不满意。1978年他在致全国戏剧会议的信中曾公开承认那个时期他错误理解了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美学特点。第二类包括情节剧和轻喜剧，注重趣味和启迪。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描写情人之间破镜重圆的《幸福妙方》、第三者插足家庭生活的《老实点，克里斯托弗尔》、讽刺分房舞弊的《亚当和

夏娃》。第三类是讽刺喜剧。这个剧种在巴朗格的笔下得到了发展,为社会主义年代的新喜剧开辟了道路。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喜剧技巧的革新,更重要的是他针对新的社会情况扩充和丰富了喜剧题材,滥用职权、等级观念、官僚作风、教条主义、怠惰无能等现象成了喜剧的讽刺对象。《和解大道》以选举闹剧为主题,继承了卡拉迦列的《一封遗失的信》的艺术传统。《疯狂的羔羊》(*Mielul turbat*)是这一剧种的代表作,在罗马尼亚戏剧舞台开创了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斯匹里东是个老实厚道、勤奋好学的普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搞了一项重要革新,可他的革新却遭到空喊原则的领导人的刁难。理想与现实发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温驯的羔羊也会发疯的。同类作品还有《圣人米蒂格·布拉加努》(*Sfântul Mitică Blajinul*)。米蒂格是勤奋的档案管理员,可惯于拉帮结派的上司为了安插亲信,却要像扔掉一张废纸那样把他赶走,让他提前退休。为此,这位心地善良的"圣人"不得不对领导搞了一系列恶作剧。如果说上述讽刺喜剧在色彩上比较温和,那么《公正舆论》和《普遍利益》的调子就相当严厉了。《公正舆论》(*Opinia publică*)以一家编辑部为中心,用戏中有戏、以戏评戏的手法抨击了墨守成规、任用亲信的恶劣作风。剧情的开放性和多种结尾给观众以启迪。《普遍利益》(*Interesul general*)充满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官僚体制对人性的无情摧残。赫里沙尼德毕业于语文系,可他却当上了某工业部的司长。他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在下属眼中简直就是凶神恶煞。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他不惜采用监听设备和凶杀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喜剧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悲剧。

H.洛维内斯库(Horia Lovinescu, 1917—1983)于1953年开始创作戏剧,次年推出《被摧毁的城堡》。该剧以战后初期为背景,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过程。家长格利戈里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律师,一心想要维护以往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旧式家庭的城堡却抵挡不住社会变革的冲击,终于瓦解了。围绕特定的社会、历

史事件,洛维内斯库还创作了其他一些反映人们思想变化的具有浓厚新文学色彩的话剧,《博加姊妹》、《在我们街上》等均属此类。1960年后,他以伦理道德为题材,创作了一些自白式的存在主义戏剧,这说明他逐渐放弃了客观表现手法,向新的艺术形式过渡。《自传》是一出独白式自我反省剧。波帕曾是某建筑研究所所长,由于工作多次失误而被撤职,调到外地任厂长,从而引发了他的良心谴责,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无情剖析。属于这类作品的还有《伤寒》、《重逢》、《荣誉之家》等。在长期探索戏剧艺术的过程中,洛维内斯库于60年代开始深入发掘创作的价值、创作者自身同世界的关系等问题,推出了代表作《艺术家之死》(*Moartea unui artist*)。此剧以民间传说中的工匠为依托,用象征手法揭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艺术观。雕塑家马诺列体现理性艺术,而他的儿子则代表厌恶人类的悲观艺术。马诺列年迈多病,在智力衰退的情况下塑造了一组鬼怪雕像,以示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但是这组雕像却使马诺列恢复了智力,他像传说中的工匠一样为了艺术而直面死神。他庆幸自己享受过生活中的美好东西,也用自己的创作美化了生活。这类作品中还有《失去人性的人》、《佩特鲁·拉雷什》等。

P.埃维拉克(Paul Everac, 1924—)是一位多产剧作家。他1958年开始创作话剧,第一部作品《大门》反映了农村合作化。此后发表的《敞开的窗口》描写了产业工人的生活。这两部作品是积极反映社会变革的一种尝试,带有浓厚的时事剧特点。在此期间,他意识到当代题材的话剧往往只注重表面的宣传和教育功能,而忽略了发掘深层次的东西,未能捉住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艺术折射点。在探讨社会现象对个人心理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时,他认为人类不是屈从社会的驯服机器,而是相当复杂、相当脆弱的活的实体。为此,他在当代题材戏剧创作中开始揭示人与社会的冲突,《定时爆炸》(*Explozie întârziată*)就是一例。该剧描写了一位追求金钱、贪图享乐的医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转变的过程。《无形接力棒》反映了互敬互助的人际关系。某大工厂厂长维列斯库由于人

事倾轧而被撤职，调到一家企业任总工程师。他的继任者在原来的基础上搞出重要成绩，可他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他非常感谢他的前任。在当代题材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是《邻室》、《扑灯蛾》和《第五只天鹅》，它们摆脱了以往的创作模式，围绕各种现象揭示了真伪之间的鲜明对立。《邻室》(*Camera de alături*)的主人克里斯蒂安是个普通的生物学工作者，可他却成了邻居邦多克一家的眼中钉。邦多克身为政府官员，有权有势，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一切全都没有逃过邻室主人的眼睛。为此，他无法容忍克里斯蒂安，千方百计想要赶走他。《扑灯蛾》(*Un fluture pe lampă*)讲的是追求自由、逃离祖国的佩特雷斯库。他抵达西方之后，迎接他的不是花束和微笑，而是各种歧视和侮辱。《第五只天鹅》(*A cincea lebădă*)在爱情问题上向传统观念提出挑战。米里亚是商业部门的经理，品德和工作无可挑剔，夫妻生活也算和谐，因为妻子整日忙于公务，习惯用理性和辨证态度对待一切，夫妇之间不大可能出现矛盾。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那位经理却爱上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被刻板、单调的夫妻生活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感情突然爆发了。他不顾同事和邻居的流言蜚语以及批判会的威胁，鼓起勇气体验了爱情上的欢乐和痛苦。此外，埃维拉克还著有象征剧《扬库》、《大路与路口》、《土地》等。

自60年代起，罗马尼亚戏剧逐渐突破教条模式的藩篱，朝着更广阔的艺术境界迈进。这是指认识的一种飞跃，剧中人物不再是理论或理想的简单表现，他们是同复杂、矛盾的现实紧密相连的有血有肉的人。

老作家洛维内斯库在《自传》等作品中首先揭开了反思戏剧的序幕，这一倾向被D.R.波佩斯库等人承续和发展，在60至70年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反思戏剧主要是批判性地回顾社会主义革命初期阶段的一些失误和不法现象，突出社会变革在人与历史之间酿成的悲剧。波波维奇的《权利与真理》、波佩斯库的《除夕夜之猫》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

70 年代初期的政治剧或者公民教育剧是在普遍宣传“培养新人”的口号声中兴起的，对社会时尚的净化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这类作品素材广泛，囊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描写个人心理冲突的思想剧，也有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有力之作。埃维拉克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鉴于这类作品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所以有些记者也参加了这一阶段的戏剧创作活动，A. 多霍塔鲁就成功地推出了《对一个无罪青年的调查》。但是，类似题材的急剧扩大，也导致了戏剧与专题报道界线模糊的问题。

在发掘创作题材、丰富表现手法的过程中，中青年剧作家起了重要作用。为了突破以往的狭隘模式，他们把完美的正面人物从“神”的宝座上请了下来，赋予他们人情味和人类特有的一些弱点。许多作家巧妙避开直接的现实，通过神话和历史折射生活，这样既保证了作品的深度和开阔性，也保证了作品的稳定性。在神话题材方面，索雷斯库、波佩斯库很有建树。而在历史题材方面，洛维内斯库、特尔及勒、安格尔、塞维尔、索雷斯库等均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有缺陷的人物，在近期历史上一直是讽刺喜剧感到棘手的难题。通常作法，对他们不是脸谱化，就是不敢触动。即使触动，也避开实质性问题。巴朗格的早期作品就具有这种特点。60 年代后，所罗门、勃耶舒等在新的条件下丰富了喜剧手法，而马季鲁则在很大程度上把讽刺抽象化。荒诞剧在 70 至 80 年代的艺术探索中应运而生，它在历史上具有卡拉迦列—乌尔木兹—约内斯科的潜在传统。大部分中间一代的作家，例如马季鲁、波佩斯库、索雷斯库、勃耶舒等，都创作过这类作品，对丰富单一的传统戏剧和发掘生活内涵起了促进作用。成功的剧目有马季鲁的《威尼斯的九月多美好》、波佩斯库的《凯撒、海盗和演员》、索雷斯库的《约纳》、勃耶舒的《驯鬼的女人》等。

近期戏剧是在破除一个接一个的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每破除一个模式，经常产生另一个模式。在这曲折的演化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批新人，其中有小说家、诗人，也有专业剧作家。对于前两类，

本节不予赘述。

A. 塞维尔(A Sever, 1921—)在戏剧创作中以稳健谨慎而著称。初期作品有以反法西斯斗争为背景的《离婚》和《女佣》,以及以家庭为题材的《归来》和《希望之夜》。这些作品基本上摆脱了50年代的套路。《老天使》是塞维尔艺术成熟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它以法西斯集中营为依托,用安插上帝、天使和鬼魂出现的象征手法诱导观众对人类的悲剧进行哲理上的思辩。同类作品还有描述希特勒生平的《黑夜是我的小教堂》。《利奥尔迪亚努一家》别具一格,从内容上看它既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剧、传说剧,同时也是一部有实在意义的现代悲剧。剧中人物虽然倾向概念化,他们分别代表了罪孽、犹豫、懦弱和惩罚,可在诱人的剧情发展中他们的形象却很逼真,有爱有恨,有激情也有懊悔。现代悲剧在塞维尔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D. 特尔及勒(Dan Tărchilă, 1923—)于6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戏剧,早期作品以描写当代夫妻关系和医院生活为主,其中有《百川归海》、《浅蓝色》等。历史剧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罗马尼亚历史剧自60年代末叶起逐渐朝哲理剧和象征剧转化,可是特尔及勒却仍然坚持传统的创作手法,突出这一剧种的史实性和教育意义,《我,米尔恰大公》(*Io, Mircea Voevod*)就是一例。在这部话剧中,他依托丰富的史料,生动描述了14世纪末叶米尔恰大公为抗击奥斯曼军队所采取的外交和军事手段。反映罗马尼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作品还有《弗拉德·采佩什之死》、《伟大的战士》等。

P. 安格尔(Paul Anghel, 1931—1995)的戏剧作品经常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予以批判的描绘,杜撰和借题发挥的现象比较罕见。《激情的一周》(*Săptămâna patimilor*)写的是斯特凡大公,在这里他没有像以往的作家那样刻意渲染大公的英雄形象,而是用批判的态度指出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斯特凡雄心勃勃,力求维护国家的独立,可终因民族弱小,难以抵御奥斯曼强敌,加之虚伪的

西方国家不予真诚的支持和合作,所以他的理想破灭了。

继巴朗格之后,喜剧创作也出现了一批新人。

T.波佩斯库(T.Popescu, 1930—)在艺术手法上介于巴朗格的传统主义和马季鲁的现代主义之间。自1967年起,他创作了近三十部剖析社会的讽刺作品。由于他的剧作在题材方面大大突破了50年代的禁区,所以也有人把他的作品称之为政治喜剧。《选美》不是讲挑选美女,而是指新生贵族的种狗之间的一场较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昔日的革命者堕落了,他们不再关心人民和社会,却热中于养犬、收藏艺术品和装饰自己的居室。为了使自己的爱犬荣登榜首,他们不惜滥用权力。剧中的狗和人向观众发出警告:这个新生的特权阶层直接危害着人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椅子》通过契什米久公园中的一群退休老人,回顾了50年代令人压抑的各种不法现象。这些人中既有历史的受害者,也有当时的权力执行者。他们的现身说法进一步揭示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的命运。《人不是机器的奴隶》围绕某工厂车间主任的人选问题对任人唯亲等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人选的确定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似乎很有客观性和透明度,但是计算机毕竟由人支配,掌握权力的人在确定标准时大做手脚,造成了一连串中选和落选的荒唐局面。比较成功的作品还有《偶然的乐土》、《贫穷的百万富翁》等。

T.马季鲁(Teodor Mazilu,1930—1980)生于工人家庭,长期从事编辑工作,著有小说多种。他6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话剧,为讽刺喜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首先,他通过创作奠定了自己的讽刺体系,那就是对社会中的道德疾患和心理溃疡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剧中人物主要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庸人、伪善者、骗子和玩世不恭者,他们在不同的剧作中反复出现,不断深化,形成了一群多视角的人物。他不注重围绕一个题材发展诱人的戏剧冲突,而是捉住一些场景对人物进行剖析,对堕落的世风予以裁断。为此,他在戏剧美学方面做了新的尝试。刻画人物时,他尽量避开传统手法,通过人物大量对话发掘他们藏在内心深处的喜剧成分。出自

人物之口的台词大多是赤裸裸的，反映了他们可恶、可恨、可悲、可笑的复杂心态。每个人物都是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漫画形象，通过哈哈镜看世界是剧作者追求的另一个目标。世界本身并不荒诞，而是有些人粗暴践踏了人类的基本规范，所以他们使毫无思想准备的善良人看起来十分荒诞。马季鲁不主张令人费解的普遍荒诞，他认为这毫无现实意义。但在剧情中恰当使用这一技巧，却可以引发人们对丑恶的戒备和警觉。荒诞是一种特殊的戏剧疗法。《月光下的白痴》(*Proştii sub clar de lună*)揭示了一组堕落分子的阴暗心理。戈古不但是个贪污犯，而且也是个玩弄女性的伪善者。同样，跟他厮混的两个女人也是玩弄男人的老手。在他们的眼中，根本不存在人间的道德。《这些虚伪的疯子》(*Aceşti nebuni făţarnici*)用抽象和对比手法刻画了另一组道德败坏的人。约尔达凯也是个只图享乐的国库盗窃者，他所追求的是活得开心，死得舒服。可是，人的心理是复杂的，除了作恶之外，他还想成为高雅的人，于是他和剧中的其他男女升入了极乐天堂。但在天堂里他们并不舒服，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与其当苍白无力的天使，不如返回人间做年轻力壮的猪猡”。回到人间后他们继续作恶，约尔达凯终于落个被枪毙的下场。《家具与痛苦》(*Mobilă şi durere*)具有较强的现实情节，揭示了两个家具厂坏头头的丑恶心灵。

这一时期的知名剧作家还有 I. 塞尔布、T. 曼内斯库、I. 纳基乌、D. 所罗门、L. 蒂奥多雷斯库、L. 古加、M. L. 雅科班等。

至此，本书粗略勾勒了罗马尼亚文学自萌生以来在历史上留下的一段发展轨迹。1989 年后，随着原东欧国家的巨变，文学领域又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动荡，构筑了十几个世纪的文学殿堂面临严峻考验。尽管形形色色的思潮恣意泛滥，但是文学的主流带给罗马尼亚民族的必将是扎根沃土、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文化繁荣。

主要参考书目

E. Lovinescu, *Texte critice*, Bucureşti, Editura Tineretului, 1968 (埃·洛维内斯库,《评论集》,布加勒斯特,青年出版社,1968)

F. Călinescu, *Istoria literaturii române de la origini până în prezent*, Bucureşti, Editura Minerva, 1982 (乔·克林内斯库,《罗马尼亚文学通史》,布加勒斯特,密涅瓦出版社, 1982)

T. Vianu, *Scriitori români*, Vol. I—III, Bucureşti, Editura Minerva, 1979 (图·维亚努,《罗马尼亚作家》1—3卷,布加勒斯特,米涅瓦出版社, 1979)

Ov. S. Crohmălniceanu, *Literatura română între cele două războaie mondiale*, Vol. I—III, Bucureşti, Editura Minerva, 1972—1975 (克洛赫莫尔尼恰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文学》, 1—3卷,布加勒斯特,米涅瓦出版社,1972—1975)

Al. Piru, *Istoria literaturii române de la începuturi până azi*, Bucureşti, Editura Univers, 1981 (阿·皮鲁,《罗马尼亚文学通史》,布加勒斯特,宇宙出版社,1981)

N. Manolescu, *Arca lui Noe*, Vol. I—III, Bucureşti, Editura Minerva, 1980—1981 (尼·马诺列斯库,《诺亚方舟》, 1—3卷,布加勒斯特,密涅瓦出版社,1980—1981)

E. Simion, *Scriitori români de azi*, Vol. I—V, Bucureşti, Editura Cartea Românească, 1978—1989 (尤·西蒙,《今日罗马尼亚作家》, 1—5卷, 布加勒斯特,书籍出版社,1978—1989)

M. Popa, *Dicţionar de literatură română contemporană*, Bucureşti, Editura Albatros, 1971 (马·波帕,《罗马尼亚现代文学词典》,布加勒斯特,信天翁出版社,1971)

文学大事年表

14—18 世纪封建时期文学

14 世纪,罗马尼亚境内形成三个封建公国:摩尔多瓦公国、罗马尼亚公国、特兰西瓦尼亚公国。

15—16 世纪,以古斯拉夫文传世的主要著作有《摩尔多瓦编年史》、《尼封主教传》、《巴沙拉布家训》、《米哈依编年史》等。

15 世纪初,引入印刷术。

16 世纪初,罗马尼亚文字开始应用。保存至今的最早一份罗语文献是 1521 年肯普隆市民尼亚克舒致布拉索夫市政长官的一封信。

17 世纪主要著作家与作品:

乌雷克:《摩尔多瓦公国史记》

科斯丁:《摩尔多瓦公国史记》

米列斯库:《中国纪行》、《中国游记》

18 世纪中期主要著作家与作品:

刊特米尔:《摩尔多瓦记事》、《象形文字史》

内库尔切:《摩尔多瓦公国史》

1780—1830 前近代文学

18 世纪末,阿尔迪亚尔学派与文化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米库、辛盖、马约尔。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主要作家与作品:

布达依—德利亚努:《茨冈史诗》(1800)

果列斯库:《游记》(1827)

沃科雷斯库家族的文人诗歌

1830—1919 近代文学

前“48”文学的开拓者：勒杜列斯库和阿萨基

前“48”文学主要作家与作品：

亚历山德雷斯库：《诗集》(1838)

内格卢兹：《亚历山德鲁·勒布什尼亚努》(1840)

1821 年人民起义

1848 年革命

“48”文学的开拓者：考格尔尼恰努

“48”文学主要作家与作品：

亚历山德里：《多依娜和泪花》(1852)、《田园诗集》(1869)、《戏剧集》(1876)

鲁索：《歌颂罗马尼亚》(1850)

博尔切斯库：《勇敢的米哈依大公治下的罗马尼亚人》(手稿)

1859 年，摩尔多瓦公国与罗马尼亚公国统一。

1877 年，罗马尼亚宣告国家独立。

后“48”文学主要作家与作品：

菲利蒙：《新旧豪绅》(1863)

哈什德乌：《米库察，一名大学生的三天三夜》(1864)、《勒兹万和维德腊》(1867)

奥多贝斯库：《伪狩猎书》(1874)

1863 年，文学社团“青年社”在雅西成立。其精神领袖是马约雷斯库。

经典作家及主要作品：

埃米内斯库：《诗集》(1883)

克良格：《故事集》(1890)

卡拉迦列：《暴风雨之夜》(1879)、《廖尼达先生面对反动派》(1879)、《一封遗失的信》(1884)、《时文与小说》(1897)

斯拉维支：《平民小说》(1881)、《玛拉》(1906)

世纪之交主要作家与作品 (1893—1918)：

赞菲雷斯库：《乡居》、《特纳色·斯卡蒂乌》、《战时》小说三部曲(1898—1902)

德拉弗朗恰：《日落》、《风暴》、《金星》戏剧三部曲(1909—1910)

弗拉胡察：《宁静时刻》(1899)

科什布克：《民谣、田园诗》(1893)、《纺绩集》(1896)

戈加：《诗集》(1905)、《土地向我们呼唤》(1909)

多布罗加努—盖利亚与倾向性文学

伊布勒依利亚努与民粹主义

马切东斯基与现代流派

1907 年，农民大起义。

1916 年，罗马尼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9—1944 现代文学

1918 年，特兰西瓦尼亚回归祖国，实现民族大统一。

洛维内斯库与现代主义

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诗人及诗作：

阿尔盖茨：《和谐的词》(1927)、《霉花》(1931)、《黄昏小诗》(1935)

布拉加：《光明诗集》(1919)、《先知的脚步》(1921)、《伟大的过渡》(1924)

巴尔布：《捉蜗牛》(1921)、《折射游戏》(1930)

巴科维亚：《铅》(1916)、《黄色的火花》(1926)

沃伊库列斯库：《初熟》(1921)、《天使诗》(1927)、《命运》(1933)

菲利皮德：《被闪电击中的石崖》(1930)、《时代轰鸣声中的

梦想》(1939)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小说家及作品：

雷布里亚努：《伊昂》(1920)、《绞刑森林》(1922)、《起义》(1932)

萨多维亚努：《泥棚户》(1912)、《安古察客店》(1928)、《斧头》(1930)、《吉德里兄弟》(1935—1942)

阿格尔比恰努：《大天使》(1914)、《曼恩神甫》(1920)

Cz.佩特雷斯库：《黑暗》(1921)、《使徒》(1935)

巴巴达特—本杰斯库：《长发披散的处女》(1926)、《巴赫音乐会》(1927)、《隐秘之路》(1933)

Cm.佩特雷斯库：《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最初一夜》(1930)、《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1933)、《坚强的人》(1922)

埃里亚德：《梅特蕾依》(1933)、《克里丝蒂娜小姐》(1936)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剧作家及作品：

埃夫蒂米乌：《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真实故事》(1911)

索尔布：《红色冲动》(1916)

穆沙特斯库：《泰坦尼克号与华尔兹》(1932)

波帕：《塔凯、扬凯和卡德尔》(1932)

基利采斯库：《扯闲话的女人》(1932)

齐普里安：《人与瘦马》(1927)

塞巴斯蒂安：《假期游戏》(1938)、《无名星》(1944)

1940年，安东内斯库组阁，实施法西斯军事独裁。

1941年，罗马尼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4年后当代文学

1944年，“8·23”武装起义

1947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起及演化

新时期主要诗人及诗作：

阿尔盖茨：《1907—小景》(1955)、《人的颂歌》(1956)

沃伊库列斯库：《续莎士比亚14行诗》(1964)

菲利皮德：《巴比伦独白》(1967)

多依纳什：《生着银牙的野猪》(1945)

杜米特雷斯库：《开枪的自由》(1946)、《抒情冒险》(1963)

卡拉扬：《不属于任何人的清晨》(1967)

贝纽克：《等待日出的人》(1946)、《向前，共产党人》(1953)

热贝利亚努：《不能忘记》(1945)、《广岛的微笑》(1958)、《汉尼拔》(1973)

巴努什：《女儿国》(1937)、《刚刚退出竞技场》(1967)

巴康斯基：《黎明颂歌》(1962)

拉比什：《初恋》(1956)、《与惰性斗争》(1958)

斯特内斯库：《爱的含义》(1960)、《情感的影子》(1964)、《蛋与球体》(1967)、《非词语》(1969)

索雷斯库：《独立于诗人行列》(1965)、《时钟之死》(1966)

布兰迪亚纳：《第三种秘密》(1969)、《睡眠中的睡眠》(1977)

亚历山德鲁：《怎么对您说》(1964)、《愉快颂》(1973)

波乌内斯库：《超感情》(1965)、《一秒钟的历史》(1972)

新时期主要小说家及作品：

萨多维亚努：《马蹄铁尼古拉》(1954)

Cm.佩特雷斯库：《一位杰出的人》(1953—1957)

克林内斯库：《可怜的约阿尼德》(1953)

沃伊库列斯库：《故事集》(1966)

博格察：《奥尔特见闻》(1945)

斯坦库：《赤足》(1948)、《吉卜赛营》(1971)

普雷达:《莫洛米特一家》(一卷,1955;二卷,1967)、《呓语》(1975)、《世上最可爱的人》(1980)

波波维奇:《陌生人》(1955)、《渴望》(1958)

巴尔布:《坑》(1957)

杜米特鲁:《无尘之路》(1950)、《家庭纪事》(1956)

伊瓦修克:《鸟》(1970)、《水》(1973)

波佩斯库:《F》(1969)、《御猎》(1973)

布列班:《病态动物》(1968)

布祖拉:《缺席者》(1970)、《沉默的人》(1977)

措尤:《野葡萄遮掩的前廊》(1976)

伦克冷让:《后人的痛苦》(1978)

勃勒依察:《两天的世界》(1975)

尼亚古:《天使的呼唤》(1976)

勃努列斯库:《男人的冬天》(1965)

新时期主要剧作家及作品:

达维道格鲁:《矿工》(1949)

德麦特留斯:《三代人》(1956)

巴朗格:《疯狂的羔羊》(1954)、《普遍利益》(1971)

洛维内斯库:《艺术家之死》(1964)

埃维拉克:《第五只天鹅》(1976)

马季鲁:《这些虚伪的疯子》(1973)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罗马尼亚文学
作者＝冯志臣著
页数＝２１３
ＳＳ号＝１１０５２１１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年０６月第１版